800379-83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

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　编



Fufa Qingong jianxue yundong shiliao

3

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

8003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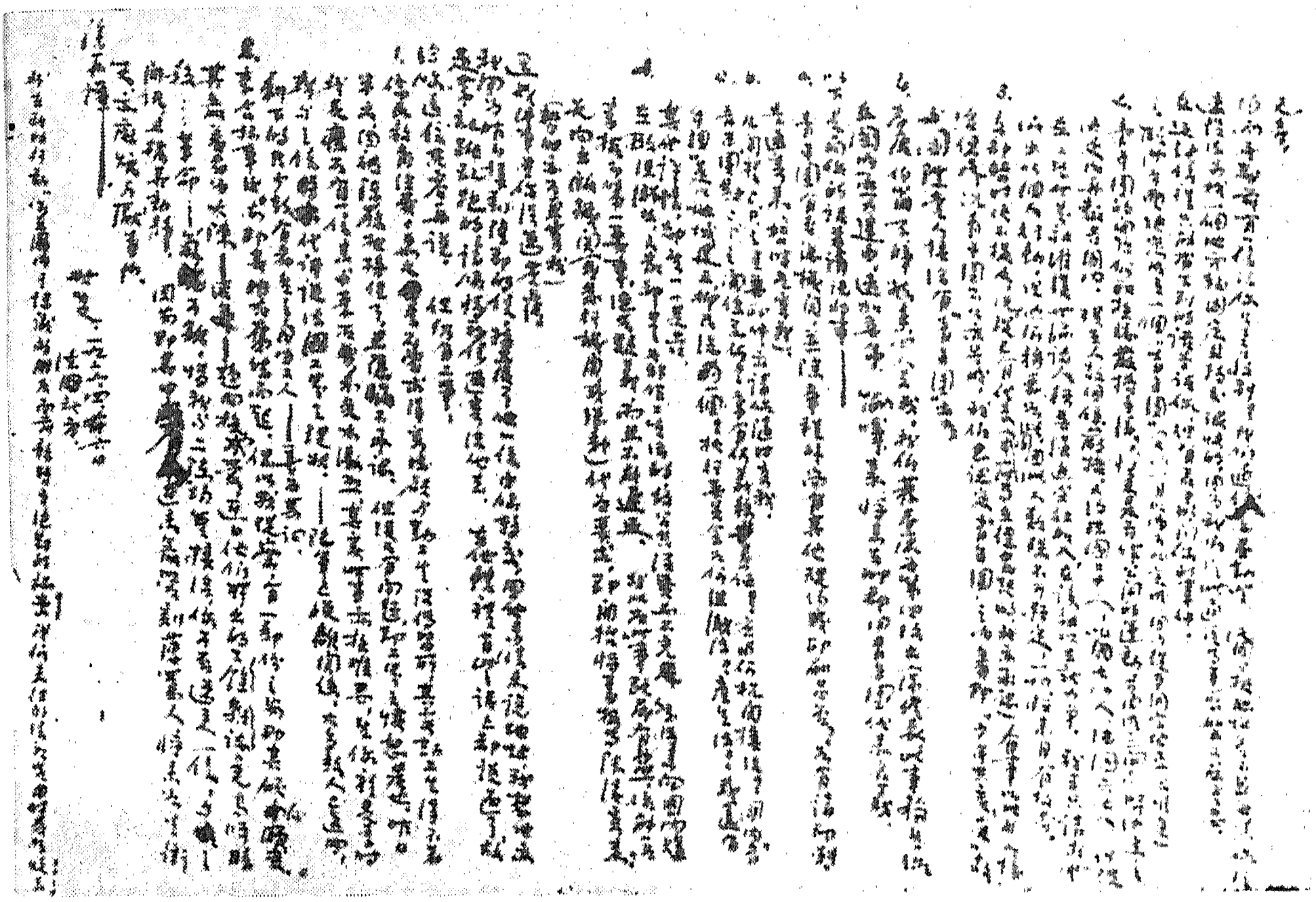
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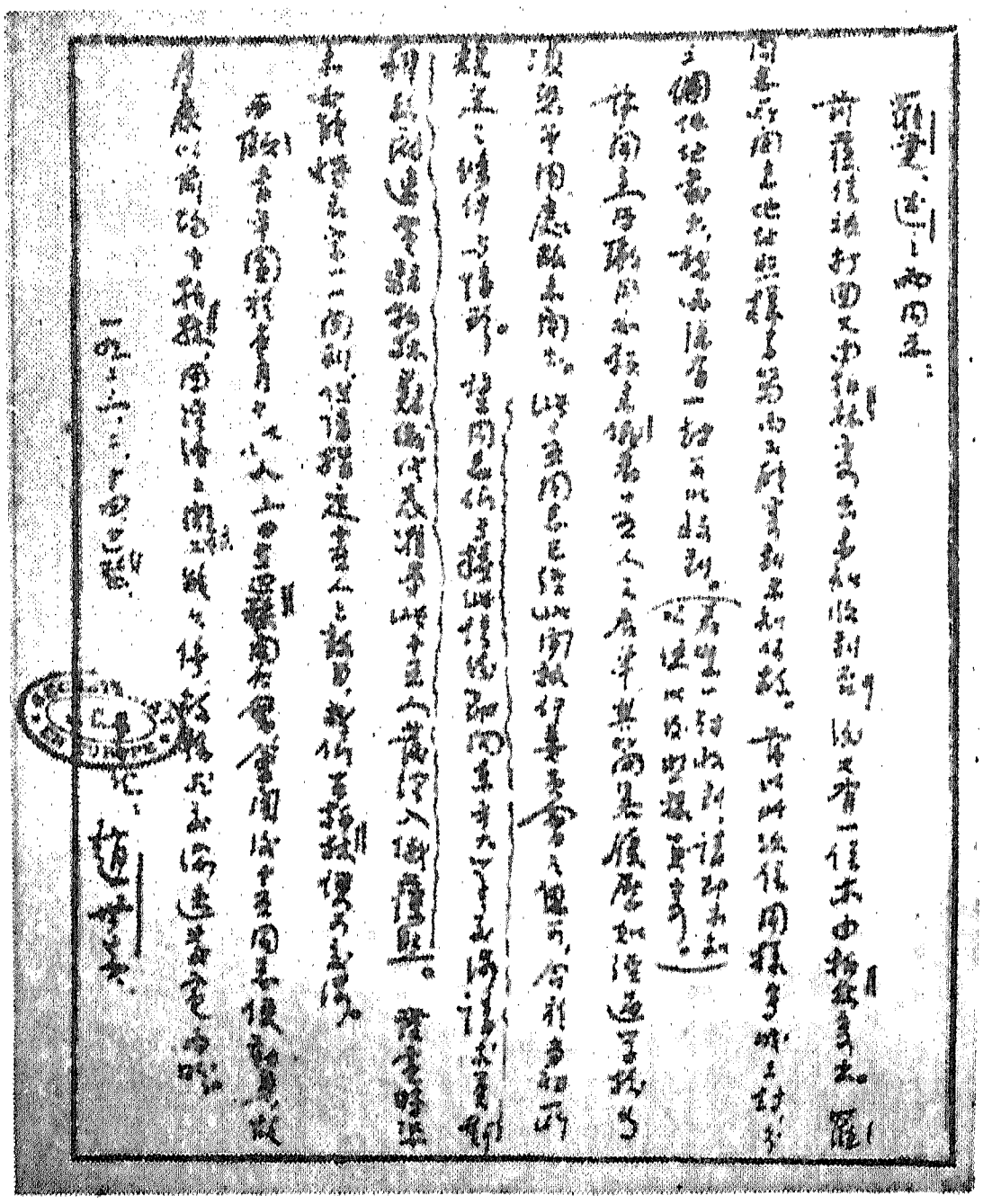
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

第 三 册

北 京 出 版 社



赵世炎同志关于建团问题给陈公培的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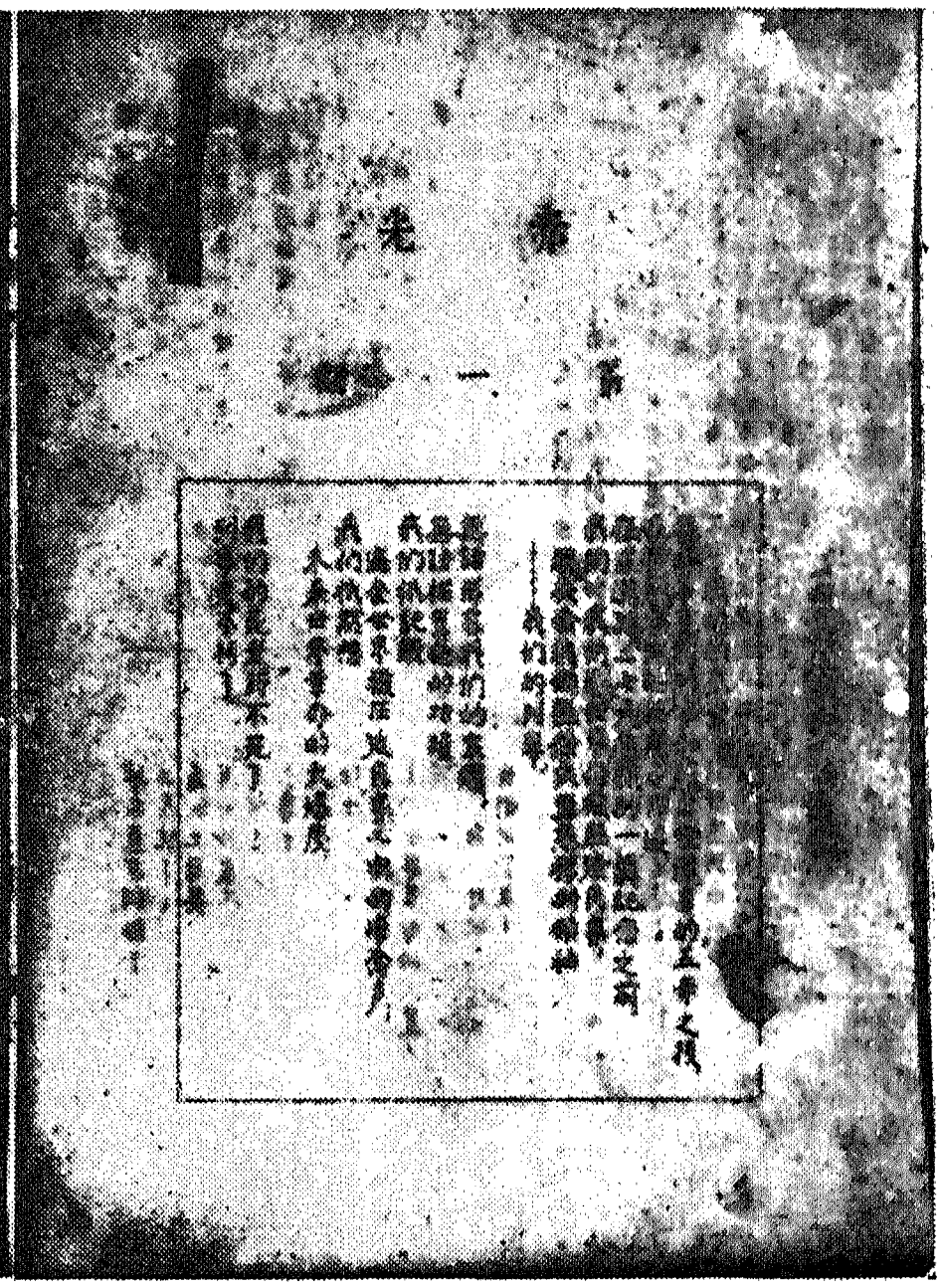
赵世炎同志关于派遣团员赴莫斯科学习给中共旅莫支部负责人罗亦农等同志的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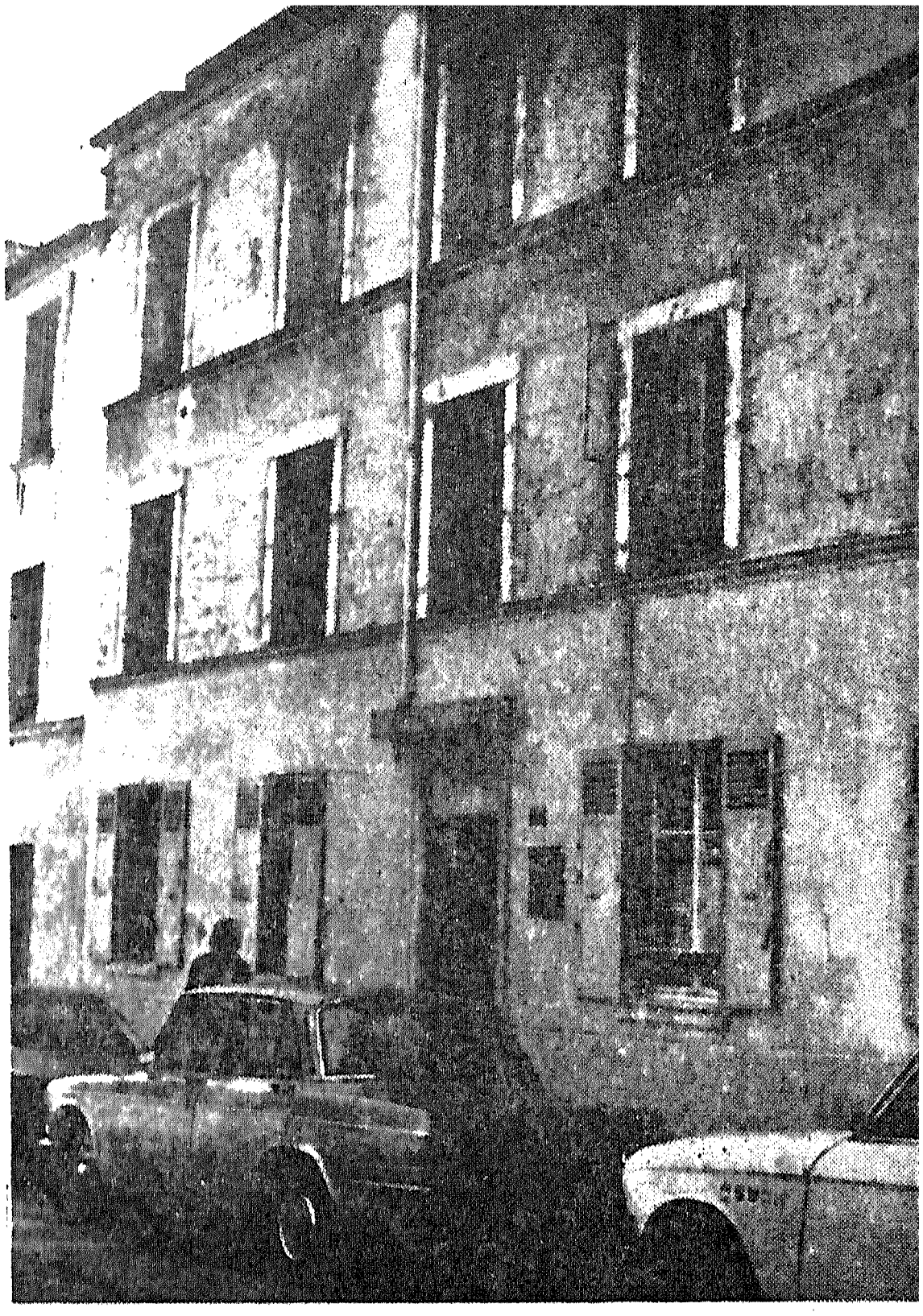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的机关刊物《少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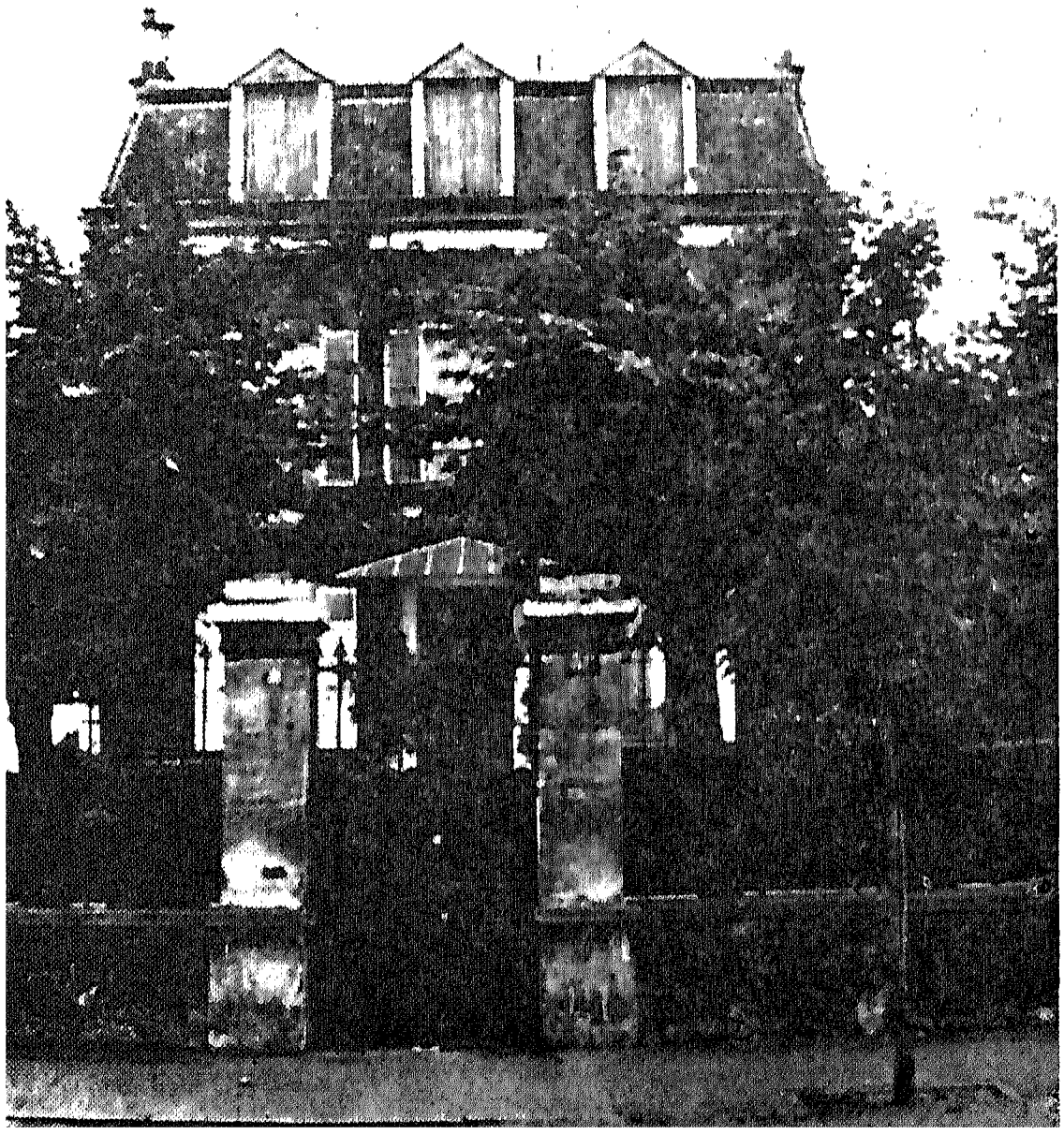
《赤光》半月刊的封面和第一期的目录。







法国巴黎市戈德弗鲁瓦街十七号——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所在地。



《赤光》社社址——距巴黎十二公里的加雷钠—科隆贝市波安特街三十九号（现改名梅特里克街）。



反映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几种刊物。

编 者 说 明

本册包括第四卷：论著；第五卷：回顾。

回顾部分，主要是收集国内报刊上发表的有关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回忆；力求齐全；有少数文章是初次发表的。文章一律按写作时间先后编排。为节省篇幅，凡解放后报刊上登载过的，一般只在目录上列出篇名（即带有＊者），注明出处；只有少数不易查找和需加注释说明者才全文刊载。

不当之处，希望指正。

目　　录

第四卷　论　　著

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考察和揭露

欧战后之欧洲危机……周恩来（3）
英国经济现象之恐慌……恩　来（9）
问题中之英国经济救济……恩　来（17）
过去一年之德意志……熊　锐（24）
待开声中之华盛顿会议……恩　来（30）
华府会议后的美国帝国主义者……翔（37）
法国强盗已自行揭破华盛顿会议黑幕了……飞　飞（39）
美国帝国主义者之对华政策……恩　来（40）
太平洋上的新风云……恩　来（43）
请看国际帝国主义之阴谋……希　贤（45）
我两年来旅法勤工俭学的实感……陈　毅（47）
我两年来旅法的痛苦……陈　毅（54）
法国资本家虐待中国女子……郭隆真（58）

二、对各国工人运动、革命运动和共产党的考察

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始末……恩　来（61）

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续志……恩　来（72）
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再志……恩　来（77）
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影响……恩　来（88）
西欧通信……恩　来（91）
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波折……恩　来（94）
英国矿工总投票之结果……恩　来（103）
法国哈佛柳史雷德工厂的华工实况……富　春（107）
法国最近的劳动运动……蔡和森（117）
劳动世界之新变动……恩　来（133）
德国革命运动的过去……伍　豪（142）
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之新发展……李富春（146）
德国之政争……富　春（148）
今日共产党之真谛何在？……R（张申府）（150）

三、学习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批判各种反动思潮

马克思主义底几个重要点……熊　（157）
帝国主义底解剖……朴　生（169）
十月革命……伍　豪（175）
俄罗斯革命的教训……F（181）
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傅　钟（188）
赤俄最近之经济状况……允　常（谢唯进）（193）
新苏俄联邦与帝国主义……锐（201）
——一九一七至一九二四
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石　夫（203）

*　　*　　*

俄国革命是失败了么？……伍　豪（210）
——质工余社三泊君
一个无政府党和一个共产党的谈话……Y. K.（215）
“工人与政治”……行　侯（246）
批评曾琦君底《神圣联合与统一前敌》……林　蔚（261）
实话的反感……伍　豪（265）
航空学会的害群之马……恩　来（267）
为周道事答湖南学生会书……恩　来（268）
请看反革命的青年党之大肆其捏造……希　贤（271）
请看《先声》周报之第四批造谣的新闻……希　贤（273）
你们就是“反革命”和“军阀的走狗”……肇　樵（275）
《先声》周报之狂吠……京　岐（277）

*　　*　　*

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伍　豪（279）
罗拜在罗马教皇脚下的中国学生……耻（285）
可注意的中法友谊会……林　蔚（288）

*　　*　　*

评胡适的“努力”……飞　飞（290）
胡适等之政治主张与我们……R（294）

*　　*　　*

旅法的中国青年应该觉醒了……列父（赵世炎）（297）
——投机、改良与革命
健社纲领草案批评……J（301）

四、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问题的论述

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蔡和森（307）

共产主义与中国……伍　豪（314）
——从经济现状上立论
革命救国论……伍　豪（321）
论工会运动……伍　豪（326）
共产主义革命将怎样在中国实行？……李慰农（333）
中国共产党与其目前政策……R（345）
反对帝国主义联合战线怎样在中国应用？……D（347）
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Y.K.（353）
列强共管中国的步骤……飞　飞（357）
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伍　豪（359）
亲美派的中国人听着……飞　飞（363）
国际帝国主义乘火打劫的机会又到了……伍　豪（365）
救国运动与爱国主义……伍　豪（367）
弱小民族的国的主权收回运动……翔（369）
两个不惹人注意的问题……飞　飞（370）
三百多条生命换来这样三条要求……翔　宇（372）
又是一个乐志华和田仲香的继死者……飞　飞（374）
北洋军阀的内哄……伍　豪（376）
再论中国共产主义者之加入国民党问题……恩　来（380）
——答胡瑞图、吴樵甫、威重三君
为徐树铮来法告旅欧华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384）
段祺瑞政府与工人阶级……觉奴（肖朴生）（386）
为孙中山先生逝世告旅欧华人
……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387）
中山逝世与国民革命……朴　生（389）

第五卷　回　　顾

*毛泽东谈留法勤工俭学生中建党情况

（一九三六年）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42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2月）

周恩来谈赴法勤工俭学……（399）

（一九三六年）

回忆赴法勤工俭学……蔡　畅（401）

（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五日）

自传的一页……王若飞（407）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日发表）

*永恒的记忆——哀悼王若飞同志……蔡　畅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日）

（《光明日报》1978年4月8日重发）

回忆留法勤工俭学时代的王若飞同志和黄齐生先生……徐特立（410）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哀忆若飞老友……郭春涛（415）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关于王若飞同志……肖　三（418）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哭若飞（诗）……陈　毅

（一九四六年四月）

（《光明日报》1978年4月8日）

赴法勤工俭学时期的陈毅同志……秋　羊（421）

（一九四九年五月三十日至六月四日）

*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 ……廖焕星

（一九五三年）

（中共中央宣传部党史资料室编《党史资料》1953 年第 1 期）

*回忆赴法勤工俭学和旅欧支部 ……肖　三

（一九五七年四月）

（《"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8 月）

*回忆赴法勤工俭学……吴玉章　徐特立
何长工　李卓然

（一九五八年三月一日）

（《革命长辈谈勤工俭学》，《中国青年》1958 年第 5 期）

*勤工俭学生活回忆 ……何长工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

（《勤工俭学生活回忆》，工人出版社 1958 年 11 月）

*在无产阶级的熔炉里——回忆社会主义青年团
旅欧支部……何长工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在红色摇篮里》，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9 年 12 月）

*谈赴法勤工俭学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 ……蔡　畅

（写于五十年代）

（《"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8 月）

*傅钟谈旅法勤工俭学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

（写于五十年代）

（《"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8 月）

*对赵世炎事迹的回忆 ……肖　三

（一九六〇年七月三十日）

（《"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8 月）

对世炎的回忆……李立三 (435)

（一九六〇年九月三日）

*郑超麟谈赵世炎和旅欧支部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十四日）

（《“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8 月）

*尹宽谈赵世炎和旅欧支部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十六日）

（《“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8 月）

*回忆赵世炎同志 ……吴玉章

（一九六二年）

（《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 1978 年 11 月）

*回忆党的发起组和赴法勤工俭学等情况 ……陈公培

（写于六十年代初）

（《“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8 月）

*留法勤工俭学小史 ……江天蔚

（一九六三年三月）

（《文史资料选辑》第 34 辑，1963 年 3 月）

*对《留法勤工俭学小史》的补充 ……胡海秋

（一九六三年三月）

（《文史资料选辑》第 34 辑，1963 年 3 月）

关于中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些情况……高承元（440）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

*回忆旅欧期间的周恩来同志 ……何长工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7 年第 6 期）

*缅怀向警予同志 ……蔡　畅

（一九七八年四月）

（《纪念向警予同志英勇就义五十周年》，人民出版社 1978 年 4 月）

*留法勤工俭学的斗争和旅欧总支部的建立 ……何长工
（一九七八年八月）
（《文史资料选辑》第56辑，1978年8月）
*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情况的回忆 ……张申府
（一九七七年三月、一九七八年九月）
（《"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
*要为真理而斗争——记留法勤工俭学中的陈毅同志
……何长工
（一九七九年一月）
（《人民的忠诚战士——缅怀陈毅同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1月）
*击石有待于刀斧——忆陈毅同志勤工俭学前后
……陈孟熙
（一九七九年一月）
（《人民的忠诚战士——缅怀陈毅同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1月）
*赵世炎生平史料
（一九七九年一月）
（《文史资料选辑》第58辑，1979年1月）
*回忆新民学会 ……李维汉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五日）
（《历史研究》1979年第3期）
*回忆五四时期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唐　铎
（一九七九年四月十日）
（《五四运动回忆录》(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11月）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的和森同志 ……唐　铎
（一九七九年七月）
（《怀念蔡和森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4月）

*赴法勤工俭学前周恩来同志对我的教育 ……徐天骝
（一九七九年八月）
（《周恩来青年时代》，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编《研究资料》1 1980 年 5 月）
*风华正茂 挥斥方遒——蔡和森同志与新民学会…李维汉
（一九七九年十月）
（《怀念蔡和森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4 月）
*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在德法两国的革命活动……吴 琪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周恩来青年时代》，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编《研究资料》1 1980 年 5 月）
*月下常思君——怀念蔡和森同志 ……肖 三
（一九八〇年三月）
（《回忆蔡和森》，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3 月）
*回忆我的良师益友——蔡和森同志 ……唐 铎
（一九八〇年三月）
（《回忆蔡和森》，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3 月）
*我所知道的早期之蔡和森 ……沈宜甲
（一九八〇年三月）
（《回忆蔡和森》，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3 月）
*与周恩来同志同船赴法的追忆 ……谢树英
（一九八〇年五月）
（《周恩来青年时代》，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编《研究资料》1 1980 年 5 月）
留法、比勤工俭学的回忆……江泽民 (445)
（一九八〇年五月）
追随徐老赴法勤工俭学的前前后后……熊 静 (469)
（一九八〇年六月）

*记巴黎戈德弗鲁瓦街 17 号……肖　三
（一九八〇年九月二十五日）
（《百科知识》1980年第 9 期）

*　　*　　*

华法教育会与勤工俭学生……盛　成（484）
（一九三二年八月）
留法勤工俭学若干情况……陈泽孚（502）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

第四卷

论著

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考察和揭露

缺页

欧战后之欧洲危机

周　恩　来

吾人初旅欧土，第一印象感触于吾人眼帘者，即大战后欧洲社会所受巨大之影响，及其显著之不安现状也。影响维何？曰生产力之缺乏，经济界之恐慌，生活之窘困；凡此种种，均足以使社会上一般人民饥寒失业交困于内外，而复益之以战争中精神文明所得间接之损失，社会之现状，遂乃因之以不安。吾人未出国前，虽屡震夫欧战影响巨大之论，然终以为欧洲物质文明发达甚盛，数年来之摧残，特不过数部分耳，何能碍及全体之发展？比以实验证之，方知昔日之理想乃等诸梦呓。欧洲一切组织非如吾国散沙可比，一切工商业咸有关联。而生产力之集中，厥维工厂、运输、保险、分配，又济之以密如蛛网铁路、航路，互有联属之银行公司商店，虽曰生产贸易自由，而其关系之深，计算之周，固已趋于集中之势矣。乃至欧战一起，人力之征役、生产力之损失、生产品之耗费、商业隔断，已不可计算。一地之牺牲，乃倾全国精锐牺牲也，一战之牺牲，乃倾全欧精锐之牺牲也。四年来影响所及，欲其求免于穷困也难矣。故游于巴黎、伦敦之市，虽觉繁华远过东亚，然物质文明之享受，如煤也、电也、面包也、糖也，已不能如我国上海、京、津之取给均足矣。至失业者之多，固不能与我国北省饥民之数与景况相较，然即以英伦苏

格兰论之，见失业者已超过百万上矣，是固不及吾两省之大，而所得之失业人数也。然其中有一事宜正告国人者，吾国之饥馑由于天时者半，由于人力不自振兴，不思求免于水旱之苦者亦半，故一经水旱，则唯有坐以待毙。若欧洲失业之人，彼自身固非无一技一艺者，置之工厂中，彼之运用机器之巧，窃恐有过于吾国之专门学校毕业生，中学生更无论矣，是验之于留法勤工俭学生入厂勤工而知也。且欧洲失业之人，均怀有技能而无地可施；吾国则不但无业之人无技能之可言，即得业之人，亦属技能仅见；是欧洲已失业，在吾中国仅可名曰无业。欧洲无事之人既如此其多，则其一人（欧洲工人多无家者）一家之生活，将从何而得以维持？是固今日社会上所最为骚扰之问题也。

不仅此也，欧洲多工业国，其工人组织之完备，与夫自谋协力之热心，在我国今日都未曾梦见，而其结果尚不能得完善之救济，则中等阶级人既无团体之协助，又受经济现状之压迫，其失业与窘困者又不知若干人矣。

推求其原，失业者之所以增多，由于商务之停滞、生货之缺乏、资财之不足、税则之重敛、物价之腾贵、工厂之倒闭，凡此种种，均互为因果，以至于产业不能振兴，而工人失业也。是种现状，不仅英法为然，欧洲各国莫不然也，而尤以战败国为尤甚。于此各国执政者求所以解决之道者，除俄罗斯已为工人苏维埃另有解决方法外，其大旨均不外农业之开拓，求所以自给之道；商业之恢复，求收回战前地位；并谋所以扩充各工业之奖励，以图外输货物之增加。凡此数事，固各国全国一致所主张者，然为谋一国百年大计诚得矣，非所以语于今日之窘困，与夫各国之交相迫也。皆若目前之救济，则欧洲联合国方面有一共同目标焉，曰定德国之赔款确数，约束德国履行条约，救济中欧。

恢复以前商务状态，是不仅欧洲联合国方面渴欲解决，即德意志，即中欧各国，亦何莫不盼其下文作如何分解也。而英人于此犹有一独得秘方，是曰与俄通商。各国之所踌躇恐惧莫能决者，英政府乃竟于前一星期，将对俄通商协定条文与驻英俄代表决定，交莫斯科方面议复矣，舍此暂不论。前所举各国政府所视荦荦诸大端者，固已经诸国讨论二年之久，于上一星期（一月二十三日——二十九日）在巴黎联合国最高会议决定矣。此次最高会议负重大责任者，除美代表未参与外，殆莫英法若。法首相白里安，新任也，登台第一声，竟将两年来法人所渴望之赔款确定，其周旋于列国间者，有足多焉。盖法主多赔，英主少赔，兹次会议英首相劳特乔治亲身往法，带去代表至四十多人，亦可谓兴师动众，视为极大问题，而竟不能胜其少赔之主张，此盖证之于会议中。彼曾对外人言德国赔款总数为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磅（五十万万金磅），而结果竟不然也，然则赔款总数究若何耶？试观下列之所记：

巴黎联合国最高会议开会，讨论一星期，经星期五（二十八日）之长久讨论，于星期六定为下列之决议：

协约国相信他们的坚固联合，是必须去保持和平，为同他们换此以胜战争的*，并且决定不许别的事件来损害他。他们相信这个联合是世界和平同条约实行的坚实保证，用国际间聚合同签定的忠实来保证他。

至于条文的内容，关于善后协定，德国应赔偿协约国一百一

---

* 原文如此。

十三万万金磅，合现今金马克为二千二百六十万万。其赔偿方法，分为四十二年，头二年每年交十万万金磅，继之以交一万五千万者三年，交二万万者三年，交二万五千万者又三年，其余三十一年则年交三万万金磅。此外德国尚应每年交出其出口税百分之十二与协约国，亦继续至四十二年为止，斯项在第一年可希冀得七千五百万磅。对于别项罚款，其所谓宽待条件者，则在应引交款时期前，转将赔款交出，第一二年可得百分之八折扣，继之四年可得百分之五折扣。又有罚约，如德至期不付赔款，由联合国取其关税偿还，并定其新税则于国内。至赔款之分配，则法得五十八万七千六百万为最多，英得二十四万八千六百万，意得十一万三千万，比利时得九万零四百万，葡、日各得八千四百七十五万，其他各国得余数七万三千四百五十万。

关于德国履行条约之规定：德国解除武装务于本年七月一号实行完了，而重费兵器尤宜于近三月内完全交出。而同时最高会议又采福煦元帅等之提议，谓德国再不履行此种条约，则立行下列之四种罚约：(一)占领新德国之领土；(二)延长现今的领域；(三)设税关测算处在莱因河的左岸；(四)非至德国能保持伊的倾向去实行以前一切的条约，不许其加入国际联盟。

对奥问题：各国佥同劳得乔治之提议，暂缓取偿于奥，并决定得在（崔爱斯剃）有一会议，讨论此事。且将遣委员团至奥调查其经济现状，因据报告云，欲创立奥国经济组合，必须助奥以八百万磅。所有决议均由巴黎最高会议于一月二十九日晚间致公文于柏林政府，征其同意，俟本月二十八日预定之伦敦会议正式决定之。

以上记录发表于前日英法各报，全欧人民足资为谈料矣。隐泣者有之，欢呼者有之，德人反对无论矣，而英国社会间不满之

声亦群起，是实大可异焉。夫以多索赔款以救济国内经济现状，以陷德人于穷蹙之境，解除武装，限制兵备，以保国内和平，以减敌人危险，此法国多数人共同一致之主张也。至于英国政府或以此为救济战后之急需，而民间识者及劳动工人，固未尝视此为良药，于此请进论赔款确定后所生之影响如何。

赔款总数为一百一十三万万金磅，此种巨大偿额在历史既为创见，而在今日新创难复百无一存之德国，尤无力偿此。证之德国现今国家收入，而断其不易偿还者一也。英、法、意等国之定此偿额，不但为一方面之主张，且多属政府派之主张，一旦内阁易人，此等条款是否能接续赞成？且偿期延长至四十二年之久，在此期内英、法、意等国内情之骚扰，暨德国将来变化之不测，此种苛约，谁能保其于社会改造时有延长之生命？此对于偿还时期而易致疑者也。至出口税扣留百分之十二，则协国之取偿于德，无异于取偿于本国国民也。盖德既因扣其出口税，此后货物为力求广售，方得增加国家收入，以偿国债，使其货物价低，则各国货高者难与竞争，资本家受直接之害，各国工人受间接失业低薪之苦，是欲求调解战后状态，反益之以纷纠不安。此于扣税方法是否合宜而不能无疑者也。若限德高其物价，则售出不易，国家收入因之减少，偿债维艰。且欲求足其偿额，则必奖励出口，减少入口，以今日情状论，德之入口货远过于出口，而其所需又为食料、原料，禁食既有所不能，断绝原料之输入，则输出又奚从其增加？是使德左右维艰，而决无法以负此巨债。夫罚在能行，而协约之所需亦在得款以济急，以调解现状，如是而曰德能应承，是尤不能不令人致疑者也。

然则结局果何如乎？是曰欧洲经济状况紊乱之起点也。若曰本月二十八日之伦敦会议，便可解决此种问题，亦犹梦呓耳。总

之欧洲今日之危机在物质，换言之即经济上的面包问题也，全欧人民之生活窘困，而乃夺德人之食以救协约国人，是岂根本解决耶?!

且夺来之食，未必便救济无食之人。取之以增兵饷、制兵械、造军舰者泰半，取之以饵资本家之口者又半，逮饥饿待救者则已无缘分润矣。不仅此，德人之食为人所夺，必思有以济其饿，则内以减薪裁人取之于工人，外以贱售夺之他国，他国亦以减薪裁人贱售之道报之，于是辗转而全欧工人拜（夺食）之赐矣。是欲图现状之安，而终无以易不安也。

但欧洲工人非盲目者，且社会党人复从而鼓吹之，宣传之，今非仅英国劳动党职工组合声言反对矣，即法国 CGT 之工人亦倡言反对，使其国民知多索赔偿固无益也。美国消息谓，其政府已以未出代表会议，声言扣德出口税款对于美商业有直接损害，提起抗议矣。

至若吾人或于此等问题如隔岸观火，不甚关切，然使欧洲危机终不可免而至于爆裂也，则社会革命潮流东向，吾国又何能免？使赔款而终有济也，则德人取偿之术，又岂能外于奖励产业，辟新商场于欧土以外？而同时协约国得其偿款，其奖励产业与辟新商场，其法亦正相同，吾中国必为其消化之所，固无用致疑。吾人又焉能不推论其根源，记其近况，以为国人告。（二月一日）

天津《益世报》1921 年 3 月 22—23 日

英国经济现象之恐慌

恩　来

欧洲各国经济现象，自大战后殆无不陷入枯窘之境，其中稍能自拔者厥惟英国。彼之所恃，在金融界之紊乱不若各国之烈；金磅行情犹能保持战前地位；国债数目出入相抵，犹有余裕；产业毁坏极微，无复若大陆各国受摧残之巨。凡此种种，皆英国于欧洲经济界中所视为足以沾沾自喜之具，不致陷入恐慌漩涡中，以与诸国同处绝境者。然此种观察，究属之表面，倘深知欧洲经济内情者，则知各国国际间经济现象关系之深，一发动可以牵大局，大陆各国既同处窘境，英伦三岛断非能置身局外者。且欧洲经济现象紊乱，常常影响于新大陆，矧英伦一海峡之隔，能无所关联？故英国当局者，于国内财政之度支，与经济之整理，亦尝致意于节流开源之道，惟收效极微。近者国家预算出入之差，亦竟达万万磅以上。其所以促成此恐慌者，其成因虽与大陆各国有别，然国民所受之痛苦，则结果无或二途。今试就其恐慌之成因现象与英政府救济之方法，分叙之如下。

经济现象恐慌原因

大战四年，英人之牺牲虽不如法、比之巨（若以数计，比犹不及英多多），然影响及于其国外贸易者，可谓至大。战后恢复，英国

首重贸易情况，争回旧观，三年来孜孜不息之图，无不以整理国内工业，开辟国外商场为事。东亚商业，因战事故，日、美已大着先鞭。英国困于船舶，困于资财，雄飞之愿，已不能如战前之任意而为。海外属地，其力能自给者，工业品渐可足用，且美货亦浸渐以入，英伦出口货已不复能据为专利。畅销之场，遂仅限于欧陆及中亚，但中亚荒芜之区居多，物质文明不甚发达，所需物品遂亦无多；欧陆困穷，战后既自顾不暇，则各国于入口货购买，当亦不复如战前之恣意所欲。英、俄通商，协定虽已签定，然成效尚未得睹。德属战败之国，因赔款担负过重故，须力图出口货品增加，入口货受抵制自在意中。中欧各国财政多濒于破产，更难倚为富裕顾主。其余各国，或方求自保，或意在竞争，于英货入口自不免有歧视之感。总之，英货出口三年来虽备极整顿提倡之方，其所得效果总难与战前相提并论。生活程度日高，国家支出倍增，而贸易情况反视战前为减少。则税则虽高，其收入与增加减少之比例，断难相合，度支亏累自亦难免。三年来英政府日日声言裁减预算，而实未能。至收入之恐慌，则日甚一日，近日欧陆各国币价大跌，乃尤为英国财政上重大打击。盖英磅价高，各国币价日落，贸易场中之来往，遂不得不趋于停顿。昔日有预定货品者，至是因金价行情之不定，类多踌躇不欲即付物价，货品之取引，遂亦以之迟延。其有货品已至而未交价者，亦因磅价之暴涨，不能即时售货。至欲定而未定之货客，届此行情不稳之时，更不愿以极高之价购此难销之货矣。因此一月来英国工场及取引商人所受之损失极大。已交出之货，货价一时难以收回；未售之货，销出更属难望。积货过多，影响及于生产，外款不至，愈使生产之力见减。首蒙其害者，乃为工人之失业。缘场主欲图自利势不得不减少工人，限制出产，以事缓和。工人失业嗷嗷待哺之

状，势必求援于政府。一方出口货减少，政府之财源又现窘象，两方相迫，结果英政府之财政现象，遂终难免于恐慌，此英政府燃眉之急也。故月来英政府当局对于救济失业、整顿财政、恢复商业之计划，非常重视，其聚精会神不亚于对爱尔兰问题之应付。而使其不得不如此者，金价之高低不定实为其枢纽。兹取战前之行情与近数日来之变化，比较观之，当知其中差异之巨矣。

各国币名	战前每磅行市	本月二十日行市	昨日行市
德国马克	二〇.四三	四二九.〇	四七〇
法国佛郎	二五.二二	五一.九五	五三.〇〇
比国佛郎	二五.二二	五二.八五	五三.〇〇
瑞士佛郎	二五.二二	二一.五八	二一.六〇
意国尼尔	二五.二二	九〇.〇〇	九一.五〇
奥国克郎	二四.〇二	四三〇〇.〇〇	六〇〇〇.〇〇
西班牙珮赛达	二五.二二	二八.五八	二八.六〇
荷兰弗劳令	一二.一〇七	一一.六五	一一.五九
美国金洋	四.八六	三.七二	三.七三

观上表所列，各国币价，除中立国及美国外，其在战前后与金磅行市之相差，少亦在一倍上，多直不可道里计。其在近数日，则金磅行市之高，虽美金亦未能与之相较。跌价最大者，以德之马克、奥之克郎为最甚，奥币愈跌，中欧之金融愈乱，英货愈难畅销。德币自五月赔款定后，行市日落，其受现金交纳之影响自无待言，惟德币愈落，德货销行于外者亦愈贱，北欧、中欧之市

场，德货大有取英货而代之势。机器及化学用品，英货价值竟有达德货一倍上者，人又何所爱于英而必购英货，故英货受挤乃为当然之事。英伦岛上各工场一月以来受货物压积难销之影响，生产交易两蒙损失，资本家之报纸连篇累牍述工场之苦况，社会党、工党之报纸则反之声诉工人失业之苦。比较观之，便知英伦岛上之经济现象之不安，已成为不可掩之事实矣。

英政府节流之计划

大战停后，英政府于开源节流之计亦未尝无意进行，惟开源除索赔款外，总难免有增税之嫌。英人税重，已冠世界，若再有所加增，势必招国民反对。故节流之议，盛倡于时，国会中反对政府党有所谓"反对浪费者已成为反对党之别名"矣。节流办法，在一九一九年八月二十日英首相便致书各部，嘱各管部大臣于其管辖范围之费用力求俭省，但结果不但俭省未曾做到，且支出竟有多较前加增者。至一九一九年十月首相复谋为第二次之减政，由结特勋爵组织财政委员会，以首相为主席，而审查结局，各部预算仍按旧表支出。至今年二月又有预算委员会出现，审查之依据虽极力注重经济现象，然结果亦无甚可记录之成绩。本年预算乃为停战后第三次预算，而所提出者仍丝毫无所削减，国会中不但反对党大哗，即政府与党亦有窃窃私议，以为不尽当者。一年来补缺议员选举，反对浪费派之议员多获选，政府睹此情形，知减政之议如再延不即行，现政府亦难免于动摇。故劳特乔治当国会期中，曾再三声明下届预算必求减削，而复以实行之约期之今岁，其顾忌之深可见一斑。当结特勋爵之委员会审议削减政费时，起初亦略有成绩可睹。车费在四月中本已削减，至七月仍复增回，余事亦多类此。财部预算，至上星期止本年收入为四〇〇，二一

二，〇〇〇金磅，支出则为五四一，一九五，〇〇〇金磅，以去年同时相证，则为四四九，八一八，〇〇〇金磅之收入对四五六，一一三，〇〇〇金磅之支出，是今岁不但支出较去岁为增加，即收入亦较前减少多多。此种恐慌，实使英政府不得不另筹救济之方，而同时工人之失业，商业之停滞，又适足使此恐慌之扩大。燃眉之急，乃使减政一途愈居为最要，据财政大臣霍尔恩氏之推测，预算中所缺欠之一四〇，〇〇〇，〇〇〇金磅，减政结果当能省出七〇，〇〇〇，〇〇〇金磅，至其余之七千万金磅，现尚在无着落中也。

失业与商业之救济

英政府于预算之不足，既以减政为补救之方，一方于商业之衰颓与工人之失业，又万无坐视不救之理，然一经接洽，又非款不足以解其困。政府言节流矣，更何纵有余款以济社会之困穷，此实英政府今日所最费踌躇之事。救济失业工人之专责，有政府中所组织之失业工人委员会，委员会中以卫生大臣孟特氏为之长，劳动部大臣及财政部中人均参与会议，其责任在停止以前之无限制救济，而另筹相当之长久办法。盖救济工人事为表面，其骨子里实含有裁减经费作用也。在委员会之意，须将各地工人救济局裁撤，而另谋以救济之道，于各地市政上求补助，此为英政府谋诚善矣。惟各地之市政之担负，又何易断其必允增加，故解决之道尚不易言。劳动部大臣马克拉玛洼博士曾于失业救济金有一千万磅之提议，嗣委员会中人以减政尚嫌不足，何暇筹此巨款，乃将此议打消。但筹款虽难，救济之事终不得置诸不问。百余万失业工人，散布英、苏各大城市中，稍一不慎，便足为动乱之谋，英政府于此终不能不求根本解决之道。且失业人数之加增

于工业之衰颓影响至大，欲求失业人数之减少，便不能不顾及工业之生产加增。再深一层言之，整顿商业，持平金融，更为根本之图。本月二十三日，英政府因劳特乔治在苏格兰休假，曾集内阁中人会于格尔劳克，专为此事有所商榷。结果办法约有数端，大要分为两类，一类属于现时之救济，一类属于未来之商业与职业之增进及国外币价之改善。前者办法仍系主由各地方分担补助，另由政府设法募集短期公债，以为救济事业之担保。俟十月十八国会开会后，政府为提出公债案求其通过，至后者办法，则英政府中人以为耗费巨款救济失业工人，犹不若救济商业衰颓之为愈。此种救济首在使生产价值减低，出口货廉销路自广，生产量当亦因之渐增，失业工人自可减少。今后之工场场主、商业家、银行家当从事联络，以谋一共同解决之方，俾政府得以施其补助之力。至工商场业因货品暂时之难销，一时资本缺乏，当由银行中与以借贷，资其流通，至担保之责，可归之政府。此外关于整顿国际币价行市一层，内阁中人以其困难特甚，特指定特别委员与银行家磋商后再作定夺。会议既定，二十四日内阁中关于此事之重要阁员如孟特氏、马克拉玛洼氏均遄返伦敦，各就该管部筹画议决案件之进行事宜，而其中尤以内阁直辖之失业委员会为尤忙。至银行家之接洽，则由财政部书记杨氏专司其责。救济计画将由政府提出一两种议案求下月开会之国会通过。预料本年预算，无论如何节减，总属亏多盈少。临时弥补之方，自仍难免于增发纸币，此举为银行家所不深喜，因政府若无确实担保品及库金作抵，纸币滥出，于银行交易上将有甚大影响也。

国际间之债务问题

英于欧陆为债权极多之国，同时于美则为负债国，偿额出入

相较，英犹有余剩。故表面上英国债务虽重，移此填彼，尚非不足。然就实际言之，英负美债届时必须偿还，至欧陆各国之负英债者，十者九不能立即偿付。兹列表于下，以资比较。

英负美债	八六五，〇〇〇，〇〇〇金磅
俄负英债	五六一，〇〇〇，〇〇〇金磅
法负英债	五五七，〇〇〇，〇〇〇金磅
意负英债	四七七，〇〇〇，〇〇〇金磅
比负英债	一〇三，〇〇〇，〇〇〇金磅
塞负英债	二二，〇〇〇，〇〇〇金磅
其他负债	六六，〇〇〇，〇〇〇金磅

表中所指，英负美债尚不及欧陆各国负英债数二分之一，使俄政府承认旧日国债，法意诸政府于现时向英国有所偿付，则源源而至之偿款，于英人交还至期对美债务岂不甚易。无如证诸事实，决不能为吾人预定之便，俄人偿款之望难言矣，即意法国债现时亦难有支出之期，且德国赔款英人欲优先分得亦为德政府所不容。是知欧陆财政尤难于英，英如以移转国债之方施之欧陆，万难有成效可言。本月下旬英殖民大臣查赛尔于当场演说有云：十一月中之华盛顿会议，欲求裁减军备之议能见实行，必先解决国际债务之压迫。查氏此言因为英政府而发，然细审内情，国际债务一日不清，欧陆财政实无根本整顿之望。英国虽孤处岛上，亦难免于恐慌之波及。盖战后改造，恢复商业，振兴工艺之图，既因迫于债务不得尽充分之力，而债务之取偿又复彼此榨刮，影响于经济现象之不安，势必同归于尽。故武力之削除，尚为治标，经济之救济，实为治本。各国政治家使仍无先机之见，如两年前

和会上对于经济根本现象之忽视，则裁兵弭乱之计终属空谈也。再国债之整理，不仅限于联合国，即德国现时所担负之巨额国债，亦宜设法解除。根本和平，实舍抛弃债务关系，而另求经济上互助之方外无他道也。（九月三十日）

天津《益世报》1921 年 11 月 23—24 日

问题中之英国经济救济

恩　　来

吾前次通信曾述及英国经济界近两月来恐慌情形与其政府所以筹救之道。彼时英政府之希望有对内对外两项，对内则希望国内资本家出而担当巨艰，劳动者原情略迹，忍辱负重，以共图产业界之振兴；对外则希望握有债权之美国，于债务偿还之时期与方法上有所让步。此两种希冀，所望甚奢，决非一时可以谅解，可以信任，可以实现者。近一旬中英政府于此三方面之进行，均有所图，然成效则未大睹，今试分别言之。

政府与资本家之拉拢

经济问题最重要部分厥惟产业界与银行界，其次则为商务。今世资本集中，大资本家类皆举此三者而兼业，其他若保险、邮船等附业，亦多在同一指挥之下，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然。故经济现象之变化，无论其倾向何方，侧重何业，结果与资本家固无不利者。以英之现况论，产业出路，远逊战前。近者且因外国币价低落，积货难销，影响之坏，遂使工场工人不能保有其地位，政府收入，亦因之大见减少。工人愈失业，社会愈恐慌，政府收入减少，现状愈难维持，救济之事更无法进行。有此内外交困之事发现，英政府除与资本家谋为诚意之接洽外，其他所计，殆均

为隔靴搔痒，无益有损之图。惟政府所需于资本家者，平定金融其一，减低物价其二，此二事定，则积货易销，商业易兴，工人失业现象亦将由不解决中而得解决，要求增加工资之呼声，亦将因物价下落之原因而减少，斯英政府所视为最善之社会政策也。以此政策，自社会主义立场观之，自难免有不彻底之攻击，然在资本主义发达最盛之英国政府方面，对此政策犹嫌过于倾向工人，致有刻苦资本家之嫌。故英政府向资本家接洽经济救济事业时，同时且向工党接洽工人对于工资、工时上让步，以期增加生产，减少失业。有此一着，于是英政府向资本家接洽之内幕，乃昭然若揭。原夫英政府本立于资本主义基础之世上，岂有为其主谋而不忠者？其向资本家之接洽，不过与社会间一层瞒混，岂真能与虎谋皮者？观英相劳特乔治在苏格兰与重要资本家之磋商，与归伦敦后之所取救济方法，便知根本办法仍一无所可也。会劳氏于格尔劳克城之英国产业财政家共五人：一为银行界之领袖兴濮生勋爵；一为业主联合管理部之主席斯密士勋爵；一为铜铁业联合会之指导人雷同；一为康买耳拉耳得公司之主席陔春斯；一为国会议员对德经济界要人葛尔斯。此五人于九月底偕财政部秘书杨氏驰往格城，与劳氏为数日之磋商。在英政府方面其所以宣示于世人之言，乃为谋商业之恢复，出产之增加。至于此二者之办法如何，在政府固决无定见，亦决不愿以定见限诸资本家之身，使其不获谋意外之发展。故唯一希望乃为资本家肯献万全之计于政府，俾执政者能藉之以转移此变局。在资本家方面，彼等以为商业停顿影响及于工业，彼等身受之损失（本无所谓损失特不过收入减少耳）势必假此时机以图恢复，此所谓得机操纵者也。因是此数位资本家之意见，乃谓欲图商贩货价之减低，生产价格之下落，对外商业之增进，国际金融之平定，则此种考察改变之责，

须置之产业家、财政家管理之下，政府不得参加。英政府以救济事希望资本家，资本家乃先以获得权利为要求。大战以来各国政府因战争特殊之关系，曾移资本家一部势力于政府统率管理之下，自由竞争之产业界因之稍受挫折。战后恢复，端赖经济，各国政府乃不得不摇尾乞怜于资本家之间，而资本家乃亦得乘时以起攫夺往日将失之权利，或竟从而增益之，此诚资本主义应有之现象，而各国政府将无可如何以忍受之者也。英资本家又岂能外此？见钱眼开之人，投井下石又岂其所惜？惟英政府虽属资本主义下之产物，然于一切救济经济事业，悉举以授之资本家之办法，究不能无所踌躇。会商四日，所得殊少。最后十月四日劳氏复在印韦尔内斯尔一临别之演说，舆论界有谓此次演说甚重要者，其实仍属一片空洞，毫无根本办法。其演说重要之点为：

（一）当此金融交易继续不定之时，吾人实难言商业；

（二）欲回复原有情状，必须使严重之经济责任及于各人之身；

（三）扩大的失业状况，实不能再使之增加，因其足以危及国之根本；

（四）失业者之流浪，足以害其个人道德之健全，救济之术，在使其获得相当之职业；

（五）有效之工作，必须平分。

劳氏所言，多侧重于工人方面，其于月初数日间与资本家接洽之结果如何，乃隐忍而不言，是所商榷者无成效可知。其能宣告于世者，仅为欲发行短期债券救济失业工人之一事。此事必经资本家之首肯而始敢昌言者，而实则于资本家无丝毫损失，且恐债卷之发行，于彼等且有大益，是真一毛不拔坐享其成者也。劳氏于十月五日至伦敦，六七两日连开内阁会议，政府失业工人委

员会亦开会请劳氏出席，会议无甚结果。大体规定者仅为一千五百万金磅之救济金，其用途限于救济失业工人，恢复国际商业。惟草案何时产出，尚不得知。总之国会在十月上旬开会，届时或能提出。使英政府救济经济之办法仅此，则其与资本家拉拢之结果，亦不过使资本家多发一点小财耳。盖救济失业工人之办法有两种，一种系以钱补助工场，使其不致以工资无出而裁减工人，一种系直接补助失业工人。前者为资本家增加财产之机，自无待言；后者则资本家正可藉机大裁工人，而便于扩充其生产盈余费也。

英政府与工党之接洽

英政府关于救济经济界恐慌事，除与资本家接洽外，复与工人组合谋为根本之磋商。英政府对于工人之根本希望，自劳氏于格城演说之要点上观之，已知非工人所能承认容受。劳氏之言“使严重之经济责任及于各人之身”，是明指救济经济事业须工人分与其责也。工人之责任何所分，减少工资，增加工时，是为资本家与政府所认为增加生产、减低物价之不二法门，以此属望工人，工人宁能如其愿以应之？当劳氏在苏格兰时已极力与工党谋联络，以图解决，退回伦敦，复邀工党首领参加政府中之失业工人委员会议，工界各团体为此事特在伦敦劳动大会以图各方之综合意见，结果于七日回劳氏一书，其言曰：

> 吾人现已指出六名代表会同吾人之职员，向君陈述吾人之提议，并愿与闻审查政府中所议定之提议，惟此种代表决不与于政府中任何组织，其中包含有财政家及产业主，如君向吾等所提议者。吾人并反对政府所定之哀的美敦式政策而

强欲吾人与以保证接收者。此会议甚愿闻君将接见吾人代表之时日。

六代表之名氏为同业组合会议三人：瓦克尔、普鲁东及滂特费尔特女士；劳动党三人：马克多拉、亨特尔生及术布。信中劳动会议盖已明指出对于加入政府工人失业委员会之拒绝，惟对于磋商事件仍不反对，故六名代表皆为同业组合及劳动党中一时之人望。劳动党领袖克令斯氏亦向人曰："吾人之所以不愿加入失业工人委员会者，以其拘束力过甚，转失吾人自由主张之余地，结果必致政府所议定之政策一一得行，而吾人因加入委员会故，转成为与政府以保证者，是于救济前途非常危险。"劳动界之主旨若此，是知政府欲联络工人首领以图工人之就范者，亦殊不易成功矣。六代表与劳氏之会面，本预料在本周间，惟日期尚未定，因近者英伦政府与爱尔兰新芬党政府代表复在伦敦有重要之议和会议，兹事遂不得不稍见停顿。多事之英国，问题咸集中于劳氏一身，下月华盛顿会议，劳氏能去与否，要视此次爱尔兰与经济救济问题平定与否为先决也。

国际债务与移民问题

劳氏救济经济办法，亦非专恃对内求解决也。当彼在格城会议时，亦曾言恢复商业救济失业之道，宜合各地方各殖民地一致努力求为此事之根本解决，外之尚有赖于国债之整理。劳氏此言，实侧重最后两项，至各地方同筹救济之言，不过为一种陪衬语。究其实工人失业、商业停顿，各地方岂不蒙同一损失，中央既无法救济，地方上又岂有余款余力。关于后二项，国债问题在英政府中人想来，总希美国政府对于此事有正式表示，并愿将此事提

交华盛顿会议。美总统对于华盛顿会议加入财政与救济事业上之讨论极端反对。惟近者华盛顿消息，美总统有一半官式之宣言，彼甚望能将国际间国债问题求一简易方法之解决。于债务者之身，使其意果属真，则不无磋商余地。而同时美财长之宣言，亦云财部将由会议中获得一最早动作，以处置国外之债务，外国债务务宜早日偿还，以平直美国之财政地位。关于债券、证券之接收，犹良于本身为债务之代付，债权移付办法，亦宜加以考虑。此外美商务总长亦言平定欧洲金融实为当务之急，而尤以德国马克为先，是知美政府固非忘怀于欧洲经济现象之恐慌者。美为欧洲债权国，其急于求债务之有着落，自在意中。英政府知其然，乃欲以债权移转办法试探美国，今美财长言可以加以考虑，则英人有机可乘矣。欧美经济风云，年内必可得其变化结果。英国之经济救济或因是而得一意外解决，亦未可知。

属地移民问题，前澳洲政界要人在伦敦时即曾言澳洲土地可供开垦者甚多，苟英伦政府能设法移民至彼，则百万失业工人不愁无生活处。此种计议当时颇为哄动，惟移民费亦甚巨大，将何所出？是固为政府中所熟虑而未能决者。至最近英国新闻界大主脑尔斯克里夫南游至澳，观察彼处情形，于各地演说，力言英本岛移民至澳之可能。彼言澳洲全岛白色居民据一九一九年预算仅五百二十四万七千零十九人，是一洲居民尚不及伦敦一市之多（伦敦居民合外城计之当得七百余万人），故移民往澳大为要图。脑氏计算，在最近两三年来每年至少可移十万人前往，因最近英人前往之数较前大减，每年仅及二万余人。今据英伦移民局计算，则言每年应移二十五万人前往，继续十年，果如此则十年后澳洲白色居民岂不可以倍增耶？惟言之虽足动听闻，实行时有无障碍是仍在难知之数。英劳动党首领克令斯有言曰："移民岂是易事，使无

易垦之土，无安家之费，百余万失业工人固仍愿穷守此土不他去也。”知此，则移民救济方法虽属根本之图，然缓而难举，究非目前所能得见实效者也。矧夺棕人之食居生存地以与白人，岂有得世事之平哉。（十月九日）

天津《益世报》1921 年 12 月 2 — 3 日

过去一年之德意志

熊　　锐

自法、比帝国主义者借口德国拖延赔款进兵占据鲁尔（一千九百二十三年一月十一）以来，已过去整个年头了。这一年来，德国社会内部解体之势以及政治上、经济上的变幻，真是风起云涌，离奇复杂。我如今把他来分做两个时期来说：1、从去年一月到十月革命；2、从十月革命到现在。

（一）　德国战后，为凡尔赛条约所束，割去亚尔赛斯、劳兰、上西利亚等地，所剩下的工业中心地，只有莱因近岸鲁尔一带，实为德国的经济命脉。赔款总额一百三十二亿金马克，既为德所难担负，而按期交付款物，更因德资本家不肯尽力，亦难实行。以是巴黎会议破裂了，不数日一片繁富的实业源泉地，尽入法比军队势力圈内（一千九百二十三年一月十一）。那时德之内阁总理为库老，库老与德大资本家斯丁纳时同属于代表资产阶级之人民党，库老的政策亦即其背后斯丁纳时的政策。法国之占鲁尔，原来为本国多铁而少煤，想把劳兰铁与鲁尔煤并为已有，而成为大陆上工业霸王。这种并合，如果使德之工业家可得相当之利，他们的国家观念是敌不过他们图利之心的。我们知道，老早法德两国工业界首领已有并合的商议，只因法工业界拟多占些红利，不得德工业家同意，乃迫不得已而用武。法、比且又猝然出

兵，德之资本家（以斯丁纳时为首）自然一时赌气，愤与抵抗。但怎样抵抗呢？他们的独一无二方法是消极抵制，即是说自己不在被占地营业，鼓动工人不做工等等。他们懂得自己有大资本，尽可以在短时期舍去一部分营业与人争胜，到结果胜可得大利，即败亦不过令劳动者多做几小时剩余工作以作补偿罢了。他们知道经济战争和军事战争一样，利用别阶级（劳动者）的敌人与同阶级的敌人战，于自己终无大碍的。不错！消极抵制！消极抵制！斯丁纳时这样说，库老也就这样说，此外更添上极右派的国家主义法雪西蒂党的反动声势，于是乎全国上下（除开共产党人外）都嚷着“消极抵制”了。但是“消极抵制”的办法最先要有经济底可能。资本家可以一时不营业，官吏可以一时强项，工人不做工却需面包吃，为的要实行“消极抵制”，政府不能不要担任一笔大宗款子。这笔款子谁担任呢？资本家吗？且慢想！他们不惟不帮助，反因而从中取利。鲁尔未被占以前，国内经济本已恐慌到万分，被占后，来源减少，支出加多，库老政府只有赶工加印纸币，结果把一切饥饿愁苦都堆到下层阶级身上，同时将无数自由职业者（医生、教师、各机关用人等）以及小资产者打落到流氓无产队中去。至于那些资本家却大肆其投机事业（在纸币涨跌中买卖外国币及股票等），将其所得安稳的存放于外国银行。照这样的景象，直到八月，累得国库如洗，小民穷困万分，大有铤而走险之势。一时各大城市的大罢工和群众抢夺食物店之事，日有闻见，因是革命派与反动派之势力也日见昌炽。革命派多属诸无产阶级中有觉悟的精锐，由共产党指挥，渐渐集中势力于号称“赤地”之撒盎逊、土灵根二省（德中部）。反动派则当属于年来为经济打下的落伍的小资产阶级，以旧日一般复辟军阀为指导，其巢窟则为巴威省城（德南部）明勋。共产党因成立的历史短（在一千九百

一十八年后），党员固属少数（约三十万），但他确是革命有为的党。他在法军占鲁尔时，早看出政府无能与资本阶级诡计多端，所以同时反对法军阀与本国政府，并以组织工农政府号召群众，由工农无产阶级拿到政权才能救本国经济，才能使剥夺者负担赔款。……他一方面联络社会民主党中的左派，唤醒他们改良妥协之梦，叫他们同跑到革命线上来；一方面对法雪西蒂派的群众指斥其谬误，运动他们舍反动歧途而走入革命正路。他这样的运动，到八九月时成绩已浩大了，在全国二千多城市中有工厂委员会者，他都占有强势。此外各山林、各农场工人接续不断的归属于他。

库老内阁处此革命声势紧张而他方又为点金无术之时，便不能不下台了。库老去，继之者为史脱拉斯曼。史脱拉斯曼也是斯丁纳□□□□□□□□□□□□□，□□□□时同党的人。他登台的责任可说是：1、结束“经济战争”（消极抵制），断送莱因近岸鲁尔一带地方与法资本家；2、剿灭无产阶级的澎涨势力。他见着国库收入，不及支出的百分之二三，马克跌落已到惊奇的极度，他宣言数月来之国用大半费于“消极抵制”，如今要取消这政策了。同时斯丁纳斯与其他资本家克虏伯沃炉夫等与法国方面也陆续议和了。他见着无产阶级革命气焰日张，乃设法向国会中取得自由全权，下全国戒严令，派几位将军镇守各区，特别注重于撒盎逊、土灵根二省。

原来此二省政府本在社会民主党左派之手，由共产党人活动的结果，得到他们同情，十月间二省遂先后由社会民主党左派与共产党合组“工人政府”。此时，市面经济较前越发恐慌，纸币几全失价值，货物之贵超出世界平均价格，革命的暴烈朝夕待发。同时柏林政府知事急，乃封闭各地共产党机关报，加派重兵入撒

盎逊、土灵根，将二省咽喉扼住；而他方面一部分精锐的无产者也耑候革命记号，各地小暴动至是遂先后爆发，最激烈的为汉堡方面（德东北部之商港）。该地共产党以为时机已熟，当柏林政府下令解散撤盎逊政府时，欲下总暴动令。不料前此名为充分表同情的社会民主党左派，竟中途退缩而不敢同发，致共产党人势孤不复能动，以是一般澎湃掀兴的革命潮遂被资产阶级与军阀暂时的压下去了。在差不多的同时，明勋省反动派的暴动，鲁尔各地有“莱因独立国”运动的暴动，也都先后或明或暗的隐灭下去。反动派以为柏林政府之“复古反旧”之工夫尚未到家，所以性急暴动。至于莱因独立之役，则为法帝国主义者暗中运动使这一块工业地与德分离之结果。嗣后柏林政府由左向右进行，既速度又加速度，而“莱因自主”的进行，也可由平和的“合法的”达到，因此个中人看出前此暴动为多事，乃改图别的方法了。

（二） 十月革命以后，有几件事值得注意的：

1. 在政局方面的革命后不久史脱拉斯曼去，内阁换上马克思，而实际却是旧军阀封洗克将军执其政柄。他由国会中取得更大的权，于是一切集会、结社、出版、罢工种种自由没得了；八时工制取消了；人民在一九一八年革命所得到的东西通统失掉；共和宪法全成废纸。政府权柄，由社会民主党首领慢慢向右传递——由库老，而史脱拉斯曼，而封洗克——已统交付于旧封建余孽了。总统爱白尔忒也早军阀化了。总之，现在柏林的政府是“白色的狄克推多”，共和国徒有空招牌了。

2. 在国际方面的所谓“消极抵制”，在史脱拉斯曼时代已实行取消，及后德资本家斯丁纳斯、克虏伯、沃炉夫等与M.I.C.U.M.（即“监管工场矿山国际委员会”的简笔字）所订的条约成，莱因—西花利成为特别行政区的事实也暂显，因此仅存的工业中心

地，也由半载经济战争的结果，断送于法帝国主义者。法德两国资本家已成了联立，鲁尔煤与劳兰铁已缔结起新姻亲了。

3. 在经济方面的，自去年十一月中旬政府始实行停止马克纸币，另发郎丁马克纸币以救济金融。这种纸币由全国工农资本家借给政府一亿两千万金马克为担保，故得以保持和战前一样的平稳价值。在市面上表面情形看去，好象德国经济已入于平安状态，其实这不过短时期的兴奋剂。我们查他的国库收入较前未加改善，那一亿二千万金马克到十二月月底已用得干干净净。在节流方面，政府虽不顾人民死活，裁减机关中用人，节少救济失工补助费的支出，但本月各机关中用人薪俸，都已无从出了。加印郎丁马克纸币吗？则将再蹈前此纸马克覆辙；希望外债成功吗？则为凡尔赛条约所限，不得协约国赔款委员会同意不得举行。美国资本家虽想借一万五千万美金与德，好使他能在美市场购买麦子，但遇着法帝国主义者的顽固，一时也爱莫能助。另外本国货物腾贵，制造货物出口之事已无望，失业工人数达二百万以上，对此种种难题，那"白色狄克推多"的政府实是棘手万分，无法解决。

去年十月革命已匆促的消灭过去了，德国政局好似稍安定了，但德国社会革命果真就此停息吗？

德国的人口据一九二〇年统计有五千九百四十万，其中壮年者为三千三百万。在此三千三百万壮丁中，无产阶级占二千二百万（工业无产者一千一百万，农业无产者七百万，其他四百万），半无产阶级占三百多万，除此外资产阶级仅占四百多万。这个占全人口三分之二的无产者与半无产者日在困苦愁悲中，他们所得的工资仅有战前的百分之四十，被抽的工资税比战前加多（本年预算国库收入工资税占九万万金马克，即全数四分之一），而且要

做十小时的工作。他们革命的需求，实在非常迫切。他们以前多被社会民主党首领所骗，如今他们的指导者当是共产党了。共产党现在虽被政府禁止公开，但他已把运动中心分到各工厂里头，他的潜势力确正在方兴未艾。

德国经济的现状已这样险恶，他的阶级形势已这样利害，而革命之指导者又方努力不息，谁敢说德国政局可以如现在一样的安定下去呢？

《赤光》第一期，1924年2月1日；
第二期，1924年2月15日

待开声中之华盛顿会议

恩　来

前旬通信，于英国最近政情，言之颇详。其主要事项，为英帝国会议及英日同盟者，其最后之变象，有美总统华盛顿会议之提议。今事隔十余日，大西洋、太平洋两岸之风云，又变化许多，而所谓待开之华盛顿会议，亦因此失去其本来面目不少。内容如何，姑志之如次。

最近一月来，英伦岛上之空气，异常浓厚，罢工问题也、减资问题也、爱尔兰问题也，均将次第告解决，而得一时之相安。其尤重者，便为英帝国会议。会议内容，吾前次通信，已详述之。此一旬中，无甚要案，所讨论者，殆皆议决而未筹有办法之积案耳。至今日会议大致可谓已告结束，一切内政外交方针之决定，已皆如英国各首相之愿以偿，所留而未决者，仅一英日续盟事。当会议期中，盟约将满之前三日，美总统曾以华盛顿会议之提议，咨求英国同意。英政府当时正苦续盟事难以解决，而有待于外交上之援助，得斯提议，正中下怀。于是本月十一日劳特乔治乃以极端欢迎之热忱，报告美总统之提议于国会；同时对于英日续盟事，轻描淡写，略述数语，此乃得以不了了之之法，安稳渡过满约之期，而留其正式解决华盛顿会议后。夫英日续盟为一事，华盛顿会议又为一事。英政府所以视此二事有极大关系者，正以华

盛顿会议中有太平洋及远东问题讨论之提议，故“盖英日续盟，本英人之所愿也。英之于东亚、印度有需于日，亦犹日之有需于英。”观于澳洲、纽细兰之两地，本为反对英日续盟甚猛烈者，今兹会议，乃转变态度，为折中式之赞成，是知英日同盟，自有其不可不存在之秘因在。至若加拿大之反对，乃纯为对美关系，不得不然。南非本与此盟约无关，赞成反对，本无容心，惟其首相斯玛士将军雅负时誉，而又为亲美派之健者，故亦与加相持同一之意见。因此纷歧，续盟之解决，乃陷入苦境。究其实，抽象论之，仅一美国问题耳。使美国能了解英国之所解释于美国者，则美政府朝宣言，盟约之续夕成耳，更何有于属地之反对？更何顾忌于吾国之抗议？英政府有见于此，故对美为竭力之疏通，然终不能得美政府之谅解也。最后乃有所谓太平洋上三角同盟之劝诱，事虽难望有成，而美总统华盛顿会议之提议，终因之以发生。

会议内容，限制军备及太平洋与远东问题二事。太平洋问题为日美争议之所在，远东问题则又为英日同盟中之重要条文也。使此两项问题，各方面有一合意之解决，则太平洋上之风波不易再兴，远东处置得各方面之谅解，则英日续盟将不解决而自解决。英政府本此心理，对于美总统所提议讨论太平洋与远东问题，遂抱一极大之愿望。愿望大矣，英政府乃又有一异样之要求。彼以太平洋与远东问题，英本国政府远处西欧，实不若澳洲、纽细兰两地适当其冲。会议之时，澳、纽两首相势必亲往与议，方可云当。然揆之事实，则伦敦帝国会议，两月之勾留，已耗费其光阴不少，两地政务孔繁，又乌能于十一月中再遄往美洲，以与是会。折中之计，莫若分限制军备及太平洋与远东问题为两次会议，前者仍开于华盛顿，时期亦为美总统之意；后者则提前开于伦敦，时期最好定于英各属地首相未归以前之八月。英人之意，以为美政府

既肯联各国为太平洋与远东问题之讨论，则地点之为美为英，时期之或早或晚，当不发生重要关系。即使美政府以伦敦会议有分华盛顿会议之势也，亦不妨以伦敦会议为预备会议，先由应加入之各国代表，讨论太平洋与远东应磋商之问题，而留其正式决定权于华盛顿会议中。使此议□不得美人之许可，则英政府宁赞成是项会议延期至明年春间。上述三种办法，英政府之自谋，诚为计得，然询之各国，尚未闻有赞同者，英政府固极不得意也。限制军备一事，本为欧战后所盛倡导，然巴黎和会所限制者仅为德奥，协约国固无与也。逮国际联盟开会，世界酷爱和平之人，又复希联盟各国于此事能有所尽力。然而言之者有人，议决焉，实行焉，乃终等于痴人说梦。盖各强国今日所急于从事者，仍在求势力之均平。军备限制，必首重裁兵减舰，彼此相峙，试问谁甘为此首创之国？忧时之士，于是又倡列强同盟限制之说，各国执政者亦间以为然，今兹美总统之提议，殆即为是说之反应。然则各国对此项问题之态度果何如耶？今先□英国言，英帝国会议中，对于限制军备之办法，殆皆宣言赞同；惟其所赞同者，乃不再加增英国之军备，而希冀别国实行减少。证以劳特乔治于会议开幕之日，其演说中有云："吾人实不能忘却全英帝国生存之基础，实为海权。吾人宜审察为保护吾人所要求方法，吾人将无所求于增加，亦不能有所减少。"观此可知英人固无减少军备意也。英本海军国也，今日世界海权之竞争，已渐驾陆地之竞争而上，英、美、日三国海军谓之增加，英实为首，英不减少，而欲求诸他人，岂得费平？至于法则对美总统之提议固绝对赞成。现法国方图亲美，欧事纷纠，法政府甚希美国出而与闻，为之处理，为之援，今兹提议，法人固认为千载一时之机，苟会议有成，则美政府必渐抛其向日不闻欧事之愤言，是法人之愿遂矣。故英法舆论，有谓华盛顿会

议宜并上西里西问题解决之，法人尤多壬是说。此真神经过敏希望太奢之言。法人对于美总统之提议，不仅赞成其议案，其地点、会期咸具同意。盖法政府初无成见，总理白利安尤高兴渡大西洋为新大陆一行，而法之武人于会期定在休战纪念日十一月十一之议更表欢迎。法之态度如此矣，然其于会议内容所具之可能成分又何若？法固有陆军八十余万纵横欧陆也，使限制军备之议果成，则法之陆军当为减裁之列，法人于是亦有要求。彼以为法之陆军盖在防德，使美国果允法人以共同防守，代担危险，则法人亦甚乐于裁减军备，以轻担负，言外盖欲以攻守同盟期美人也。法政府于斯虽无正式表示，然其有望于美国之助固彰彰明甚，至若太平洋与远东问题，法政府以关系不多未尝有若何议论。意大利方面，对于美总统之提议固愿接收矣，惟其国人于兹事无甚兴趣，且有出怀疑之论调者。盖限制军备，叩之意政府私心，并非为赞成者。会议后能否生若何效果，亦为其所怀疑。然以情势故，又不能不随同赞成，是亦一不强健之份子也。欧土中尚有荷兰要求加入会议，彼所具之理由，为太平洋与远东问题彼以属地故，当与议。据情势论或不至被拒，惟至今尚未见美国回答。欧洲以外，东亚方面仅吾国及日本被邀与会，此两国之态度，一急一缓。吾国得信即应曰可，故劳特乔治十一日在英国会之演说，便云中国已接收美国提议。而日本则迟迟作答，至十四日始有一半接收，于太平洋与远东问题则故作娇态，置诸不论，以示其半推半就之态度。夫太平洋及远东问题中之关系于吾国者，吾本自有主权，何劳他人代议。特以积弱故，无法阻他人之越俎代庖，然吾人殊不能置诸不问也。姑无论其为善意、为恶意，吾人苟得机与闻，总宜挺身而出，据理力争。故今兹华盛顿会议之召集，吾国既被邀与会，接收之速乃为当然。惟吾人亦非无厚望于该会者，

山东问题也，二十一条也，吾人以公理争之于巴黎和会，竟不得其直，山东半岛且遭强占之辱。国际联盟开会已一年余，吾人以种种顾忌迟迟未能提出，求诸公断。今华盛顿会议，于远东及太平洋问题固独标一帜，求诸国为之评解也。吾人以最有关系之国，提议问题中最有关系之议案，是非曲直能否邀诸强赞助判断，姑置不论。而吾人据理陈诉，固吾人天职所许，正义所容，吾人方以是属望该会。乃不意自美总统提议迄今，为期仅两周余，距预定之开会日期尚远隔三四月，而内容之变化已令人生今昔之感，斯果何故耶？请观吾下述之日美最近之交涉。

当本月十四日日本政府接收美总统之提议也，其所声明仅及于军备限制一层，太平洋及远东问题实未提及。彼盖以为太平洋及远东事项，在在与日本有极大关系，苟冒然承诺不加限制，则届时与议之国议案提出，必于日本有极大之不利。故半推半就，以待美国事前之磋商。一方日相原敬于十六日在东京又发表一极热烈之通告，表示其赞助华盛顿会议之诚意。通告内容，限制军备特为列出，太平洋及远东问题便未明言，而含糊其辞谓之为要求政府改量之其他问题，此两事也，日本可谓曲尽骗诱之能事。缘太平洋及远东问题，为日美问题中之最大关键，使日本明言反对讨论此事，则华盛顿会议即无开议之必要。彼美总统之希望列强共同限制军备，其最要者实为海军，英、美、日海军之裁减，太平洋及远东问题又实为先决之条件，日本虽愚，岂敢为此破坏会议之戎首？然彼又不甘于自投罗网也，乃以延宕之手段，不即不离，求其意中之收获，以为此问题之交换条件。果也，美人易欺，二十四日有一答覆日本之公文至东京，内容未能公布，据传于外间之消息，实信其有下列三项之声明：

（一） 关系太平洋及远东问题，仅为宽广之问题有所讨

论；

（二） 凡凡尔赛和约中已经解决之问题，如山东问题、西比利亚问题及其他事项，会议中拟屏弃不议；

（三） 关于耶普岛之争论，华盛顿与东京间已渐有妥协之望，该问题拟不加入会议中。

使传来之消息果确也，则日本意中之收获实如愿以偿。当美国提议至日以后，日本半官报纸已声言凡关于两国间易于直接磋商之问题，会议中不应使其加入，言外即指山东、西比利亚及耶普岛诸问题也。夫耶普岛之归日，不曾经和会同意而规定之于国际联盟者耶，以美国反对故，乃改为两国单独之商榷。今彼此已互有让步，事将解决，宜乎美政府认为毋须加入会议。至若山东问题，虽经和约规定，吾国固无承认之表示，且有拒签之举，因此中日两国对此问题且无直接交涉之可能。日人虽曰易于直接磋商，吾人殆誓出反对。而今者美总统一纸之回答，竟认为山东问题已规定于和约，会议中将摒不与议，是直以日人之言为是，而以吾人之反对为非，慷他人之慨，以图此会议之开成，进行之圆满，在美国诚为计得。然则又何解于昔日美共和党反对山东问题之激昂慷慨？且同一不承认和约也，美国不批准和约，便能不受其束缚，吾人拒签，乃不得抗议之自由，预排吾人之所欲申诉者于会外？会议尚未开也，其以主人自居之态度已竟如此，他日列强开幕论事，利害相关，秋波相送，岂尚有吾积弱之国发言地耶？此而不争，时机又失，吾爱国之国人，对此问题将作何计，此实海外侨胞所亟欲一知其究竟也。

会议议题变化矣，会议之地点、时期英美各执其一是，至今尚未有定。美政府之所以不能承认英国提议开伦敦预备会议，讨论太平洋及远东问题者，彼盖以此项问题与限制军备实为互为因果，

不容强为分裂，故主持统归华盛顿会议中解决。此亦为其自身之打算，与英政府之心理，初无不同，毋为讳也。（七月二十七日）

天津《益世报》1921 年 9 月 13—14 日

华府会议后的美国帝国主义者

翔

华府会议条约是美国帝国主义者打破了列强数十年来在中国所划分的势力范围的圈锁，而走入共同侵略利益均沾之途的一个胜利记录；在这个条约中美国是处处占了上风，而且处处以国际共同行动来操纵一切。一年来凡是稍能承认事实的国人，大都已领略够了美国帝国主义者所自炫的华府会议“对华善意”了。但是我们要知道美国这种“对华善意”也决非自华府会议始，在十几年前，他已曾同各帝国主义者一样地寻找他的势力范围，表示“对华善意”。不信，请看上月十三日上海传来的电询：

据日人方面消息，最近美国政府突然照会英、法、日三国，提议约定对于中国海军，各国勿单独予以援助，遂发表前清时代之中美密约。此系前清政府派伦贝勒等赴美国考察时与当时美国国务卿诺克斯所订之秘密条约，其中重要条款：（一）美国代中国建造军舰；（二）美国代中国筑造军港；（三）美国尽力代中国养成海军将士；（四）中国对于以上三项海军振兴事业，不委托他国。其后中国革命，改为民国，此约遂无实施之可能。最近美国以华府减军案成立，明知此等密约目前无论如何无实施之望，于是决将此密约自行提

出，与英、法、日各国政府商议，谓美国自愿抛弃此项权利，希望各国亦于某种期限内勿援助中国振兴海军，请各国同意，……

在英、日、俄、德、法当年已划定了势力范围之后，美国帝国主义者当然不得不着眼于扶助中国军备的振兴。因为那时候的英日同盟正如日中天，远东情势逼得美国必须结好中国以自重。且代造海军又正好稳握中国军事大权，此与退还庚子赔款造就亲美洋奴的办法初无二致。但现在呢？现在华会条约既将列强势力范围打破，又将英日同盟取而代之，于是此秘密无可实施的专利条约，美国当然乐得公布取销，以与英、法、日各国商换更大的报酬。这报酬便是不许中国再兴海军，好使美国在远东所获得的半殖民地——中国——压服得更坚牢点。国人们！记着：这便是美国帝国主义者前后所给予我们的“对华善意”！

《赤光》第二期，1924 年 2 月 15 日

法国强盗已自行揭破
华盛顿会议黑幕了

飞　飞

一月八日由巴黎传至美国的电报有关系华盛顿会议条约中国收回领事裁判权事，说："法国答复美国国务卿请派代表组织委员会讨论将来各国派遣代表至华调查之照会反对是举：一因中国不肯以金佛郎为本位还庚子赔款；二因仍不信中国有治理外人之能力；三谓依中国近日情形及对待外人举动，外人似不应退让。此外，法政府又向欧洲外交家罗举中国近日对待外人行动，指责美政府在华会太信任中国政府有自治能力，其他欧洲列强亦多有同样反对云。"

从这个电报中，我们当知道华会中所给予中国人的"甜头"是要中国人以更大的代价才能换回的；青岛交涉如此了，威海卫的退还如此了，现在领事裁判权之收回自然也要陷入同一运命中。只是，我们要想想，说中国人无"治理外人之能力"，然则中国租界中成百成千类似乐至华、田仲香的案件之发生，法兰西"文明"国的马赛华工大院所表现的成绩竟足证明列强有治理中国之能力么？哼！我们须于此等处领略各国帝国主义者的"威信"啊！

《赤光》第三期，1924 年 3 月 1 日

美国帝国主义者之对华政策

恩　来

美政府自华府会议成功，得了列强在中国共同行动的保证后，对华政策却一变其向来阳示亲善的面孔，大踏步地赶上英、日帝国主义政府在中国实行侵略的故道。两年多的经历，已使我们饱尝美国帝国主义者的在华一切设施，殆无不备有钱臭和血腥的混合滋味。尤其露骨的，便是美国工商业的资本家。张家口的克门案，临城案，宜昌的大来案，浙江纸烟捐案，长江舰队联防案，上海美国侨商会议案，无不与他们息息相关。最近沪报载美国在华商务总会的报告有云："……去年本会与美国协会曾致电国务卿，要求增加美国在华利益之保障。所幸本国政府尚未认为极端主张，已由海军部准添长江巡舰六艘，且已先由檀香山派鱼雷两舰来华。此各国已暂停关税会议，并闻对华债务将有所措置。凡此，未始非吾人要求所生之结果。至国务卿许士亦认定中国时局之严重，并有具体对华政策之决定云"。但什么是"具体对华政策"？请看四月中美国众议院海军委员会所通过的议案：许造一万吨之快巡舰八艘，每艘需费一千一百万元，军装经费在外；并造炮舰六艘，每艘需费七十万元。此炮舰乃供中国海面之用。这个议案审查至六月五日美国上下议院完全通过。美国国务卿的"具体对华政策"实现了。美国工商业资本家的"要求"得"结果"了，被

压迫的中国人从此将更增受了六艘炮舰的射击。

然而聪明点的美国人究竟知道这不是个万全的侵略政策。有个美记者李郤特哈顿竟在报上公开说道："溯自一八四一年中国在英国枪尖之下被迫割让香港于英之一不幸之日起，以迄华盛顿举行所谓减军及远东问题会议之日止，中国人民对于西方任何强国，始终无可爱可敬之理由。而美政府于华会中辜负中国人民可靠之友谊，殆为此不幸关系之最后大结束，亦为一号称友邦者对其友之最重打击，且此可谓为中国历史上之转捩点。盖当美国因欲取悦英、日两强而卖中国之前，中国颇有步武西方诸大共和国所取途径之势。今自被卖于美国之后，彼乃觉悟中国必须自立不赖外助，且必须抵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反对。盖此等国家之唯一目的实为掠夺中国之富饶天产也。……美国最近联合他国在广州为海军示威运动，而以保护条约权利之脆薄理由为根据。此项疯狂举动，可谓铸造中国对西方各国及其葭尔东邻一串怨恨锁练之最后一环。欲迫中国群众投身于布尔塞维克主义而试行苏维埃制度，美国此举，殆已有充分之效力矣。……西方诸共和国果欲挽回中国，使仍为彼等之姊妹国急起直追或由未晚。但为时已甚迫促，受苦已久之中国人民正在力图自救，无暇久待。若彼等竟断然效法俄罗斯者则西方世界之烦闷将从此开始矣"。这位美国记者的议论，毕竟有超越美国普通工商业资本家的卓识。设无最后一段话，至少我们会疑心他是个社会主义者。但从"西方诸共和国……使仍为彼等之姊妹国……"数语看来，便知道这是一位不着侵略痕迹的巧妙的新闻记者。会这样说话的人，美国向中国做文化宣传的教育家、传教师、新闻记者、旅行家都惯为之。我们，尤其是从事国民革命独立运动的我们应将他们看成和主持武力侵略的美国帝国主义者是一流人物，严防受他们甜言蜜语的诱惑。

又，美国总统将于本年年底改选了，代表大工商业资本家大地主的共和党若胜，则顾理治联任，军事的对华政策自然具体的继续施行。否则代表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胜，他们或要采取旧日阳示亲善的对华政策以缓和国人对美恶感。这个，在外表虽有缓急之分，实则同一样子有帝国主义从中作祟。我们切须紧紧记牢，一律反对。

《赤光》第十期，1924年6月15日

太平洋上的新风云

恩　来

欧战中日本在东亚乘火打劫，美国来欧洲做了些投机事业。大战停后，威尔逊的国际联盟毕竟在欧洲未曾唤响，且转而为英法争霸欧陆玩弄弱小的利器，逼得资本大王的美利坚不得不换头而西向太平洋上寻觅新战场。逮华盛顿会议一开，日英同盟约解，于是乘火打劫的日本始不得不俯首受命承认美国共分东亚大陆的俎上之肉，然而心实未甘。不幸天祸飞来，去秋地震的大损失竟使强狡的日本在目前难以恢复他富强的原状。日本这样的竭蹶自然使暴富骄横的美利坚益欲轻敌之念。积至最近美国上下议院竟因日本大使的一封抗议公文，两三个议员的感情鼓动，暴躁地通过了限制日本的移民案，总统的再议不理，缓期的执行不听，终于使顾理治即刻将此法令签布。固然美国帝国主义者之对待有色弱小民族，尤其是对待华人，久已夫千限制万限制：做工不许，入境须带美金若干、验出些微病来立刻随原船回国，并限制入境数目。这样留难的待遇，在我们歌颂美国洋大人的衰弱民族中，实已司空见惯，安之若素。但独立的日本民族却如何忍得？于是有自杀于美国大使馆前的日本人以激励其国人的排美心了，于是抵制美货的举动出现于三岛了；于是示威运动集数万人、十数万人于东京、大阪了；于是日美战争之声浪起；于是太平洋上的风

云生。

但日美战争果能立起么？这不但是日本未曾预料，便是赶造军舰六艘的美国又何曾有事前之备。固然太平洋上的帝国主义战争终有爆发之日，财力雄厚的美国既不惧战，蛮横的日本，尤其是以强硬对外著称的新任首相加藤高明亦未必怯战，不过时机终还未成熟。

在此盘马弯弓的时期，他们所最努力的还是国际外交的纵横捭阖，他们首先注意的自然是衰弱民族的中国。试看近半月日本联俄之急与夫近来向中国表示的文化亲善——退还庚款作教育经费——便知日本的外交方针必有转变。然而时代不同了，日本若不根本抛弃帝国主义的野心，即是说日本的平民若不将贵族资本阶级打倒，则联俄联华终将成为一种梦想。无产阶级的俄国，固然不会上当，即知事的中国人又岂肯自投罗网。至于美国除掉美国的无产阶级翻身后，我们敢断言他对华一切的亲善方式，均丝丝含有铜臭和血腥的气息，我们要毫不假借地一律与以反对。

不管日美的战争急不急，总之太平洋上的风云已密布了，他们预备的是帝国主义战争，我们反抗帝国主义谋中国独立的战士，当兹风云起后，波涛涌起，切不要如欧洲大战时一般地逃避港中希图幸免，要切实地预备，预备乘机掀起太平洋上革命之潮，联合起各国被压迫的民众，携手冲上潮头，争先去做弄潮儿！

起！起！起！勇敢的国民革命之战士，请从今日预备起！

《赤光》第十期，1924年6月15日

请看国际帝国主义之阴谋

希　贤

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以统治德国底道威斯计划（大魏计划）来统治中国一事，《赤光》前期已说及了。现在此事之发展情形如何？请看下列消息（法帝国主义报纸所未载的）：

(一)《人道》十二月四日载云："全世界帝国主义对于中国情势日益挂念，声传它要预备一大□外交会议于北京，讨论中国政治经济问题。此会议将予以财政的援助于中国将来首先成立之强有力的政府。又，人谓此会议将由法国办理。"

(二)《人道》十二月十一日续载云："虽然帝国主义者现在不谈及此会议(指帝国主义报纸不载此项消息而言)，俄报通信员自北京传来消息，谓英、美、日、法外交会议在这几日内已举行了。他们的计划是由中国政府请求(列强)组织专家委员会入手。此委员会将在华府会议以前组织成功，负有审查中国政治经济情形及整理中国债务之责，英、美、日、法政府已接受了此新的道威斯计划。中国政府还未正式接受。但梁士诒曾声明中国处于财政极困难的状态中，必向美国借二千二百五十万元(美币)。因为帝国主义者严守秘密，还没人知此道威斯计划之仔细。他们想使人相信这是中国自己请求设立专家委员会来为它拟定道威斯计划，以免人反对，所以恐宣布早了不好，但要预见其目的之所在是不难的。

帝国主义者，尤其是英美，想一方面改变包有四万万居民底大国为殖民地；他方面从苏俄势力中把中国拔出来，再用经济封锁来从经济上扑灭那正在充分发展底地方(苏俄)。全世界底无产阶级要空前地大叫："勿犯中国。"

(三)《人道报》十二月十七日又载云："《晨报》,《时报》(俱伦敦大报）反对臆说的孙中山方面之布尔塞维克宣传底文字攻击很有系统，而且还在继续。他们想预备一个在最近的将来英、美干涉中国底口实。这种文字攻击中还有许多相片来描写孙中山底权能，如象一群强盗样子……"。

这是最近国际帝国主义对于中国之阴谋！其实中国自四国银行团到新银行团之包办借债，关税、盐税之外人管理，铁路航路之利权丧失，……早已在比统治德国底道威斯计划还十分厉害的道威斯计划中了。现在它还要用新的道威斯计划来统治中国，这简直是要把穷乡僻壤都殖民地化！简直是要想吸尽全中国人民最后的那一点血！

全中国人民反抗起来啊！

打倒国际帝国主义！

《赤光》第二十一、二期，1924年
12月15日及1925年1月1日合刊

我两年来旅法勤工俭学的实感

陈　　毅

我来法国差不多两年了，对于彼邦学术自惭毫无研究，因为我的初意是欲先观察事实，从复杂的社会中找相同的关系与因果，然后研究前人遗留的学说，来与自己的实验相证印，并且同时可以解决生活问题，及调剂不生活的罪过*，这是我希望的工学美满生活，是我到法国的初志。

八年冬间果然到法国，入了工厂，才觉得与我的理想大不相同。一是自己的言语太差，莫有熟练的技艺。二是法国的工厂生活，是寄在资本制度的下面，不容工学者有发展的余地，尝感着一种迫我同化的压力。若用我们在法国社会上的感觉，去推想工厂内的情形，完全是一种错误。我初入法境见着他们平等、自由、博爱的精神，到处流露，我便连想后日的工厂生活，一定能满人意。其实不然，在市面上所以看不出他们的痕迹，不过是不在统辖力之下罢了。俗语说得好，“吃人饭服人管”，在工厂内是拿着厂主的饭碗，那吗来在矮檐下谁敢不低头呢？今将我两年来在厂内的实感详细写出，当知言之不谬，留法勤工俭学的大概便在此中了。我是一个重实际的人，所以我不用张大之辞来鼓吹劳工神

---

* 原文如此。

圣，我不是有产阶级的子弟，所以我也不穿凿附会说劳农这件事怎样的坏，不过我对于我自己的经验力求忠实，有一句说一句而已。

我进厂的第一个影响，就是把我的虚荣心除掉了。因为我在未出国之先，就觉得自己有实行劳动的必要，一生活问题，二求学问题，三将来服务问题，我希望到法国去解决这三个问题，换一句说，我既不是去改革欧洲的社会，更不是听别人的鼓吹，去作劳动神圣的尝试，我有如此的宗旨，所以才生出以下的实感。我头一天入厂门，工头儿拿一张命令状来指挥，我心里想我堕地以来，这是头一次供驱使了，连想到我的初心，那里是来法国受呼唤的，并且学生的身价简直不好放下来，继后想着自己要吃饭，难道不作工吗？别人之对我如此，无非不互相了解所致，于是我的火气便得了安慰登时按住了。

晚间归来把凉水面包的晚饭用了，坐着慢慢的想，才知我往年用的钱都是祖先用汗水赚来的，那吗为父母者拿钱与子弟挥霍，是父母的罪过，为子弟者靠父母是子弟无能力。我往年谈劳工神圣那里知道硬要出汗，那么高谈主义而不实行的人，又何足说得，寄语爱谈主义者，快自己去做，做得出来，主义才有价值。

过了几天有了工作习惯，便觉稍有趣味，只是我作的是杂工，不是能学技艺的工作。每日所操可算毫无意义，后头得同伴的指导，到把耕田机Metoculteur的全部了解清楚，这就是我勤工的成绩。此外，勤工得的教训分为以下几层：

1，扫除往年坐食之病，得到生活的实感。我初作工时自己煮饭，弄来口味难吃，至缝补一层拿针总不灵便，到了一二月后，我那小家庭简直井井有序，星期三或星期到菜市去割肉买菜，看着自己的血汗工钱，不着向外的倾荡，自己心内只觉得

痛。咳，往年何尝想到此地，一年来的实感，就是知稼穑艰难了！

2，知道法国平民的情形与法国民程度的限度。法国人民尚有不识字者，大都年在四十左右，其普通仅识字而不通文法者极多，推其原故，无求学经费而已，虽有夜课学校，年长者，固已疲倦，都不愿再事学问，好在他们文言合一，解拚音便略通书报。我在国内见各报上所载的颂扬某国文字，简直与我所见不合，因为他们所遇的人是中产阶级以上，对于平民难得接洽。老实说，法国工人们有些连本国都闹不清楚，何论其他，他们心目只知道有钱就是好的，所以什么劳动运动，他自然不知道。最妙他们见著黄脸人，便谓是他的属民（安南人），这是我国自甘雌伏，不出风头，莫有留一个影响在他人心里。大凡两国国民互相了解后，才有国际间的互相扶助，我们自身的责任，就是要促起外人与吾人互相了解。

3，法国社会的普通习惯。国家最重要的是法律，有一种潜势力，比法律裁制为更大，就是社会的习惯。中国男女不平等其实无显著的法律限制，不过在男女社交公开的时候，群以为不合社教而已。中国妇女伏于此势力之下，凡几千年，可见习俗的势力了。法国的习俗就是劳动与礼貌两项，我有次因事未去厂作工，店主人便问："你得了病吗？为什么不去作工？"。次日我入厂时，同伴人们亦如此诘问我。平时法国人最忌讳骂人懒惰与不礼貌，他们的礼貌随处可以见得，都是我们应取法的，可见在他们这种社会上，若有不劳动与不礼貌的人，群众的裁制早把他更正了。

4，工作是同心情的介绍。譬如我们大家在患难之中，自然须一致的举动，当然大家有合力的必要，在厂作工的同伴，是同

道作事的人，大家为完全所事起见，那吗协商与研究是不可免的，故共同工作是互相了解的第一法门，人人能如此互相了解，互相扶助，简直是道德进步，把什么界限都化除了，岂不是合心的情爱吗？

5，资本制度的罪恶之一斑。当货物销路极广的时候，资本便雇过数的工人，以资制造。到销路低落时，便大批取缔出来，尝见工人被退出厂的情形，就用“神情丧失”“面若死灰”都形容不尽致，令人表无限同情，觉社会革命是极合道理的事。因工人在厂作工的时候，起居饮食都有一定，到了失业时期，断了收入款项。那身家的支出怎样接济，我已经过了此种景况，不过我较他们要好点罢了。总之，伤别与念旧，是谁人都不能免的，在一个久住的老屋内，与许多同伴分手的时候，谁不黯然神伤呢？况此后生活问题，毫无着落乎。资本家完全为自己利益起见，实毫无人心，我才知欧洲资本界，是罪恶的渊薮。

6，罢工的情形与利害。因为我恨资本家，我平时便想劳动家为何不联络起来一致罢工要求管理权呢？一天果然罢了工，我才到工厂门打听消息，只见许多拿枪的已站在门首。工人们在大街上大声疾呼说，我们如何救我们的生命，兵大爷拿起鞭子四下乱赶如风卷残云，工人便自己散了。头两天倒还好，四、五天便有人入厂了，此周以还，厂内出一个通告，明日不入厂者本厂能另请别人代替，原人无容来厂。次日便如往常一样了，这是工人的失败。其实罢工这件事，是一种比赛事业，两方面互相拖延，资本家无饭碗的危险。工人们一天不作工便要饿一天，不但生产额减少，工人家中，也有断生活的危险。工人罢工，生命自然不能延长，资本家有政府为后援，中等阶级及工头儿又去迎合他，所以资本家很不容易至于失败，资本家的财政，是刻夺来的，不

知政府为什么替他保守。

6，工场制度之缺憾及其组织。法国工场是工头制，资本家派一个总办 Directeur，以下有总工头 Chef D' Atelier，工程师 Ingenieur，监工 Contre Waitre，小工头Chef De quide，以下便是工人分如许的阶级，由下至上与小官见大官一样。我尝说工厂内森严阶级，就是这些工头儿筑成，他们是由下至上，常常拿身分来凌辱工人，这是我极不满意的。且工资分配很不平均，工人作工除少数作典工（以工作多少为给工资的标准）者勤苦作工而外，其余混时光而已。一则是工作无兴趣，工作是勤苦与懈惰得同等的代价，资本家见不及此，他的生产额只好减少。此种怠工影响，资本家损失最大。至厂内有救急的医生，因工受伤有半日的工价，天一热，有咖啡解渴及风扇，天冷有火炉，这是劳动家流血的结果，是我称叹不置的。

7，男女共同互助的两性调剂。法国除少数资本子弟而外大都要作工，如因身体不强任事较轻，故工资较少。许多不入厂在家操持家政，男子入厂作工。尝见午后放工时，厂门便有许多左手携儿的妇女，来与她丈夫接吻，大家便携手而归。星期日携手同游。这种快乐，吾国人几人享得，男子日间疲乏了，归家便休息无事，这种互助的爱情，比“山盟海誓”坚固得多。大凡作工的人都感有男女互相扶助的必要，我作八钟的工，还要作烹调，一天弄得自修时间都没有，每天过劳，于身体极有关系，没有女子扶助，工余在家当然另〔没〕有乐趣。由此推之，男女互相扶助是极好的事。至于男女社交公开更何待说，现在有些地方还在大惊小怪，说些“男女有别”的混话，真正可笑，替他们不值。

8，中等阶级的状态。他们是工程师企业家作文字工一类人

物，他们智识较工人为高，他们常有自高自大的状况，但他们对于资本家却又极端迎合，因为他们是将来的资本家，他们的幸福是建筑在资本劳动两阶级之中，他们是拜金主义的信徒。我尝说中等阶级，除教育界及有创造发明的工程师外，别无可取，他们一种轻视工人的面容，实在令人讨厌，就是法国的国粹（博爱）也丧在他们手里。

9，单独勤工的缺憾。我第一个缺憾，就是在法国勤工无团体生活，无研究学理的机会，星期日便老坐在店里，即或去到博物院，一人也毫无趣味，团体的益处就是在实行互助，如同订书报，同请法文教习等。至工余自修问题，工资保障问题，将来择业问题，勤工俭学宣传及发展问题，都是最重要的。可惜在法同人绝少联络，大都未改国内涣散的习气，所以把勤工俭学弄得毫无光彩，我是其中一员，首先向国人抱歉，后来的机会尚多，人生总有觉悟时，这也是无大关系的。

（此外在学校的杂感极多，此时恨不能再叙，后日当著长篇详细发表。）

这是两年来的实感，就能够记忆的写出来，错误之处读者更正。今再说几句作本篇的结论。总之，劳动是平常的，是人应做的，并不是神圣的，并不是一种新生活，是一种找饭吃找真理的法子，以劳工为神圣而实行劳动的人，其心盖与想当资本家等，以劳动为新生活的人，其人原是寄生虫，从新忏悔激于好奇心罢了，真真是劳动者，应作生产工作，不应终日劳力把脑力停钝了，学理与工作有极大关系，我希望研究学理的人去作工，作工的人去研究学理，一是免掉机械性工作的学病，二是把学理实证到事实上去，也是学术界一条新道路。可惜留法的勤工俭学是寄在敌人（资本家）底下，仅可供吾人的苦工训练，不是解决问题

的主义生活*，差不多我来法的初志完全是失望了，因为勤工所得不能俭学，做十年八年于智识无补益，而时光可惜，若把勤工俭学当著一种主义，更为荒谬。因为主义必有目的，试问勤工俭学主义的目的难道是替资本家造享福吗。至说借勤工俭学来改造社会尤是荒谬，试问把人塞到孔口，为生活而呼吸都无余力，那里能说改革事业，所以留法勤工俭学应改良的地方甚多。一味说勤工俭学绝对可能的人，是未免武断了。总之，"留法勤工俭学事业的成功，正待国人为援助"。

十四，六，一九二一

Chateau Vhierry Treboul I

《晨报》1921 年 8 月 16、17、19 日

---

* 原文如此。

我两年来旅法的痛苦

陈　毅

勤工俭学问题

少年的价值倘然是可贵，少年的时间也便可贵。少年少不了要求学，那吗少年时光应拿来求学，与此理相反者，便是少年的痛苦。下走(即"我"的谦称)是感这个痛苦的人，为诸君述一受痛苦的情形，带到发表我的感想，而引动同情于我的人们，望大家想一个解决方法，这就是我的本意。

我是四川一个学生。自我入中学以来，便感受社会的痛苦与横受金钱之支配。至学校式的教育，当然不合我的需要了。当时我已经不能自求解脱，但是每每想着西方文化，早存了游西之念。

到了八年夏间，留法勤工俭学会提倡，我把这个主义思索了一遍。我相信工学生活是人的生活，我以为勤工便是生产，替社会充裕生计；俭学是求学，是精神生活，是创造文化，为社会求进步。并且工学兼营，即理实并重，较在国内株守好得多了。又想中国人素来无往外营生的能力，我此次去以两手解决我的生活问题，与求学问题，这真是少年的伟力，能在海外独立，这也是一点光荣啊。

我去是如此想，过海时亦然，到入法国投入工厂不竟大失吾

望。天下的理论自然是不能完全与事实互合，我这种失望，绝不是中途灰心，掉转身来非难工学主义。我欲说者，就是勤工俭学生何以中国才有，我们何以不满意欧洲的资本制度。我已经受了这些苦，我把它说出来，望大家想法去救后来者。

中国何以独有勤工俭学生呢？这个问题好答得很。中国教育不良，不够学生的需要，并且愈教愈坏，试看国中那个学校能求真正学问？并且学校以外的师资极少，简直不能得观摩参考之益。加之年来军人势力太大，与匪盗串通抢劫，在这种强盗政治之下那里有好教育？青年人不向外国较光明的地方去做，难免不同化与自杀两途。但是一般无产阶级的子弟，又无力量留学，又不屑于去与伟人政客当狗，又不屑去运动，有这几个原因，所以勤工俭学主义应运而生。法国是世界爱和平自由文明先进国家，彼邦以欧战需要，我们勤工苦朋友遂因此而独盛于法国。

以吾国之古老、之宽大、之人口众多，乃送子弟去转输文明，不能替世界创造文明，已经说来惭愧；加之政治不良，遍子弟去为人作工，荒废光阴，真可耻了。我希望国内办几个真正能求学问的学校，等学生毕业后才送他们出来游学，比较留学有三层好处：（一）游学者学有根柢地，加些实验功夫便可为服务之用；（二）节省时间；（三）节省经济，并且有学问的人观察别国定要透彻些。

我学无根柢，又无有求学经费，住在法国工厂内，我受的痛苦，就是不能求学的痛苦。所以我两年来的痛苦，就是国内旧社会的痛苦，与资本制度的罪恶相加。前者已经说了，诸君听我说后者。

我由学生而为工人，由消费者而为生产者，由劳心者而为劳力者，老实说可算一种进步。因为我不是一个纯粹劳力者，我常

常把工厂内四周用冷静眼光去透视一下，那资本罪恶，我便看穿了。

在厂中分厂主、总办、监工、部长、工头、工人、杂工人。厂主是资本阶级，监工、总办是中等阶级，以下是劳力阶级。这几种人，一个怕一个，即是一个管一个。厂主的威严，在在令小工人失色。中等阶级之承上起下（媚上欺下）尤令人讨嫌。工人中之无识者，只有坐受脔割了。在法国街市上，他们那种自由平等"车揖马下"之风，真令人羡慕，但是到工厂内简直大不相同。所以人道的敌人，便是资本主义。

工人每日自然是八钟工作。工资很不平均，有技艺者工资较多，苦工者较少，妇女次之。象我一人养一人当然可以足用，可怜有些养家口的人，也就差吾国贫人不远了。

有时厂中增加制造，还是加增时间，工钱也要加。只有营业畅达时，他便雇用多数工人，营业停止他便大批退出，我见那些工人被退出厂的狼狈，真令人寒心啊。

法国工人如此，外国工人难免不歧视的。勤工学生能力不强，技艺不熟，语言不通，当然大吃其亏。厂中有班无意识的工人，常说些话来讥刺我们，真令人讨厌。还有一层，他们看到黄脸人，以为你是愚蠢与黑人一样，他们的对待，令人更难当了。

工余之暇，便煮饭吃，与洗缝等事，至少要费三句钟；一天又作八句钟的工，及入厂归店一句钟（系以近厂而论），一天差不多作了十二句钟的工了。除睡眠而外，余下只有两句钟，再治休息、整理、通信诸事，二句钟当然算了，所以工余求学，是梦想的了。

如果工资很多，倒可以积蓄，求最后的胜利。可怜，资本家用十个法郎，便把我苦朋友的精神、时间将来一齐买完了。凡事

总要有结果，我们既然不是奴隶，当然以资本制度底下的生活为不正当。并且我看见那些古人遗留的学说的伟大丰富，我知识上的需要也就膨胀极了。痛苦啊！把我少年光阴拿去兑换口粮，这个才是精神上的痛苦啊！

看见巴黎的华美与彼邦文明，才知祖国毛病太多，自己不能不以改造者自任，但是改造能力毫无预备的机会，此种痛苦，真非我笔能述说的了。

至留法勤工苦朋友如何结局？我希望国内父老帮助我们一点，提高我们勇气。这些由苦中过来的人，绝不象往年跑洋的那样幼稚。并且为父老者也不要太漠视后来者的教育了。

结论：我说了如许话，总括来说，我两年来的痛苦，是把劳力时间拿去卖钱，得来的钱不能满我的欲望，常常使我处到罪恶中，为罪恶的奴隶。推我至此的原因，一言以蔽之就是社会制度不好。

勤工俭学者　　陈　毅

十年七月十日　　法国沙多居里

《时事新报》1921 年 10 月 31 日

法国资本家虐待中国女子

郭　隆　真

八月三十日里昂中法大学收容了日本领事送来的一位中国女士名王亚森者。此女士为广东人，十二岁丧父母，被其继母自西贡诱到法国送与某商人家充下女，凡二年余，主人对她不但分文不给，常时施以极残酷的虐待。今竟于八月间将该女士逐出门外，并扣其居留证。嗣后，她的邻居念其孤苦，乃送至日本领事馆，再由该领事馆送到中法大学。现在里大一小部分同学对王亚森表同情，拟请驻法领事向法当局提出交涉，并一面募款充王亚森底临时房膳费。从这件事看来，我固然盼望里大同学能为王女士伸冤，里大能为王女士解决生活问题，但我尤盼望大家要明白这就是资本制度的罪恶！法国资本家不知奴隶了多少法国女子，现在且奴隶及中国女子。王亚森这件事不过是法国资本家黑暗势力下底一个发现，我们应该为已发现的王亚森谋解放，同时亦应该为〔未〕发现的女奴隶谋解放！

《赤光》第十七期，1924 年 10 月 15 日

二、对各国工人运动、革命运动和共产党的考察

缺 页

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始末

恩　　来

二十世纪开幕以来，世界之劳动问题，几成为社会上最切要之事项，劳动界一举一动，其关系于社会上之安宁进步，几有举足轻重之势。其在吾国或以尚无关系目之，然欧战停后，世界之风云变化正多：俄以劳农阶级当政；西欧各国劳动界列席议会，与闻政治，管理生产事务，亦日见进步；而巴黎和约签定后，世界劳动问题且特开国际会议，图解决焉，此合世界政治家、资本家、劳动者于一堂，希得合宜于各方面之办法也。至若劳动者本身，主急进者直欲以俄国现象为法，稳进者则期以渐进手段，求劳动界之逐渐改善，是虽各是其是，各非其非，然欲求世界变为劳动化，其重观劳动问题之心理则一也。故我国既不能无劳动之人，则今后之影响与变化，吾决不能自外。矧国内劳动界组织暨其发展，亦正在方兴时耶，组织既有，运用即随之以生：于常时则保险也、联络也、介绍职业也、维持失业也，均为其运用之所在；于变时则罢工也、怠工也、破坏也，又为其最大之运用。冀有以达其要求之目的，是以托辣斯之制兴，资本家遂得握社会上经济之枢纽，操劳动者之生活权，劳动界之组织起，工人权力乃得反制资本家之死命，其组织应用破坏之力于政治上者，则有俄罗斯之劳农专政，今且一变其苏维埃制度，产生建设事业矣；其

组织应用破坏之力于经济上者，乃有同盟罢工。同盟罢工乃在有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国家之罢工，在今日之俄罗斯，且目为资本家之煽惑，大逆不道之事矣。

同盟罢工最为常发见之国为英，劳动界组织之完备亦以英为最。故英工人每遇罢工，实多操胜算，而其中罢工之盛，又莫若煤矿工人，罢工关系之重又莫若（三角同盟，）今则前者已实现于英国，几及两周，后者已表决援助，设中间不经调解缓和，则昨日英伦诸岛已入万象消沉中矣。

（三角同盟）者何？煤矿工人、运输工人、铁路工人，三项联合之总同盟也。其同盟之规定，成于欧战期中，以互相援助、联合运用、保护三项工人利益为依归，而其中运用最显著者，厥维总同盟罢工。国人试思英国为如何国家耶，工商繁盛之国，一旦燃料失其供给，转运失其人，交通失其用，消沉之结果，损失之巨且不言，即此万象停顿，已足使英人感受无限痛苦也。斯种动作，本甚恶毒，然非此又不足制资本家之野心，斯实劳动界组织完善之特征，但犹不得谓为尽善，设劳动界团结之坚无可抵御，则一举手之间，劳动界可直握生产统治权，资本家将望风而逃，固无待于今兹之变，纠结不清也。

故今日欧洲除劳农俄罗斯外，劳动界之现象，仍在颠波摇动中，前途发展及其趋向，正莫知所之，即俄罗斯之劳农，使非少数人之专断，大多数之自识力恐尚不及西欧劳动者之视社会改革为切要也。社会改革之动机，本发自欧洲，欧洲自文艺复兴以后，社会无日不在进化中，亦无日不在改革中。吾国人之视社会改革中所应当解决问题，有时尚以为理想者，在欧洲已均成为实际上之趋向矣。即以罢工一事论，在欧洲为家常便饭，在吾国尚为希有，去春唐山煤矿工人罢工，其所得之结果，与今日英国矿

工所要求之事实相较，直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同是英商，其在本国则受劳动者之要求虽至再至三至于不可胜数，亦必斟酌其情形，满其希冀。其在吾国，则工人罢工之结果，只争得日增铜元一二枚，以视英国矿工此次争每日合中国币数元之差者，殊令人莫知所喻。或为之解曰：英国生活程度高，中国生活程度低，故其相差如是之巨。但吾人细心究其内容，英国煤矿工人每日工资多者有合吾国国币现今行情十元上下者，少者亦可六七元，唐山矿工多者，日得铜元三十枚以上，少者且在二十枚以内，幼童日将低至十枚，以相差如是之巨直达四十倍以上，中英生活程度之悬殊，岂复如是，是实以人生为机械也。然而英商行之于本国则有所忌惮，施虐待，役牛马，于吾国行之若无事者又何耶？是劳动界有组织与无组织之分也。欧洲劳动界之组织得以有今日，非劳动界之自决，乃社会中之有思想有能力者起为之助，方能达今日发达之境。国内达人，果视劳动问题不甚切要则已，否则组织之引导，智识之诱进，是终不可以袖手旁观，听其自生自灭，使顽钝之民众，与今日不可遏止之世界新潮流接触，伏将来无穷之隐忧也。

英国煤矿工人罢工之原因，据现象论，直接的属于拒绝矿主之减薪，间接的属于希望政府规定工人一定之薪资，设立国定工资部，保险工人的利益，设立国立利益均分组合，此现今要求之事实也。其内部之动机，则希冀以此种渐进手段，达其煤矿国有之主张。缘英自欧战停后，煤矿工人首先发难于一九一九年春，去岁十月又复为大规模之罢工，彼等两次罢工之主张，均不出前所举之表里二事。去岁罢工，结果经政府之调解，定为自复工后起，至今岁三月底止，视此数月间矿产之产额与售出后利余如何，以定工人工资之准率。此种临时敷衍办法，本非真能解决矿工间之冲突者，盖矿主只知得利，扩充其资产欲望他非所计，彼

等所根据之理由，则以战后物价渐低，生活程度亦渐复旧态，矿工工资应以一九一四年七月以前之情况为标准，且欧战后工资既有增无减，而输入及产额反远不如战中，资本家损失殊大，不得不减低工资，以求其平，此种论调真所谓为一方面说话者，初听之似亦有理。实则欧战期中为资本家特殊之时机，普通人民丧其身，破其家，毁其财，资本家且因之获无限厚利，斯类暴富，岂可期之于平时。以工人方面言，则彼等所争得之工资，初不过略减其日常生活之担负，数小者且仍拮据万分，又何能有减低之可言，故工人心内，雅不愿与此等只图私利之资本家久生纠葛，极欲煤矿改归国有，以求得事业上实际之经营权。工人之主张煤矿国有，非单纯之国家经营也，使国家之经营仍如资本家之自私其利，只为政府，何能增益于工人，且政治经济合而为一，势利相辅而行，工人宁仍有去路？故彼等之主张，其要点乃在以事业之监督权归诸政府，经营权属于工人，而外以有条件之利益分配权，留为政府与工人间相互商榷之事。此种办法非如共产主义者之直接管理之主张，而其生产者与消费者之划分权限，已现有基尔特社会主义之倾向矣。以今之英政府又奚能认可？故英政府对于国有之主张，尚愿采行，至内部之办法，则完全不能容纳。前之两次罢工，根本问题辄未得实现丝毫，其所争执多趋于工资一事，及其解决，亦仍不外乎此。今兹之变，本为矿主所逼成，故煤矿工人同盟书记郝居斯氏当罢工后，对于英相劳特乔治之宣言，始终不承认工人罢工，而认为矿主解工人之职也。

罢工之远因吾已历述如前，至其近因，则数月来矿主日以生活程度低落，煤矿收入减少，势非减低工人工资不可为言。复因各地矿产肥瘠不均，收入不等，减低工资且将谋为局部之解决，减低工资是促工人之生活力也，局部解决是保工人团结之力，而

不易一致抗拒也。是计虽巧，其奈工人已洞烛其奸何，故当三月下旬时，矿业联合会发出最后之通告，定自四月一日起实行局部解决减薪问题，煤矿工人同盟即于次日开各地代表大会于伦敦，表决拒绝矿主之提议，谓矿主不取消其办法，仍开始进行者，则全国煤矿工人于四月一日实行罢工。罢工表决后，各地代表便各遄回本地，报告大会内情，且谋团体之坚固。矿主方面，得矿工之表示后，续开一会，对于以前之办法，决定仍不更改，抱定初衷，亦各遄返本地，筹画其局部解决之实现，而暗中又复谋为矿工团体之破坏，两方相持，势盖非破裂不可矣。三月将尽，矿工同盟书记郝居斯氏尚为一度政府中人正式之访问，出示以将发之通告，告以此次罢工，系包含煤矿上人全体在内，虽抽水工人亦不能外焉。抽水工人系保护矿地之安全者，设一日不作，则水涨坑内，煤矿便有被淹之虞。郝氏之出此也，盖甚希政府中人出而维持，有以达国有煤矿之希冀，即或一时不易实现，则于部中所预定之国定工资部与国立利益分配组合，亦可有磋商之余地。不意政府中之回答，乃以国力空虚，实无能为矿区解此纷扰为言。斯言也，既明示以政府将暂持旁观态度，亦即暗示矿工煤矿国有之暂无望也。

政府之态度既明，于是煤矿工人同盟之通告，乃于三十一日发出，其所达之地，凡煤矿工人加入同盟为会员者，均有履行此项通告之义务。通告之内容，即言雇主之提议，无意撤消，凡在煤矿工人同盟之工人，均须于四月一日早零点时起实行停止工作。其所示之工人，虽抽水工人，摇机轮工人，亦均须停止其工作，于是罢工风潮起矣。罢工第一日有数处矿坑即因抽水工人罢工，当时被淹，间且有受损失极巨，不易恢复者。先是矿主于各回本地以后，志得意满，以为矿工之团结，终得以局部之解决分

散其势，遂于减低工资之进行，不遗余力。至三月三十日各地减薪表格，大致均都公布，其中均有减无增，多寡相差竟有至每日六先令者，以现今中国行情论，已至两元外矣。最多减低处，南威耳士，每日减低七先令，合中洋三元上下，最少为卡闹克卡斯，每日减少一先令，合中洋约四角以上。呜呼！以英国矿工一日被减之资，多者已足当吾国矿工二十余日辛勤之所入，少者亦足抵三四日，天地悬殊，真不忍为之一较矣。矿主此种表格之公布，其计在安数矿区之心，殊不知迫之愈急者，其铤而走险之心亦愈坚，故表格之公布，适足为罢工之导火线耳。在罢工前一晚，矿主知局部之解决无效，尚谋为内部之破坏，冀抽水工人不尽加入，以矿坑之被淹行将使工人失业之警告，冀动工人之怜，留一部分为保矿地安全之工作，不意计亦未成，抽水工人竟掉首不顾，卷入潮中。既罢工后，矿主又谋为志愿人之募集，或集技师从事于抽水工作，而结果以工人团结之威势，致应募者无人，技师保护，亦屡受工人呵辱，致亦不得终其工。因是自罢工日起，矿坑被淹者日有所闻，矿主之损失亦云巨矣，而工人团结力之坚，是又非组织完美公共意志坚强不能臻此，至工人之智识发达，则又此罢工风潮中之主脑也。

罢工开始后，英国现状顿呈不安之象。政府中对于调解一层，尚欲前又却，若甚恐失其威严，行将无以号令于全国者。矿主与矿工之相持，则各执一是，决不相下，矿主仍以局部解决之见，横梗胸中不去；矿工以局部解决，是无异散工人团结之势，使成为散沙，任听资本家宰割，是矿工所万难容忍者也。相持愈久，两方之损失愈大，矿坑被淹，间接且影响于国家产业之兴替也。

二日英新任财政大臣郝尔恩氏与煤矿工人同盟书记郝居斯氏会面之结果，其公布之内容，则政府之意见仍以财政支绌，不能

为经济之接助于任何方面，对于抽水工人停工一事，力持反对意见，云行将以政府之力募集志愿工人，保护此国家产业。斯种意见，前者为矿工对于政府之希冀，后者为矿工对于矿主之唯一恐吓利器，兹相见既异，解决之方不易言矣。一方政府鉴于矿产之濒于危殆，乃不得不别筹保护之方，先是当罢工开始前一日，英皇即签押于将发之临时戒备与召回海员两命令，前令系根据于年前国会所通过之非常事变时之政府特权法案，后者系对于因耶苏复活节各归本乡之海员而发，政府将倚之为镇压工人之具也。四日阁议，政府中关于特权之行使方法，商榷者甚多，据正式公布之内容，政府视为必要时，得征发任何土地，建筑物或工作，置于政府指挥之下，其所最注意者，为煤气电气工作，食料之分配与送达，路政之交通。此次矿工之罢工，其人数虽已超过一百二十万人，其影响究尚未立即普遍于全国，政府之筹备，何以若是其周，惟恐大乱或发者，盖深惧三角同盟罢工之继起实现耳。

三角同盟之组织，原为对外而起，今兹之变，其不能恝然不问也明矣。当事发之前一日，三角同盟干部会与（煤矿工人同盟执行部）开一联席会议，结果对于援助煤矿工人实行总同盟罢工提案，作为保留。俟四月初（运输工人联合会）（铁路工人组合）各自招集其各地代表，开会表示共同意见后，再作正式之采取或撤销。罢工事既实现，时机遂愈觉紧急，四月四五两日，运输工人联合会集各地代表，作两次之磋商，结果一致赞成三角同盟罢工之实现；六日（铁路工人组合）开会之结果亦同罢工之实行赞成矣。至其实现之期果何日耶，是则两会均留其权于干部，待三角同盟之决定，此盖与办事人时机上有伸缩之余地也。三角同盟既有罢工实现之可能，煤矿工人之复扰乃益扩大前途危险，是政府之重忧也。一方国会中人，睹此将发之重大变动，亦甚不安，

因连日开会，促政府图适当之调解。至是劳特乔治乃宣布其方法，于七日政府与矿工代表之会议，斯次会议之开，乃矿工代表受政府招致而来者，未会面之先，政府所持之意见，矿工同盟已有所闻，故当六日同盟之执行部曾有一度内部之商榷，对于劳特乔治所持之三项调解前决定之意见，完全反对。劳氏之意见在矿主与矿工未正式谈判以前，抽水工人须完全复工，救护矿业，政府之救济不能希望，政府管理亦不能作到，此盖与二日郝尔恩财政大臣所表示之政府意见，无稍差异也。

矿工既持反对政府意见之态度，其对于政府亦提出三项意见为待解决问题(一)当谈判中间抽水工人不能复工；(二)工人复工须以原旧最高之工资为标准；(三)政府须允许设立国定工资部，与国立利益分配组合。此又与政府意见为针锋之相对也，意见出入既如是之甚，非至迫不得已，任何方面决不甘牺牲，故七日早晨两方面之谈判遂告决裂。

是日晚劳得乔治在国会之报告，归其过于矿工，而以将实行政府特权之意告诸国会，所以示政府处置此事之决心也。所谓特权之内容，对于矿工之关系，亦仅派兵保护矿地，募集志愿工人恢复抽水工作耳。而所谓全部特权将何所使，劳氏之意，盖非专对矿工而言，亦所以示运输与铁路工人，政府对于三角同盟已有所戒备矣。

不意政府之戒备愈严，三角同盟罢工之实现亦愈急。四月八日三角同盟各团体干部联合会议之结果，遂决定设此数日间矿主与矿工谈判不复开者，运输铁路两业工人，得于四月十二日继起为总同盟之罢工。罢工之时期既定，各地之通告与致政府及各业主之通牒，亦同时发出，风云紧急，政府中人遂不复持迟缓之手段，以对待矿工者对待三角同盟矣。九月一日间，政府再开阁议，

各党要人亦咸往政府接洽，冀有以缓和此形势，三角同盟干部亦曾数往政府处，磋商谈判复开之条件。最后结果，九日晚间由三角同盟领袖陶玛斯氏，以下列之二项条件，作为暂时之调解：

（一） 政府将担任招集矿主与矿工代表开联席会议于四月十一日下午；

（二） 矿工同盟执行部，将允许于当晚（九日）发通告于各地，通知矿工停止以前干涉保护矿业安全，或干涉政府用其他力量保护矿业之动作。

斯种调解，当由两方认可立即实行。陶氏之办法，盖仅限于会议开始前之先决事项。以此二项，较之以前政府与矿工代表自相接洽之条件，殆有繁简之感。政府所希冀者三，矿工亦以三项希冀应之，今则后二项均改归谈判中解决，而以第一项之两种相反意见，折衷为上列之办法，一方既不强矿工以复工之事实，一方又容纳政府保护矿业之意见，诚两得其平矣。矿工同盟执行部之各地通告既发出，果各地矿坑之抽水工作，遂有多数得防护之机，而矿工亦暂止其破坏干涉举动，静候十一日会议之消息，作如何解决。使十一日谈判竟得言归于好，渐就融接，则英国一时之危机，岂不安然渡过，而复归为一致振兴产业之途耶！然而此事非易为也，满天云雾，集之也易，散之也难，矧两方意见之差异，又若是其深耶，故谈判重开，亦不过罢工声中应有之点缀，其去真正解决之道，殊辽远也。至于三角同盟罢工之实现，则十二日之预告，乃因之延期，是亦足稍慰英人平和之望者，然而于大局之乐观，正未易言也。

谈判复开以前之现象既明，吾请进而叙近两日来谈判开后之情形。十一日之会议，系由政府担任召集者，与会者除矿业联合会中央委员及煤矿工人同盟执行部人外，政府中人有劳特乔治首

相、财政大臣、劳动部长、矿业书记等官。会议内容，先由矿工与矿主两方面各述其所持之意：矿工意见以工资之安定，须以国定工资为根据，工人利益均平分配，及国家担任救济时之不安现象为先决问题；矿主意见仍坚持其局部解决之办法；两方意见宣布后，劳特乔治亦申说政府之意见，其重要点在政府对于增加赋税救济重要产业之案，断难提出于国会。三方面意见宣布完毕，即由劳特乔治宣告散会，定十二日下午继续开会，政府将公布政府调解两方面之办法，征求两方面同意，而于当日之午前及午后之开会前，与矿主及矿工代表又约为单独之谈话。逮十二日正式谈判既开，政府中人提出下列八项办法，大旨如下：

（一） 矿工所要求之国家工资部，与国立利益分配组合，政府将允许实验其一；

（二） 关于不论各区矿产之能力如何，矿主与矿工之利益分配，均须受强制的为普通之均平分配，以期工资平等之实现一事，设政府在各矿产上不得十分及永久之管理时，此事不能实行；

（三） 此类类似威胁之方法，虽经力行，恐亦难免于破裂；

（四） 国立利益分配组合，结果其均平分配法，将使矿业出产，不能如原有之产额，间接影响将及于生活程度之提高；

（五） 在每一地方将制定一标准工资，当标准工资未得满意前，利益分配将无从支出，此种工资标准将由国家决定，且将为此次会议之重要讨论题目，此后并将组织一国家委员会，矿主与矿工均得派同数代表与会；

（六） 标准工资之决定，将不依煤矿之价值而定，将以改善工资之可能性为依归，其可能性当以引低生产品的价值，增进经济与效率，暨结合矿主与矿工之协助为标准；

（七） 矿主与矿工其各自标准利益与标准工资，暨其余之剩

余利益，分配之关系，将立刻决定于此次会议中，而其分配时，其采用之成分多寡，亦将由此会议决定；

（八） 假若矿主与矿工之商榷妥协后，其工资定率系以经济现象为根据者，政府将协助工资低落受影响最巨之各地方，以一时的借贷，或别种救济之方法；

政府意见宣布后，其倾向仍不出斟酌各地情形，图工资之减低，其所允矿工之要求者，仅第一项办法，而一时又不易做到，名曰调解，实则仍属庇护矿主。矿工虽愿迁就，亦难以下手，故当场煤矿工人同盟书记郝居斯氏宣言，对于政府所提议之办法，将退席审议，再予政府以书面之答复。至晚间英首相便得其答覆，原信寥寥数语，盖一坚决拒绝政府提议之文也，至是政府之调解又归无效。同日晚（十二日）三角同盟又开一紧急会议，认为此次会议完全决裂，对于三角同盟罢工之进行，其通告各地之电文为（非得罢工通告后，仍当继续工作），此一电盖示三角同盟罢工尚不即实行，留以有待也。其在外部则希冀矿主政府矿工之谈判仍有转圆之余地，其在内部则希冀此罢工局面有扩大之机，前者之动静尚未闻有若何之佳音，而后者则会议决裂当晚，电气同业组合工人已表示一致援助三角同盟矣。果使今明两日之形势不转，则三角同盟之总罢工其终不免于实现，将来之结果究竟如何，容俟续报。（十年四月十三日晚）（完）

天津《益世报》1921 年 5 月 26—29 日

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续志

恩　来

吾上次通信述英国煤矿工人罢工之事实，至四月十二日止，今又一周矣，中间之事变，乃有出乎吾人意料之外者，乃三角同盟总罢工解约是也。当十二日晚，英国煤矿工人同盟致拒绝政府之提议书于首相，政府招集矿工矿主之会议，遂复归于决裂。三角同盟首领陶玛斯氏之调解，乃亦因之无效。十三日三角同盟干部暨煤矿工人同盟、铁路工人组合、运输工人同盟三会之干部，开会讨论罢工之实现问题，会议结果由铁路工人、运输工人之首领发通告于各地，宣布两业工人于十五日晚间十点钟起一律罢工，无特别情形之保留，言简意决，三角同盟总罢工殆在不可逃数矣。同日两业首领陶玛斯、维廉两氏，复致正式通告于首相，报告十五日将发之事实，而劳特乔治亦回报如仪，且附以放弃此种举动之劝告。三角同盟之通告既发出，火车机匠消防队员联合会，亦继之表决与三角同盟取一致行动，而伦敦电业工人亦有同样之意见发表，情急势迫，英伦岛上之危机，殆愈演愈烈。政府方面对于非常事变时特权之行使，布置不遗余力。为防街车之停驶也，盖搜公共场所之装货车，以备接替；为防运输之中止也，令各大商店之仓库尽储食物，以济缺乏；为防电业之停工也，预雇技师，谋充补替；为防秩序之骚动也，预遣水陆兵士分镇各地，政

府之布置如此。一方于调解之进行亦仍如旧，十四日国会开会，政府为谋安定人心起见，有先决各地工资之临时规定办法，国会各党和之，于是当晚煤矿工人同盟书记郝居斯氏，被邀于国会劳动党员谈话室，商榷先决办法，郝氏以本身虽赞成妥协，但不能代表众意，允于十五日作正式答复。是日国会至夜中始散会，会散后犹有数人至劳特乔治处，作私人谈话，盖亦为商榷和缓罢工之情势者，足征当日空气之紧张也。

十五日既至，早间劳特乔治与矿主代表又为一方面之商榷，劳氏与前一日晚且约矿工代表作私人之接洽，但矿工代表终未至。下午政府中人群聚于国会，俟矿工同盟正式之答复，至二时，矿工同盟致首相之书至，由劳特乔治读其词，则拒绝政府最后之提议，且尤反对政府不承认国立利益分配之办法也。矿工最后之态度既明，总罢工之危机更愈逼愈近，伦敦市上之空气，乃为之益紧，然是时三角同盟各业干部犹有一最后会议也，事变正多焉知不有此最后之一变？于是政府及国会中人乃静坐以俟此最后之转机。有顷，一消息至，乃三角同盟会议之结果也，果也总罢工之通告，乃以解约闻矣，是距矿工拒绝政府提议之消息，仅差二小时，而三角同盟暨铁路工人领袖陶玛斯氏，且亲报此信至国会，与劳特乔治作得意之周旋。是日会议除煤矿铁路运输三业工人外，尚有火车机匠消防队夫联合会亦加入，解约藉口，以不满意于矿工之屡拒调解故，是知总罢工延期，一而再，再而三（盘马弯弓故不发）者，盖有待也。然而此惊人之策，遂使矿工牺牲数日之罢工，痴待后援之实现。使三角同盟果无意于总罢工也，则八日之会实不应有十二日罢工欺人之举，不但十二日也，且因调解之故，时日之延宕荒废，以至十五而卒无一成，此耽搁矿工之进行，减少矿工之势力，实足以使政府与矿主阴谋之得济

也；使三角同盟果有总罢工决心，则刻不容缓之举，八日之会又何必有四日之犹豫期间留于实现罢工日前，十二日会议之决裂，又何必至十三日始开会议，而复定罢工期于十五日晚间？名曰图消息之周知，实则暗助政府得有缓和之机也，不仅此也，二次罢工之通告固明定无特别情形之保留矣，而十四日晚间政府之调解，铁路工人领袖陶玛斯氏且赞助其事，十五日矿工拒绝政府提议后，三角同盟且据此以非难矿工同盟，是种反覆举动，实使矿工蒙巨大之损失，政府中人乃得上下其手也。故此次三角同盟总罢工之解约，英国市民视之或以为危机避去，正英国无上之幸福，但失信于矿工，此后三角同盟之作用恐不复如前之得人信任，使人仰服矣。而工联之不能互相援助，从此亦将出一破绽，吾之推论也如是。至三角同盟之内幕，则此次总罢工之通告，盖由于一二首领运作用于其间，遽尔表决，非真有罢工之决心与实力也。

当煤矿工人初罢工也，其领袖诸人谋三角同盟总罢工之实现，极力促铁路工人组合，暨运输工人同盟开会商榷此事，运输工人本甚赞成援助矿工为总罢工之举，故四月四五两日各地代表集合于伦敦之会议，赞成罢工者遂居多数，至铁路工人则对于总罢工之举不甚赞成，六日铁路工人组合会议，以运输工人业已表决援助于先，当仁不让，遂亦作同样之表示，然领袖诸人固甚不愿事实之终实现也。八日三角同盟会议，在煤矿工人代表意见，固甚盼总罢工早日证实，期以九日晚间，但铁路工人代表坚决反对，遂延期至十二日，此四日之和缓，陶玛斯氏遂得调解于其间，卒有十一、十二两日矿主矿工与政府之联合会议，结果虽仍归决裂，而矿坑之被淹危机，乃因谈判前交换条件之结果得以少安，三角同盟总罢工之实现，遂亦因之延期，此诚使政府及矿主感无限之厚赐，此中内情实以陶玛斯氏之希冀调解之成功为最大关键。盖

陶氏明知铁路工人实现罢工之困难，然又不得不有惊人之策，彼固冀挟三角同盟总罢工威吓之势，可以使政府及矿主有所迁就，故第一次调解决裂后，而三角同盟犹不即刻为总罢工之会议，迟至次日始表决十五日晚间之罢工预定，延缓时日，实无不为调解留地步也。然时期愈长，情势愈缓，群众之同情心本利于速发不利于迟缓，愈迟缓其势愈衰，罢工不易实现之破绽，乃愈为政府识破矣。

三角同盟既解总罢工之约矣，矿工之外援乃绝，旬日来之时期荒废，真正之实力遂仍不得不返求诸本身。十六日煤矿工人同盟会议，对于罢工之继续仍坚持固有状态不稍动，对于政府所提出之种种调解办法，决定于二十二日集各矿地代表于伦敦，再开会议讨论。此数日间各矿地自行集会，决定各矿地对于调解时之最后办法，以备伦敦大会时，作各地意见之总勘定。矿工之态度如此，政府之意见，则劳特乔治十八日在国会之演说，仍持调解办法，办法内容与十二日政府在矿主矿工代表联合会议中所发表之意见（已见上次通讯），大致相同。劳氏之宣言既出，矿主方面之矿业联合会，亦于十九日晚间发出一公文，宣布彼等对于解除矿工纷争之意见，大致分为九项，盖为对政府之提议而发者：

（一） 设立国定工资部，执行应用于全国之要项；

（二） 处置国家要项，以各地财政结果为根据，而法定各地方之工资价格；

（三） 财政结果之正确时期，由国家规定；

（四） 工资最低之点，亦由国家决定；

（五） 当现存法外期间，其收入之盈余所有，如给工资于工之利率，将应用于各地；

（六） 将满足各地矿工代表，给各地矿工以矿主所能担负之

工资；

（七） 同工人代表协议，关于最低工资点之意见；

（八） 赞成与矿工将来有工资同盟利益在国家关系之上；

（九） 设备矿主之帐簿同主簿之联合审查，由矿主与矿工两方代表担任，在必须时工资得加减之，所有事实，一同预计；

以上九项办法，与政府意见不相出入，矿主方面自罢工迄今，除此次通告外，并无别项正式表示，其重要可知，谅亦与政府暗幕中商榷妥协之结果也。预计二十二日矿工之各地代表会议开后，调解之趋势恐将日甚。盖矿工之态度，因后援之绝望，时期之长久，恐亦不免稍为软化，而政府遂得操纵于其间矣。然矿工之要求，虽不易完全达到，但现状终将改善，且罢工二十日之结果，矿坑淹没者不知凡几，受损失后一二年间不易恢复者，亦有数处。此矿业本身所受影响，至若各地工场因煤产之停止，供给之不足，工人有失业者。向欧洲大陆恃英煤供给者，尤直接受其影响，意大利且因此将节省用电时间，减少火车次数矣。美煤之由大西洋输来者，且因此大增出口之额，是知百万以上之煤矿工人罢工，其关系于欧洲现象及经济界固非浅鲜。谁实为之，孰令致之，矿工之罪欤，抑资本家之惟利是图，政府之轻视心理有以使之耶。（十年四月二十一日早稿）

天津《益世报》1921 年 6 月13—14日

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再志

恩　来

煤矿工人罢工近讯　关于英国矿工罢工一事，吾已两发通信，叙其内情。溯自罢工之日，至今已二十五日，时期之长，持力之久，在世界罢工史上已属少见。然结果犹未得者，盖中间之挫折与延宕实有以使之，三角同盟之罢工未果，其挫折一也；政府之主开会议而无调解之诚心，卒致谈判中止，其挫折二也。三角同盟三次延期，其延宕一也；铁路运输工人首领声言罢工，而犹留三四日之预备不克即发，资敌人和缓之机，颓内部仗义之气，其延宕二也；政府谈判，两次提议，与工人所希冀者，均相差甚远，然因时期延长之故，乃得上下其手，破三角同盟将成之势，其延宕三也。有此变化，故二十三五日之长期罢工，政府与矿主犹得高坐堂皇，与矿工争论得失，而矿工终不能获完全胜利也。然谓胜利不易完全获得可也，谓尚一无所获则不可也；谓因中间之挫折延宕，以致胜利之不克早获则可也，谓因挫折与延宕而胜利终不可获则不可也。盖自罢工既现之际，各矿工所持之态度与要求之事项，时至今日仍无以异也。至若政府，则对于国定工资部之设立，与政府担任一时救济，固已显示其让步。矿主方面，则吾上次通信亦已述其提议九项办法，于政府之表示多致赞同，而于减低工资问题，尤再三以政府得最后之决定权为言，此实与方罢

工时政府之宣言不问矿主之地方解决，大有别也。证以最近数日中之事实，尤知兹次矿工罢工之绝大牺牲，万不能一无所得也。

大会前之各地形势　三角同盟总罢工既失败于十五日之会议，煤矿工人之同盟干部乃继起会议，谋内部之坚固与方法之商榷，定开各地代表大会于二十二日。当聚会期前，各地矿工预先集会讨论干部所询问之事件，与今后之态度，讨论结果虽有缓急之分，然其于继续罢工及国定工资与国定利益均平分配办法，仍坚持如故也。此次罢工人数最多主持最力之区为南威耳士地方，故二十日南威耳士矿工代表开会于加第夫，对于坚持上述之事项外，而尤竭力反对政府及矿主所提议之临时办法，对于裁减工资问题也。故大会未开以先观各地形势，已足证矿工之勇气未尝稍衰，不但未衰，恐其因后援之绝望，而益觉自助之切，团结之力久而愈坚也，此证之于各地之接济现象而知其然也。当罢工初现时，各地矿工所得自团体中之救济金尚足维持生活，及乎最近一星期中，则贫乏区域已减至每星期五先令矣，稀微之数，何足以供矿工之需求？然万众一心，犹未闻持异议者，则团体之信仰心与公共利益心，有以胜此一时困难。呜呼！他且不论即此一端，已足愧吾等组织无能力之民族矣，已足愧吾等无组织能力之民族矣！

大会前之干部会议　大会前一日煤矿工人同盟干部，开会议于会所，预定次日大会干部应持之态度。会议结果，对于国定工资及国定利益均平分配办法仍主张坚持，而于富裕矿区接济贫乏矿区一层尤加注意，此盖汇集各地方意见而为此总勘定，不待大会之开，矿工之态度固已鲜明若揭矣。干部宣布之文，为干部已取得各地报告，将提出解决于明日各地代表会议中。此项报告对于国定工资部及国定利益均平分配主义，表示工人坚持之态度甚不明了，同盟干事将于代表会议中，报告上星期五（十五日）早

晨三角同盟议决之详细内情。至于上次通信所述之矿主提议九项办法，矿工同盟干事则以为未得矿主之正式通告，不便作若何表示也。

大会与谈判之复开　二十二日之各地代表大会，开自上午十钟半，会议结果：对于三月十日各地代表会议所规定之条件，大致无所更改，对于干部之赞助仍不改旧观，惟于三角同盟则非议渐起，盖十五日之变，各地矿工殊致愤慨，其视三角同盟干部尤深恶痛绝，知非彻底改造不足以清三四首领利用之机也。各地代表会议散后，下午政府与矿主矿工之谈判便得复开，斯盖矿工干部已先有接洽，而留待各地代表之承诺也。谈判内容，当日并无剧烈辩论，主开会议者为政府方面，劳特乔治亲出席与议，佐以财政大臣，商务局长，劳动部长，矿务书记官等人。矿主矿工两方面，对于工资问题略有争论，嗣由政府提议矿主方面应于下次会议中将所愿提议之条件，加详细说明与妥确办法，而定下次会议之期为二十五日，无形中又延宕数日。盖政府中所据之理由，为二十三四两日英法两国总理，将集议于英伦海滨林圃庄，殊无暇也，故矿工方面亦无异议。然因财款问题重大，牺牲两日时光，百余万之矿工乃又延长四十八小时之无业困苦，此所谓以国家为前提者，正不知劳特乔治又何以慰其望也。

矿主与矿工之争点　矿主方面之意见，今已渐化其强硬态度，而作和缓接近之磋商，前函所列九项办法，即其让步之表示，但犹有与矿工难融洽者，即国定利益均平分配办法，富裕矿区救济贫乏矿区办法，而减低工资之意见亦所见各异。据矿主方面所报告，今岁前二月矿业上损失，殆近一千三百五十万镑，比较以前比例言也，三月内之工资支出，过六千九百万镑，平均损失，一月中每吨煤约合五先令八便士，二月中每吨煤约合五先令十一便

士多，三月中约由五先令至六先令之间。在一九一三年中，每吨煤出产价格约八先令十一便士，其间支出于工资者，为六先令十一便士，至今岁一月之每吨煤出产之价格为四十先令三便士，其支出于工资者为三十一先令七便士，以此比例相较，矿主所支出于工人者自较一九一三年为多，但此种比例宁得谓平？一九一三年每吨煤之余额为二先令，今则增至八先令八便士，虽曰生活程度增高，物价腾贵，然矿主盈余额之增长，其积数终不应持以与矿工工资增长之积数相较，盖一则敛之于数人之手其利大，一则分而散之众人，其利虽薄，却甚微也。且矿工对于矿主极大之攻击，则在其乘欧战多事之秋，鞭策工人，博巨大利润，今战后万机待理，经济枯窘，而矿主尤希保持固有之利率而增长之，其道非低工资即长煤价，是均于社会有极大影响也，故矿工之罢工，拒绝低薪条件，不仅为自身生活，亦所以为社会鸣其不平。不仅此也，矿主所欲分地减低工人薪资之预告，其比例视以前之工资在南威耳士得百分之四十，在定恩林地且达百分之四十三，是不止欲保持一九一三年之余额比例，直借题发挥其扩充资产欲也，是乌可以不战?!两方面争持之点，其注意点均不外乎此。苟谈判中果能磋商至此者，则双方让步，解决之期已近，然犹不及议者则（盘马弯弓故不发），一方以国定工资及国定利益均平分配办法为根据，希得根本之解决，一方暂许其一而竭力反对其他，以冀矿工之就范，此近日会议中之争持事项也。

大会前矿工之会议　二十五日政府与矿工预定会议之前一日，闻矿工人干事部曾开一预备会，审议对于矿主所提议应持之态度，同时并兼及三角同盟问题。干部中多数主张煤矿工人同盟暂行脱离三角同盟，须俟其改组后，能获得真正各业工人代表来参与是会，再行加入，此种反动，固二十二日各地代表会议此以

促成之，然十五日之变，实居其主因，前次通信，吾果已料及之矣。二十五日会议既开，由新财政大臣郝尔恩氏主席。矿主方面之提议，乃正式发表，其内容甚复杂。昨日（二十五日）之会，几为此矿主提议所独占也，其所宣布之公文，首冠以已经得两方面同意之条文：

（一）工人之报酬，须视产业力所能负之点决定；

（二）矿主之标准利益，当针对矿工之标准工资规定，但矿工之工资必先查定；

（三）利润盈余当以规定之比例分配于矿主矿工中间，至必须事实同表格之确定，当以矿主簿计审查联合部为依归。

此外矿主方面之提议，有所谓持久方法者：

（一）工资由产业中支出，须视其财政上能力为定，因此全国矿区将别之为数区，以便画一标准；

（二）下列事项将助定工资之支给，而按其财政地位行于各区者：

（甲）矿工之标准工资，当针对矿主之标准利益规定，但矿工之工资必先规定；

（乙）利润盈余，必须分给于矿主同矿工。

此外又有所谓临时意见者：

（一）暂规定一短期，以三月为限。在此短期中，减低工资实用一定总数在每一次变更中，但减低标准，不得超过政府与矿主矿工三方面所预定之数，不作工者每日停止工资；

（二）在临时时期中，每月之确定数目，须以渐合于持久方法为准则，但矿主总计各矿区：

（甲）将无盈余可分，因按前数月应减低之工资率所推想者；

（乙）并将无标准利益可得全部或一部，因此月中按第一条所

规定工资，必仍在最大限度上结果利益遂不获针对之标准；

(三)政府在必须时，应与各区以寄附金，如按第一项之规定，而犹过各矿区力所能负之最大限度上者；

(四)临时时期限至一九二一年七月三十一日为止，此后当按持久方法第一项办理；

(五)为计算之故，三月中之结果将得适用于五六两月，五月结果将得适用于七月。

至于分区办法，或将分为苏格兰，劳沙璞尔兰得，达尔汉末及中部西南威耳士数区，此矿主提议之大概也。继起者将为财政统计结果之讨论，已定于今日下午开议，睹此情形，矿主与矿工盖已渐具接近可能性矣(十年四月二十六日稿)。

愈久愈坚之罢工潮　吾前次通信，不云英国煤矿主已提出新解决方法于会议中耶，时至今日罢工实现已逾一月，宜有佳音以慰吾人，特吾人望之綦切，而事实之昭示吾人者，乃适得其反。当矿主于四月二十五日英政府及矿主矿工两方面会议时，提出永久与临时两种办法，次日会议复开，矿主方面以办法既已提出，赞助承认与否，惟在政府矿工，故当场并无若何辩论。矿工方面，以矿主之提议原分永久与临时两种，永久办法虽似有承认矿工国定工资之要求，但决定工资最后之限制在政府，而其中矿主仍得有伸缩余地，至若国定利益均平分配，则矿主所云之利益盈余分配办法，又与矿工之要求者，绝不相类，此矿工罢工所争之根本解决，已显然被其拒绝泰半；此外若临时办法，则今后四月即使能协商得一最低之普遍减薪价格，然究属一时相安，过此之纷纠又将继起。是矿主之所提议，虽曰实行让步，但与矿工之要求相较，犹相去甚远也，惟矿工代表当日在会场中并未表示拒绝态度，盖将视政府作如何处理。政府代表知救济矿业，终属政府

当局之职。矿主之希冀于政府也，在救济贫乏矿区力不足以负工人巨大工资者，矿工之希冀于政府也，则一在根本解决，一在临时救济。政府调解之术，以根本解决非立时可办，且国定利益均平分配办法，非特政府不肯为，即矿主方面亦坚持反对，遂首以救济为言。救济之方，在政府惟能尽力于补助及工资少减之规定，补助视政府之余力如何，当局可自定之；工资少减，则须视矿主矿工相合之意见而折中之，是有待于互相磋商也。不但此也，工资之少减与多减，直接影响固及于矿工，然间接及于政府补助额者亦正大，反言之，政府补助额之多少，固又影响于工资少减多减之差矣。因此政府当局，乃定于二十七日上午，分见矿主与矿工两方面代表，磋商工资减低之事。原来政府意见对于减低工资，拟采取折中办法，盖工人主张由国家定一合适于工人生活之标准工资，矿主主张地方分别解决，而政府则欲定一减资限格，使矿主在限格中有伸缩余地，过此则受限制，此盖采纳矿主新提议，而由政府主持者也。二十七日双方接洽，政府本欲实行减资限格为三先令六便士，工人方面力持不可，谓最多只能及于两先令，且此为临时办法。根本解决如国定工资部之设国定利益均平分配办法，政府均当如其所求，方有妥协可言也，矿主方面，则与政府互为表里者，自无不乐从也。惟其代表之与政府商榷者，乃在救济金之多少，因其与减资高低有莫大影响，而资本家所视为有利可图之事也。

四月中之最后会议　二十七日政府与矿主矿工两方代表既分别接洽，二十八日乃由政府招致矿工代表会于商务部。财政大臣郝尔恩氏代表政府提出新议，其大旨谓政府将以一千万镑，救济煤矿产业，凡所得不足达减资限格之需要各地，均可以是款为其地之工资补助。但此种救济，仅限于四个月内，普通的减资限格

五月内最少不得过三先令，六月内最多不得过三先令六便士，七月以救济前两个月之余款三分之二救济各地，八月则用其余数。四月后工资之减低，将达一标准地位，政府甚赞成于地方之分别解决，但在此临时期中，各地减资决不能外乎政府所规定者。工人既得一渐进减低之调剂，则四月后亦不至有若何变动与不安。政府甚希望此后安定，能由八月以后有一年之预约，至期即使有特别变动，亦宜有三月预告之期，俾各方均有所备。至国定利益均平分配办法，则决非现时所能议及，且政府亦不信此项办法能于各方面有若何利益。工资价格之争执，政府固甚愿有国家部设立，矿主矿工两方各派代表与议，由政府为之调解，至规定工资，所根据之收支帐簿亦可由两方派人审查，断其正确，郝氏之提议大概如此。当由矿工代表郝居斯答言，矿工之罢工牺牲绝大，其所希冀在求一永久和平，而不求一时之苟安，如国定工资部，国定利益均平分配办法，均为其根本解决之道，今政府乃弃此不顾，而极欲求片刻之安，且此片刻之安，亦置工人于死地者，五月中六月中工资既以六便士递减矣，则七月将增至四先令，而八月且为四先令六便士矣，长此以计，宁有底止？三四先令之减，于工人生活标准已难维持，则犹不止此耶，所谓四月后一年安定之期，殆类梦呓，此矿工所极难承认者。郝居斯答言既尽，当以归而询诸各地代表为辞，会议乃散。当日晚间煤矿工人代表开会，以八十九万九千对四万二千大多数同意票，通过拒绝政府提议案，其重要之点在政府之提议：（一）拒绝国定利益均平分配办法；（二）为地方妥协；（三）为新标准工资之仲裁；（四）以一千万镑救济四个月；（五）部分削减工资，均不足满矿工之希望。其所公布之决议为此次会议决定拒绝政府之提议，原因由于政府并未承认吾人所主张国定工资部及国定利益均平分配办法之提议，于

是政府之一场调解，至是又完全停顿。各矿工代表，亦各遄回本地报告政府提案之内容，兼征集各方意见，以备此罢工期中筹画别种进行方略。矿主方面，既得矿工拒绝政府提议之表示，乃于二十九日开各地代表会议于伦敦，对于矿工态度之强硬，深致愤懑，当决定离伦敦，各回本地，并宣言将不复为何种会议，盖所以示其悻悻不平之气也。两方既复趋决裂，一时和解乃不易言，数日来未见若何变象，而春光四月，英伦海岛遂完全渡于罢工潮之中矣。

罢工声中之各现象　矿工罢工既一月矣，持力之久，固足为吾人所倾倒，而其损失牺牲之大，要亦足令吾人惊叹不已。此一月来，生活之支持，家室之赡养，子女之教育，在在需财，滴款不入，支此难关，奋斗之气，今犹未已，斯诚属难能。其所恃救济者，则在团体中向日储金之供给，然涓滴之施，何足以应工人家家之需？总计此次罢工人数约及百万，益以家人盖其数约达三百万以上，饥饿困窘，此一月之现象可推想而知。然工人决不以是颓其气，矿工代表议决拒绝政府新提议之消息传至各地后，工人意见类皆表同情于代表，重要矿区如南威耳士、兰卡雪耳、雪耳、洛脱诸地，且开地方代表会议，表示赞助代表之举动，以示矿工之决心。其尤奇者，则各地矿工之妻亦有联合，对于继续罢工之举，咸开会表决赞助，斯益足以坚矿工之心，鼓矿工之气，所谓人贵得有贤内助者，谁谓贫女子不若人耶?!

各方面之继起援助　三角同盟总罢工之事既败，煤矿工人乃绝意于同盟干部，声言干部非彻底改造，矿工将不愿与闻一切，斯盖表其不满意于干部中操纵诸人，与全体铁路运输工人固无与也。铁路运输工人亦因三角同盟总罢工未得实现，深致不安，乃思有以挽救之，以消除两方之隔阂。于是运输工人有不装煤，铁路工人有不运煤之通告，凡美德之煤由海道运至英国海口者，卸

货工人拒绝搬运，英国各矿地之积煤，铁路工人亦拒绝运往各地，其中有为居家日用两处之煤，尚不禁运，盖其战略在涸竭各工场之需要，有以促资本家之反省，政府之醒悟也。运输工人且进一步通告大陆各国运输工人，亦为同样之举动，拒绝运煤来英，此不过英运输工人之希望，至事实上尚未得证明。惟英国内部拒绝运送之举，已有行之者矣，影响所及，实足以使工业活动力最富之英国，蒙一时停顿之损失。内攻外逼，工人之搏战不可谓不勇且凶矣，然矿产及政府当局犹指挥若定，不肯稍示屈就，此真西欧社会久经大敌，惯能应付者也。若在吾国，不惟工人无是团结，无是勇敢，无是毅力，即资本家政府当局，遇斯难关，恐亦望风而靡，谚云(棋逢对手)，信然。

各工厂所受之影响　罢工以来，煤产不出，运输停送，最大之影响，厥惟工场，据最近各报所载，各地工场因煤额之减少缺乏，作工时间有缩短者，工人有失业者，工资有减少者，需煤最多之铁路交通，因燃料缺乏，上月下旬已逐渐减少车行次数，先之以星期停车，继之以减少平常快车，至今则已减其车行数至一半矣，甚有数线连睡车饭车亦均减去。轮船公司，且借煤料缺乏高长船票价格，此又为资本家乘机打劫之现象也。伦敦全城因需煤之巨，政府已四方设法图用煤之减少。欧战以还，伦敦市中灯光已不甚强，今则市灯有每隔一灯方熄之处，行人尤不便矣。然居家之灯尤为费电气费煤气之所，于是政府近乃颁行限制点灯之规章，同时且又以提前钟点之法济之，但伦敦乏煤之现象，仍日增不已，政府当局不根本之解决是求，而惟从事于消极防御，徒见其无济于事，未来胜负，恐于人终不能无所得，而矿主与政府及资本家亦终不能无所失也。

减低工资之流行病　煤矿工人既以减低工资问题掀起偌大之

风潮，各业场主宜有所惧而不敢再发矣，然资本家戒畏之心，终不敌其扩充资产欲念之旺，故月来各业工人受减资之预告者，日有所闻。上星期海上航业部已决定减低工人薪资，建筑业联合会决定减低工资至百分之二十五，而增作工时间至每星期五十小时，棉业主且主张大减工资，以维持向有之利益。至工人方面，则造船业工人、渔业工人、丝业工人、药料化学工人、成衣匠、靴匠各联合会，均先后表示其拒绝减低工资之意见。种种隐忧俱已呈现，一旦爆发，非工人受生活艰难之赐，即社会全体消费者，蒙物价腾贵之影响。彼资本家固决不肯稍敛其野心欲望也。而昨日美洲电讯，美国大西洋航业员，于五月二日在纽约克海港罢工，船艘约二百只，机器工人有六千，据海员联合会之通告云，将有四万海员从事于此次罢工之举，于是美国大西洋之航业将见一时停顿，其原因则亦因减资之激变也。无独有偶，罢工潮恐将继长不已，社会不安，抑果谁之咎欤？（完）（五月四日稿）

天津《益世报》1921年6月16—17、23—24日

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影响

恩　　来

英国煤矿工人罢工，至今已两月余矣，妥协消息尚无所闻，各方为此事奔走调解者虽不乏其人，然终因矿工矿主及政府之意见相差甚远，不易为之疏通，以致徒劳无功。近数日来，政府方面似对于此事渐欲过问，劳特乔治及霍尔恩财政大臣与各方面均有所接洽，其所商榷，仍不外政府之救济程度与矿工应受之工资减额也。惟政府此次过问态度，似较以前为慎重，对于矿工如不得实在把握，决不轻易招致矿主矿工两方代表开正式谈判，以免再蹈前几次破裂覆辙，但实在把握殊难言矣。矿工意见视国定工资部及国定利益均平分配办法，为此次罢工要求中必须实现之事，工资减少程度如何，犹属次要，使前两项要求不能达到，则罢工牺牲将成为毫无结果，此岂矿工之所愿?!矿主观念，则以工资少减犹有商榷之余地，若国定利益均平分配办法，非特无益于矿主，且将无益于工人，因彼等曾宣言以近来矿产产额不丰计算，煤矿固无余利可获也。究其内情，亦非毫无余利者，不过资本家嗜利太重，贫乏矿区支出全部工资后，资本家所得盈余数已不多，宁肯再与劳动界分杯羹耶？此矿主所以于上月底会议决裂后，各回本区，坐视矿地之湮没，掉头而不一顾也。彼等心理，狠毒殊甚，因其宁愿使矿地蒙极大损失，有待于未来之修理，而决

不让步于矿工之前，示其气馁，获战败之头衔。至于政府方面则外强中干之状，尤较矿主为甚，因社会安宁与否，直接影响于内阁之安危，间接及于国家，矿工罢工虽曰仅一种职业，非劳动全体，然关系之深，则凡百职业莫不胥赖其生存。煤产不出坑，迄今既六十日，工场受缺煤之影响遂日益加增，英国失业人数本较各国为多，据劳动交易所报告，本月初失业登记人数已增至一百九十二万五百人，视昔日数少时仅一百万者已将倍之，而一百二十万之矿工犹未计入，且未失业之工人受减资之苦者，亦咸勃兴于此时，是尤难仆数。总计月来英国产业界减资罢工之事，已成为流行传染症，执英国报纸读之，殆无日不有此类事实之记载也。

据最近情形，则商船役员及厨役之罢工，似渐归稳定，然离英国西航之船，固已有因缺乏役员致乘客自相料理者矣；渔业雇员已有数海口实行罢工者；电气业工人亦有数地于此星期罢工者，其故均减资问题使之也。棉业工人因业主有减资百分之三十三之议，现方争执未已；造器具工人因业主主张由各地解决减资方法，乃力持全国协定之议；丝业工人之工资减少问题，方在商榷中；羊毛纺织业主思以巨大低额向工人要求；钢铁业则两方方于一种新提议内有所考量；此外则化学工业工人已承诺业主之减薪要求；建筑工人于业主减资加时之提议，已允许于此星期内略减少许，此盖为资本家所屈服者也。凡此种种，虽非尽受影响于矿业罢工，然减资罢工之战，要不得谓非矿业界开其端也。原减资之意见，在资本家方面，均异口同声认为振兴社会产业，低落生活程度之唯一救济方法。彼等以工人工价之高足以使资本缺乏，物价腾贵，欲救此弊，总宜使工资比例等于战前，则一切恐慌，方得平服。斯种偏执一方之论调，本不足以邀社会之信，然举世当权者，多资产阶级之人，利害关系，自不得不与以同情

耳。

有勃拉克摩尔者，英国家商业部会长也，于前数日曾发表其生活程度低落之推测意见。彼以战前生活程度为百分，现时情形视一九一四年已自百分之一百三十三降为百分之一百二十七，至六月一日将降为百分之一百一十七，七月初将再降七分为百分之一百一十，此后八月九月将各降五分，至九月便可恢复战前状态。勃氏所论，足以代表最近资本家及政府中人所根据之心理。彼等以生活程度复旧，工人工资亦理当复旧也。故月前政府调停矿业罢工事件之提议，便主张政府担任救济至八月底止，工资之逐渐减少，亦期至九月时能如矿主之所预计，是彼等视生活程度之复旧，甚有把握也。然按之实情，则不惟下降之率决不如勃氏所推测之速，即现今状况，持以较一九一四年，亦未必如一二七与一零零之比，其纯属主观，无待深辩。故英政府深信资本家之言，以为可以安社会者，恐将因之益社会以不安矣。

如前所述，今日之英伦岛上，已处产业危殆期中，其所积蓄虽云富有，然损失之巨，终不可隐讳，一旦因不安之故，社会发生变故，祸乱之生，岂易幸免？纵英人天性保守，不易危及国本，但内阁动摇，自意中事，此劳氏所以焦心积虑终不能忘怀于调解矿业罢工事也。矧自罢工实现以来，国会中反对党时起质问，爱尔兰新芬党因是益肆骚扰，内外不安，益使劳氏有早为收束之渴望。预料谈判之开，本月底或能实现，前昨两日劳氏及财长霍氏均曾向矿主有所接洽，而煤矿工人联合会诸领袖同时亦会于约克，意者其为妥协劳工问题之先声乎，姑俟证之于下次通信。（五月二十七日）

天津《益世报》1921 年 7 月 15 日

西欧通信

恩　来

煤矿罢工中之谈判　前周通信曾言英国煤矿工人同盟干部总书记霍居斯氏有约克州行。霍氏至其地，曾与同盟会长斯密司及各地同盟代表会议于州中之汉满摆。会议内容，大要不外商榷干部今后应持之态度，及与政府商榷之最后让步程度。开会时，各方舆论曾有矿工代表已预备妥协之推测。会议既终，霍氏乃于本月二十日发布一简略宣言，大意谓斯霍两氏现已各返巴恩斯里及伦敦，彼等对于近来调解矿争之非正式提议，已获有考虑之机，政府方面久无提议商榷之举，今后不久或将有招集谈判之事，但无根本计算，和平仍难实现，斯言也盖已明示谈判复开有可能性矣。二十四日英相劳特乔治及财政大臣霍尔恩氏归自白金哈末州，当开内阁会议。劳霍两氏对于罢工问题均有所计划，并报告最近接洽矿主矿工两方之私人情形。先是劳霍两氏出游白州时，英伦舆论便谓矿工代表已暗中与劳霍两氏接洽，事之实否；未得左证。但劳霍两氏已显然与矿工代表中私人有所商榷，固彰彰明矣。接洽而出私人也，而出于单独也，则意见之交换易于疏通，掉头不顾之行为，或亦不易出现，是政府兹番举动，不得谓非审慎周详矣。果也阁议次日，政府当局便宣布招集矿主矿工两方代表开正式谈判于二十七日。矿主本与政府通气者，政府之招请，

固不啻其自身表示赞成开会及渴望和解之急也；矿工方面，霍居斯既得劳氏招请之信，当定于二十六晚招集矿工领袖开会取决，至期全体纳劳氏之约，遣代表与会。会期为昨日早晨，矿主及矿工两方代表均到会。首由劳氏致辞，大旨谓今后之商榷，仍将注意工资之问题，无论如何，工资之标准总须与生活程度标准相切合，工资低落，纵一时不易达到，然总宜限一时期，逐渐减少，以期与工业界之发展及工人之生活一无妨碍。此后谈判有两种提议可资商榷，一为矿主之提议，一为政府之补助，政府之补助当仍以千万磅为限。至此次谈判之结果，当不仅为临时解决，且应求永安全之道。劳氏言毕，两方代表各略述其希望，便宣告散会，此开幕第一场也，重要会议将俟之今日。会散后，矿工代表于午后复访劳霍两氏为单独之谈话，所商榷者为政府补助之方法及矿工之态度。晚间矿工同盟干部开会，决定今早仍访政府中人先为单独之谈话，其重要点为关于矿主提议之探询。溯迄今将及两月，双方谈判，合而裂，裂而者此再矣，最后决裂，几将一月，矿工持久，矿主之负气，政府之坐视，均可谓各臻其极。今时携日迫，英国产业界受罢工之影响，动摇不安，失业人数日益增加，社会损失转瞬将及于政府，是政府终难再事迁延矣。故兹次会议之开，政府实居主动，而渴望和平之念，则又各方咸同，会议结果或竟得免于决裂，亦未可知。惟兹事问题复杂，有非片言可决者，即使两方各有让步之心，亦必吞吞吐吐之先示人以难成，以明其非易与。此则时日之延搁，又敢断其非月内所能解决也。

德国按期缴出赔款　五月五日协约国对德之通牒，德国既以无保留无延缓而承认，则其届期应缴之额，当难再有所推托。初协约国通牒至德时，旧内阁本向以拒绝协约要求为政策者，处兹难关，欲仍坚守旧志，则协约势强，且将增失土地，外交破裂，

一切进行，更属棘手；允之则又无以解初志，于是乃以辞职闻。旧阁既倒，继之者乃一反旧日强硬态度，与协约国为缓和圆满之周旋。对于限期要求，一律予以承认；于波兰人在上西里西亚之争也，则极力诰诫德人，使毋暴动，勒兵不出，以免贻法人以口实；于至期应纳之赔款也，则力搜国库，以备如数交出。一切行动，均无不力求协约诸邦之意满，以冀无所借口。对内则刻苦自持，以警励其国人，然而又不敢公然有所陈述于国民，招诸邦之疑忌，忍辱吞声，备极难堪。诚今日德国政府国民所身受，而拜向日军国主义之赐者也。本月底德政府应交出四千二百万金磅于协约国，据德政府之计划，将以美币价值汇出，分配方法：汇于纽约者八千万元；汇于巴黎者六千万元；汇于伦敦者六千万元。协约国赔偿委员会昨日开会，声言已得德国保证将于本月底交到七百五十万金磅，同时并决定二事：（一）遵照协约国在伦敦会议决定将遣正式代表至柏林监管德国收入税则；（二）决定与德国在上西里西亚应获之煤产额，使得实现其和约中所规定之应行让渡产额于协约国，前者为求赔款征税之事实现，后者为利于德人之举也。（六月一日）

天津《益世报》1921 年 7 月 20 日

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波折

恩　　来

会议再开后之英国　英矿工罢工事件，月前通信，曾提及英政府招致矿主矿工两方代表第一日会议之内情。此会议也，虽政府所主动，而亦月来各方面所渴望实现之事。良以政府暨矿主矿工自四月底谈判决裂后，罢工延长，匆匆又将一月，未闻有一度接洽，各走极端，产业界之前途，危险殊甚，今得复合，各方之意见虽未能有立刻融洽之把握，然一经接近商榷之机，总似较搁而不问者为佳，此固人人所深信。且会议未开以前，矿工首领曾有一度约克州之行，预商妥协方法于各地首领，当其时英内阁要人劳特乔治首相及霍尔恩财长亦曾旅行在外，外间且有传言谓其已暗会矿工首领作妥协之磋商者，兹事虽未证实，然彼等对于矿工首领曾有私人谈话，固劳氏在阁议席上直言不讳者也。以会议前各方奔走之情势论，吾人总以为此次会议或不至虚开，结果必有佳音饷吾人。不意竟出意料之外，双方接洽仅两次，态度便见强硬，嗣矿工代表以政府之意见征求赞否于各地，一星期后乃以反对闻，于是会议又决裂，而罢工延长遂竟达两月余矣。惟兹次决裂，与四月中情形有不尽同者，四月中几次磋商，均政府与矿主为一方，矿工为一方，谈判不开，矿工多视矿主从中作梗，罪甚于政府，中间且有一次为矿主之提议，完全受拒绝于矿工者，故当日之情

势，矿主与矿工极难融洽，非特政府为之疏通，颇难望有转圜之余地。而今则不然，会议中之提议出自政府也，态度之强硬，亦政府用以威吓矿工者，反动之结果，矿工对于政府乃一变曩日接洽之诚心，转持严厉拒绝之态度，同时乃授矿主以可乘之隙，于是近两日遂有矿主矿工两方单独之磋商，摈政府不与，此实罢工后之创闻也。但英政府究因何故致此，斯不可不述其略以告国人：请先言英政府于会议中所提出之意见。会议第一日为政府对于两方面之周旋，无甚意见表示；第二日英相劳氏乃以常久与临时两项办法提出。所谓临时，仍持政府接济一千万之金磅主张，希望矿工工资逐渐低减，于四月后能达到矿主所预定之工资定额。此四月内贫乏矿区，力不足以负此重大工资者，得由此一千万金磅之补助费中接济。所谓长久，即矿主与矿工两方对于工资确定之磋商，双方得派同数代表，加入政府委员，作争执之仲裁。对于矿主所根据之矿业经济上的出入，矿工亦得派代表查核其帐簿。对于工作之出产，与工资之增减得为正比例，由矿主矿工两方自行商定，大概情形如此。而对于矿工争持最力之利益均平分配办法，仍无一言及之，是盖与一月前之矿主提议无大殊也，由是可知政府调解之心理，盖一成不变者，欲期矿工俯首受命，斯诚难能。惟矿工代表当会议时并未表示态度，仅云对政府提议之赞否意见，还须征诸各地，俟各地意见汇齐后，方能作正式之答复，于是会议乃暂告中止，静听矿地之回音矣。

会议中止后之波澜　矿工代表既以政府提议传达各地，征求各矿地赞否之意见后，一方对于会议时政府所持之态度，深致不满之论调。矿工代表以政府中人在会议席上所发之言论，实含有谈判不成，将从事于强迫裁判意味，以矿工两月来之牺牲，一切不顾，其所希冀原在国定工资部与国定利益均平分配办法之设施。

今政府之意，于后者既只字不提，于前者亦但采其名而弃其实。所谓地方解决，工资渐减，均顺矿主之意未更也。持议若此，已足招矿工之反对，乃复欲以强迫裁判继其后，宁矿工所愿闻？所能忍？激之愈烈，反动亦愈甚，是固非爆裂不可也。矿工代表之宣言既出，英政府中人亦知于前途为不利，劳特乔治乃于上月底在国会中演说，切实声明矿工代表之言为误会，彼于会议席上实未有将从事强迫裁判之言，且亦未有此存心，反对政府派报纸之批评尤为无据，其意在推倒现政府。惟政府对于保护矿地，保护国家产业之预备，曾有实施特别事变法令之筹划，然此属于保护范围，非欲强他人也，劳氏之言大概如此。此外则劳氏于三十一日致一信于煤矿工人同盟总书记霍居斯氏，声言霍氏将反对政府强迫行动之言，实为误会，并云劳氏实不承认霍氏之言为能成立也。霍氏当复劳氏一函，云在协商时，尚未特别提及从事于强迫裁判之事，一方霍氏对他人言，劳氏演说时，彼实印象劳氏有协商不成将以强迫裁判两方之争执的意见。霍氏之言，虽承认劳氏于会议中，尚未特别言及，然彼固深信劳氏实具此心者。一言系天下之安危，霍氏者，矿工首领也，彼既坚持劳氏之辩白，乃未生若何效力，而霍氏之言适足以坚矿工之心，张政府之罪恶，是又劳氏之所不及料者矣。

各地矿工一致反对　英政府之提议，既置该矿工最坚持之条件于不顾，而以改头换面办法以诱矿工，是无图和诚心也，宁易得矿工之同意？而一方又以强迫裁判威吓于后，是愈激矿工之怒，事乌不败?!后者虽曰为矿工代表所言，且为劳氏所不承认，然劳氏在国会之言，固明明认非常事变之法令将实施矣，名曰保护矿地，暗实破坏其团结，打草惊蛇，又焉能免矿工之疑？故本为调解，而反益以纷纠，是不得谓非政府无诚心调解之罪也。矿工同

盟征各矿地之意见，本期以六月二日为限，而至上月底重要矿区已多数表示反对政府提议，如约克州、南威耳士、利遂斯特耳、兰拉耳克州、得耳拜州、定林、洛亭汉末州等处之矿工均票决反对接收政府之意见，于一日正式宣布，三日煤矿工人同盟干部开会，正式决定拒绝政府之提议，总书记霍居斯于会议后，发表下列之布告：

在各种情势之下，各地方票决结果，均一致反对接收政府之提议，此种决定已正式通告首相。

此通告既发出，于是两月来所希为最后之谈判者，又开始决裂矣。同时矿主方面亦致通告于政府，声言彼等视矿工所提议之国定利益均平分配办法及工资之国定均无法使其得妥协的进步。因矿主于此等提议，实居反对地位，彼等所认为能办到者，乃成立两方派同数代表所组成之国定工资部，以政府中人为主席，决定各地标准工资及对于工资之利益比例。斯种意见，盖与四月底矿主之提议无殊也，其拒绝国定利益均平分配办法，仍依旧坚决，与矿工之坚持是议者，正各走极端，是虽英政府之意见龃龉，恐矿工亦难与矿主谋最后之融洽也。

英政府之威吓政策　矿工代表既以拒绝接收政府提议之通告致政府，政府不能无所答也。改变方法耶，坚持不变耶，是二者必居其一。四日劳氏答煤矿工人联合总书记霍居斯一函，为政府正式表明态度者，其言如后：

余已收得君函，并深知贵干部所决定之事项，政府中对于此事将无若何新提议。

但无论如何，余视前次所提议之政府救济金一千万磅用以备补助贫乏矿区受煤价低落影响而不能发给满意于工人之工资者，将不能为无限制之有效。

吾人所以提及此者，诚以现时别种产业及纳税之市民担负太重，不能不加以注意，且罢工事愈延长，每星期国家富源与产业家能力之损失更不知凡几。

吾人最后结论，郑重声明此种提议将不能再延长至十四日以后，使君如以为可或设他法以求妥协者，则此十四日之时期，足可供君征求全体意见及票决之用。

劳氏之言，斩钉截铁，态度可谓非常坚决，其缩短限制补助费发给期间与威吓何殊，是昔日国会之辩论，乃反足为今日欲盖弥彰之证。十四日之限制，转瞬可至，而政府除与资本家一鼻孔出气之办法外，一无所筹，是直欲置工人于死地也，宁有调解之诚心？且函中所称为保护纳税之市民故，遂不能使一千万磅补助作为无限制之有效，以增市民重担，是直欲嫁祸于工人，使其不即妥协，便将成为市民怨府矣。又妥协条行，乃等于屈伏。使矿工果含糊相从，则两月来之牺牲实无代价可言，一百二十万之矿工及倍数以上之家室，真无异春蚕自缚，又将宛转于锁枷桎械下矣。矿工虽愚，宁能甘此？然劳氏固以此为威吓之具，请君入瓮，其计诚狡，其心却不可问矣。

矿主对矿工之牢笼　劳氏之信既公布，其直接影响固为对工人而发，然矿工既抱牺牲之决心，则此区区一千万磅补助，宁足动矿工之心？且此次补助又非直接助工人者，实惠之收，实为贫乏矿区之矿主，是名为工人受影响，而实则矿主受影响也。十四日之光阴，在矿工未必便认为可惜，而矿主则却有多数人迫不及待，深惧此偌大款项将不翼而飞。故劳氏书发之次日，本为星期日，上几次谈判经此日便延期，乃今者以矿主一刻千金之观念，当日由矿业联合会（矿主方面）会长威廉斯致函于煤矿工人同盟总书记霍居斯氏，声言（政府之态度既已表明，今后吾人当谋自身之

接洽，以期渐趋接近，吾人不宜使偌大款项忽然失去，有损于矿工之收入，吾甚愿贵干部与矿业联合会之中央委员商榷一至善之方，以图矿事之解决）是信末后□声明矿业联合会中央委员将于六日果开一会议，届时当能邀矿工代表与议。斯信既达煤矿工人干部，诸代表以来意非恶，姑与周旋，故并无拒绝。于是昨日晨（六日）矿业联合会中央委员先开一会，当决定致一正式书面邀请矿工代表往会于午间。达午两方职员开始会面，直达下午二点十五分始停议，当日由两方公布一文如下：

关于争论之事，此间已有一详细讨论，此种讨论，仍将接续为友情上之商榷。在今日下午四点四十五分时已决定明日上午十一点仍将聚议。

斯次会议之开，两月来可称创见，因矿主与矿工两方直接谈判，无政府中人为之仲间，尚未之前见也。至于会议之结果如何，现尚不能预料，惟细按友情上之商榷意味，则今日之言乃为缓和的，一旦以主张相见，则利害之冲突，所谓友情上之商榷，仍将付之流水。且矿主今日之急，在惟恐补助费之失去，岂真有丝毫为矿工心，资本家无往而不为利，欲罢工事之妥协难矣，劳资战争，舍根本解决外其道无由，观此益信。（六月七日）

矿主矿工直接谈判　前次通讯，曾详及英矿主矿工直接谈判事之促成，本月七日为两方预定之第二日会议，上午十一点开会，讨论经两小时。矿主方面意见，仍坚持逐渐减低工人工资，至达到合于一九一四年工资标准为止之办法；对于国定工资部之设立，彼等仅赞成以双方派出同样数目之代表组织一会议，由政府委员为主席，磋商各地工资之减落程度。矿工代表视此提议，盖与上次政府中所提出者无大殊，几经周折，几度磋商，政府之态度如故焉，矿主之态度亦如故焉，所谓改善，所谓迁就，殆皆为口头

上之缓和，事实上固无丝毫让步可言。矿工代表果以方法不变为其战志，则此次会议，亦惟有仍归决裂之一途，和解宁有希冀？然矿工代表谋和之心亦甚迫切，罢工七十余日矣，三角同盟之外援既失败于四月间，此数十日来之奋斗支持，皆赖自身团结之精神有以助其成，但支持之力仅足以延长此罢工时期，致胜则殊嫌未能。且精神之表现赖乎实质，矿工罢工后之经济维持，初由煤矿工人同盟之保险金中支出，继则存金已尽，乃益之以借贷，今则借贷之术恐亦不尽如意，是同盟干部所不能不急求解决之方，以安此一百二十万之矿工生活也。又英人保守，属诸天性，事外之人以事不干己，多持旁观态度，矿工自身，除希望彼等所提出之条件，能达到目的外，决无作根本解决想者。故内无决心，外无后援，矿工之罢工今七十四日矣，虽至一百七十四日，恐其要求仍难越和解之境，而别求所谓推翻之道。其目标既注于和解也，则时期之长短，实与损失之多寡为正比例，时日少而收效少，视时日多而收效略多者，犹为经济。缘一日之损失，不仅工人无工资可得，同盟组合负基金之一出一入之差数亦甚巨也。有此诸因，故矿工代表当日答矿主代表之言，乃为代表不能专主是议之可否，须决此事于各地矿工代表大会，最后赞否，或将求矿工全体之总投票以定从违也。

各地代表催开大会　矿主矿工代表会议既停，各方渴望平和之视线，咸集于十日之各地矿工代表会议之结果，及总投票办法之采取与否，以断事之究竟。当十日大会之先，九日矿工同盟干部关于矿主提议曾有所讨论，以备次日提出参考，其分矿主之提议大别为三项：

（一）　战前工资必须定为将来之最小工资度，至明年六月止，实在工资不能少过百分之二十在规定标准以上；

（二） 标准工资，第一当以工业状况为要求之凭借，第二以商店交易及别种新加税则为凭借；

（三） 矿业中之盈余，分配于标准工资及标准利益者以百分之十七归矿主，百分之八十三归矿工。

十日大会开于伦敦，当决定举行总投票办法，赞成此议者八十二万三千票，反对者仅十三万五千票。投票办法分两项：一项为坚持矿工向来之提议；一项为政府同矿主提议，矿工赞成何项者即书赞成何项于票上，票纸制于同盟干部，纸之正面书两项事由，其文为：

（一） 汝仍将坚持国定工资部及国定利益均平分配办法之提议，以坐视政府一千万金磅补助费将于六月十八日失去耶；

（二） 汝或将赞成接收政府及矿主之提议如此纸后面所书者耶。

此票已散发各地，将于十五日收回，届时当可获知矿工全体之总意矣。

总投票结果之预测 罢工七十余日，今兹总投票，殆将为事变之收场耶。抑仍坚持前议不变以另开新场面耶，是固未敢预料，然溯因推果，亦未尝不可稍论一二。使矿工之意果多数赞成接收政府及矿主之提议，则一天云雾，顿将化为乌有，而七十余日之牺牲，所得亦复无几，矿工果心甘矣？是亦不能令人无疑。否则矿工仍坚拒如故耶，政府之提议已决绝至十二分，使此次再无所迁就，则一千万金磅之补助费，行将不复为矿业所有，矿主方面此次直接和矿工谋和，于条件上又复稍有退让，自以为已属仁至义尽，苟矿工仍无所可，彼等之态度恐将因政府补助费之失去转变接洽为拒绝，三方面之接近，恐因此而入于遑遑无期之境，则前途之黑暗，殆又较今兹为更甚矣，是亦矿工所踌躇不

决，而不敢遽作拒绝想也，此就两方推想者如此。若从利害上主论，则矿工七十余日之牺牲，仅换得四个月之政府补助费及一年间之小安定，一旦时过境迁，困苦艰难仍将层层袭来。使忍而不发，则今兹之战为无代价；不忍而发，则争之百日，得之寸尺，纷纠无已时且不论，即此生活之不安，精神之不快，已足增矿工无穷隐忧矣。且四个月之补助，虽数千万，其分与各个工人者，则人数百万以上，能各得几何？况此款又非直接授之工人者。补助费之出，原为与矿主以补助贫乏矿区力不能担任工人在临时期内所应得之资额者，其利在矿主，是矿主之所急需，而非工人之实利也。若矿工仍拒绝两方提议，继续罢工如故，则今后之维持费将奚出，家室之供济，个人之需求，在在以减其精神，颓其志气，使拒绝后而团结力锐减，则反不如今日接收之为愈，是亦矿工之意志所游移难决者也。总之兹次投票关系绝大，预测诚难，惟以英国民性观之，既无下彻底推翻现状之决心，则接收提议以救目前，或亦矿工之所愿为也，志之以觇三日后之结果。（六月十三日）

天津《益世报》1921年7月28—29，8月1日

英国矿工总投票之结果

恩　　来

英矿工罢工风潮，迄今八十余日，几经调解，卒未底成。本月十日煤矿工人同盟干部因政府补助费，将归无望，矿主又单独为最后和解之提议，关系綦重，不敢专断，乃集各矿地代表议于伦敦，当决定举行总投票表决，征赞否之意见于全体工人，票上印入两种相反问题，（一）为坚持原有国定工资及利益均平分配之提议，（一）为接收政府及矿主之提议，并政府愿出之补助费一千万金磅，当时详情，已见于前次通讯，兹不多叙。票散出后，期以五日，限各地一律交回干部，总计结果多寡，以定去从。投票期中，干部中人对外无所活动，缘结果不知，一切办法都难作正式规定，所忙者乃在各矿区本地，因投票关系之重大，集议鼓吹传布等事遂无日无之。向持坚决态度如南威耳士、兰卡雪耳等处，仍激昂如昔。希望复工者各地虽都不乏其人，然众寡之势殊，强弱之气异，故多不获公其意于群众，反对之论调乃得深入人心，久而弥坚。但各方面意见都以罢工之期过长，矿工困窘殊甚，热血之涌现终不敌饥饿之压迫，票决结果，必可偕和平之音俱来。此种观念，当时不但政府中人因一千万金磅补助费取消之威吓信之，矿主方面因最后单独接洽之平稳信之，市民因渴望平和之热中信之，即矿工同盟干部中人亦并无继续罢工之把握，其

间且有信和解将实现者。孰意至期揭晓，则与所预期者竟大相径庭。消息传至各地，劳动者色然喜，资本家色然忧，各国执政者又都愕然惊矣！工人一票之价值，不可谓不巨，今试以本月十七日英国煤矿工人同盟干部正式宣布之结果，略述如下。

十七日同盟干部开会，经两小时之讨论，由代理会长斯密斯总书记霍居斯发布下列之通告：

〔票决结果，仍主持继续罢工。〕

至票决之内容，则赞成接收矿主之提议者为一八三八二七票，反对前项而赞成继续罢工者为四三二五一一票，两数相较，反对票多二四八六八四张。

总计此次之投票人数为六十一万六千三百三十八人。惟矿工总数约及一百二十万，其中入煤矿工人同盟者有九十五万七千六百十人，今投票人数仅达百分之六十四，余者均放弃票权，彼等何故置此不问，殊令人费解，因此等切身问题，非如普通选举议员，可视其为无直接影响者，各处矿地之罢工，固非此投票之六十一万六千三百三十八人罢工也，九十五万余人实皆与其役，此万不能以事不关己论之。若云彼等因不悉兹次事变之内容，故宁甘缄默，则彼等皆曾入同盟组合者，罢工八十日，一事之经过，一议之发生，同盟干部殆无不报告于各地代表，各地代表亦无不归区报告其会员，且报纸又日日载其事，以终日饥饿相逼室家交困之人，宁能盲从两月余？含糊相与，此均非放弃票权之真相也。重思之，殆因处兹最后，利害两端实难定评，欲屈从矿主提议，则两月来所求，均成泡影，欲坚持原议，则政府一千万磅之补助瞬将飞去，和解实属无望，歧路徘徊，一票之投，仍难处置，故不若放弃之视大多数之意见为从违，此意或近真相。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持此种态度者，结果竟达三十余万人，使反对赞成之票

数，都未能过同盟组合会员总数之半。干部中固不能因三十余万人放弃票权，致使赞成反对未由决定，然不投票之表示实足以明其意志之不坚，眼光之不定，见仇称快者且将目此为矿工内部瓦解之先兆，是果然耶，请证之以近数日之现状。

十七日矿工投票之结果，既分布于世，次日英相劳特乔治便以正式书面复矿工同盟干部之通告，其文大致如下：

吾谨告汝等，罢工愈延长，财政上之损失愈大，而政府之所能助矿产者亦愈无力担负，吾人前曾声言一千万金磅之补助费仅能再延长十四天，本星期末日乃其时矣。

设使投票之结果如告于余者而能发生影响，则财政地位之困难将益见加甚，在此情形之下，政府已无别意，惟使此最后之决定，所谓政府之补助者及于明日（十九日）晚间为止，不能再有所保留。

其言决绝，足以表示政府不再担任补助之决心。当日同盟干部亦即开一会议，决定接收劳氏回答，两方决裂，至此遂无转圜余地矣。

矿工同盟干部中人声言将无会议可开于最近期间内，其内部之办法，盖以坚持罢工为唯一之策略；对外则移其向日接洽政府接洽矿主希图和解之视线，转而注到各种同业组合身上。彼等已正式向凡发生减资问题之同业组合提议，联合为全国之行动，换言之，即总同盟罢工也。英国工资之减低已成为是邦之流行传染病，计今日有减资关系且能发生影响之工人，连矿工在内，其数已不下四百五十万，分计之则为工程师一百五十人，印刷工人十万人，田庄工人一百万人，棉业工人五十万人，煤气工人九万四千人，脚行十二万五千人，道路运输工人十万人，电车工人七万人，棉业师二万人，毛织业工人二十五万人，船场指物师二万

人。

如此巨数工人，今日固皆在工资摇动之中，而不得自安者也。棉业工人于本月初，几因与业主协议不调激成罢工，后经多方调解，方允于每磅工资中减少三先令十辨士，至六月后加减七辨士，较昔日业主要求固稍有别，然兰卡州之工人犹持反对，事悬至今，未能完全安定。其他各业，亦时有波澜，苟矿工干部之提议能活动成熟，则大不列颠之岛国，行见有大变动发生，而工人之获得政权，亦将易如反掌，但英虽其地，人非其人，真正之总同盟罢工，英人恐终不能优为之也。矿工干部之提议，已发出数日，应者尚无人，而一方矿工之复工事实，已喧传于各地。乐亨汉末洲之东林矿区，其地矿工曾拒绝投票，今已渡工；北斯他费尔特州矿工之妻子及老年矿工甚急于复工，但老矿工因惧他人之干涉，尚迟迟不敢行；南约克州之矿工甚希望复职于小矿区，以低就矿主之条件；苏格兰奥米斯东、米得劳支安已起首工作。是数地虽非罢工区中之要地，然影响所及，必有起而效尤者，团体信用之谓何？是团结之精神渐呈涣散现象矣。但八十余日之长期罢工，至今尤坚持反对不懈，虽有少数破坏约章，而其精神，其魄力，其勇敢，又属难能可贵矣！（完）（六月二十日）

天津《益世报》1921 年 8 月 9—10 日

法国哈佛柳史雷德工厂的华工实况

富　春

我们工界同胞的实况，很不容易说。我这篇东西，是工后偷闲写出来的，自然有许多不妥的地方，不过我自信是“依据真实情形拿客观的眼光去写”的，我所知道的都在上面，不知的，只好慢慢调查。但在写的起初，请先将地方和工厂的情形略说一说：哈佛柳是法国北边一个小镇，只有数十百家的铺店，面包店、肉店、咖啡馆，杂货店却占了十分之七。因为离哈佛(Le Harre)只有五启罗米突，有火车和电车相通，又由巴多或庐昂到哈佛一定要走此经过，所以也算交通便利，还不寂寞。更因为有大工厂，居的人也多，异国杂色人种，时常点辍于街头小巷中。早晚上下工的时候，电车铃声和火车汽笛声，遥相呼唤，街上的工人更是和潮涌一样，向工厂的门进去或出来。一个小镇，却有这样人多，不是工业发达的原故吗？

史雷德铁工厂，正设在哈佛柳，但离街市也有二启罗米突。工人现有五千人，分造炮，造摩托发动机，和修理火车头三部。史来德工厂总共有五个，总厂在巴黎，这是个分厂。工人除法国人外，有英国人、中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比利时人，波兰人。中国的勤工俭学生和华工，共有六十人，现在

将华工的状况说如下：

在哈佛柳附近两个地方，哈佛及何克 Hoe 两处工厂中，还有很多的工界同胞，但是我不知道详细，现在所说的只限于在哈佛柳史来德工厂的。

哈佛柳的华工，可分两种：

A.未脱离合同者；B.已脱离合同者。请分条别种说于下：

（一）人数、籍贯、到法日期、到厂日期，废合同日期。

A 种共十人。内七人是江苏徐州人，两人是安徽合肥人，一是湖南湘乡人。年龄是由五十二岁到二十四岁，都是民国五年来法的，于今年六月由南皆到本厂。他们定的合同是三年为期五年为满的，所以他们还有两年多才满合同，他们在本厂作工已四个月了。

B 种共六人。内山东五人，一个天津人。年龄是由二十三到三十五。四个山东人，都是今年满的合同；其余一个山东人，是去年由俄国来的；一个天津人，是去年自备费来的。在本厂作工日期，久的七月，少的两月。

（二）工作，工价，时间。

A 种：十人，都是作的散工。(Manoeuvre)分散在各处，有推车的，有做零杂粗事的。每日作工八小时。工资由十四方到十五方，伙食自备。

B 种：由俄国来的山东人，是打铁工，每日作工八小时，可得十八九方，近以季候关系故，每日作工十小时，可得二十二、三方。自费来的天津人，是作锅炉助手工，每日可得十七方。一个山东人，是做车床工，论货计资，每日可得二十三、四方，加工作十小时可得二十七、八方。（此数人在大战时未满合同，曾在此厂作车床工三年，今满合同复来此地。）还有一山东人，是做收集

铁屑的工，乃推车到各厂，将铁屑集堆车上，每车计资五方，每日平均可得十七方。其余二山东人作散工，每日十四方。因为有手艺没手艺的原故，所得工资竟可差到一倍。我们一方面固然要注重自己习手艺，一方面更要想这中间的原故，不单是在手艺上呢！

（三）工厂待遇。

A种十人，来的时候，由法陆军部派了一个法国军人作统带一样的同来，并没有什么巡捕翻译等，那法国军人也只在作工后的干涉，也不十分为难。他们做工时，工厂并未另派工头，所以这十人很自由。法国军人虽和他们同住，这十人却不劳他干涉。所不自由的，只在合同上的拘束，工作不能自由换动罢了。每星期每人出两佛郎的保险费，工厂里替他们保了险，这或也是合同的好处咧！

B种，他们六人既都是自由来厂的，厂里自然同待别的工人一样。

（四）饮食，居住，衣服。

哈佛柳在欧战时驻了许多英国兵，在离街市不远的小山上，兵房是木制，很坚固的。战停兵归后，工厂就将兵房买了一部分，作为外国工人的居所，所以中国人有许多住在兵房中。兵房离工厂有六启罗米突，需三十分钟方可走到，这个自然有许多不方便的地方，但这却是资本家发的慈悲做的事。我们没事时，再静想想中国工人在中国作工的状况，就更不堪言了。

A种十人，来时即由工厂指定一大房作居室，每人发小铁床一，小桌一，椅一，毡子二，白单被二，枕头一，房中公用的扫帚、镔铁桶各一，同来法国军人即居于由大房间出的小房中，除此寝室外，有洗脸室（又以之作洗衣室）、浴室各一，山居的中国

人（内有勤工俭学生十七、八人及B种四人居山上）共之。中国人住在一堆，自然有些把中国的习惯——不清洁、利己、分界限——一统现了出来，所以人虽有三、四十个，好象分做几家一样，各人顾各人门户，公共的地方，就没有人管他。加之工后疲劳故，凡事都随便，更愈形把上说的那些弊病流露出来，生出以下的两事：

一、公共地方不清洁，乏人收拾；

二、以关系轻重之不同，分散不相联络。

这十人的伙食，都是自炊。自炊不是共同的，是各个的，大约每人一个汽炉子，据他们说："共同的不自由，各个的可以随自己意思，丰俭嗜恶，可自如己意。"这个意思虽说不错，但不能养成共同生活的习惯，和互助的精神，这是各个生活的大缺点。他们吃的，早晨多半是单吃面包，中餐由工厂跑三十分钟，还要顺路带面包小菜回来，很匆忙的急急煮点面或白菜马铃薯吃了，又要走三十分钟入厂去。这个急急的走路和吃饭，虽说可以少用两个钱，其实时间和精力，白费了许多，并且这样的饮食，也实在不卫生。我们中国人有一种习惯，是只要眼前过得，甚么事都是空话。譬如，他们这种饮食法，现在一没有疾病发生，二没有减少作工的力量，都以为可以过得，又何尝知道又何尝想到，甚么滋养料应如何支配，消化的力量如何才得宜，饭前饭后，应如何注意咧？从前有许多勤工俭学生都是如此，现在都有了觉悟。所以我还望我们工界同胞，对于饮食注意，莫吝小费损千金之体啊！晚饭吃的东西，与中餐差不多，有时买点小黄瓜尝点新，就觉得象开三月不知肉味的荤一样，平时吃的就可想而知了（按法国黄瓜本很贵）。在这种伙食，以现在物价计算起来，每日二方半三方已足。

他们十人不但饮食简单过俭，讲到衣服一事，也就与众不同，起初来时，十人都是穿的旧中国服式旧军衣(从前旧陆军部发衣，现在改发钱)，既不清洁复褴褛不堪。在我们自已穿惯了，过惯了，却不注意，但经外国人看了却很诧异讨厌了。外人轻视中国人的原因，在衣服上，恐怕也是一个呢！近来却有三四人改穿西装了，然而有几个同伴却很不以为然，常说道："穿旧衣服不好么？一定要费几百方去买一套西装穿，这又何苦来？"这话固然不错，不过我们穿衣服，清洁合俗和奢服摆阔却是两件事。如果我们作工的人，费了几百千方，去买了一套阔衣服穿了，那是不应该的，如果费一二百方买一套衣服，清清洁洁的穿了，不但人家看了不讨厌我，我自已便也大方多了，这并不是浪费。我们辛辛苦苦得来的钱，乱用当然不能，但是衣食清楚一点，却是分内事。国内外的工界同胞呀！你们的力量，也许被人剥夺得太有限了，但是看看欧美工人，和我们一样的作工，然一出工厂以及礼拜日，谁分得出品类来？这我们应当如此，如不能如此，我们当想一想原因，我们得力争去！

B种六人中，有两人租房子居了，其余四人都住在兵房中。兵房中有小房子，内中三人与法女结了婚，（详后）都各居小房中，自已添了一些家俱，铺盖还是由工厂发给的，却俨然也成了三个简单的小家庭。租房居的，租钱每月三十五方。六人的伙食也是自炊，结了婚的，却不自已动手，有法妇代劳，不过吃的稍为丰点，所以用费也自然多了。

讲到衣服，六人穿的却很清洁整齐，比A种十人好多了。未满合同的十人中有三人近来也穿西服的原故，却是受了他们六人的同化咧。研究六人衣服所以整洁的原因，不过是因为合同满了，工作要自已去找，一切行动也要由自已，所以外观要美点，

才不至惹人讨厌，自己才得生活。在这个情形中，我们可以觉得独立生活是可以促人奋斗，促人进步的。还有一个原因，是所入要较未满合同的多点，到法较久，习惯也清白些了，这又是一种无形有益的教育了（还有他因可说的详后）。

（五）经济状况。

A 种十人中，饮食起居虽都是一样，但因为穿衣服和嗜好（详后嗜好条中）的不同，所以用钱和储钱也不一样。大约老年点的人是要俭点，嗜好也少点，存钱遂多点。那个五十二岁的老人对我说：来法三年，已寄了三千多方回国去了，然而他饮食也简单，衣服也过朴。有两个三十几的，自然爱时髦一点，嗜欲也多点，所以衣服、酒、烟、逛窑子的消费合起来很重，那个湖南人对我说："来法三年，不但一钱未存，倒亏几百方的账。"这却是实话。综观两个老年和少年的情形，我们就可以知道，老年人保守性重，少年人的危机多，我们也不要象老年人的刻苦存钱放在骨缝里，我们也不要象那少年人的放肆呵！

B 种，三个结了婚的人，排场局面，自不能照独身生活一样，更不能象那五十二岁的老人，所以他们的经济方面只要顾得维持生活，养活得妻子，就是好运气，存钱一事，是从没有的话了。间或法妇自愿作工时，对于妇人的奢费还少，家中还能活动，如果法妇发起娇懒来，一面减少家中入项，一面增加奢费，更加要"打背攻"了！

没有家室的三个人，也不能存多钱。因为一则行动自由，少不得要学些坏样，白用去些钱；二则没有别的事做，到了礼拜六、礼拜日，肉欲顿炽，少不得要逛窑子。平日在工厂作工日久，法国工人的嗜好——抽烟喝酒——都学了，每日的消费，平白要添三四方，合算起来，存钱自然不能多了。拿著钱不正当的"丰衣足

食”却要去乱花，我们工界同胞啊！我以为“正当的娱乐方法”实是救这种人的良药啊！

(六)知识和教育

A种十人中，认识中国字的只有两人，法文更是一字不识。有两个可以说几句普通成语，如 Bonjour Comme ça; C'est bien; ……但是这些话，是平日听得听惯了，已成了无意识的观念了，讲惯了，已成了无意识的反应了，恐怕不用他就不久会忘去的。所以据识字方面看，就可以知道这十人的知识如何。我有一天问那位五十二岁的老人:“怎么来法三年不会说法国话?”他答道:“我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还学这些东西做什么？还想带回去用他吗？中国字我还不识，也没什么要紧，何况外国字?”这些话我听了只好闭口不作声。我们仔细想想，我们工人的生活，实在不是完人的生活，每天作八小时的劳力工，吃两餐极蔬薄的饭，下午散工回来，吃了饭就睡，固然难怪，一则工作疲劳，二则也无别事可做，不睡做甚么？但是一个人的生活，分物质与精神两方面。大概言之，物质方面，是要求起居衣食的饱满；精神方面，是要求智慧的发达，即求知识的充足。在此地的十几个工界同人，精神生活，是没有一点的。吃点蔬薄饭，做八小时的苦工，物质生活算完满了吗？讲到这里，我愿我们工界同胞想想，我们应该自觉了，一方面应求物质生活的满足；一方面就尽力去求精神生活。现在一些人提倡工读，正是说拿做工为满足物质生活的方法，拿读书以满足精神生活。所以工读的生活，是我们人的正当生活。如果我们工人只作工不读书，便是过半身不遂的生活，——不是完人的生活了。我们工界同胞呵！我们做工之后，应该读书，应该努力想法求读书的机会！

两个认得中国字的，有一个常常和我说话。我说我有好多

书，你尽可拿去看，他听了就立刻拿了一本《红楼梦》去看，并且说他从前在家曾看过这书，又讲了一些书中情节。我因劝他该看点报，他虽以为然，但是终没有实行。唉！认得字的，也不愿求知识，实在自弃，可惜了。我们同胞中这种人恐怕还多咧！

但是，近来却有一件稍可乐观的事，就是十人中有四人，每晚由在哈佛的华工青年会的中国干事某君，来教一点钟的法文。一点钟虽说不多，但也聊胜于无。青年会是以传教为目的，而以教育为手段的。我们固然不能看他做一个正式的教育机会，但是姑且将错就错，也可以得到一点益处。宗教又另是一问题了，我一日问四人中的一人道："你们要青年会教书，你们信基督教了吗？"他颇明理的答道："我们无所谓吃教不吃教。青年会的人也常常拿着耶稣爱人的话，要我们入教，但是我想，耶稣爱人固好，我却可以不入他的教。我入了他的教去爱人，不是有耶稣教我才爱人么？我们自己大家相爱就是。……我们请青年会教书，也并非为他利用，为他引诱。我们只要谁肯教书就去学，读书与吃教两件事是不相关的。"他这段话很有理，特附记于此。

B种六人中，既是不联络而散住的，既没有求学的机会，知识与A种也差不多，不过法语与技艺稍微要好些。但是应该把这纯熟的法语，和经验来的手艺求进步，那么又非求学不可。我很希望工界同胞中已经到了这地步的，切不可自满自弃，而急切的去读法文，引证平日所讲的普通话语；学工业，引证平日所经验，学理与事实相证明，一定很有乐趣的。

在这六人中，虽说有这种好资格，可以大造的，他们却没想到，从前在中国，既没受过教育，中国字又都识得有限。总之现在缺少一种相当的教育方法，须如何引起他们的志趣才好。

（七）嗜好。

法国工人的嗜好，是烟、酒两字，中国人也是一样。所以在这十几人中，不吃烟的只有二、三人，吃酒的却要少两个，但都不象法国工人之视烟酒如性命一样罢了。

还有逛窑子一事，只有几个年老的不来，其余的就都难免，这也是性欲的本能，却也应注意二事。

一、近害，花柳病，十六人中害者已二三人；

二、正理，娼妓应当废止，工人反去宿娼？

从前我听见人说，华工中还有两种特别嗜好，就是赌博和鸦片烟，但在此地的十六人中却没有，推想他处，也不甚多罢。

（八）娱乐。

中国人在枯寂的中国社会中过惯了冷酷凝静的生活，从不知什么娱乐，跑到外国见他们的娱乐方法，虽则很羡慕他们，但是我们中国人，还依旧过我们的旧生活。在这里之十六人，平日作工、吃饭、睡三事外，娱乐两字是不知道的。礼拜六下午或礼拜日上午，洗衣啊！洗澡啊！买东西啊！更没有时间去娱乐，到了星期日下午虽说闲了，但是出外散散步，就是他们顶好的娱乐法了。大多数还是睡，所以他们的娱乐法就是睡。早两个月还有哈佛华工青年会的人，带一套留声机来唱唱，近来也没有了。结了婚的三人，星期日下午可见其一对对的出外散步，只见三个法妇带一些人在屋子里闲坐谈谈。法国人是最喜 prome ner（译为散步）的，一嫁了中国人似乎也同化了似的。

（九）与法女结婚者的状况。

一个是结婚已两年，男的三十五岁，女的也有三十二岁了。女的本是寡妇，先夫法人，死于欧战。现在他们的夫妇关系，女的是结合在这生计艰难中找一个替他补足生活的人，男的方面是年壮不堪久旷而结交对手的，所以他们的恋爱是由物质而至精神

的。男的人既诚实，所入又可维持家计，所以女的也愿终身从之，颇觉相安。

二人是今年才结婚的。一个恋爱期只三个月，男的二十五，女的二十二岁。他们爱情，暂时还好，女的母和妹，也时常来往。女的也在厂中作工，他们就是在厂中相识的。他们的恋爱，是不是完全自由，没有境遇生计的关系，我不得知。但是自结婚后，女的以养息为名已停止作工了，她的意思是不是要男子独立养家，男子是不是有此能力，我暂时都不清楚。不过女的目的似乎全靠丈夫，将自己独立生活的能力停止不用，而男的每日只有十七方的收入，养两口子是不足的。住在山上，嫌房子小了，已经搬下山去另住了，这个似乎危险！

一个虽说今年才结婚，但是相识已有两年，同居也不是短期了，所以结婚数月，即有了一子，夫妻爱情很好。女的从前作工，生子后停止工作了。礼拜日，男的抱了小孩，牵了女的在山上游，很有一种乐趣。男的所入虽不多，但女的持家很俭，小娃娃的推床都没有买，可见得能与丈夫提携了。房中很简洁，除工厂所发家俱外，自己只一衣柜、一橱柜、一小灶，据男的说，这都是女的要如此布置的。我们会着女的时，很和气近人，每每说，将来他要和丈夫同回中国去呢。（完）

按：在法华工，尚有三万以上，在北地收埋死尸，修复战地的不少。在工厂中者，以里昂之北克鲁邹地方史来德工厂为最多，约四千人。其余各处者，情形亦各不同，均俟陆续调查记述。富春君此篇所记，只十六人，亦自有特别情形，然也可见一斑了。由这些事实，觉有好些问题，应该研究讨论的，国内外阅者，请注意为是！

《时事新报》1920年12月5、6日

法国最近的劳动运动

蔡　和　森

凡稍微研究社会学的，莫不知道德国马克思的学说与法国蒲鲁东的学说，显然分为两大学派，而法国异军特起之 Syndicalisme，实受蒲氏学说的影响，才立为确定之主义。三十年来，以工人阶级之自觉与团结，于现政治之下取得法律上的地位，而成实现之组织：即结合同一区域同一职业的工人而为工团 (Syndicat)，联合各处工团而为工团联合会，联合全国工团联合会而为劳动联合总会(Confédération G'en'erale du Travail)，简称为(C. G. T.)。他的性质为经济的而非政治的；他的组合为职业的组合而非工业的组合（工业组合本为后起的新组合主义），他的制度为联合的而非统一的，劳动联合总会到现在有二十五年的历史(一八九五年成立的)；有二百五十万会员，为法兰西工人阶级行动的中枢。假如那一个行业要罢工，就可提议于劳动联合总会，如经总会认可，总会就与之负那运动和指挥的连带责任，或令其他之一行业或数行业或所有各行业同盟罢工，以厚其运动之势力。或一行业单独的无限制罢工，而令各行业维持其罢工费用。工团、工团联合会、劳动联合总会，都不设会长。工团的会务由执行委员会行之；联合会的会务由联合委员会行之；总会的会务由行政委员会行之。书记为极重要之职，可算为会中主干。近年

工人经济问题，自增加工钱逼到国有的问题了，故劳动联合总会设有劳动经济会议(Conseil'economique du Travail)。

按照工团主义，各种产业支配管理权均应归于各行业的工人之手。大战以后劳动运动的新趋势，就是挨着这种目的而进行。自从去年二月底英国三角同盟产业国有的运动发了端，到今年二月底法国路工也要求铁路国有了，产业国有计划，劳动联合总会计之已久，不过到最近才大大地见诸实际运动。然而现在的国岂不是中产阶级的国？从资本家的公司里移到资本家的政府里去，究竟有甚么多大的分别呢？所以按工团主义而要求国有，初听之不免有点疑怪。其实现在劳动界的国有运动，不过在现政治之下不得不以所有的名词归之国家，而支配管理的实权，纵少也要一半握于工人代表的手里。这就是国有运动的要点。三角同盟所争的在此，劳动联合总会所争的也在此。今年二月底法国路工罢工，为要求铁路国有之头一声，不久政府即答应将拟定铁路改组计划，提交议院，并交劳动联合总会经济会议审查。故这次罢工于三月二日即终止。三月四日劳动联合总会宣布其国有之根本观念说：要使全国铁路变为社会的集合产业，应为全般社会的利益而经营之；不应由几个特许专利的公司为资本家惟一的私利而经营。……经营与管理此集合的产业，完全由集合的团体主持之；而不由政府主持。我们曾再三宣言绝对的拒绝官营 (L'étatisa-Tion)……惟由集合团体的代表，生产机关的代表，消费者的代表所组成之自主的机关主持之。……撮要言之就是：排除一切的私利和资本家的垄断。以全国铁路为国家所有，而其管理权一付之上列三种代表所组成的自主机关，此机关对全社会负责任，一切行政与管理的方法均为自动与自发。

政府于三月九号，打电话给劳动联合总会总书记 Jauhanx,

请其供给关于铁路改组的新意见，三月十五，劳动部送一信给劳动总会，说该部于三月十八召集一个会议，请劳动经济会议派代表来部，以备顾问。Jauhanx 复他一信，说那日总会自有会议，不能派人来。四月二日劳动部又有一信给总会。总会因为不满意于他的计划没有答覆，于是这个问题就搁起了。不久路工联合委员会改组，新委员均为极端派。

五月一日，为万国劳工会议所规定的劳动节，每年各国工人，例于这日休业，做一个阶级的大表示或大示威。上年法国这一日的示威运动，很为利害，与军警冲突，牺牲多人。至是新路工联合委员会，对于国有计划要积极进行，拟乘五月一日的机会，做一个无限制的总罢工。四月二十七日，路工联合委员会以二十八票对二十四票通过从五月一日起无限制总罢工的议案，四月二十八日提出于劳动联合总会。是日总会行政委员会与路工联合委员会开联席会议，决定路工于四月三十夜十二点钟起无限制总罢工。于是无限制的大罢工与劳动节的大表示合而为一，就成了最近劳动运动的伟观。今把各种重要宣言撮要写出，以见这次运动的伟大精神。

路工联合委员会的宣言：

铁路工人啊！以前政府许多的预许，答应改良你们的地位，现在不但一个没有解决，而且你们必要的生活，时常觉得不可能了！在这产业私有经营的时代，日常生活之昂贵，我们已饱受了中产阶级资本家的惨苦。而他们正努力保护其私利，欲关住一般人民于穷困祸患之中；他们正围困你们的奋斗者，敢于遏抑你们的正当要求；他们正努力控制工团的自由，他们的脚老踏在工人极神圣的权利之上！路工联合会

决定以路工惟一之行动，进而为全工人阶级之行动，向那新刺戟做个大反响，以求达到我们生命改良的目的。五月一日你要表示你们愿得的东西：（一）铁路国有；（二）因罢工而失职者复职；（三）释放叠次被捕之奋斗者；（四）尊重工团的权利。铁路工人呵！此时不应迟疑了，五月一日开始你们的行动，继续到完全胜利的时候才止。各行业的工人呵！切莫忘记了罢工的权利这是工团的权利，不要惊惶失措呵！铁路工人保护你的权利和奋斗者；压胜你的威迫者；你的威权在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明日呵！

塞纳工团联合会的宣言：

同人呵！五月一日为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劳动纪念日，我们每年要庆祝他的……五月一日又是宣布中产阶级一切罪恶的机会。中产阶级的倒帐，是不可免的了。他已犯了腐败社会的罪恶，他那筋挛挛的凶势，几使社会成了尸僵。若是我们没法子诊治，他的凶症将充满于全世界。……五月一日为我们极光明极好表示的日子，我们用体力用脑力的工人一律反对政府对外对内的政策：一律反对他们那反革命的举动，他们或明或暗，不知发出了几多反动于全世界，比方在匈牙利那种残酷的反动，就是个明证了！……我们一律反对那无廉耻的自私者，不劳动而把持生产的富源，横行他们那贸易主义和特许专利！……我们一律反对那祸根的帝国主义，他们还日日在那儿增加税项，募集新债！……我们惟有大同盟罢工以致他们将来的命。罢——罢！无限制的延长罢下去……欲使世界真正和平，我们应得做到下列几件事：

（一） 覆审要死的凡尔塞和约；

（二） 抛弃一切反对世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反动：如

最近与德政府协同压灭鲁尔区域之劳工革命，与几年来对于俄罗斯革命运动的反动。须正式承认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

（三） 消灭军国主义，全国解除武装；

（四） 男女完全平等：如正义的努力，幸福的努力，市民权与政治权，均应有同一之机会；

（五） 无限制的全体大赦：如一九一七年下狱之黑海水手，屡次罢工党之被捕者，均应全体释放，因为这些罪恶都是资本主义犯的；

（六） 铁路、矿业、水运、以及一切中等的生产，均应收为国有。最好言之就是社会有。

最后就是在法兰西全国内，推行现行于俄罗斯而革新俄罗斯的共产主义。换言之就是要使统御宇宙的社会主义从此登基！……我们今日所努力的：在确定人民的经济，以救此太不公平的穷困和惨苦！

塞纳工团联合会又有一个布告：

今年五月一日的表示，用全般一致的方法，要比上年的更利害更可怕！……一九一九年克列满梭政府剧烈的反对塞纳工人，今年各行业应一律参与，没有例外。……离开你们的工厂、局所、码头、矿山、店子，结合你们全体的同人，要求：大批公众应用的产业，直接收为国有；尊重八点钟制；扩张工团权利；实行全体大赦；承认社会根本改造之必要，建筑一新社会于劳动基础之上，以谋全般的利益和幸福。……五月一日都不要去做工，马克思有言："谁要吃谁应生产"。

社会党宣言：

上年法兰西无产阶级，于劳动节日做了一个总罢工，以答覆劳动联合总会的请求，这在我们国内为未有的盛举。今年这种表示，应得更严肃而一致。用个全体停止经济生命的方法，以表示工人们的志愿是要急切达到他们的要求：（一）全国大赦；（二）扩张工团权利；（三）与俄国和平；（四）全国解除武装。当此国内国际紊乱无序的经济政治，血淋淋的中产阶级的倒账之前，工人阶级所郑重肯定的：是要以生产国有，贸易国有的方法达到其奋斗的共同目的。……社会党以百七十万选举权者，敬请工人阶级于五月一日恪守劳动联合总会所布告的极严谨的方法与教训。“联合的秩序”这句话，全体工人应予以最好的答复和勇健的突进。社会党是相信工人阶级于这次大表示不会有缺憾的！此时政府与议院的反动，正在那里舍死保护他们的特许专利。那负大战责任的资本主义，已致全社会于破产；而使起国际永远不安宁；每日生活腾贵的困难有进无已……五月一日来了！工人动员了！应有个可惊的团结，可怖的纪律，这是新社会秩序的发端呵！

此外还有许多极激烈的揭帖，都是一片“穷困”“破产”“中产阶级倒账”“革命”“苏维埃”“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的呼声。法国工团主义本有“革命的工团主义”之称，这种呼声当然是应有的，不过从前没有这样利害罢了。假使上年苏维埃的匈牙利不被他政府绞死，今年三四月间德国反动革命后的劳工革命能告厥成功，那么，世界头一个敢作敢为的法兰西无产阶级，当然还不止是这个样子。

这次表示的方法，与从前大不相同，不游街，不示威。劳动联合总会三令五申，说：此次的运动不是游街示威的运动，惟须于寂静严肃中表示其坚决勇敢。惟一制胜的方法，在完全停止全国的经济生命。绝不要稍授人以口实，犯那久已准备好了的军警的锋，堕到他们奸计里面去，使这回运动软弱无力。

到了五月一日，全国工人——自各大行业以至演戏者，图画师，咖啡店，饭馆——通同停了工作。一遵劳动联合总会的命令，不游街，不示威，集会演说，多于郊外行之，惟在巴黎因军警故意寻衅，略起冲突。这一日的组织力和纪律，要算如量表现了。虽政府的机关报加以称许，说是和平合法的表示，得了“德谟克拉西”的真精神，不知这乃是民众运动处于暴力压制下不得已的一种变形，不然他们何以要全国解除武装呢？那中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他们早已宣言与他们没有关系。

四月三十日，劳动联合总会已议决令矿工，船渠工，水手，三大行业与铁路工人一致行动。五月一日，路工联合委员会与总会行政委员会联席会议，路工委员提议：说北方各路罢工者只百分之一；东方各路形势更为恶劣，这两大部分游移不决，外间很有总会与路工联合会不和的风声。路工联合会代表希望总会决定一广大的连带负责的行动：令矿山工人，海上工人，船渠工人即刻大同盟罢工，以消灭外边谣言。于是总会发出三大行业罢工命令，从五月三早起(因二号系星期日)。

五月三号四大行业——路工——矿工——船渠工——水手——同盟罢工。罢工者号五十万。这四大行业可说为国有运动之主干。如路工要求铁路国有；矿工要求白煤国有；船渠工要求港埠改组；水手要求海上运输事业改组，并反对船主于德国赔偿法国之海船内分了十五万吨船位的赃，约值二十万万以上，这都是

他们水手的性命兑来的，理应退出收为国有。

五月二号内阁总理米勒阑对报界代表说：不幸的大战，法国虽获胜利，但和平时需工作与生产更甚，若是照常的运输作用停止，那末，又不能工作又不能生产了。为问路矿各工，把手靠到背上，岂不是要更加重生活昂贵的危险么？也没有个什么要求不可以和平请愿的。并且昨日参众两院，已再三向矿工表示其诚恳，接收他们的要求：即承认扩张矿工养老金的法律。他们口口声声要国有，不知政府正忠于他的预许，将在议院中通过其铁路改组政策。当此宣布同盟罢工之下，政府绝不见得是一般的公意，愿和他们做这种革命的运动。公众的意见，显然反对这种革命风潮与示威。公众实一致要在和平中工作。政府对此惟有尽其职分：维持秩序；保障工作应合以其威信与善意，请求大多数工人始终爱国，离绝那犯罪的煽动。

中产阶级各报载各业罢工很不一致，劳动总会罢工命令，在 Nord, Pas-de-calais, Loir 各大矿区没有发生效力。当罢工命令到那里时，参议院恢复工作的命令也到了，所以仍照常工作，大多数矿工，以为北方路工尚没有罢工，他们很不愿维持路工的运动，四号劳动会长 Trocquer 对报馆记者说：中部大多数的矿工，没有加入罢工者达百分之三十五。Nord 的矿工不罢工，其影响很大，法国每日矿产总额为四万吨，而 Nord 日占二万七千吨。各大港埠的工人，大多数也还没有离开工作。至于路工，罢工者不过百分之三十云。

六号五金工人加入罢工，九号劳动联合总会出一布告说：政府拒绝考虑工人阶级的要求，劳动联合总会不得不扩张其运动，从明日起；运输工人，河道工人，五金工人，快车工人（电车摩托车工人），房屋工人，一律加入大同盟罢工。……自从几月以来，

工人阶级所设定的条件，政府老不承认，我们工人惟有用手取之耳。工人阶级有全般利益的自觉，绝无自私的意见，为问铁路改组的计划，怎么不承认生产者的地位呢？这个布告又向工人说：总会免避可以给人口实，惹起暴力压制的举动。须知现在的运动不是街上的运动，他的目的：是要使政府承认劳动社会的势力；并使他知道继续他那顽固的态度之不可能；及劳动者在全国经济活动之必不可免的改造中，所应占的地位之为必要。总会决定战争到酣足满意的地步。今特提出注意之点于同人：（一）反对一切可以发生冲突的行动；（二）反对不由责任机关发出的揭示。

到了十号共有九大行业——路工——矿工——水工——船渠工——五金工——房屋工——快车工——运输工——河道工——罢工，总额号百万。劳动联合总会又发出通告说：行政委员会考虑此次运动之目的，郑重请求各业同人聚精会神于惟一的共同目标，不要为别种目的分了心，比如工钱之增加，工作条件之满足，此时皆不宜提出，因为这些特别的要求可以分散大运动的势力，减少其达到目的的效率。此次运动的目的：全在应用产业国有的原则，来做铁路改组；矿业改组；港埠改组；海上运输事业改组。

十一号政府发出通告说：政府已向法庭提起诉讼，司法部开了个审查会，按照一八八四年三月二十一的法律第三，五，九各条，劳动联合总会应得解散之结果，此项法律只赋与工团及职业的工团联合会以研究及保护其经济的利益之权。比晚，劳动联合总会发出通告说：劳动联合总会为合法存在的机关，他系由法律承认的工团及工团联合会所联合而成的，已经久历年所。政府要逞凶来解散他，不但不行；而且负了否认法律的责任。十二号，

社会党与社会党之议员及社会党各报，皆大声疾呼；反对政府。北方路矿各工，至此也一致罢工，以答解散总会之刺戟。

此次政府外面虽然强硬到底，自拒绝谈判以至示威解散，似乎愈接愈厉，不稍让步。但骨子里的三魂七魄：实被劳动运动的势力征服了。劳动会长 Trocquer，于十三号在《小巴黎人报》宣布其铁路改组计划，其重要之点为：于铁路公司之上建设一铁路最高会议，以铁路公司代表二十四名，职员及全国一般利益者——工业——商业——农业——代表二十四名组成之。最高会议握全国铁路之管理权与行政权。此计划最后重要之点为：劳动与资本应得同样的红利，他规定劳资分配的数目系以三分之二分给职员，三分之一分给股东。十四号劳动总会的布告说：昨日劳动会长在某机关报所公布的计划，是工人要求已经立了根据的证据。总会付书记 Dumolin 在《人道报》上发表一篇论文，也说这种计划是三年以来不能由平常方法得到的，今日已由直接行动得到了。

九大行业罢工，到十四号加到十二大行业。即电灯工人，煤气灯工人，家具工人，亦次第加入。但均不能持久与一致：如巴黎煤气灯工人，罢工者不过百分之四十；电灯工人，至十三号又纷纷上工；运输工人罢工者日见减退；五金工人上工者日多；电车摩托车仍通行如常；路矿各工原先即不一致，至十四五更停滞不进，法国全国工人本还有大多数未入工团，即入工团者亦未能一致罢工。此次罢工人数已达会员总额之半数，而又支持如许之久，劳动联合总会要算尽力旋盘了。十六早总会行政委员会与路工联合委员会联席会议，讨论至半夜，决定于五月十九号在劳动联合总会开全国联合委员大会，审查罢工情形。

十九号既为全国工团联合委员大会开会之期，又为众议院开会讨论罢工事件之期，各讨论三日之久，才行解决。今先把众议

院讨论的大略写到下面：

关于罢工事件，各党议员提出质问十一种，阁员均出席于议会。第一日共和党议员 Taittinget 大声祝贺此次罢工之失败，他以为这是政府对付得法，他更希望大多数工人以后如这次一样的尽忠于政府，以确定政府的威信。次急进社会党议员Deurafour说劳动联合总会并没逾越法律，国有运动即根据于保护工人经济的规定而来，政府改组铁路计划，应与劳动总会通力合作。次民主共和党议员 Rallin 说他考究此次运动的原因是带有政治的革命的性质。他考究此次运动 ⊂败有三个原因：一是幸得大多数善意的工人很聪敏，他们晓得人家是要他们干革命，故不肯信从，所以此次运动小产了；一是幸得一些青年学生抛弃学业，和他们的教员来担任一国生命枢要的服务（指铁路），故此次运动触了礁；第三就是幸得政府贤明有识。次民主共和党议员 Engerend 说路工联合委员会完全是一运动革命的机关，十六个新委员均是极端派之最激烈者，又有一人说劳动总会为革命的总机关，他有个反对国家的阴谋。第二日社会党议员 Cahin 说罢工运动全世界都有，在法国不算甚么希奇。他的总原因是起于不公平，而在法国这种原因为尤甚。他历数资本家之垄断自肥，生活之昂贵，以及政府拒绝劳动总会为不应当。内务会长 Steeg 说他反对此项政治性质的罢工。平常的罢工本为应有的本分，但此次乃系极端派路工委员胁逼劳动总会所致，意在继续停止国家经济的生命，以推倒政府，其目的全在内乱。政府不得不为内乱之打破者。次社会党议员 Paul, Boncour 有极重要的演说，全场都向他拍手。他说：劳动总会是合法的，罢工也是合法的。在他的计划内，在他的方法内，在他的目的内，都没有不合法的地方。他是合法的工团的集合体。人人都知道工团主义是革新法国的工具。至于罢

工，本没有在那个律例内有规定他的明文，现在要分出那种罢工为正当，那种罢工为不正当，乃是不可能的事。劳动总会为维持路工国有的要求，这不是政治的性质，乃是经济的反响，正为按照法律为保护工人经济起见，工团不仅只能从事于职业的问题，又可从事于经济的问题，明为法律所规定，国有运动，完全是经济改造运动，故只有政府解散的诉讼乃真不合法。他又说：凡不完全的改良，好如一把连环的铁锁，但社会改造，终须从此连环的铁锁内打破出来。况且今次运动，谁分得出是改良，或是改造的革命。其实今日有个极伤人的事体；就是生活困难，工钱总赶不上物价的抬高，把无产阶级压迫的如关在铁桶里内一样。现在人人要从那铁桶的环境内打破出来，只有用这个广大的社会的经济的改造来打破他。第三日社会党议员 Brack 质问停止许多学校的功课，驱使学生抵制罢工，他说政府犯此不法的行为，不独使许多青年学生为罢工之破坏者；而且有几个很大的学校因此关了门。并闻政府将给敌对罢工之学生以奖章，实为挑拨内乱之萌芽云云。这日米勒兰说明他对付此次罢工运动的政策，他说路工过激份子推翻委员会取而代之之后，专意弄成这次的大风潮，故这罢工的原因，一不是为得行业的利益，二不是为得国有，乃专为过激的几个路工委员要捣乱。他又说此次政府所以拒绝劳动总会的原故，因为劳动总会仅五月五号在《战争》(工党机关报)报上向政府公布一个宣言：要政府承认审查他那与政府相矛盾的规定（即劳动总会的铁路改组计划。)政府对于这种间接的请求当然不与以答复，倘若稍微让步，那就是政府软弱无能了。他又说此次罢工乃是一个革命的军队，政府按照法律，当然用其合法的军队维持秩序，保障工作。他又说这种革命的运动，料想与俄国鲍尔雪维克无甚直接的关系。至于拘捕与搜查，乃为政府防护国家应

有的事。次劳动会长将他历次请劳动总会派代表来部的信札说了一些，以明此次曲在劳动总会。最后共和党全体议员及各党连署之议员提出赞成政府社会政策，信任政府案。分作四次投票：

（1）关于尊重工团的权利以五百二十一票对七十八票通过。

（2）填谢不罢工之工人以五百十八票对八十四票通过。

（3）信任政府以五百三十一票对八十八票通过。

全案以五百二十六票对九十票通过。全案原文是：

众议院决以平等的精神担保劳动之自由，与工团权利之尊重，反对各种迪克推多的倾向，维持共和国家法律之尊严，众议院谨贺大多数自由意志的工人能抵抗反乎国家生命利益之行动。重谢诸君在其本分中尽其情愿帮助国家之义务。众议院赞成政府之宣言，并信任政府于秩序与自由之中执行全国与社会的公平之建设。

统看议院中各种议论，我们可以知道这次运动多方面的消息。今再把全国工团联合委员会的大略写到下面：

十九号劳动联合总会开全国联合委员会，审查罢工情形，共计全国联合委员会代表三十八名，各州联合会代表七十二名，亚尔塞斯、劳兰二州的代表亦在内。由塞纳工团联合会总书记 P'erret 主席，由总会总书记 Jauhanx 报告罢工之历史，然后投票通过下列之议案：

全国联合委员会，以各州工团联合会代表及全国工业联合会代表组织之，以保护劳动联合总会反对政府之压迫为鹄

的。关于政府反对全国无产阶级之总机关而提起诉讼之行为，全国联合委员会宣布劳动联合总会为合法的机关，他的行为亦极合法。此机关既为全国工团与工人所组成，故全国工团与工人一律反对推翻他解散他者。

全国联合委员会反对政府滥捕罢工之战士，加以无根据之罪名。

第二日主席报告万国工团联合会致法政府之电报，大意是：法政府以解散威胁劳动联合总会，而罢工之战士亦多被牺牲或拘捕。法政府对付工人之行为。一反从来极其高雅之法兰西人民的习惯。万国工团联合会以最后之努力反对法政府对于其无产阶级之压迫。法兰西无产阶级应取得地位以保障工团运动之自由，应如在他各国一样云。次由多数委员提出即刻恢复工作的议案：由路工委员提出继续无限制大同盟罢工的议案。

第三日以九十六票对十一票通过上列第一议案，由全国联合委员会发出停止罢工命令，于五月二十二早，除路工外，一律恢复工作。路工联合委员申明，路工联合会须按照本月十八号的决议，继续（无限制）罢工，不达目的不止。全国联合委员会为尊重联合的自主起见，予以承认；并予以费用上之辅助。最后全国联合委员会抄录其各种议案提交于议院说："改变路政，不应屏除工人阶级的代表于事外，不应置那极合法的工人的热望于不顾。"路工继续罢工，罢到五月二十九号，亦已恢复工作。于是轰轰烈烈的大运动至此告一段落。一诉讼案，法庭于五月十四号曾传讯劳动总会重要人物 Jauhanx(总书记)，Laurent, Damoulin(副书记)，Calveyrac（会计)。至六月六号又传讯一次，现还没有解决，大约解散是必不会有的事了。至于政府对付罢工的方法，

除武力弹压外，就是以"阴谋反对国家"的招牌，四出搜查与拘捕。劳动运动中重要的指挥人物以及社会运动中重要人物，均被捉去。共计捉去十八名，今把其名字列下：Pierre Monatte（工人《生命报》的主笔），Henri Sirolle, L'eveque Monmousseau（三人系路工联合会的书记为此次运动之发动者），Loriot为）C. A. P. 党创造人），De Lagrange（工党中人物），Rey（Allier 工团联合会的书记），Sigrand, Gauthier, Courage,（皆为重要的铁路工人），Totti（马赛铁路工团的书记），Chaverot（巴黎P-L-M-工团的书记），Hanot（《苏维埃报》的主笔，此报为共产党之机关报，共产首领为Gisault云），Lebourg, Giraud（二人为《苏维埃》报发行人）Boris, Souvarine（此系假名，他的真名叫 Liftchitz' 他是一个珠宝商人的儿子，现年二十三岁，他系第三国际社会党，——又叫第三国际共产党，即中国报上所常见的木斯哥劳工党——的书记，又为法国《人道报》及《平民报》的主撰人），Chauvelon（为青年补习大学的文学讲师），常常在《工人生命报》上做文章），此外被搜查或没有捉到的，还有许多许多，政府说他们是与俄国鲍尔雪维克暗通，谋革法兰西的命，使法兰西变成为苏维埃共和国。在法国内阴谋的机关有三个：一是木斯哥第三国际社会党的委员会（所以 Boris Souvarine 被捉）；一是加入第三国际共产党的法国那一部分的共产党；一是苏维埃共产党联合会（La Fédération Communiste Des Soviets）。并说：在 Monatte 的屋里搜得两个电报，一个是 Trotsky（脱伦斯基）的；一个是 Dridzo 的。他是一个社会民主党的老战士，在巴黎很著名，一九一七年已离开巴黎了；因此疑鬼疑神四出搜查，大有超过莱茵河搜到俄罗斯去的样子。但是他那百七十万的统一社会党，今年三月在 Strasbourg（亚尔萨斯首府）会议，已决定脱离第二国际社会党；加入木斯哥第三国

际社会党了。又将怎么样呢？

一九二〇，六，十三，

写于法国蒙台尼

《少年世界》第一卷第十一期

1920 年 11 月

劳动世界之新变动

恩　　来

劳动问题和社会主义在欧洲各国已结成不解之缘，这是稍知欧事者皆能相信。什么政府中的劳动政策，社会上的慈善济贫事业，在劳动问题根本解决上，早已失其威灵同效验。最切近而又普遍的，凡是劳动界中人，都相信社会主义能够应这个需要。这不但欧洲如此，美洲同澳洲的工人也都是这样相信，甚至于现在新潮流方侵入的亚洲，也都发生了一点影响。社会主义之不可侮，实已成了必然的趋势。不过社会主义的派别也很多，在欧洲这个发源地上，更是五花八门。他们目的中的对象，本都是在现代政治经济制度底下讨生活的劳动者状况，但是他们要打破这种现象的方法，却生了很多差异，因此遂分成很多党派。劳动者本身受了这个影响，于他们自己组合上也随着发生许多不相同的主张和派别，结果遂有许多名目不同的劳动团体同社会主义团体在各国内部及国际中间产生。这种情况，在大战前似乎分别得还不甚多，到了战后，俄罗斯已变成了共产主义的领地，德国又变了灰色的改造，而其余各国更蒙了资本主义回光返照的更盛势力，环境不同，派别也更多了。单就国际间言，社会主义的团体，已有了三个，一个是接续旧日规模的第二国际党，一个是设在维而纳的社会党国际联合，其余一个便是今日人所盛称的莫斯科第三

国际党了，也可称作国际共产党。劳动团体也分了两个，一个是设在莫斯科的红色国际工联，一个是在阿姆斯特丹的国际工联，通常也称做阿姆斯特丹工联。两者之中，前者是赞成共产主义的，而后者则仍保守他旧日的规模，因为他的来源实是很久，不过吸收各国工联的能力已大不如前了。这种国际的分野，在战前是不多见的。至于各国内部的组织，更是分裂得很甚，并且时有变动，从抽象上说，总是主张革命的人多赞成共产派，保守的永远挂着他们的老社会主义招牌，调和其间的便成了个中立派。表面的情形大都类是，不过盛衰的势力在各国中间又彼此不同，俄国已成了共产主义的天下，不用说了；如在英国无论工联与社会党总还是右派得势，所谓新的便是调和派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可译为行会主义）了，然而这个主义现在也有就衰之势；如在德法共产主义便渐渐抬头，旧派的社会主义已渐渐失掉劳动界的信任；如在奥国，则调和派的势力很盛，所以社会党国际联合在他那里成立；其余各国也都是各因他的环境情形同民族历史的背景而各异其状态。总之，不同是不同，然而大致的趋势，总是由右向左的，虽说英国可以看做例外，正如他离开大陆独立在海中似的。但是在潜隐的势力中也确有变动，如行会主义的中坚份子柯尔，近来也有赞成共产主义的倾向，便是一例。

各国的派别如此复杂，从进化的理论上看来，确为一种难免的现象，因为凡是解决社会现象的方法，总是属于多方面的，尤其是在开始进行的过程中，更易引出许多互不相下的局势来。不过从事实上着想，彼此因为互竞的结果，易使“渔人得利”，而劳动者本身反常常得不到实际的利益，因此一般热心劳动问题与社会主义的人多以此为可虑，他们时时想设法调解、融合各派于一炉，但是在过去的记录中，这种运动又多归于失败，并且不但没

能融合，更常常因为调解的结果增加出许多分歧，这也是常见的事。分歧越多，派别的分离自然更烈，现象也就不能见佳，有识者的调解号召，遂不能表现一时的冷静，然而他们心底下调解的火热还是依旧燃著，预备待机而发。这种颤动，恐怕不但为愿意调解的人具有，便是各派中各走极端的人，也是时有这种感觉，他们也知道在现时资本主义犹盛的时代，他们不应分裂得成如许派别，他们更知现代各国资本家的联络，差不多都没了国界，成了国际间浑然一体的资本主义大联合，虽说他们彼此间自由竞争的习惯和侵略主义的观念犹存，但是对待劳动阶级的步骤总是一致的，壁垒也是团结得很坚固的。劳动阶级的敌对，本只是资本阶级，他们深知若不能整齐军旅，来同这样一致而又坚固的资本阶级奋斗，结果只有败退。所以劳动阶级如果认清了敌我两方的情势，则无论各派在将来的改造方法如何，而在现在这种冲锋的阵势上，总应该力求联合，勉图一致，好免掉敌人乘间攻入的危险。各方面对于这类的观感，既已深得，然一时犹未及实现的原因，便是多为情势所阻了。不过他们的呼声，却已又渐渐地昌盛起来，在过去一两月中，各派的联合运动，又开始号召了，这或者便是未来劳动世界新变动之起首。

我在介绍这新变动上起首要说的，是去岁十二月十九日维而纳社会党国际联合的动作，这个联合的事务局，曾开会于满恩河上弗郎克弗特城，在那天决定向各国共产党、社会党谋联合会议之运动，他的目的是打算在最速期限内能使这个大联合的会议实现，图谋将来联合行动的可能，和解决欧洲救济的问题。主动这个议案的，既属于社会主义团体的中央派，赞助最力的遂也出于德国独立社会党同奥国社会民主党，这两党已将此事看做实际问题，向国际劳动运动的各派中有所活动，他们因为现时德奥所处

的情势危难，所以他们的注意点也多特别在联合救济上边，这一点恐怕与共产党的直接行动有些不易相合，然共产党在同时也有个新发展，这个呼声是从德国共产党中起来的。德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向第三国际党发出一个要求，请他决定采取“全国际劳动组织”的步骤，在这个组织中要包含红色国际工联、亚姆斯特丹工联部、维而纳社会党联合和第二国际党，换一句说，便是要将国际间所有劳动联合同社会主义联合聚拢在一起，他应做的事体，也曾被提议出来，要项如下：

一，国际债务废除；

二，解除军备；

三，阻止法兰西帝国主义之侵略行动，如强制占领惠尔一事；

四，俄罗斯苏维埃政府之完全承认的保护；

五，俄罗斯改造与其救济灾难之信用的保护；

六，八小时工作之国际承认的保护。

在这个提案中，我们可以看出今日共产党的态度已不是象从前那样执着了，他们的目前急务，竟有点同维而纳社会党联合向着一条路上走了。但是这个仅属于德国共产党的意见。我们现在再看看莫斯科方面的情势。莫斯科的红色国际工联执行委员会在德国共产党提议后不多时，曾向亚姆斯特丹工联部发出一个劝告，同他讨论阻止法国工联破裂的可能情势。原来法国工联本是属于亚姆斯特丹工联派的，自从大战后受了俄国赤化的影响，便有一派人主张与俄国工联联合，而投入红色国际工联中，但为大会所反对，遂别立一派为革命工团部简称为“C.S.R”，而大会仍为“C.G.F”，所谓劳动总联合是了。然在劳动联合中，也分有两派，右派主张完全拒绝革命工团部的加入，左派则以为宜加以联络，并且不赞成分裂。这个分歧，在去岁李鄂大会中最为显著，两派

数目的相差并不甚大，右派仅以一五七二票对一三五二票握住了干部的全权。左派虽失败了，妥协各派之心却终还盛着，况又当着这联合的呼声中，他们如何能忍？于是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间，他们不待干部招集，竟单独在巴黎开了个全国左翼大会。到会的工联代表竟达到一五六四处，若按在李鄂的大会票数算来，他们少数派却变了多数派，是联合的主张竟得势了。他们的主张是要将劳动总联合重新整理起来，联合革命工团部，整顿现时为右派占据的干部，联合全国工人抵抗资本家的压迫。他们负着这种使命，当着开完会后，便由他们选出的临时委员前往，干部要求速行召集全国大会，解决联合事件。但是干部认他们非正式会议中的议案为无效，不加接待。因此遂生了重大的争执。从分裂上的情势看来，法国的工联，显然要分作三部份了，在他们开始争执的时候，莫斯科的红色国际工联的劝告，便已向亚姆斯特丹发出，这两种国际工联在主义上，久已成了敌对，此次红色国际工联竟肯与他反对者商量，劝告两方与党联合，的确是一件新的变动。由此可知德国共产党的提议，维而纳社会党国际联合的活动，全可视为有因而至的事了。再说红色国际工联这种劝告法国工联联合一致的意见，难保不是受苏维埃政府经济政策改变的影响，我们看第三国际党近来不大倡其“前锋联合”的主张么？这种见地，正是要想在这抵抗资本主义的前锋上，实现全劳动阶级的联合，好与敌人作个死战。说句时髦话，便是先一齐向这私人的资本主义预备抵抗，将来的主张且不论，这个策略的改变，实是共产党的进步。因为列宁当了几年事，学了不少乖，他也知资本主义无妨让别人乱叫着，只要社会化了便不要紧；商业主义更免不了，只须求他运用在国家手里。所谓国家化的产业、国家化的商业，都是现时农劳政府中人所乐道的。但是他们对待

各方面的态度虽渐渐和缓些，要从隐暗处着手，然此种大联合的活动，从各方面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各异上看来，似乎还不易使这种新变动生出多大效验，不过变动却应由大家公认了。其最显著的事，便是维而纳的社会党国际联合同莫斯科的国际共产党本不相容的，现在忽有了上边的提议，可知德、奥今日的困苦情势实在与他们速求联合的暗示不少，这各国间的环境变动，在将来总有一日会应了他们"全世界的劳动者联合起来"的愿望。

在这种新变动下，最让我们注意的，自是劳动界本身的联合情状，同指示他们趋向最新的共产主义了。因为没有前者，社会主义便失了凭借；没有后者，劳动世界也不会有现今这样地热闹，俄罗斯的共产主义政府，更无由产生了。但是要知道这两种情势，我很难在通信中一时将他们说尽，现在只好将他们的国际活动，用统计的方法略提一提：

(一)各国工联，即工人联合，或译为同业工会(或作工团)中的人数(据去年七月中调查)：

国　　别	人　　数
阿根廷	七四九，五一八
奥国	一，〇〇〇，〇〇〇
比国	七一八，四一〇
保加利亚	四，〇〇〇
加拿大	二六〇，〇〇〇
希腊	一七〇，〇〇〇
和兰	二一六，五八一
匈牙利	一五二，四四一
意大利	二，〇五五，七七三

南斯拉夫	二五，〇〇〇
莱多尼亚	三〇，〇〇〇
鲁森堡	二七，〇〇〇
挪威	一五〇，〇〇〇
捷克斯拉洼克	七四〇，〇〇〇
丹麦	二七九，二五五
英国	六，六〇〇，〇〇〇
法国	一，五〇〇，〇〇〇
德国	八，〇〇〇，〇〇〇
秘鲁	二五，〇〇〇
波兰	四三，一三八
南菲	六〇，〇〇〇
西班牙	二四〇，一一三
瑞典	二七七，二四二
瑞士	二二三，五八八
总计	二三，九〇七，〇五九

（二）各国共产党的人数（此据全世界五十一国共产党包含会员二百八十万六百四十五人所组织之机关报□□□□□□*最近之报告）

在一万人以上之各国

俄国	五五〇，〇〇〇人
德国	三〇〇，〇〇〇人以上

---

* 此处原件空白六字地位。

捷克	三〇〇，〇〇〇人以上
法国	一三〇，〇〇〇人
挪威	九七，〇〇〇人
南斯拉夫	八五，〇〇〇人
意大利	七〇，〇〇〇人
乌克兰	六一，〇〇〇人
保加利亚、罗马利亚、芬兰均各	四〇，〇〇〇人
奥国	一八，〇〇〇人
亚再贝特张	一六，〇〇〇人
瑞典	一五，〇〇〇人
北美、英国、乔治亚均各	一〇，〇〇〇人
高尔斯克及西班牙均各	一〇，〇〇〇人

在一百人以上之各国

日本	九〇〇人弱
南美	七五〇人弱
鲁森堡	六〇〇人弱
帕内斯坦	五〇〇人弱
葡萄牙	四〇〇人弱

其余二十七国多不及百人，不列举了。

此外还有少年共产主义国际党，乃为国际共产党的别派，全体党员现已达八十万人。

再共产党的日报总数已达六百四十六份，在俄国境内出版的有五〇〇份，在乌克兰的四五份，在德的三三份，挪威一四份，捷

克斯拉洼克七份，其余的便止一、二份了。周刊同定期刊总共有三百五十一份，在俄国发行的有六十九份，捷克四六份，北美三一份，挪威二二份，法国二〇份，意大利一二份，瑞典一〇份，其余的都很少了。少年共产主义国际党共刊行五十种周刊，日刊尚没听说。（十一年二月六日寄）

天津《益世报》1922 年 3 月 29—31 日，4 月 1 日

德国革命运动的过去

伍　豪

大战停了五年多，各国的政治经济情况，不但战败国因为战争结果弄得一团糟，便是战胜国又何尝不是左支右绌，艰于应付。这样的局面谁起来开展他？从事实上的证明，只有各国的工农阶级和弱小民族联合一致来推倒这扰害全世界的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唯一的出路，便是革命。但这个向资本主义宣战的革命是要以广大的群众——尤其是集中在城市中的工人阶级——做基础的。假使某一国的被压迫民众尚未集合有可靠的革命先锋——亦即是受革命党指挥的战斗员——自然这一国的革命便难发作，即使发动了，不是等于昙花一现，便是备受挫折。前者如大战后德、匈的共产革命，后者如今日中国的国民革命。且不仅如此，我们的敌人——资本帝国主义——是国际的，故某一国的革命发动，至少也要含有国际性或更有普及国际的可能。例如土耳其的国民革命掀起后顿时影响了中亚、印度、东亚的各弱小民族一致起来做国民革命运动，这便是前者之例。至俄罗斯十月革命，不待说是属于后例了。持此以观察今日各国的革命运动不仅其成功与否可以预料，便是革命的时机也未尝不可预测。而其中尤可以预料予测的便是德国无产阶级革命。

在德国无产阶级因其工业特别发达之故，已造成极广大的群

众。当一九二〇年选举时，德国有选举权的人在其六千万民众中有三千三百八十余万，其中工人获有选举权的为二千二百七十余万，约当总数三分之二。选举结果投工人阶级政党票的有一千九十余万，当全票数二千六百余万的百分之四十三。其时社会民主党党员有一百万人，独立社会民主党数十万人，共产党约八万人。以如此广大的无产阶级有一千万以上可靠的后援，将及二百万受指挥的先锋军，假使社会民主党、独立社会民主党在德国革命进行中不于中途变节自安于民主革命，则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在一九一八年停战后至一九二一年随时都可爆发，又何至内而使德国无产阶级延长其受压迫穷困的运命；外而懈中欧各国革命的朝气，并助长法兰西、意大利两帝国主义日渐增高的凶恶呢！

次之，德国又一革命时机便在去年秋后，当时库老内阁因工人阶级的反对而倒，工人阶级的势力，足以左右政局，已是确然无疑。革命的潮流，更涨高到极点了。但主持革命的德国共产党却顾虑到：（一）共产党的党员数目尚不甚多（在一九二一年为三十五万九千余人，至去岁约近四十万），革命的工人未必能有多少；（二）反动派的势力正盛，革命发作后未必能持继多久。于是第三国际乃依其顾虑定出工农政府的口号与社会民主党左派合作希望取渐不取急地夺取政权。果然撒格逊土灵根的工人政府实现了。然而三个共产党员当了些时阁员竟无法施展，不但工人阶级革命的勇气因此消沉不少，便是反革命派的势力也在此革命停顿期中才得以增大起来。至汉堡工人骚动的失败，更是因各方为工人政府的空气所蒙蔽不为响应所致。结果反动派势力愈长愈大，撒土两省的工人政府解散了，共产党封闭了，共产党报纸禁印了，共产党员被捕了，工人的工作时间延长了，集会结社受限制了。资本政府的威严如此，于是始证明取渐进而不革命的工人政

府的手段为不合时宜。惟渐进的虽遭失败，革命的究有无把握，初尚属一疑问。及最近德国本届选举揭晓：共产党所得的票数竟自五十万一跃而达三百七十一万，选出议员六十二人；社会民主党得票近六百万，选出议员一百人；最反动派（保皇党）的国民党得票五百七十余万，选出议员九十六人；民众党得票一百九十余万，选出议员三十二人。从这个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投票总数二千九百二十五万余人中，投工人阶级的票数仍保有与前届相近的票数九百六十余万，而反动派的票数也不过七百六十余万。至民主派，民主、中央、人民三党则无不失败，议席无不减少。由此可推知去秋的革命情势是非常急迫而可靠了。因为工人阶级经了这半年来反动势力的压迫、破坏、摧残和分散犹能保持原有的信心，犹能有自改良派的社会民主党的欺骗政策下跑到共产党中来的如是多（社会民主党此次失去票数约四百余万，失去议员七十三），则半年前处在较自由的空气中的革命势力当决不仅此数（四百万的革命派，一千万的后援）。反动派要不经这半年的培养，不但民众党不得发生，便是已有的国民党也未必能这样张牙舞爪地大肆活动。民主派本是现今的当局，经了史脱拉斯曼和马克思先后的努力，其失败犹如此。假使在库老方倒的时候便发作革命，其在人民中的信用更可想见。故当时德国共产党的顾虑实未将局势看得清楚，以致时机坐失。

腊伙客说：德国革命不是从外国输来的，是要从德国无产阶级自身嚷出。因此他便赞成在德国先试行工人政府的主张。诚然德国革命是要德国无产阶级自己要求，俄国无产阶级的磨砺以须，只不过助长他的勇气，为他发难后的防御，而发作终要他自己做起。但我们要追想十月革命是谁为俄国无产阶级嚷出来的？俄国有列宁，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便应时而现。德国虽有费须尔一

派力持反对工人政府之议，但他们振臂一呼，号召革命的卓越识见尚未养足，使我们乃不得不缅怀死去的卢森堡和李卜克利西突了。革命需首领，尤其是在革命的紧急期中，证于德国革命遂益知其然。

《赤光》第八期，1924 年 5 月 15 日

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之新发展

李　富　春

自近年国际帝国主义共同侵略中国以来，自最近中俄协定成立以来，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逐渐发展。从八月的军阀开战、国际帝国主义进兵，种种事变看来，此种运动尤长足猛进。不过当时若法、英、美三国共产党之致电国民革命首领，愿为反帝国主义的内应；若第三国际之告世界工人赞助中国民众，反对帝国主义；若苏俄报纸（如《真实》和《新闻》等）及各国共产党报纸（如法之《人道》及《共产主义周刊》等）之分析中国情势，为中国人民鼓吹，尚且在言论时代。到九月中旬以后则入于行动时代了。兹举数事证之：

（一）九月十七日，莫斯科成立“勿犯中国会”在劳动宫开大会；这一类的组织遍于苏俄，各工会俱通告工人一齐加入。此种会社曾召集过许多演讲大会；杜洛茨基和拉德克等俱到处担任演讲。九月二十一，法国共产党各区书记会议决定在“勿犯中国”的标语之下组织一会，请一切反帝国主义的团体和个人加入。

（二）第三国际通知法、英、德、意等国共产党在九月二十八日于巴黎、伦敦、罗马等处开第一国际六十周年纪念大会，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法国共产党曾将“反对帝国主义在中国之干涉”列入其开会程序中。当中国人去参加时，工人见了中国队

伍，俱叫出“中国万岁”等声音。十月四日《人道》报载莫斯科各大学学生做示威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

（三）九月二十五日，杜洛茨基致电中国“反帝国主义大同盟”表示苏俄为中国人民之协作者。十月五日《人道》报载全俄各工团（共二十三个）联合会中央议事会发出通告，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及赞助中国人民。九日，德、法、美、比、意、荷、瑞(典)、波、捷、匈等及巴尔干诸国的共产党和赤工会之代表开国际会议，告被压迫民族，完全赞同国民革命运动。

（四）八月二十一日，上海各团体欢迎苏联驻沪领事。二十八日旅巴黎中国人约有一百多去参加法国共产党所召集的露天大会。十月七日《人道》报载柏林电，中国人民及青年俱欢迎苏联大使。至于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则始于北京，而继起于湘、汉、沪、济、杭等地，有风靡全国之势。

这样看来，外国人之赞助我们的，全是国际主义者，即工人和共产党人。那一般讲国家主义的政党和其报纸，都象青年党人一样，专于利己损人！他们也实行胡国伟君的话：“我们主张国家主义，则我们的爱，当然范围于国家”。这就是一切帝国主义在这次中国内乱中，主张干涉中国，不为中国人民说话的原因！然则我们究竟觉得国家主义好，还是国际主义好呢？然则我们还要说帝国主义者是我们之敌，共产主义者也是我们之敌么？愿大家想一想。

《赤光》第十七期，1924 年 10 月 15 日

德国之政争

富　春

德国无产阶级贩子手马克思（前译作玛格士）底内阁，是由中央党和民主党组成的。三党共只有议席百五十人，所以内阁政策在议会中有时要依靠社会民主党（议员百人），有时要依靠国家党（议员九十六人），才能通过。八月底马克思要想把他由伦敦会议捧回底国际帝国主义"圣旨"——专家计划（即大魏计划），特别是其中所包含底改国有铁路为私有事，在议院中获得三分之二底通过。乃以内阁中四把交椅作代价，买国家党议员底票。高唱爱国的国家主义党，竟与背叛工人阶级底社会民主党一致投票赞成专家计划，把德国卖给美、英、法、比诸帝国主义。

及投票过后，以做官发财为目的之国家党要马克思履行前约。它以反对德国加入国际联盟和要求政府向列强提出"欧战底责任"之通牒，抵抗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组阁底瘾又发作，遂力与国家党相持。原来中央党由百多万基督教工人和一部分大工业资本家组成。因为利益不同，遂分为反对国家党之信教工人底左派和愿与国家党合作之资本家底右派。中央党若与国家党合作，则必引起内部之分裂。民主党党员大部分为小商人、雇员、技艺工人等。代表有产阶级底国家党若上台，只能为大资本家大地主谋利益。所以代表小有产阶级底民主党人说：我们现在要学

法国，与社会民主党组成左派联合，将来专家计划实现时，只有社会民主党才能消灭工人底暴动（!）而现时对英、法外交也只有这个左派联合才能与爱友、麦克唐拿携手（!）。因此组织马克思内阁之三党只有代表大工业资本家底人民党（即平民党）才愿与国家党合作，于是在国家党与社会民主党相持中，乃完成了民主党、社会民主党左派联合（小有产阶级）与国家党、人民党右派联合（有产阶级）之……这种政争既日烈，而施行专家计划和加入国际联盟等问题又横在目前，维持现内阁和扩大现内阁都不能成功，于是遂不得不解散国会，定于十二月七日选举。

在这政争之外，来反对一切有产阶级政党小有产阶级政党的，和从根本上反对掠夺工人之专家计划的，只有代表无产阶级底政党——革命的共产党了。因为这样，德政府通缉六十二个共产党议员，资本主义的报纸亦热烘烘地反对共产党！但早或迟，共产党都是要爆发无产阶级革命的，亦只有这样，德国之有产阶级的政争才能从根本上告结束。

《赤光》第十八期，1924年11月1日

今日共产党之真谛何在？

R（张申府）

结党营私，原非好事，今日劳动阶级之所以有此，共产主义者之所以组织此，实因缺此，别无他法，可以代之达其目的，但承认自觉了的劳动界之主张为是，为应该，便不能不承认共产党之成立为是，为应该，因为共产党所逐的利，营的私，并非共产党人一己的利一己的私，乃是通于全劳动界的利、的私。

就一般而论，凡有一种公同的利益，为得这种利益，便不能不有组织，如果这种利益是关系政治的，或非借政治不能达的，便不能不组织政党。但共产党之所以组织，犹不止此，近世以来，劳动运动之势力，已蓬勃的非到全世界社会改造，不能收拾。然劳动界的人，固未同样的觉悟，也非有同样的本领；虽有共同的利益，却非同样的知道怎样去达。在这时候，试问，若无作率导的团体，运动怎能成功？寻常战争，不能无先锋；阶级战争又怎能缺了先锋？劳动阶级的这种先锋便是共产党。有了这个机关，乃有了指路的，有了这个机关，本阶级较进步的分子乃可领着全体群众，鼓舞而进。

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决议说的好："当一八七一年巴里市政府时，法兰西无产阶级第一次英武的举事，当时若有个强固的共产党，无论怎样小，成功也应多的多，许多错误与缺欠，也应免

得了。”

最近俄国十月的革命为什么成功，德国正月的革命为什么失败，主要的原因还不是一有坚强的共产党，一无坚强的共产党？

共产党既如此其重要，那么，其真谛何在？第二次大会决议又说：“共产党是劳动阶级的一部分，是其最进步，最有知识，因此最富于革命性的那一部分。”“共产党是合最好的、最有知识、最牺牲自己、最远见的劳动者而成。”

然此是共产党的界说，还非其真谛，若其真谛，还别有在，在什么？一言以蔽之，曰：纪律。有纪律，有共产党，无纪律，无共产党。共产党之所以强在此，共产党之能成功在此。共产党与其他政党之不同，此其重要点之一。第二次大会也说“无严格的纪律，劳动者之胜利实不可能。”游过俄的，如兰萨慕(A. RaSome)，如罗素，如布来尔斯佛 (Brailsford)，不论对于俄国别的地方，怎样的不满意，对于他的共产党，却无不称赞不值；无不认共产党如倒，俄国立即不能维持。俄党的数目，就俄国人口而论，本不算多，为什么小小的一个党就有这样的势力？

俄国共产党对于党员之加入，限制本是非常之严，然而还按时有所谓廓清，凡是有点不可靠，有点不配的党员，都被驱逐。“稍微有点懈怠，稍微有点不热心，行为稍微有点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伦理不合，都是可以致驱逐的。”酒不准饮，牌不准斗，跳舞既受呵斥，吸烟也要监视，逐利谋私尤是必不可恕之罪(参看 Brailsford, Russian worker's Republic，论共产党章)。这种种又是因为什么？没有别的，仍是因为纪律，有这种纪律才有那样力量。有这种纪律，才能艰苦卓绝，未成功时，既饱尝监禁流放之味；成功以后，又把天灾人祸战胜。

不要小看，这种纪律，并不是容易的事情，俄党之有此，实因

其历史，若寻常出身小有产阶级而未改其心习的人，非但不能以此自律，亦且不敢以此律人。这种的人，本来不配组织共产党，就令一旦组织，也只徒冒其名，他本不求实际，又何能以实际问之？然而共产党乃是最实际的党，他的种种计划作为都是因实际为实际而起。不能以实际问之的党算不了共产党。

没有纪律，不能坚固，不能精神贯一，一个共产党形体不坚固，精神不贯一，又岂有能成功之理？俄共产党之有今日，本始于一九〇三年社会民主党之分裂成多数少数两派，这个分裂，本是列宁有意为之，这种分裂正是谋贯一，一个组织，精神不贯一，万万不能强有力。数目虽多，只同散沙。若不是各国社会党的分裂，今日怎能有这样坚强的共产国际？

真正的共产党是一点不苟且的，是一点不姑息的，不但显然不忠，或违犯纪律的党员，为其所不容。便是一个党员，居重要职位，而作事不得法，或见解不当，也必逐无疑。去年德共产党之驱逐雷维(Paul Levi) 便是一个显例，这是为的什么，这其实也是为的纪律。

今日世界实只有一个共产党，便是国际共产党（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他的决议凡是共产主义团体都须遵守。各国各只准有一个的各国共产党都不过他的支部，各国各只准有一个的各国少年共产团又是此支部的支部。横之，此各国的少年共产团又联合成少年国际，作为共产国际的一部分与妇女国际书记部同其作用。如此互相联贯，而谋成功之便利。共产国际所不承认的人，各国共产党必不能容之。共产党所不承认的人，少年共产团必不能容之。这也无非为的纪律(参看第二次大会决议共产国际组织法)。

总而言之，纪律是共产党之魂。失此，共产党是不能活的，不懂得这个的人，不配加入共产党，更不配组织共产党！

附录：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驱逐法伯宣言

法伯Henri Fabre 法共产党党员，巴黎《Journal du Peuple》报的总理编辑。因其违反纪律，不忠而谋私，今年二月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曾议将其驱逐。但法党自己对此，因有许多居要职的党员都来袒护他，久不能决。五月初国际执行委员会乃据特洛斯基，布哈林等五人被命组织的审查委员会报告，因事情的急迫，不待法党之自决，即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决议将法伯驱逐。并且凡党员中与法伯相依的，都认为自动的被逐。除宣布此决议外，执行委员会又有一说辞，详说驱逐的理由。今摘译如下。

共产国际是以其历次大会所明白草出的原理为基础的。他的组织是立在全体党员所承认的纪律之上的。

共产国际绝不强迫人加入。但如加入，这种加入的意思就是为谋国际之公利，舍弃一切个人的私利。这种公利乃不可解的与世界无产者之利益相结合。

各国共产党及共产国际，既不是以政治为娱乐的人的俱乐部，也不是想出风头而为自己谋活路的人的谈论团。实乃是从事战斗的阶级组织，由无产阶级为防卫自己，为竞争解放而成立。

这种组织的所有分子，必须都是完全靠得住的。鞠躬尽瘁于公共的主张；为共产主义思想，惨淡经营；为革命事业的成功，情愿把一切私人的欲望都牺牲——这种种实共产主义者之显著的特色，实共产主义团体应当向其分子要求的必须不可缺的保证。

共产党，因反抗武装的有产阶级，从事毫不悯恤的竞争，行列中绝不能容忍游疑不稽，疑惧沮丧的分子，使得散布贰心而弱党力。一看出这种分子，立刻就须毫不怜悯的将其歼除。

共产党里绝无存留来此戏弄(dilettanti)，营谋私利（买卖政客）的人之地，也绝无安住自觉或不自觉作有产阶级见解的机关的人之所。

不论以思想或以著作，反对共产主义的自由，只有在共产党以外，能容下去。随便什么政治上的庸流，无识的僭妄人，所常用的关于“思想自由”或“笔头自由”的许多老儒常谈，也掩不了这桩真理。

这些议论，对于各共产党，乃属根本。……

……（此处即述驱逐法伯事）

……

无论或是或非，但举以往对于革命情事，所作的功劳，以辨白现在加于此同一情事的害处，可以宽恕，那都是枉费功夫。无产阶级实在很常常不得不将那在一个时候，为很相异的理由，对于其阶级的利益，曾能尽过力的人，除掉。……

……

……据第三次大会，为驱逐雷维事的决议，凡声言与被驱逐的人一体，负联带责任，或投稿于被驱逐人的报纸的党员，都要自动的驱逐。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译自《Jnternational Press Correspondance》，
Vd. 2, No. 45. 1922. 六月七日号，P.340）

《少年》第二号，1922年9月1日

三、学习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批判各种反动思潮

缺页

马克思主义底几个重要点

熊

高真、绍群、子君、永璧、肇绪诸同志：

自前月巴黎临时大会后，C. E.对于训练团员问题，即督促团员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工作特别注重。关于我们研究主义之必须与急速以及研究之宜取共同的手续而不应徒作单一之行动等问题，已经C. E.叠次布告，且有大会的严重决议，无庸我再事呶呶。

C. E.研究委员会主任捉掀于本月十二日特指定我和你们五位不时作系统的讨论，并嘱我转致你们要尽量的和我共同研究。同志们，我们大家都是在赤色青年旗帜下学习革命的人，彼此相互间毫用不着客气，“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打开窗子说亮话，说不对不要紧，总要彼此能时时把各人脑神经系内起的变化作用结果写出来互相对证，互相矫妄，则我们彼此所得自然日多。而团体的焰焰红光自将日为熏烈。

如今我先请你们注意几件事：

1. 请你们于接此信后，各人回我一封信；

2. 在回信内告诉我，你们各人看过及现在正看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名字并作者；

3. 对于我发挥的议论，请毫不放松的痛下批评；

4. 嗣后请你们各人常来信讨论，至少每两周一次。

我现在来和你们详细讨论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重要点。

一、社会科学的阶级性

我们知道人类的一切文化、一切科学都应随某时代、某阶级而生。这一个时代、这一个阶级的需要和别一时代、别一阶级的不同，因之，其所反映而出的文化、科学的性质的容量也不同。人类社会已在历史流行中分成为——其尚未十分明显者必未必朝着这方向走——有产与无产两大阶级。这两大阶级的性质之异，好比狼与羊，二者之所需求太不同，两方利害更大相庭径。有产阶级所需求的是：怎样的牢固资本统治权，怎样的利用学者、教师、军队、官僚去愚弄，去箝制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所需求的却是：夺取有产者的统治权，建设无产阶级政府，以期达到共产社会。这一个阶级的利，即别一个阶级的害，比方在资本制度国家内，有产阶级要维持秩序，无产阶级却要破坏秩序；在赤俄无产阶级祖国内却恰相反，却是无产者要安定秩序，以期施行无产教化，那些有产者（反革命党）图复辟，便要来多方破坏了。社会科学由社会的实际所产生，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实际已异，那么两阶级的社会科学必随之大异而特异。但此还有一件应注意的事，我所说的“社会科学”（德文 Sozialwissens chaft 译法文为 Les sciences de la Sociéte）是指一切科学（哲学在内）的共同组织（System）而言，并不是单指其某部分如物理、化学……等等。须知社会科学是有组织的，好比一座旧房子也是一个组织，这组织内总有好些东西为将来新组织中用得着，但他的全组织已要不得，总值得将这组织拆毁另建。

在社会科学中有两种科学，不是就单方面却是包括各方面的：这是历史学和社会学。历史学研究某时代某地有某事、某现象的发生；在社会学则研究这些事情、现象发生的原因以及他们的共同关联，他的历史的发展，由是可知社会学是一切科学中的重要部分。有产阶级有他的社会学（从孔德而到涂尔根）；无产阶级也有他的社会学。无产阶级的社会学是什么？即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二人所建立的“历史唯物论”（Historischer materialismus），或简易称为“唯物史论”，或者又可称为“经济的唯物论”（ökonomischen materialismus），美国塞利格曼教授（赞同马克思主义修正派学说的）更呼为“经济史观”。

这个无产阶级的社会学于历史负有莫大的使命。有了他，无产阶级才了解社会里面的生活，才走得上阶级争斗的正路；有了他，共产党人才预先看明资本国家的战争、的革命，接着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各党各群的关系；并有了他，第三国际才能领率群众披荆斩棘的向共产社会途上走。

为明了社会科学之有阶级性，我可以再说个浅明的例，赤俄境内 Swerdlow 大学及东方大学讲座中讲马克思学说；柏林、巴黎各大学内也研究马克思学说。但是在前者讲座中的布哈林 J. P Denike 是把马克思学说当做无产阶级的社会学，当做共产革命的基本科学；而后者各大学中的 Monsieur Gide 及 Herr W. Sombart 等，只能够常把马克思的著作断章摘句的曲解。再来，资本国家内各学校与赤俄境内各学校全教授电学、机械学……等，但是，一则在资产阶级科学组织下，为资产阶级用；一则在无产阶级科学组织下而为无产阶级用，分部的材料可以相同，但在各个不同的组织内其性质效用便变了。同样，国家、政治、风俗、法律、道德等有阶级的特性；同样，社会科学也有阶级的特性，

有产阶级的社会科学与无产阶级的绝对不同，因之，两方的社会学也截然各异。

无产阶级的社会学（即唯物史观论）重要特质有些什么？我们且在下边分头来说。

二、马克思主义是先找原因（Marche译法文为Cause）的而不图空说目的的，他是属于原因论(Kausalität)而不属于目的论(Teleologie)

举凡自然中一切现象，无论他如何深隐的，都有被纳诸法则(Rageluäsrigkeit) 中的可能性，在自然中，夜随诸日，日复随诸。花四时过了，又复四时。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物体遇热则涨，遇冷则缩。在社会中，资本制度发展了，无产阶级必集中，劳动阶级也必发展。假如小规模生产与大规模生产相遇，前者将为后者所吞灭。在资本制度下，无政府状态的生产必闹出生产过剩的恐慌。纸币发多了，国币必低落。诸如此类的例，举不胜举。这些是说一切现象都有法则可随的，但我们于此即刻要问：这是哪一种“法则”呢？有的人说，宇宙现象均各有其目的，造屋者必先有屋的图形，制机械者必先有机械的图样，鱼的形状如舟，为的是要在水里生活，鸟类骨枝轻，为的要飞翔于空中，人类谋改革社会，不是也有目的吗？全部历史的发展不是为着社会安宁吗？总一句，一切都为“目的”而进行、而终结，没有目的即没有现象。这种见解名为“目的论”，这是解释现象法则的一种说法。别一种说法，却以为凡事当先求其原因，没有现象无原因的，人没有找到他的原因时，即不能说已了解了此现象，即如目的论者所谓的“目的”也必有其原因。造屋者与制机械者为什么照那种图形去造？因为适合那时代人的生产，人的需求。鱼、鸟的官体何以

那样？因为他们经过长久时期的环境所压，不能不以此模样为适应。人们何以要谋共产革命？因为在资本制度下无产阶级形成了：一方无产者得不到适当生活；一方近世纪的科学进步，社会生产趋于集中而同时在现制度下又永为无秩序的纷扰和竞争，因之，无产阶级有革命的必须与可能，因之，无产阶级更有利用现存的大规模生产，使之成为社会化，有条理的进行而立共产社会之基。总之，这个见解，是慢问现象的目的(何以为?)，却要先问他的原因（何以？为什么?）的，这就是所谓原因论，马克思主义即立在这个原因论上面。

我们当再进一步去问，为什么原因论胜于目的论？照上边所说，已可知目的论不问原因是失了事物的根据，此外目的论之受批评的还有：第一宇宙间无生机物大抵无目的，目的要由意识而来，无生物乃无意识，何来目的？一块石，一根树的成长有目的吗？风、云、雷、雨的变幻有目的吗？这只有野蛮人或拜物教中人，才敢下肯定的回答。其次我们观察过去的历史，有无数的生物(人类亦在内)种类，因不适应环境已消灭大半，据生物学者言，在古代生物一万种中，只有一二能延长存在于今日，如果照目的论来解说，那些生物岂不是多有愿意死亡的“目的”吗？第三目的论者无论说得如何精妙，结果总走入切近宗教家的上帝式的解释，譬如说我愿意干这件事，这个“愿意”从什么地方来？在目的论则莫能回答；即或能回答，也不过说来说去总在“上帝”“真我”以及其他玄之又玄的圈子内打回旋。在原因论则不然，他必先问我为什么这样愿意？发生“愿意”以前，我与环境生了何种关系？以及其他和此相关的种种疑问。

自然马克思主义者不否认人类对于社会事物的目的，因人类有高等意识（异于其他生物）可以就已往而测将来，可以将事物

现象类比而成法则。但人们的目的只能安设在这法则内，换言之，即要顺应此法则，以求达□□所求，离开这法则，即没有目的的安身处。马克思说：蜘蛛和织布者的手续相仿佛，蜂营巢与泥工造室也大略相□，但是最劣的泥工之所以优异于好蜂者，在于他未成功之前先有目的在头脑中……他不但施行“自然的模型变换”，他在自然中还带及他的目的，他知道这目的，这目的如法规般决定他所作的方式，并且他应当将愿望附属于这目的……(《资本论》第一本，1919年汉堡版百四十页)。此处马克思已很明了的说明人类是异于其他动物在社会历史流行中有意识作用（有目的）而同时又说明这目的要在自然中施行。所谓“在自然中带及他的目的”并“应将愿望附属于这目的”的话，已可令人很明了了。

三、马克思主义是屬于有定论（Determinismus）而不屬于无定论（ndeterminismus），他是立在“历史的必然”(historische Notwendigkerit) 上面而不是依“愿望自由的”(Willensfrei lichkit)

象上边所说，在自然中与社会中的一切现象都有原因法则可寻，但于此有一个疑问，在事实上社会是为人所构，其中现象也都是人的，没有人即没有社会，即没有社会现象，人在社会中你这样干，他那样干，而第三者更别一样干，我渴了取些水来饮，你饿了拿饭来吃，他倦了就应去睡，这些行为岂不是由我们各自的“自由愿望”吗?这个愿望“自由不自由”的问题，在哲学中分为两派，一派以为人的愿望是绝对自由的，这派叫做无定论。别一派以为不能独立有条件所限的，不自由的，这派名为有定论。此两派谁是合理呢？我们说过社会的现象是有法则的，我们也说过

社会的现象是人为的，由这两个前提所得的结论当然是人为的社会现象必有法则，换句话说人的愿望必从属于一些东西，不是自由的，是服从于一定的法则之下的，假如不是这样，假如说人之所为是绝对自由，则两个前提必有一个站不住，不是社会现象将没有法则，即是社会现象不是人为的，社会现象是人所为而又有法则，则人的愿望便不能绝对自由而必有所从属了。再来，我们知道宇宙的一切，都可以问一句“为什么”？如今若是说人的愿望是自由的，无从属的，则即是说无原因，那便走入“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去了。而且拿上面饮水、吃饭、睡觉的例子来说不能以这些行为无所从属。我为甚要饮水？这因为我□□太多，或因为我跑多了路，身体上的水分缺乏，喉间的神经受了脑神经系的命令，向外要求添加水分。你为甚要吃饭？因为你的身体上细胞需求滋养料。他为甚要睡觉？因为他的血管筋肉等与外界相应的能力限度弱了。这些生理上种种变化又从属于各个境地各人秉赋之不同而异。如此不断的追求原因，是有定论者的事。马克思主义即以此有定论为基。马克思根据这个找出历史的必然律。他说到在自然中的简单事物已有原因可寻，有法则可依，即约□□□的人类意识作用也有原因，也有法则，更进而到人类社会的共同现象也不能逃出法则之外，统括宇宙一切都在历史必然律的范围内，人对于这种必然论常疑他为宿命论。其实二者是恰恰相反的，历史的必然律看物是动的，是历史的、永久变的。宿命论是以物为一成不变的。历史必然论是求原因的；宿命论是不问原因的。历史必然论下的法则，要依照历史的进行而变换。在太古时天然物产，稍加工作，即可充分的供人类的需求，“凿井而饮”“耕田而食”“鼓腹熙”无所争夺而共享天然这个环境下必然产出古代共产社会。等到这共产社会与自然相应力失了平衡

(CGleichgewicht=fguilibre) 即是说因人类欲望日高而驾驭自然之力未足，致天然物提供不够社会需求，因之社会内部失了平衡而起征掠剥夺(社会之成立的必要条件为：1.是社会与自然界得了平衡，如人类在某时代有某程度的欲望与之相应的驾驭自然生产方法也恰适应；2.是社会内各分子间的平衡，前者名为外界平衡，后者名为内部平衡，二者互相关联，后者常为主动力。关于此问题非此处所能释说)。接着便必然有奴隶制度，有地主与农奴两阶级的对抗，接着便有封建制度，有贵族与平民的对抗，后来手曰手工业站不住了，蒸汽机新式工业应世而出了，便必然有资本家与工钱奴所共存的资本社会，从此根下去，资本式的生产起了恐慌，工钱奴团结起来了；他方面工业集中了，劳资两阶级对抗形势紧张了，因之资本社会的出路必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着必为无产阶级专政，在此无产阶级专政下，科学进步了，生产力提高了，生产方法社会化，人们的脑筋也社会化了，于是阶级消灭了，人类的聪明完全认识了，自然生活必需品如日光、空气之丰富，可以任人取求，工作艺术化了，人可各尽其手脑之能了，在这些条件之下，才必然有共产社会。

马克思与恩格斯常说社会的现象对于人的意识、感觉、愿望是独立的，因为人的意识只能在社会现象法则下求认识，去活动，绝不能用个人的意识去自由改变现象。法兰西的1789年7月，俄罗斯的1917年10月，是历史必然的，不是卢梭、孟德斯鸠、马克思、列宁等可以随便Fantaisie(幻想)的，将这两个大革命招来也不是路易十六、俄沙、克伦斯基等可以倔强的将他屏去。马克思自己更说："个人所用以生产之社会关系——就是生产的社会关系——和生产的物质方法□然有变迁和发达生产力也随着改易，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关系——就是我们所谓之社会，这个社

会的历史发达是一定的程度的……古代社会、封建社会、有产阶级社会都不过是生产复杂关系合成的结果……”。马克思学说的特异点就在能认识那些各个社会关系的变易法则，列宁之所以能指导俄国无产者取得政权，也在于他能认识资本制度下社会关系与其出路。无产阶级社会学的特性即将来共产社会的人们比前此别社会中人的优异处，也在这一点。

总之，在马克思主义的见地上，不论在自然界或在社会中的一切现象，小至于一草一木、吃饭、睡觉，大至于天体运行、社会革命无不在有定的法则中，无不有原因可说的。人类意识界中的现象，如思想、感触、举动等比其他在自然界中的生物为复杂，当然有些为现人所不可解之处。比方人常说同一个时代同一个环境所生出的人的不同的思想等等，其实思想不过是人类脑神经系中与外物相触而起的变化作用，和化学瓶内的化学作用，只有繁简之别。我们如果有法正如试验化学般将某时代某环境下抱不同思想的个人，不差毫厘的去考察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能得出明白的原因，其对于这些有不能说明者，则是社会科学尚未进步到此相当程度的缘故，这和自然科学不敢说全知自然界的现象，同为无足怪的事，我们不能以尚有未经科学解释之事物斥科学为无用，同样，也不能以人目为一二例外事物而疑到普遍历史的必然法则。

四、观察社会的方法（即唯物史论的辩证法）

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宇宙间一切现象从纵的看是动的，是永久变换的；从横的看是一切现象有不可离的互相共同关联。因此对于社会须依以下三个法则去观察。

第一，要研究每个社会的本质并他的模样(实际的本质)。

资产阶级的学者，常极呆板的去谈历史，常把各时代不相同的事实更相比附，常以古代罗马奴隶的革命与今天的无产阶级革命混为一谈。马克思社会学则不然，他教人众先要认清各个时代所发生的现象不同，他教人不当将古代的奴隶和今天的无产阶级相混，不当不知道希腊的奴隶主与今日的工厂主大有歧别。奴隶制度是他本身的东西，他有他的特别法则，特别的进行。封建制度是别一种东西，资本制度又是别一种东西。据此以推将来的共产社会是将来的特异品类，共产社会的过渡期，无产阶级专政时代又是一个品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最重要的使命是“发现资本社会的动的法则”。他是以在资本社会中果然找出了必然法则，认识了小生产为大生产不可免的吸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利害之冲突，资本制度下生产之纷乱无次，因而劳动者革命、而劳动阶级专政，而达到共产社会。

第二，要研求每个社会的活动和他们的内部变化（实际的运动）。

从一个社会到别一个社会不是象最初是圆的，以后突然换出了一个方的来，必然要在那圆社会中有不断的运动为后来方社会预备下充足条件，然后方社会才能经过突变而成立。不是开始成立了资本制度，便自始至终停留不变，以后突然来了一个社会制度。我们知道资本制度到现在已过了好些个时代了：由手工业的资本制度而新式工业的资本制度，而带帝国主义的最后资本制度……每个社会组织里面，无一时一刻没有变动，在平时为“潜变”即里面分子的多可〔少〕疏密的变，即“量”的变，即在平衡状态，即人目为社会平静（其实是永变的）时代。在急变时代为“突变”即里面分子相排到剧烈时而为“质”的变，即失了平衡状态，即人目为社会纷扰或革命时代。

第三，要把每个社会的发生与他的必要的经过，他和别一个社会的共同关联取来考察(实际的共同关联)。

没得一个社会从天而下，没得一个社会不是为前一个社会的必要的结果。一个社会模样消灭，别一个开始了，这一个流入于别一个，其中界限，人每不能将他分清，因历史是动的、流荡的、不停止变换的。要认真懂得社会的模样，必要追随他的根苗于已往，研究他的发生原因与成立条件，并他的发展与倾落的运动力。资本制度已出自封建社会，由商场发达、生产变更而进行，资本制度更于其发展中成为生产之阻碍而走向无产阶级专政而到共产社会。

人看了以上种种，或以为一切现象已在历史必然的法则范围内，则与主张无产阶级革命，以及共产党人利用种种阶级争斗方略大有冲突。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上面已经说过社会是为人所集合起来与自然相应的平衡结局，而社会的现象，□彰又以多属于人为主，人的意识怎么不能活动？某个社会中的某阶级的人，在某种条件下，干某种举动，发表某种思想同样是必然的。比方古代奴隶革地主的命是必然有的事，同样封建制度下的中产阶级即现在的有产阶级革命，资本制度下的无产阶级革命，同为历史的必然。他们的一切努力，一切争斗也是历史的必然。但改变社会是阶级势力的事，而不是一二学者所能煽动的，并且所有革命都是被压制阶级的使命。革封建主的命者必然为当日的中产阶级，即今日的资产阶级；革资产阶级的命者，必为无产阶级共产党人，在历史必然法则中认识了资本制度的出路，必为无产阶级革命，更认识了这个革命的责任，除了无产阶级本身担任外，没有旁人可以代庖（少数资产阶级中人来帮忙的，他们的思想、行动已为无产化，或将要无产化了)，在这必然的形势下，主张被

压制阶级推翻压制阶级，正和吃饭、饮水的必然一样，还有什么可疑？

九月二十一日

《共产主义研究会通信集》第七号，1923年

帝国主义底解剖

朴　　生

自十九世纪末到现在，中国人所受的一切痛苦和耻辱，莫非帝国主义之赐。中国人此时若果还不懂得帝国主义，已经不是一种很轻微的疏忽了；中国人此时若果还不愿意懂得甚至想抹煞帝国主义这个事实，那就万分不应该了！

不愿意懂得帝国主义的人自然要进一步抹煞帝国主义这个事实，故意误解或故意曲解都是抹煞的绝妙形式。

基督教徒李钫祥说："资本主义是给帝国主义打败了，不能自立了，要听帝国主义的指挥了。"这是不懂得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之关系的。克来蒙梭之徒曾琦（曾琦诗有"克来蒙梭是吾师"之句）说："今世界亦但有英吉利资本帝国，美利坚资本帝国、法兰西资本帝国、日本资本帝国而已"。这是把帝国主义当着资本主义国家中之强大者解释的。有产阶级左翼政党中社会民主党人奋我以为孙中山之"考试成立"便是"恢复帝国主义的主张"，要"反对帝国主义者……起来……反对他。"这是把帝国主义当作专制的封建制度看待的。总而言之，他们都不懂得帝国主义是什么，他们之误解曲解，都是有意抹煞帝国主义这个事实。

帝国主义这个名词并不创自列宁。二十年前英国改良派经济学家霍布逊 Hobson 已经著书论帝国主义。不过有了列宁，帝国

主义才有了极正确的解释。我们且看列宁怎样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时期的变态，此时造成了独占与财政资本的统制，资本的输出占一种最重要的位置，国际的大托拉斯宰割世界已开始，各资本主义国家宰割世界已经告终。"看了列宁这个定义，就知道我们之所谓帝国主义与只顾主观不顾事实的人之所谓帝国主义，完全不是一个东西。我现在且从以下三方面去分析帝国主义。

第一，帝国主义的由来。我们都知道资本主义有一种特性：一方面是无政府的生产；一方面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就是立在这种特性上而生存而发展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又有一种倾向：一方面是使生产集中；一方面变自由竞争为独占。这种倾向进行到了一种最高点，资本主义遂一变而为帝国主义。我们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去说明帝国主义的由来。

A. 独占 Se monopol 底发生。资本主义在自由竞争的原则上发展，资本家彼此间自然常在一种剧烈竞争中过活，这其间大资本家自然常是竞争中的胜利者，小资本家要不甘愿灭亡，只有投降作为大资本家的附庸。大资本家为要容纳这些附庸自不能不有一种相当形式，于是合营公司 Socété par action 便应运而生。大资本家借此吞并小资本家，资本集中比从前更要快，小资本家陆续为大资本家所吞并。合营公司之间又起了竞争，于是由合营公司更进一步组织加特尔 Cartelle 与托拉斯 Trust，它不仅使同性质的企业集中起来，并且使各种不同的企业联合或化合在一个独裁制的产业组织之中。这种萌芽见端于一八六〇——七〇年，经过了一九〇〇——一九〇三年底恐慌乃完全显露。自此以后资本主义对内的自由竞争告终，世界市场的自由竞争开始，帝国主义就是这样发生的。

B. 财政资本 Capital financier 底形成。独占底发生就是帝国主义底由来，然而我们若果不懂得财政资本底形成，我们对于这种由来还不能充分了解。二十世纪底开始旧的资本主义就渐渐为新的资本主义所代替；工业资本家就渐渐向银行资本家低头，财政资本就是从近代银行底新作用中产生出来的。向来银行资本底作用不过是作支付的媒介，变消极资本为积极资本而已，但是到了现在，它发展成一种可惊的形式。因为交通便利使它所吸收底数目一天一天的扩大，它能够投置很大的资本到各项工业中去。至此，工业渐渐成为银行附庸底，一国的工业通通以财政资本的吸引联合或化合在加特儿与托拉斯底组织之下，财政资本遂成为一切经济生命的主人。国家的机关——政府变成了银行家首领底经理人。银行家首领可以使用这种工具把他的势力扩张到全世界去。帝国主义统制世界其实就是财政资本统制世界罢了。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底必然结果；必然的母亲就是如此。

第二，帝国主义的特性。懂得帝国主义的由来，再去研究它的特性应该是一个很容易的问题。兹把它的特性约为以下两点去说明。

A. 移殖资本。旧的资本主义时代输出商品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帝国主义时代输出的重要问题却是资本。产业底跛形的发展与下层阶级生活底困难是资本制度下的必然现象，亦是这种制度所以生存底柱石。倘若"先进文明"国的资本阶级能把剩余资本用在发展已荒废底农业上面，它可以使产业的发展平均，它可以增高下层阶级底生活，它不复有剩余资本的问题。——但是，如此就没有资本主义了。资本家的资本不是拿来增高下层阶级底生活的，而是拿来辗转生利的；为增高他们的利息只有移殖资本到外

国去——到工业未发达的外国去，那里缺乏资本所以利息高；那里的土地贱，劳力贱，所以原料也贱；重要的铁路在那里造成了，工商业的中心造成了，财政资本成了那里的统制权力，那里的统治阶级就是财政资本底买办。“文明国底资本阶级不但输出财政资本去开发这些野蛮”国的工业，他并且以公债的形式投资于弱小国家底政府。于是一部分强大国家成了一部分弱小国家底债主，弱小国家的政治、经济权完全操纵在这些帝国主义者之手。

B. 瓜分世界。帝国主义者既然一方面要移殖资本，同时又要争夺富源。结果，殖民地的夺取与势力范围的扩张，其目的就是不仅是争夺市场的问题，而更有其新的作用与意义。而且帝国主义时代夺取殖民地底形式与资本主义时代不同。当十九世纪末，亚洲和非洲还没有完全成为各强国的殖民地，此时各强国夺取殖民地完全是取的自由竞争的形式。到了二十世纪底开始，世界上的殖民地以自由竞争形式一一归于各强国的掌握。不独新兴的美洲，它不能再向亚洲、非洲得到殖民地，就是殖民地最多之国与殖民地较少之国彼此间亦现出不平之气。于是夺取殖民地的问题乃成为瓜分世界的问题；国际的大托拉斯瓜分世界乃从此开始。而最强大的托拉斯又每每要变瓜分的形式为独占的形式，结果只有诉之战争。

帝国主义底特性已如上述（凡是在资本主义底范围内可以解释的，这里当然都不涉及），它真是一只老虎呵！没有不侵略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正如没有不吃人的老虎！

第三，帝国主义底末路。列宁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底最后一幕。马克思早就断定了资本主义是必然要灭亡的，那吗，帝国主义不过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罢了。我们且从它的冲突点去观察它的末路。

A. 代议制破产与无产阶级革命。帝国主义时的托拉斯与银行家首领，以资本万能主义垄断了一国政权，无产阶级从议会争斗中认识了代议制不能调和阶级利益而只是资本阶级的工具。议会争斗既然无望，所以只有采用新的武器——直接行动武装革命。帝国主义就是这样去教训无产阶级走上革命底前线的。

B. 帝国主义战争。帝国主义者彼此间因移殖资本、瓜分世界的问题，常常在一种剧烈竞争中。帝国主义之有战争，正如天空中之有风雨，这种战争底爆发常常使无产阶级革命成为立刻实行的问题：因为不如此，无产阶级就要供他们的牺牲。这种战争的结果，又不但常常把一部分帝国主义者弄弱，并把帝国主义一般的形势弄弱，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即随之扩张挺进。

C. 民族独立运动。帝国主义者压迫弱小民族，无廉耻的掠夺亿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榨取巨大的利益。然而因为这样，这些弱小国家底工商业都得到相当的发展，无产阶级形成了，且有民族觉悟底智识阶级形成了，民族独立运动乃成为这种压迫政策底必然结果。这种运动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有重大意义，因为如此可以变帝国主义生存底保障为无产阶级革命底保障。他们的联合是必须的，而且是一定的。

以上这些冲突点没有一点不是帝国主义的致命伤，帝国主义真是资本主义底最后一幕呵！

被压迫的中国人呵！我们懂得了帝国主义这个事实，当不会再看不清楚我们的仇人了。帝国主义以东方尤其是中国为它的生存基础，帝国主义一天存在，我们是一天不得解放的。我们从此再不要只反对军阀不反对帝国主义了，因为军阀不过是帝国主义底走狗，我们不能单反对走狗而放松了指挥走狗的人。反对帝国主义只有与帝国主义死敌结成联合战线，而帝国主义的死敌便是

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众，尤其是共产革命胜利后的苏俄。中国人只有如此才可以推翻帝国主义而得到解放。

我且引二十年前英国改良派经济学家霍布逊的话来作这篇文章底结束：

> 他们（指帝国主义）想把这种奴隶制度施行到中国去，使中国屈服于欧洲银行团支配之下，这种银行团由他们的官僚工商业买办特别组织起来掠夺世界最大的富源而以之供给欧洲。我们很难于预料到将来的事，然而西欧的帝国主义者已经往这个方向走，倘若他们不遇着别的相反的势力，倘若他们没有转弯，他们是一定要完成这种工作的。

《赤光》第二十五期，1925 年 2 月 15 日

十 月 革 命

伍　豪

十月革命的使命

在过去历史中，革命的事件本屡见不一，最大的如法兰西革命，美利坚独立，也颇能震动一时，各有其历史上的相当价值，但一持与俄国十月革命相较，则广狭远暂的不同，又不难立见。前二者革命的范围只限于谋各个民族的有产阶级的利益，而后者便转向全世界无产阶级身上来了。有产阶级的革命，他对内要推倒封建制度或君主独裁政治而建立民主主义的代议政治，垄断资本，运用工业革命后的科学能力来图私利，对外和侵略的政策，以维持其本阶级在国际间的优越地位。如此情形，支持了一百多年，现已算入到他的崩溃期了，过去四年多的大战，近四年的世界破烂情形，便是他的实证，恰巧在这期中，俄罗斯的无产阶级革命便应时而起，这个革命所负的使命整个与民主革命相反，在历史上只有一八七一年巴里共治团* 能取来与他相比。只是巴里共治团不过是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的一朵昙花，稍现即灭，而俄国十月革命确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奠定了革命始基了。再，十月革命之所以能与旧日革命相异的，乃因其立足之点在于全般的社会

---

* 原件注：十月革命乃指俄旧历十月二十五日说，是日在西历便为十一月七日。

* 即巴黎公社

革命，而非仅限于一国一种一阶级的革命。无产阶级革命起首，本含有阶级争斗重大意义，且因其发动于一种民族，故国力的运用，也正不可缺少，但他的革命进程，却决不以此自封，且不得以自封。共产社会完全实现时，人人都是无产者，还有什么阶级界限可说？世界革命完成时，全世界的无产者都联合起来，他们还要什么国和政府？这样子一个革命，经济和政治革命实做了全社会革命的先锋两翼，除掉无产阶级外，谁能担当起来？俄罗斯十月革命实在是负有重大使命，不过他才做得世界革命的起首罢了！季诺维埃甫 (Zinoviev) 说得好："在俄国并不是一个共和问题，只是一个革命问题。""俄罗斯革命的不朽之功事实上在他为世界革命的起首啊！"

革命的原因与其成功之道

一个革命的爆发，其内幕总要含有生产状况变动和阶级争斗的重大意义在内：这本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革命学说所尝诏示我们的。俄国十月革命之先有三月革命*，此两个革命的来源甚远，从产业观点上看来，十九世纪的农奴制和其后的地主制，与工业发达后的生产力变化和外资竞入全与有极大关系。其在阶级观点上，则俄国历来的政权都只是操于俄皇和贵族高僧之手，中等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除掉依附权贵，阿其所好外，很少能崛起自组成一雄厚的有产阶级以与俄皇贵族对抗的。农民虽是占全俄人民的最大多数，但他们因产业情势和大地主的压迫终不能有什么组织，不过他们反抗地主的心却总是热烈的。至劳动阶级则自工业盛兴以来，他们的组织和活动能力，的确是日见进步，外方或

---

* 即二月革命，此处作者系按公历计，下同。

加以俄皇专制的压力与他们以种种练习反抗的机会，他们的战斗力遂益加伟大，终成为俄国各阶级中的最强阶级了。此两点既明，我们再归论到革命近因，则俄皇穷兵黩武，劳民伤财，三年大战实与以直接影响，俄皇室的亲德嫌疑，在民族间的憎恶性上又适足以增其助力，三月革命本此遂抢得民主革命的一时胜利。惟是另一方考之实际，当俄皇尚未宣告退位之时，彼得格勒实已有劳兵苏维埃的兴起，继之者为莫斯科苏维埃。三月革命告成后，各地苏维埃蠭起，于四月中旬便开成全俄苏维埃会议，自是革命临时政府的举动乃常为苏维埃的向背所转移了。五月初 Cronstadt 苏维埃宣言承认临时政府，克伦斯基(Kerensky)遂据之入阁而为陆长。其后，Ekatemiburg 苏维埃□□□开始反对战争，农民会议赞助苏维埃，Cronstadt 苏维埃亦继起不服从临时政府，民主革命的根基乃见动摇。至七月，彼得格勒的工兵先后声言“政权归苏维埃”，形势更见紧迫，克伦斯基显出他的反革命本领捕获些多数派的首领，镇压一时空气，更改组了内阁，他改坐在第一把交椅之上。但这种情势终是不稳的，接着便是莫斯科工人为反抗民治会议而罢工，九月中彼得格勒苏维埃更接收了多数派抢夺政权的动议，黑海舰队继着有同样的主张，至十月北方劳兵苏维埃和莫斯科苏维埃又相继响应，最后乃由彼得格勒兵工发动，于是政权终归苏维埃了。

这种劳动阶级组织和活动的发展情势，与农民兵士赞助之功，在三月革命至十月革命中间我们既已找出如许痕迹，唯其成功之因，尚不止此，尚有更远的肇端可说。在一九〇五年的俄国革命中盛称的赤星期日，便是俄都造船工人的血染成的，同时接着起的各地骚扰，造船所的破坏，彼得格勒等城和波兰诸市的兵工血战，Baku 煤油矿工的大规模同盟罢工，十月底八十万铁路邮电

工人的大罢工，十月立宪令发布后的普选运动，殆没有一事不是劳动阶级为之主的。且苏维埃的制度，也是□时创生的，兵工联立的情势也由那次黑海舰队的变动而立其始基。彼时革命骚扰，差不多延长到一年之久，事虽未成，但其与人心上的刺激和旧势力的打击，已给一九一七年的革命暗伏下不少助力了，其中自更以无产阶级所得之教训为最大。总这十三年前后三番革命的因果关系来看，我们当知俄国革命中含的阶级争斗意义至为明显了。且每次革命都是劳动阶级为其中的主动力，农兵从旁赞助，而中等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既无真实力量又无团结训练，以致立宪运动民主革命均无建树，国力政权终落到无产阶级手里，使十月革命独著其功勋了。

十月革命与马克思学说

当十月革命成功后，世人尝说共产革命不先出现于工业发达的英美，而首见于俄国，乃是马克思学说上所未曾料到的事；但这是只见其一未见其二的话，也可说人还未懂得将马克思唯物史观和阶级争斗两说打成一片来看。一般工业发达的国家，他的资本制度已不能再与生产力适合，崩坏之期本已很近，但是他国中一般有自觉性有组织力的有产阶级却不甘束手待毙，他必要千方百计来救济这个恐慌，过得一时算一时。他方，无产阶级在这决战期中，困于种种情势，一时也还未能取胜，然而这决不是无胜之可望，只是暂时的相持不下。俄罗斯虽是个工业后进国，唯他生产状况的变动已不复能与君主独裁，地主专横的制度相适合，于是乃必然地需要一个革命。恰巧应这革命而起的阶级，只有劳动者是富有阶级争斗性，较有训练的战士，他们眼看着这资本战争的惨祸，从恐惧的自觉中，乃终能一跃而握住了政权，造成无产阶

级专政的局面，超过了欧美先进国中兄弟们向来成就的纪录。但这样，不过仅是一个革命的起首。我们当知工业发达之国共产革命虽难革命之期实短，半开化之国则革命易而革命期长，换句话解说，便是：共产社会的真实完成总是要先见于工业发达之国的。但这话却不是说工业后进国必须等到资本主义将国内实业发展够了的时候才去革命，我们一方也当知道在共产革命期中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资本来发展实业，其成效当超过有产阶级竞争的资本主义万万，后进的许能赛过先进的早成为工业极发达之国，且一方也不当忽视易于革命和无产阶级易于握得政权的时机，因此才更易促成全世界资本制度的崩坏，全世界革命的实现。俄罗斯现在已是这样地一个领路者了，工业后进之国焉得不从而效法？又焉得不看清马克思学说的真实价值？

十月革命中的一个忠实的指导者

十月革命成功之因已如前述了，但我们还当追想下俄国三次革命既都是劳动阶级为其中的主动力，为什么偏等到十月革命才成功呢？这不难回答，并且是很简单的回答：这是因为有了多数派——共产党——在其中做了忠实的指导，唯一的指导。俄罗斯的劳动阶级中也实只有共产党称得起他的忠党，这不独俄国为然，各国的劳动阶级中也无不皆然。当着一九〇五年的俄国革命，立宪党人也多是运动中的参与者，但等到俄皇“十月敕令”下了之后，他们便都弃了劳动阶级，眼巴巴等着次年的国民议会召集了。一九一七年的三月革命成了功后，社会民主党和少数派又复卖尽劳动阶级，大踏步地走入联合内阁，讲起民主共和来了。剩下来的只有多数派，他始终是百折不挠，以无产阶级的利益为他自己的利益，一九〇五年，他的党员也多参加在运动中，托洛

斯基且做了一时的劳兵会长，惜因人少势弱，终归失败。他们饱受了这种经验，加以十余年亡命国外时的奔走，三月革命一来，他们便极力注意到劳动阶级的指导和苏维埃制度的运用上头。革命初起时，各地苏维埃内部政党派分子还很复杂，四月中列宁初归，便向社会民主党提出革命中无产阶级的任务，以清党略。自此后，各地苏维埃的会议中，遂渐渐增加了多数派从中指导的分子，最显著的倒是七月一日彼得格勒工人示威运动中所发出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口号，那确为多数派最得胜利的指导。这个口号且立时传遍了全俄，克伦斯基着了忙，竟诬多数派为德探机关，迫走了列宁，捕获了托洛斯基及其他党员。但这种压迫，终无效果。九月十七托洛斯基出狱，次日彼得格勒苏维埃便接收了多数派“抢夺政权”的动议，因是执行委员会辞了职，再选举，多数派变成多数，他更开始宣布“抢夺政权的时候已经来到。”接着，列宁、季诺维埃夫被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赴民治会议的代表，要求政权归诸苏维埃。十月俄都市政选举，多数派又获多数，托洛斯基做了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会长。从此，革命的酝酿日熟，各地苏维埃的响应也均以多数派之动议是从，最后红旗一挥，无产阶级专政之局开始，多数派忠实指导的功勋乃得大白于世，十月革命遂得在历史上建了不朽之功了。

《少年》第五期，1922 年 12 月 1 日

俄罗斯革命的教训

F

十月革命与世界革命

我们很相信季诺维埃夫所说的俄罗斯革命乃是世界革命的起首。要证明此言真实，我们只须要拿过去的历史和今后的趋势来看。十月革命过去的历史所给与吾人的教训，不仅在他与一八七一年巴里共治团革命有成人婴儿之别，要紧的是他的坚强的革命实力乃筑在阶级争斗严格意义之上的。在一九一七年三月革命中，我们知道，指导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多数党不是不予革命以援助的，但他们最大的努力还是向下，还是极力去做苏维埃的活动。克伦斯基政府他们不来参加，共和政体的决定他们不予以是字，他们唯一的口号只是“所有权力归苏维埃。”时机是不可失的，推倒“沙”终胜于在专制政□下讨生活，这个他们□深深知道，但他们决不肯以推倒“沙”实现民主政治为满足，他们知道民主政治是与无产阶级无利的，是仍然要增加国际纠纷延长资本主义寿命的，于是他们还是继续为革命努力。结果俄国各大城的苏维埃先后成立，多数接收了他们的口号。农兵的苏维埃也齐愿加入革命援助，七月暴动一试未成，十月再试，遂终于开了无产阶级专政之局，民主政治遂不复再见于俄罗斯。革命成功后，苏维埃俄罗斯所努力的事业更无一件不是为世界革命披荆斩棘的。大工业、银

行国有，土地与农民耕种，废遗产制，这是绝资本主义大地主制孽息的活路。破坏旧日军事组织与信条，编制农工阶级的赤军，行红色恐怖，内制反革命派，外御资本国家的封锁和侵犯，血战三年，方始坚牢了无产阶级的壁垒。对外援助弱小民族独立，鼓吹被压制民族的联合和反抗，指导各国无产阶级团结活动，对内更聚积无产少年施以无产教化，革命精神遂益加普遍。行新经济政策，以舒援世界上唯一的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急迫之气，好使工业落后的状况渐将易了旧观，凡此诸事，皆是在世界政治上经济上开了一个新的局面，而这个新的局面更是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资本主义的掠夺行为永远立于反抗敌对地位的。进言之，这个革命，精神是世界的，不是偏向于一国一种的，是立于阶级争斗意义上而将为全人类的。不是以全人类为欺人的号召而永远为一个治人阶级增助力的。我们本着这个见地来说俄罗斯的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起首，谅谁也不能否认。

俄罗斯革命与各国

十月革命既是世界革命的起首了，但经过五年的奋斗，世界革命依然还是没有多大动静，还是让俄罗斯的无产阶级在那里孤军转战，其中底情我们仔细地研究下，可分两项来说。

第一，我们先看一看一般工业先进国的内部情形。当十月革命方发生后，各国的无产阶级颇思乘机活动，但因战事的压迫，谁也不肯继着俄国为此戎首，时机延缓，终于让美国生力军一队队增加过来，西战场生了变化，德奥革命方始爆发起来，德奥革命开始后，德国斯巴达卡斯团颇能极力从事于无产阶级抢夺政权的指导，但内因社会民主党背叛工人阶级，外因协约国胜利的压迫，英法劳动界的坐观成败，不为响应，终于使最具有十月革命

精神的李卜克内西突、卢森堡遭了惨杀。巴威邦的苏维埃成了昙花一现之局。奥国是看德国行事的，德事既败，其后匈牙利苏维埃遂也独力难支，崩倒在罗马尼亚的侵占和社会民主党人的背叛上头了。从此，德奥遂成为协约国的俎上之肉，战胜的疯狂心理更弥满了协约国的人民心中。意大利虽经过了一时的赤色倾向，但终敌不过反古派的气焰，最近残杀劳工的捣乱派且更握得了政权，要皇帝和国会保证他们的长久地位了。法国劳动界本是充满了不问政治空气的，大战后此风渐革，新的统一总工会已和赤国际工联携手，只是他们缺少政治运动上的适当首领，旧的变节卖党已将他们吓够了，新的还没见出现。最守旧而圆滑的劳动首领要算是在英国了，他们利用工人的组织，工人尚未自觉的好管政治的心理，来图私利，于是工业先进国的英国劳动者转瞬也将来上德国劳动者现在正上着的当了。上月选举，英国劳动党不已经握得了议院的次多数么？劳动奸细马克多那德不已经领袖了全党么？德国的社会民主党，爱勃耳脱总统不是他们未来的目标么？美国的情形更混沌了，资本主义的势力在那里足以雄视全球，失业的工人和罢工的风潮虽可增他们内顾之忧，但东亚、南美商场的抢夺，老朽劳动首领的保守方略，很能够延长他一时的寿命。日本的劳动运动尚在开始，军阀官僚勾结的连锁还系着很紧，一时自难说到革命。总起这各方情形来看，大战所给的复古潮流与压迫影响要算最重。次之，便是无产阶级群众中缺少阶级觉悟和革命精神，一方又被叛卖劳动阶级的社会党人领错了路，致使欧洲经济恐慌到了这种程度，社会革命还是延缓着未能生出。俄国革命的成功，在于有产阶级的冷不提防和领导无产阶级的多数党继续不辍的革命活动。同样的情形在工业先进国中是不易具有，不曾具有的。托洛斯基说欧洲反革命和革命派的争斗只是在“十

月念五”之前，非在“十月念五”之后，此话可谓知言。本着这个见地，列宁于这次共产国际会议中遂说，“我们(指俄国)是在一个普通意义中来学，他们(指各国)必须要在一个十分特殊意义中来学，以求真实地吸起革命工作的组织、建设、方法和实质。”这实是全世界无产阶级所应牢牢记着的一句话啊!

第二，我们再看经济落后各国的情状如何。十月革命起后，环大俄罗斯而居的各小民族，差不多全相继而起来试行苏维埃政治，但中间经过了各反动派的骚扰和煽惑，到现在尚复以苏维埃共和国名的，便多是小资产阶级势力不甚雄厚赤色恐怖力所能及的区域了。芬兰和波罗的海诸州，因民族的差异，工业交通较为发达，工商阶级的反革命力渐知团结，所以他们的局势遂多变迁。此外各种被压迫的民族当欧战过后，只知震动于“民族自决”的虚声，而不悟国际间资本主义的政治作用，于是波兰独立乃做了法国的傀儡，中欧小协约国一方欺凌奥国，一方更须仰赖协约国的经济做他们耀武之资，为争一片地不惜用兵多时，数年不决，而国内的经济恐慌却无法能求解脱，做了英国傀儡的希腊现状正是如此，几十万的败兵和商人现都没了生路。其中较为奋发的要算是土耳其的国民党人，多年的战斗最后他们有赖于俄国的指导，算是将胜势确定。但劳赛恩(Lausanne)会议开了，英法意本将携手来宰割近东，忽美国因米索不达美亚煤油矿问题又欲联法以制英。巴尔干诸国因对土而联络。土耳其在这种连横合纵的情势下，能不能脱其操纵，这须看他的革命精神如何为定。换一句话说，便是能不能从民族主义见地上改入社会主义来冲断一切。日诺亚、海牙两次会议中的俄罗斯，华盛顿会议中的中国，孰得孰失，须由他自择了。总起来说，弱小民族不图独立，不图自存则已，否则唯一的榜样和助手只是俄国。时机是不可忽的，革命是

不可止的，变化是不可忘的，知此乃能言世界革命。

俄国革命与中国

我们知道人类历史是不重复的，各国情形是不尽相同的，俄国革命所能给与中国人的教训，并不是取他的历史重来排演，乃是要从他走过的痕迹中找出胜败之道，好让我们有所去取。

在俄国三月革命以前，君主独裁政治的权力足以笼罩一切，国会虽有若无。工业固已渐渐振兴，但多一半资本家势力尚不雄厚，且因君主的索取与役使，一时也难得有余力来图团结，另一方外资输入又占其半，这也是单薄国内资本势力的一个关键。俄国又是农业国，农业难得有象工业国中的组织，大地主因榨压农民，更不得不倚靠皇家军队皇家法律来巩固他们的地位，于是他们更成了皇室的忠仆而不暇自觉，但是生产力发展了，旧经济组织不能应其所需，一个新的变化必将产出。在这变化酝酿期中，再加以政治黑暗，官僚贪婪，人民不得自由，学问家少发展机会，生产机关多用作军械制造，种种激动，一个革命的大团结遂乃伴着生产变化成为不解之势。普通的下层阶级是这种团结的同情者，真实的活动分子还多是智识界中人和一部分有自觉性的劳动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中人。他们运动的目标是立宪运动，一九一五年和一九一七年三月两次革命都是应此目标而生，不过程度的深浅略有不同罢了。

同样的情形我们拿到中国来证，颇有些相类似处，只是辛亥革命我们不能认他为类于俄国的三月革命。俄国的三月革命虽也曾存留了一些旧皇室的军力，经旧朝贵族来组织内阁，但不久克伦斯基当政，终表现出些民主政治的气派。至中国则辛亥革命民主派的势力不伸过长江以北，便与袁世凯苟和，让他挟着北洋正

统来主中国。二次革命失败，北洋铁骑更渡江而南，直逼湘粤。其后袁死黎继，冯去徐来，民主派始终未能突出湘粤，破北洋派已成之局。及至最近，则南方新军阀又都成势，起与北洋军阀呼应争冲，因是群雄割据，争为雄长的形势在中国遂益发开展起来。这样的情形只能说是军阀政治从旧日君主专制政体中孳乳发长起来，决不能认为民主派共和革命的结果。革命十一年了，民主派所以不能抬头的根本原因有二：一是由于辛亥革命建筑在排满的感情成分上较多，建筑在民主革命的意义上较少。故革命的对象乃多重在满洲驻防军，而忽略了隐于河南的袁世凯所领率的北洋军队。一是由于帝国资本主义的压迫，辛亥革命本含有因生产状况变化须急图自强的经济上重大意义在内，唯正因如此，所以列强才不容此销费的大商场生产独立起来。捉住了这两个关键，我们当易懂得同样的事实表现，在俄国三月革命造出那样的果，在中国竟尔如此，都因为此事实中具有的条件不尽相同啊!

贪婪是可恨了，但因为袁世凯利用他来拢络官吏、政客和武人，军阀都传了他的衣钵，列强更借此而来勾结卖国贼，于是人民遂受了万重的剥夺。自由算是民主国民应得的东西了，但一般有智识的人竟在袁世凯治下要自由，遂要了一部治安警察法出来。捧着上边压有两重压力——军阀和列强——的国会造宪法，结果只有弄到解散，不则便是白纸，留供他日军阀挟以争雄之资。在军阀治下讲联省自治，结果是赵恒惕，唐继尧和陈炯明的替身陈席儒做了民选省长，黄、庞遭了害，云南遍种了烟土，广州城抢掠一空。学术不振是可恐惧了，但一般教育家却只想在列强和军阀治下来建立个好政府，结果王宠惠组了阁，好政府"算是凑一色"（胡适之评王内阁语）了，财政教育的椅子全被好人占了，但终不免罗文干的被捕，国内八校依然无钱发薪。发展实业是必须了，但

一般军阀刮钱来办实业，大小资本家勾结外援来办实业，则结果不是工场倒闭使聚到城市中的工人失业，便是工场主权完全落到外人之手。

情况如此，如何可以图苟安，如何能自认为在中国民主革命亦已成功？真正民主派人如相信民主主义可以内倒军阀，外抗列强，则只有努力革命，方能实现。我们——共产主义者——对此革命也自应与以无限努力，不过我们所努力的革命，须要有我们的意义。在某种情况中援助民主革命原是可以的，但我们对他无大希望，且不应忘记俄德两国革命前后的事实。一九零三年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分裂，一九〇五年革命和一九一七年三月革命中多数派的活动，他们立足在何种阶级之上，定念在何种主义之前，其后十月革命，更成功在何种方法之中，我们均须仔细与以考量。且尤其令我们难忘的是德国革命的失败纪录。我们当深知道社会民主党之所以能造成今日的局势，乃因其违背主义，叛卖劳动阶级与斯巴尔达卡斯团发生太晚之故，历史既是不重复了，复辙更不应再蹈，从事革命活动的朋友们，我们终当自慎！

切实说来，在中国现在并不是什么共和民主问题，但是一个革命问题！这个我们须牢牢记在心中。

《少年》第五期，1922 年 12 月 1 日

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

傅　钟

硕夫同志：

我有几句话想同你研究一下。因李枏来信告诉我说，前几天巴黎组开会，申府同志也来参加，他还有段演说。他演说大意是说俄国现在新发生一种□列宁主义。在申府的意思以为马克思主义不尽实行于俄国，因俄国革命，列宁的主张有为马克思所未见到的。推之，将来中国革命也非所谓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可能完全达到。说是马克思主义不尽实行于俄国的话，我殊不理解，故将我的疑点，陈列出来，请你暇中代为解释。

我以为列宁只是马克思主义之奥义底阐明者，马克思主义底实行者，他并不能另外成立一种特立的主义。我们只读列宁名著«L'Etat et la Révolution»一书，其中几乎五分之二系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而加以发挥说明。于此我们便可知道列宁学说之根据来源，他是否可以成立一种特立主义了。

我以为马克思主义系立于纯粹客观上面，本唯物哲学底见地来说明人类经济进化之程序，而归纳出一个革命的原理，此种科学方法，与物理学家之发明公式，殆无稍异。至于如何演算这公式，如何运用这公式，则当就各时各地方实际情形而异。如增减其数字，然虽数字稍有增减，但却始终是立志于求出这公式之最

终结果的。本此推论，我以为列宁在俄国革命的主张亦无非是□□俄国之实际需要而主张，以图求出这公式之最终结果罢了。并非马克思不能见到，纵使当时他能见到，亦必不愿多说：因这只是一民族一地方的革命方略。若要马克思必如此琐碎替人主张出来，则偌大世界，无数地方、无数民族，恐马克思不能胜此累坠麻烦了。所以我以为，他只能负责将这革命公式归纳出来，以后当由我们努力设法求出其结果。

我们再留心考察一下，列宁在俄国革命的一切主张是不是逃出了马克思所指出无产阶级在专政期间那十项标准？便自然知道马克思主义是否“完全”或“不尽”实行于俄国了。

若说一九二一年列宁所实行新经济政策(nouvelle politique économique) 的主张，便是马克思不能见到的吗？但马克思老早就自己说过：“……劳动阶级用他的政权‘渐次’夺取有产阶级的一切资本……当视各国情形定夺”的话。这话的意思，即是告诉我们“应当注重实际”并不是说死板板地只依那十项标准进行。然则俄国新经济政策之主张，马克思虽未曾明白指示，但在他的学理上，仍然有根据，仍然未曾离开他的革命公式。并且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列宁也曾说道：“这不是一个进化，这是一个策略。”(Ce nést pas une évolution, céstune tactique)。因此，我反确证列宁这样能就实际情形，善随机应变的方法，乃正合了马克思要我们应当注重实际的主张了。若因此而说列宁的主张为马克思不能见到，更以为马克思主义不尽实行于俄国，我真彷徨闷索，不解其故了！

至于说“将来中国革命也非所谓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所能完全达到”，这话的后半部，我很承认。因列宁只是本马克思的重要主张，参照俄国情形而运用革命手段，他的主张不能完全适宜

于中国，这是当然的现象，但若说将来中国革命非马克思主义所能完全达到，这便不能不使我疑心起来了！

傅钟　八月二日

硕夫同志：

最近一信，我批评申府同志之演说，实因受了一时间的一点忍不住的冲动，于是顺笔写了出来，未知道当与否，还望你确实指教！但我望你能将我信在《通信集》上发表出来更好，因为如此，或者还可引起同志们的讨论。至于我批评错了申府的话呢？我愿负责，可以同他再辩。硕夫，我觉得申府那番演说，似乎有点背叛共产主义的可疑形迹，所以我那信的最末几句说道："我不能不疑心了！"……等话。这"疑心"二字，你不可忽略看去。自然我这样说话，仿佛是我一点小孩子的态度，但我总觉得这是个"光明"态度！

我今晨接读《工人旬报》，篇篇文章都好，新闻也转载的好！但我总觉得《工人旬报》办糟了！为什么张崧年（即申府）那篇文章都载在完全共产主义的工人的报上发表！或者这是我的智识浅了，不懂崧年那文的意思吗？但我看他那篇文章完全是与胡适们的□□"好人政府"的主张底意思相表里，不然他何以要说"铲除军阀，抵抗帝国主义……"等话为不切实呢？

我自然承认申府是我们的前辈，我们必须以礼貌对之，因他的研究比我们早，我们有平心向他领教之必要。不过我最近看他的言论，未免有点令我们不必看重他了。——他又引些一八七一年巴黎共产自治府的话来说，我简直不懂他那段话的意思！

这封信我是专批评申甫，我认为这个意思颇重要，请你将此

信顺便交把恩来、卓宣们看看，不知他们的意思如何？而且我还要问朴生，为什么张申府那种文章都不加斟酌，竟然让他发表出来！或者朴生别有所解耶？余俟不日来巴面谈。

傅钟　八月六日

附：

傅钟同志：

你批评申府同志那两封信，都给你发表出来了。

列宁主义即是L'eninisme，这是的确有的。列宁底学说，可以成为一个主义。因为我们在列宁著作中从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分析底应用和解说那方面看，可知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底理论家(Théorién du Marxisme)。其次，从他对于历史的现象和阶级争斗底说明那方面看，可知他是一个历史学者（Historien)。最后，我们为研究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底政治，从他的书中，可以得许多重大的证据，所以他又是一个政治家(Politique)。(以上见 Adoratski 底 La dialectique Marxiste dans l'oeuvre de Lenine 那篇文中)。但是我们要注意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范围内的，它的中心点在解说阐发和应用马克思主义，不是离马克思主义而独立的。一句话，马克斯是把共产主义由"空想"方面移到"科学"方面底人，列宁是把共产主义由"科学"方面移到"行动"方面底人。(语本 Dunois 底 Karl Marx-farsdativa du Communisme 一文中）申府同志把列宁主义看成一种与马克思主义不相同的东西，当然不妥。至于申府同志在《工人旬报》廿八期上所发表那篇文章，自然也有很大的错误。他以"打倒军阀，

推翻国际帝国主义”为不切实底话，简直违背了“国际共产”党第四次大会对于东方问题底决议，简直违背了“中国共产党”一年以来所叫出底口号。若果就道理和事实上说“国民政府”必须建筑在“打倒军阀”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两个基础之上。这三个标语根本上是联成一气而不可分的。不过照他那种“在欧洲组织中国国民政府”底计划看去，自然就可以把“国民政府”同那两件东西分开了。你读了他“知政府需用某种人材……，看某人可作某事……”我们就来“造这种人材”，这一些空想的、不落实的、带改良色彩的说话，当然要“疑心”他了。何况他那很酷似“做官主义”底声音，尤予反对者以口实呢？当那文章登出后，C. E. 曾有一种议决，想你已知道，毋庸赘述。朴生的或者亦不必答覆你了。以后有暇，我还可发表点意见。

卓宣　十月十一日

《共产主义研究会通信集》第七号，1923年

赤俄最近之经济状况

允常（谢唯进）

世人对于赤俄之一切施设，始终用一种封锁政策去对付——资本家政府在政治上、商业上去封锁，知识界中人则索性图干净，遇着苏维埃的事件，把眼睛闭着，耳朵塞着，开始骂他是强暴的过激党。最近从眉睫缝儿透进一点消息，见着俄国大闹饥荒，而赤俄政府的使员又往来于日诺、海牙之间，与资本家政府商议条件，便都讥诮赤俄政府之无能，甚至蔑视共产主义不能实施，真好象，欲振兴俄国，非按资本主义的老套儿从头再干不可的样子。我如今不必多费闲辞去为共产主义打先锋的赤俄朋友们辩护，我且借一点现在有名的经济学者瓦伽 Eugine varga 的论证，并还引一点切实的事实来给大家看看。

瓦伽最近著有一篇论文，题为《俄罗斯经济之恶慌》La crise de léconomi russe 最初登在《国际共产党通信》上，后又被转载于本年八月十日巴黎《人道报》上。他先说俄国近来经济上恐慌，有重要的数种原因。第一由于战前俄国境内农业工业上生产机关工具的腐败。“在和平时代，俄国国家的岁出大多数耗在预备军事上头，在农〔业〕上，虽然有肥沃的土地，而没有注意到土壤之讲求，加之农民的愚而无知，因之所出物产比较欧洲各国差少很大。在工业上，也是有同一原由，因俄旧政府欲与欧美列强争

为雄长，遂注全力于军械的制造，本来俄国工业是极幼稚的，这么一来，工业上的生产更不堪想了。”

瓦伽还特别指明说，象这样幼稚的经济是不能和帝国主义战争的雄心相应的，所以在大战中的列强，最先崩倒的是俄国。“读列宁所著的《怎样才能修补危急的灾害?》一书，我们当晓得在克伦斯基治管下的俄国崩坏程度之如何深了。”

第二由于全世界资本家政府的封锁和他的阴谋，暗助反革命党在内捣乱。这些连三接四的战争使得布尔什维克政府，为自卫起见，不能不训养多数军队以御外侮。在这儿尚有重要事实不可忽略的，那是因为各国的封锁，使俄国不能得着国际间分工的利益，因俄国颇需要入口货，封锁政策实使俄国大伤元气。

第三由于“无产阶级专政”连带所及的影响。在说明这个原因时，瓦伽有一段重要的话说：“如果否认这件事实那是不诚实的。凡一种革命，开始时，常生出工作纪律上的怠弛以致减少生产。初创一种无产阶级专政的工作纪律，那是很需时候的，因旧观念尚还存在人心，大多数人民不能即时懂得资本主义利益和全社会利益的分别。因此工作的减少，在无产阶级专政初期，是难免的。”他还指明当时俄国有一班懂得社会利益，能够做群众榜样的工人，又为战事要求着去和白军打仗，生产事业多操在愚昧无知的工人手中，这也是一件重要事实。然而这还仅仅是工业上的说法，还有农业呢，那个原因，便稍为复杂了。

在俄国三千万农人中，个个都是他们田地的管耕人，苏维埃政府，为全部利益上，已把田地一概收归国有。在条件上，本来政府应要用工业出品去偿还农民的出产，这事在开始两年曾实行过。但是后来受经济上的恐慌，使得政府无能为力，似必要全农民自供给麦子了。因此农民除耕种他所需要之外，不甘再多生

产，所需的用品，也由他们用极旧式的手工方法去自制。这么一来，个人的生产和协作的生产起了莫大的冲突，城市与乡村乃断绝了交通。

俄国经济上恐慌的原因，照瓦伽意思，已如以上所述。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和第二两种，因为若在苏维埃政府执政以前，元气不象那样坏，又若在苏维埃政府当权以后，没有万恶资本家政府在俄国外边四面包围，在内鼓动反革命党捣乱，使他不得用全力去建设一切并促进生产，那么第三种困难，是可以免除，至少都可以减至极不关重要的程度；而为共产主义的实行者，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向光明路的朋友们的成绩，必不止如今天一样。然而那些又将成过去的事实了，自年来赤俄政府，变更经济政策以来，俄罗斯的景象，又一大变。那些闭着眼睛，塞着耳朵的先生们还在他走过的遗迹上头，议论他的成败，哪知他老早已驾着新式飞行机前进了几许路程了。但他那变更经济政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瓦伽还约略的告诉了我们。据他说俄国变更经济政策有两个法子：1.用完实物税的方法以鼓励农民耕作，这即是说归还农民的田地，用他生产所得的几分之几纳实物为税（如麦子之类）于国家，余下的归他自己所有。2.按照本国的经济力量，不能不采用自由交易，这是与1项有关系的，因如果没有自由交易，农民所有将无所用。有了这两个法子，便把以上第三种困难全免掉了。

“按这两个法则的解释，修改了些国家的身分。在共产主义作战时，国家经济在原则上要顾到一切人民。一切人民作工为国家，从他的方面，国家也供给人民的需要。”

最后瓦伽对着俄国新经济政策的要点说：“个人的经济被吸收在国家社会经济里头。在新的经济学里，国家生产者站在私人

经济，如同资本制度的对面。他用纳税的方式要求人民工作的生产*一部分。他管买，卖，运转，和经营商务，为使国家完成他的责任，乃有一种新组织，他的效果如下：a. 由立一种以作工多少为比例的工钱制度，可以减少人位增加工作。国家只维持真能生产的劳动者，其他应由自己去另找生活。b. 采用商品和供给品的价格于生产品的价值上。在交易场中，国家的经营如同私人经济一样，自由买卖找寻最高的利息。c. 联合经营者适应他们的经济利益于国家托辣斯上。这个法子，可避免他们方针上的一概官样的桎滞，并使他能够适应交易场中情况的需要。”

以上就是根据瓦伽论文所说的俄国经济恐慌的原委并他的由变更经济政策而改良的方法。如今再来瞧瞧赤俄内部最近的经济实况。

近来有一件最足令人注意的事实，就是在日诺和海牙会议中，协约国用尽种种方略——其中以法国为最蛮悍——想将极苛酷的条件加到俄民身上，并想于无形中取消赤俄政府的实权；而俄国代表始终以极坚决公正的态度拒绝资本家政府以前用强力封锁，攻击所不能得，今乃转用阴柔手腕的野望**，始终保持由劳动者从资本家手中所已夺得的最高特权。虽然共产主义的道德，极足以维持赤俄朋友们在艰苦中的勇气，虽在实事方面，亦足以使苏维埃政府自信其经营之进步，并深知现在是全世界的经济恐慌，其影响于俄国者，还不是十分重要，而协约国方面内部的忧苦却比俄更深。俄国经济实况的改善，除开近来报章遍载本年农产收成极佳外，还有比较详细的材料足以告慰我们的，本年七月二十四日莫斯科国民经济最高会议的地方局开会议时，委员长

---

* 原文如此

** 原文如此

Bcgdanov 报告全俄经济状况，其内容大约如下：

（一）燃料——当 1918 年俄国工业上的燃料已缩至完全需用木材，木材燃料难于运转而且生热（calorigue）极弱。现在这个弱点已将完了，以前专去采伐森林的工夫，现在已变为开采石油和煤炭了。在 1921 年 4 月所取木材达三千二百万斯的（stire），本年四月只用一千三百万斯的。Donetg 地方所出的煤炭在 1921 年开始五个月供给 140,400,000 ponds，1922年同一时期已增至183,100,000 ponds。每月所出平均达 30,000,000 以上，还没有计入其地由农民开来的小矿场的出品。虽然在春期遭遇大饥荒，Bogdanov 计算煤炭出产已达到战前的 42%，在 1921 年仅有 31%，1920 年仅有 27%。足见是逐渐向上的了。在 Bakou 地方的煤炭出品可如下表：

1921	九月	11,600,000	ponds
	十二月	15,200,000	ponds
1922	正月	15,400,000	ponds
	三月	16,100,000	ponds
	五月	16,400,000	ponds

在 Grozny 地方的所出则如下表：

1921	九月	6,000,000
	十二月	6,300,000
1922	正月	7,100,000
	三月	9,700,000
	五月	7,400,000

至于石油的出品，本年第一季已达到战前的43%，当1921年在 Bakou 和 Grotyny 两处地方平均每月出不过19,800,000 ponds，在1922年已是平均每月22,700,000 ponds了（俄国一波特Pond＝中国27斤强）。

（二）金类制造——为调查这一类工业的兴替，即须计其所需炉的多少。我们看下表便知道他更是从低而高的。

1922	正月	11 haut-Fourneaux
		（高炉）
		20 fours Mortin
		（马尔丹蒸烧电）
		43 larninous
		（摇机）
	二月	13 haut-Fourneaux
		24 fours Martin
		52 laminoirs
	三月	16 haut-Fourneaux
		24 fours-martin
		52 laminoirs
	四月	14 haut-fourneaux
		23 fours martin
		49 laminoirs

在这四个月期内的出品与1921年头一季的出品比较，已增加13%的展金品，31%的锉铁，40%的槌〔冶〕金类（Metal Martin）。这类工业的进步，特别是在南方（乌克兰）的工场，

在此处每月的出品超过 146,000 以至 313,000 ponds了。

（三）矿场——在南部工业的进步，可述者尤其是矿业。开铁矿的工作，从 1918 年到 1920 年已经完全停了工；在 1921 年重新开掘，并掘锰矿 (Manganēse)。骸炭矿（coke）的制造已由 1920 年的 4,000,000 ponds 而达到一九二一年的 7,000,000 ponds 了。

（四）其他实业——俄国盐务的改善近已有绝好的成绩，在 1921 年的盐产达到战前 28%；本年则有□前 55%了。其他如电事业，织造事业等亦有惊人之进步。在 1922 年的年头，计算有 1,000 公共电局供给 400,000 Kilowatts(瓦特 watt 为电力单位)。至于织业，只拿棉纱来做例说，从 1921 年 103,000 ponds 的每月出品，本年已增到每月 260,000 ponds 了。

苏维埃的工业有一些时，受农产收成恶劣的影响，颇起恐慌，现在本年的收成已有满足之希望，那么前此资本家报纸的窃议，也可以无劳过虑了，最后Bogdanov 还引一件极显著的事实，足以证明俄国经济状况之渐次复原的：便是俄纸卢布得了平衡的地位，并物价已渐次低落。在本年五月第三个礼拜物价有一次低落后，保持了平衡的态度。及到七月的第一个礼拜，又复从新再跌，在莫斯科的蔬菜价格又减少百分之五，面包和肉减少百分之四，杂物减少百分之二，而同时在市场中用来换十个金卢布的纸币已很觉得他减消，这些都是现时明显的事实。

由以上所引述的种种，可知俄国自苏维埃政府成立以来，劳农政府只有改善经济状况，促进生产的功绩，他并不负使经济崩颓的责任，这个责任是当由前俄皇室和现存万恶资本家政府与一般无聊的反革命党所负的；更可知这共产主义的第一个实验所是能适应环境，从经验中逐渐得着优胜的战略，为全世界无产阶级

开艰险的途径，更指引被掠夺的人们向着光明道上走的。他终有一日使一班闭着眼睛，塞着耳朵的朋友，解除他们的封锁来领略福音，围绕到红旗下来。然而这并不是说，我们，资本家的掠夺者，便可“袖手旁观”希图因人成事，现在赤俄的经济虽然稍为改善，但是世界大部分还被资本制度笼罩着，在这笼罩内生产事业只有倾下，再不能向上发展的，除非各国的无产阶级多多的觉悟，群向资本制度下总攻击，单任赤俄的孤军转战是不成功的，而且这也是极可耻可羞的事！（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三日）

《少年》第二号 1922 年 9 月 1 日

新苏俄联邦与帝国主义

——一九一七至一九二四

锐

一九一七年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把世界帝国主义吓得不寒而栗，至一九一八年他们赶紧结束了战事，缔下奴隶弱小之条约。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一年又忙着封锁俄国，以军事助反革命。一九二二年用软法儿在日诺、海牙两会议席上诱胁苏俄使者。然而，硬的软的都失败了。一九二三年俄国新经济政策成绩大著，合苏俄乌克兰、白俄、乔治亚等国之苏维埃联邦成立了无产阶级祖国的基础乃大见巩固。

各国的帝国主义者至此始着了慌，复因国内经济恐慌紧迫，眼看着这横亘欧亚的一个大好商场，只有与俄重修旧好，或可借以救济本国经济。因此，本年二月一日英政府首先承认苏俄联邦，接着意大利与苏俄定了商约，即最反动最强项终日做囊括莱因左右煤、铁的法兰西也不能不假手小协约向苏俄通殷勤了。我们于此看出：（一）在历史上开新纪元之苏联的基础确已坚牢，他的国际间势力确乎可与世界帝国主义相抗；（二）各帝国主义国内的经济基础确已根本摇动，东奔西撞去找外国尾闾为其缓冲器；（三）在帝国主义者承认苏俄，固为经济上利益，但在苏俄方面，则以国外贸易国内大工业俱在政府掌握中，故能利用外资来发展

国内产业，此于共产主义前进上当有利而无害。

《赤光》第三期，1924 年 3 月 1 日

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

石　夫

有一个很流行的反对论攻击马克思主义，就是人说马克思主义否认道德，因之，站在马克思主义见地的共产党人，主张用武力革命，主张阶级争斗，主张无产阶级专政，遂更被人控告为暴动——为不道德。

有时，纵在觉悟的无产者当中，也不免有未脱尽有产阶级意象学的迷惑而认马克思忽略了道德的。一天我在木兰(melun)参与一个马克思主义夜校，有一位同志拿起一本著名的《共产党宣言》在手中说："这个宣言，我已研究过三四遍，马克思所说的确不错；但内中找不出有研究道德的地方，可惜马克思确实忽略了道德问题"。

哈！若说马克思否认道德，在某点上说是可以的，因马克思是一个革命家，他的革命不是自道德观念出发的。若说马克思忽略了道德问题，这就是大错，我们可以大胆地说：只有马克思第一次真正完全认识了什么是道德！

我们在历史中也可以看见，道德是时常变迁的。若从改造社会的见地上去看，道德是不能够作我们的任何凭借的，因他是精神现象，不是永久常存的自然律。一个社会有一个社会的道德；这个社会的道德移到那个社会去，是不适用的。一时代有一时代

的道德；现在的道德拿到历史的过去是不合事物底实际的；因此他亦无资格可以凝结社会的将来。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在中国从前是至高无上的道德，现在也崩坏了。崇拜祖先和三年之丧，在中国也是至高的道德；然在欧洲因工业发达，将家庭打破，早已没有这回事了。奴隶制，人人都知道，这是不道德的，然在某一时期，生产方法不完备时，所有民族都应采用奴隶制。纵人类最大天才之一的亚里斯多得，在他的时代也不由得不相信："自然特别创造一种人专做奴仆"。男女平等，现在我们知道是道德的；然在中国，这种道德观念依然是少数知识阶级中人底谈论的资料；即在欧美也只盛倡于大战以后；因经过这一次大战，将妇女更从家庭赶出来了。最讲绝对自由的如卢梭，在他的时候，仍不能不承认"女人是供男人娱乐的"。

然则道德究竟以什么为归宿呢？哲学家，宗教家，伦理学家，道德家，谁有这个天才，能创造一种道德底规律，贯通时间和空间，使人类永远有所依归呢？

在马克思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对道德底问题如对一切社会的问题一样，他们总是时时抱着两个重要的认识：

第一个认识就是唯物主义的认识，这就是说道德是以经济为归宿的。经济是所有社会制度底基础。因经济的生产而发生社会的关系，由社会的关系而形成道德的观念，所以人说道德是社会的上部结构（Superstructure），是经济生产底反应；他是紧跟着经济，一在下面，一在上面。由这一世纪到那一世纪，平行的转变，他的经济的基础变迁了，他即不能不跟着变迁，所以在历史上每遇新旧交替的时代，所有旧的道德观念都如雪山上滚雪球一般，一个个地滚下去了，一般道德家眼巴巴地望着莫名其妙，

徒叹“道德沦亡”“人心不古”。

在一般道德家或唯心论者，他们以为感情或正义，平等底绝对的观念可以支配社会的运动，因此他们处处以道德观念出发，以为要改革社会，先改革人——先将人人灌以哲学或道德的教义。他们研究社会问题，不从当时社会问题的真实关系下手，他们从脑子里去挖取公式。

马克思主义者不然，要改革人，只要改革他的社会的环境，将社会的环境改革了，一下子即将人的风俗习惯，道德，感情等都改革了，他们研究社会问题，不研究哲学的公式，他们只研究经济的现象；回溯他们的起源，追究他们的发展，观察他们在家庭和政治的形成中作用，然后即毫不迟疑的抽出结论来。

第二个认识是阶级的认识，所有人类底历史直到现在都是阶级争斗史，因此有史以来的人类社会都是阶级组成的，都是支配阶级和被支配阶级组成的。社会既是直到现在都是支配阶级和被支配阶级组成的；那么，支配某一个时代的道德观念，必然就是这时代底支配阶级底观念，我们若不明白这个见地，而动口说“普遍的道德”，无论是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都时时是拥护支配阶级底统治权而帮助他压迫被支配阶级的。

试举实例来说：“自由”“平等”在现代社会中为一般学者称道不已，几无人敢否认他们不是道德的，其实，所谓自由，即是自由贸易，自由竞争，是对待封建的专有说的，在中世纪末，有产阶级因经营工商业在自由都市中已占得重要地位，当然要起来反抗当时徒拥有爵位的封建的特权阶级，而要求：只要谁有资本，都应该自由营业，不应为任何世袭的优先权或行会（Corporation）所束缚，国家不但不应当阻止，并且应加以奖励或保护，有产阶级卒因此而先从经济上取得重要地位，于今呢？有产阶级仍

可自由竞争，自由掠夺，自由组织强大的托辣斯，自由做化学的和空气的战争，无产阶级呢？他可以自由组织大公司开大工厂么？Non，他可以自由饿死吗？Bien Sûr(当然)！

所谓平等，也是有产阶级向封建时僧侣贵族要求的，凡是有钱的人都应同样的受教育，有才能的人都可以干预政治，不应因门户而有所限制，所以发生“天赋人权”说，有产阶级以此将僧侣贵族的特权打倒，将他们的财产瓜分，将政权握在自己的手里，于今呢？有产阶级将无产阶级的劳力剥夺下来送到市场去卖，无产阶级在社会上可以处处与他享同等的待遇么？无产阶级底儿子可以有幸运入中学大学，或其他专门学校么？这是决莫有的啊！

人人应该劳动，这仿佛是社会上应有的道德，然在现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中，劳动工具都为一阶级所备有，劳动者终日劳动并未为社会增加福利，只是为资本家增加资本，劳动者愈劳动，资本愈堆积，扰起社会的灾害愈大，所以“人人应该劳动”这句话，在现社会中只可成为一个阶级的命令，一阶级的命令语：“你要好好地作工，我才收留你，并且多给你几个工钱，否则立时要你站在工厂门外去！”

“个人的财产应该人人尊重”，这是现代有产阶级社会最重要的道德，可以说所有有产阶级社会的法律都自这一点出发，当劳动者还是直接的生产者时，这就是说当劳动者自己备有生产方法和工具，自己为自己生产时，这种道德观念还可以用的：因为这时侵犯他人底财产，实是侵犯他人应有的生存，于今个人的财产十之九都被资本鲸吞了，而自己也资本化了，大多数人是没有个人的财产可以尊重的，那么所谓尊重个人的财产，即是尊重资本家底资本，资本是掠夺劳动者底血汗和压迫殖民地底凶器，资本膨胀，会扰起经济的危机和战争的危机。

还有“国家的防卫”也是曾经在历史上成一个很重要的道德，国家防卫底道德观念所以成立，本是因邻国屡次侵犯的刺激，某一地方底民族遂能纠合民众底势力以防敌人之侵入虐待或蹂躏，在某时期间，被支配阶级也有相当便利的，于今呢？资本主义发展已将世界的经济关系打成一片，国与国相依为命，不能独存，只因还有有产阶级存在，要维持他的私有财产，他的统治权，仍然要从地球上划分此疆彼界，国际间一切纠纷和危机都由是而起，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牺牲品，资本主义发展成了世界的，无产阶级也跟着成了世界的；法国的无产阶级同德国的，英国的，美国的，以及亚洲的无产阶级，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无所有，卖劳力生活的，无产阶级若仍受掠夺和他的有产阶级底欺骗，为防卫祖国去牺牲，不独增加国际间的危机，直是保护和扩张他的敌人底统治权而增加自己的枷锁。此外，马克思主义对于道德还有一个重要的认识，这个认识是由第二个来的，就是：有史以来的社会是阶级组成的，道德的观念就是因有阶级对抗底事实发生的。若共产主义革命以后，因生产力发达的原故，社会的阶级废了，阶级对抗的情事没有了，而道德的观念也不存在了，这个观念乍说出来，一定大为成见所不许，其实仔细研究起来并不奇怪。

比如再拿上面所举的例子来说，“自由”罢，阶级争抗废除了，即没有压迫束缚等事，换言之即没有不自由的事，没有不自由的事，即没有要求自由的事；没有自由的要求，哪有自由的道德观念呢？“平等”也是如此，没有平等的要求，也即没有平等的道德观念。

再说“人人应该劳动”罢。在分成阶级的社会中，劳动总是一阶级强迫别一阶级的，才有人不愿意劳动，若阶级对抗废除了，劳动艺术化了，无人不劳动，因之劳动也不成为道德底观念了。

他如“个人的财产应该尊重”“国家的防卫”等，在共产主义革命后，不待说，更是没有的。

这种事实并且在人类社会上已经找到了例证，有一位英国律师梅纳(maine)曾经证明在印度共产村中，关于我们对于正义、权利、责任这些观念，人毫不懂得，为什么呢？因为在共产团当中，没有冲突的利益，换句话就是因为所有□达到个人即施之于团之全体，又因为利益是公共的，不是象在我们社会中，利益是冲突的，所以不需要什么政府的权力或官吏以矫正个人的错误。

以上三个道德底认识，在《共产党宣言》上也明明说过。《宣言》上说：

这岂是需要一个很大的敏锐，才能够懂得人底意识，如见地、意想、概念等是伴着自他的生活条件、他的社会的关系、他的团体的生存中来的变换而变换么？

思想史证明什么？不只是精神的生产随着物质的生产而转变的么？所有支配一个时代的观念，曾未有不是支配阶级底观念。

常人说，革一个全社会的命底观念时，人只须发表这个事实：在旧社会底怀中一个新社会底元素已形成了，旧的观念瓦解，与旧的社会关系底瓦解并行。

当古代社会到了他的末日时，旧的宗教被基督教战胜了。当十八世纪，封建的社会与有产阶级——这时是革命的——决了最后一战时，基督教的观念，遂让位与哲学的观念；宗教自由和信仰自由这些观念都只是在知识底领域中宣布自由竞争即位。

会又有人说，不错，宗教、道德、哲学、政治裁判等的思

想，是在历史发展的路程中改变的，但宗教、道德、哲学、政治、法律经过这些转变，他们的本身总还时时保存在的。

有很多永久的真理，如自由，正义等，是共通于一切社会的条件的，乃共产主义废除永久的真理，他不给宗教道德一个新的形式，而给他们废除，这是违反所有以上历史的发展。

这个攻击，应该用什么来压服他呢？所有社会底历史直到现在可概括在阶级对抗中，——在各个时代而被有各个不同的形式的对抗中。

但是，无论这些对抗所被的形式是怎样，社会底一部分掠夺别一部分，这是有史以来的一个共通的事实，所以历代底社会的意识，虽然极分歧，极不同，都在某一些共通的形式上变换其皮毛，这是毫无疑义的，这些意识底共通的形式，只会与阶级对抗完全消灭而完全消灭的。

共产主义的革命是与旧有的财产关系最彻底的决裂；若他在他的发展底途径中，与旧有遗传的观念有最激进的决裂，也是毫无疑义的。

《少年》第八号，1923年4月1日

俄国革命是失败了么？

——质工余社三泊君

伍　豪

在九月号的《工余》上有三泊君一文，名《俄国共产主义失败之原因及其补救的方法》。此文题及其内容颇能惑昧于俄事之人于一时，本志对□似不可不一加驳论。

在三泊君文题中最足惑人的便是“俄国共产主义失败”八字。俄国自从革命后直到今日，纯是在共产主义革命中讨生活，这谁也不能否认。取例来说，大产业、银行、铁路等收归国有，土地交给能自种的农人耕种，废除遗产制和土地占有权，消灭有产阶级遗留下的恶制……凡此种种，全是过去五年中俄罗斯无产阶级以革命的活动换得来的。因此活动，所以才引起内部皇党、有产阶级、自私的农人的反革命结合和国外资本主义国家的压迫行为。并且他们更互相勾结起，继续不断地来图捣乱，而各国的无产阶级又因困于情势，都按兵不动，于是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遂不得不独自地持续下去了，革命事业本是要经长期努力、长期奋斗才能保住成效的。一国一种的民主革命，如法国革命，美国独立都是经过极长期的血战争斗才得使共和奠定，更何况无产阶级的共产革命，须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世界革命呢！我们若因要急观事的成效，便忘掉革命的时效，或更忽视了四周反革命的空

气，则只能怪我们性急，若硬加俄国以“共产主义失败”之言是不当的。且俄国今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劳动会议掌握政权，从阶级争斗的根本见地来解共产主义，只有说他是成功。何得反谓之失败？我们应知俄国现正在从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期中，换言之，便是正处在共产革命期中。

在革命期中，最初建设是要少过破坏的，五年来苏俄的努力多一半是用在铲除旧毒，内防叛乱，外拒强敌的工作上头。我们若肯平心静气地研究研究俄罗斯五年革命的纪录，则知他们并不是不图建设的，也不是没有建设的，只是旧势力的反动迫得他们不得不在破坏上多下功夫。且他们从事破坏，又岂无意义？扫除了旧的障碍，新的制度方得逐渐实施。未来共产社会的实现，须要有共产制度为他做保障，俄国无产阶级今日的努力，乃正因要立此保障之基，所以他们的破坏才非盲目。

明乎此，乃知三泊君“俄国共产主义失败”一言，是极不合于事实的闲话。

三泊君既错立了题目，因是他开宗明义第一句便以俄国施行新经济政策为“共产主义在俄国试验失败”的左证，这真太背事理。俄国又施行新经济政策，其在事的根据上实有极重要的来源可说：1.俄国在革命前工农业上的生产机关和工具都太腐败。2.大战发生后，生产运输机关的破坏和壮丁的损失更是直接地增加经济恐慌。3.十月革命过后，反革命派的骚扰，一方既使大战中的情状愈加延长，一方更使无产阶级无暇修补此危急的灾害。4.全世界资本主义政府所与的压迫。5.愚昧工人在工作纪律上的怠弛。6.政府因经济的恐慌，无法供给农民以工业品。7.无知识而只图私利的农民不仅不肯供给麦子，并且还因受反革命派的煽动要图反抗。总此诸因，生产状况遂呈现出一个极大的不稳，最后

且更激出皇冠城(Kronstadt)和大包夫(Tarr bov)省的农军暴动，于是新经济政策乃在这种事实的要求上势所必至地产生出来。

事实是不可侮了，我们且再转向理的根据方面来看。在新经济政策中最受世人非难的要算是重建私人间小工商业一事。他们常爱以废除私有制一义来反证俄国今日共产主义已经失败，其实他们却永未尝明白俄国今日尚是在共产革命期中，离着共产制度的全部建设尚属很远。私人间小工商业的恢复在共产社会中自然是不容留，容留了便是还没到共产社会。但在共产革命过渡期中，遇了相当的情形，有之却不足为惧，新近英报访员兰沙末(Ransome)曾问列宁，说有了这般小商人，他们不将觊觎政权么？并且买卖兑换的利大，握在商人手中；国家多管些无利的事件，此无论从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的见地上，全可看出有后退之虞。列宁回答他的大意是说这些小商人犹之伦敦市上夜市的小贩，买卖虽然极好，究离着政治很远。若说他们利大，则未免忘了俄国尚是个农业之国。本年政府收入，粮税乃为大宗，农业丰收，更影响到卢布价格近来的安定。轻便工业，已多振兴，国家银行近又有余裕可计，行将用他来振兴机械工业。这样情形，不仅从资本主义见地看来可以乐观，便是从共产主义见地看来，也可抱同样乐观，因为现在俄国的政权固握在工人阶级的手中啊！后退是不可能了，俄国今日已决不能走回“封建专政”之局，他只是要以国家资本主义来领路好走向共产主义(兰列两人的问答，全文见满切斯特守卫报十一月二十二日)。列宁此言很可指明新经济政策在理论上也决不会妨害共产革命进行的，并且就一年多实施的效果看，也的确可以增加无产阶级国家的财富。至政策中征收农民粮税是与农民自种其地据为己有相呼应的，若农业共治团

之以产业归公，则其组织自与国有的工场相同无所用其粮税了。对外通商，是现状所必须，且大权握在苏维埃政府之手，更无所恐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诱惑。忍诺、海牙两会议的结果与乌尔圭哈突(Urquhart)对英商约的延签，不已明示我们了么？

以上的事理我们皆根据于经济状况的必然性和共产革命的可能性而来断定新经济政策决非能作三泊君所谓的“俄国共产主义失败”左证。且不但不能为其左证，我们更信这是完成共产革命促进共产主义的一条捷径呢！三泊君也肯研究此事实么？

上述两点既明，三泊君文中一切论点遂多失了根据，其所谓乐观派的话，我们既可置诸不论，便是悲观派之言，已多受了各国有产阶级蒙蔽，社会党人欺骗而后发出来的“杞忧”，其实俄国今日的劳动阶级岂真是“除了换过几个统治者外实际上一无所获”么？凡稍注意俄事的人，当皆知其谬！

三泊君闻也是赞成阶级争斗的人，严格说来，既赞成阶级争斗，则因缘而生的无产阶级专政与专政期中一切必然的设施，有何可以反对呢；除非他是站在“有知识的人仍然多属于资本阶级”的地位来说话。

三泊君所最批难俄事之点是“中央集权”与“产业国有”，中央集权为无产阶级革命期中所必不能免的事实，这是凡稍懂革命战略的人都知道的。且全俄苏维埃所集的是什么权；各邦苏维埃所分的又是什么权，我们若不加以实在考察，细心地研究，便笼统地以“集权”二字来反对，亦嫌未当，至说权力集中是多数党争权的结果，不是革命的必要条件，尤属武断。多数党当三月革命方发生后，便力嚷“所有权力归苏维埃”，十月革命是全俄苏维埃应着这个口号而起的，要说争权，便是俄国无产阶级来与有产阶级争权，要说无政府党社会革命左党不赞成无产阶级专政，退出联

合，那是他们昧于阶级争斗之义，却怪不得多数党“产业国有”是生产集中的必然现象，俄国这几年的经济恐慌正因为他生产运输机关的集中还未做到十分好处，不是因为他不能碎分产业而生出的反动结果，此就经济现象与原理看来，都能证其无误。依三泊君意，总以“饥则耕而食，寒则织而衣，劳则筑而居”的自由境界与产业国有相反，此话说来何尝不好听，其实就生产趋向说，历史是不重复的，如要硬来碎分生产机关，返之上古部落生活状况，则因实质的条件难合，必要引起更大的经济恐慌。如此人必有不得食，不得衣，不得居的了，更何从言其自由！

此外三泊君还有许多不考实际，蒙蔽事实的话，许是他错信了 Sennacica Rerreo 的记载而吐发出来的，我现在无须多加辩正，因凡是留心俄事的人都能知其不然。

《少年》第六号，1922 年 12 月 15 日

一个无政府党和
一个共产党的谈话

Y. K.

甲：我真还不明白，你们共产党人的目的究竟是怎样？换言之就是你们愿意创造一个什么社会？

乙：我们共产党的目的是在由无产阶级推翻有产阶级，转变有产阶级的社会，即资本主义的社会，为共产主义的社会。这共产主义的社会是生产共有，分配共管，无国、无家、无阶级、无政府的社会。

甲：你说错了。这全是“我们无政府党人所主张的无政府的共产社会。你为什么不说：生产为国所有，分配为国所管；有国、有家、有阶级、有政府的社会。”而窃取我们的主张呢？（参看《工余》第十号 143 页）。

乙：你说话真奇怪，象这样一种无政府的共产社会的目的，岂是一种什么灵物，由你们无政府党人脑子里创造出来的，应该为你们的专卖品么？要知道这样的目的全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了矛盾的时候反映出来的，人人不难推测到。所以无论是空想家或实行家，说到目的上总有些相同点。因为目的，人人都会抛弃坏的，选择好的。殊不知问题不在好的或坏的目的，也不在高谈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是在我们怎样去实现这个目的。

甲：然则“你们的主义为什么不称无政府共产主义呢？”（参看《工余》第十号 143 页）。

乙：你这话更是莫名其妙了，难道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区别就在原定的名称这几个字面上么？无政府主义有《无政府》三字就会达到无政府共产社会；共产主义没有《无政府》三字冠在头上，就会达到有政府的共产社会么？我解释给你听：你们无政府党人所以郑重地将《无政府》三字冠在头上，是因为你们只知道笼统地诅咒“政府万恶”，政府在你们仿佛是一个偶然下凡来的怪物，所以大嘶大叫地反对任何政府，以为只要那一天我们大家都“齐心齐意”一长矛将这个怪物捣毁，“第一日就实现共产主义（!）”共产党人不然，共产党人认现代政府是现代经济制度的产物，是阶级压制的机器。近代政府之凶恶，不是政府本身凶恶，是有产阶级凶恶：完成这架机器，使用这架机器。我们只在努力推翻有产阶级，将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转变为共产主义的经济制度，则政府即老废了。

甲：你莫要强辩，你们“共产党之革命志在夺取国家之权力以压制群众，我们无政府党之革命志在废除国家以解放群众。”（参看《工余》十三号 190 页）不信，请看你们共产党人已经在俄国实行的共产主义的模范社会：“俄国革命之第一幕，波尔什维克党将土地从农人之手夺过来，然后置于国家权力之下，及强迫工人将十月革命所得之工厂而让于国家。”（参看《工余》十三号 189 页）

乙：象你这样信口雌黄，实在麻烦人。我且问你：你所说的群众，是指资本家，大地主，小有产阶级，及他们的仆人：门失维克，社会革命党，以及无政府党么？抑是指工人，贫苦农人和半无产者呢？要知道俄国现在的所谓国家，与从前的已大不相同了。其形象虽相似，其实质已完全改变。即从前的是维持统治权

的机关，现在的是革命的机关，从前的是少数压服多数的，现在的是多数压服少数的。一句话：俄国现在的国家是劳农的国家，不是有产阶级的国家了！国家既是劳农的，所谓将土地置于国家权力之下，将工厂让于国家，是不是说将土地和工厂都置于劳农统治之下呢？

甲：无产阶级既推翻了有产阶级的国家，为什么还要重新建设他的国家呢？

乙：他要国家来施行他的专政。

甲：只要他是国家，“无论他是沙皇的或波尔什维克的，都要推翻他，无论什么都不肯让给他（!）”（参看《工余》十三号109页）

乙：你这种说话，真令人笑死。这样，好比一个夜间的狗子，闻着声息就狂叫，不管这声息是主人的还是客人的。对不起，我说这话并不是有意侮慢的，我不过要选择一个恰当的比喻。不说你们也主张阶级争斗么？

甲：是的。但“阶级战争是一件事，劳工专政又是一件事，不能混为一谈。阶级战争乃社会进化路上推演出来的一步。劳工专政本为强权的共产主义派所要造出来的方法。”（参看《工余》十一号160页）我们也知道，现在的社会是分成两个阶级的：一是治人阶级，政治上治人者是官僚，政客，军阀，经济上治人者是资本家；一是被治阶级，政治上之被治者是平民，经济上之被治者是工人。（作者按：读者注意，这样的分别对不对!）治人阶级常借其政治上经济上之优越权把被治阶级大部分之权利掠夺了。所以被治阶级因为感受痛苦，渐渐便觉悟起来，而组织一阶级之大团结，便把治人阶级推翻了。（参看《工余》八号86页）我们主张阶级战争和“劳工武装”，因为这种武力的组织在革命初期

是不可少的，但是不可照现政府的办法，完成一种宪法而成为永久之机关，这不过是过渡时期中之一种组织，这种组织最好叫做“革命防卫委员会”。（参看《工余》八号 87 页）

乙：难怪人说你们无政府党人只是咬文嚼字。你这“革命防卫委员会”，若以你们反对任何强权之见地看，与工人国家是一样的，因为他也是革命的集中的军事的组织；不过他是想象的，拿到实地上去应用还不够罢了。

甲：不然。(1)我这个委员会不是国家，“他的职权只是防卫的，是防止反革命的。若反革命消灭了，没有防卫之需要的时候就要给他取消了。除了防卫之外，其余一切生产和分配都由各地方各□业的工会自决。”（参看《工余》八号 87 页）不象“俄国共产党人所实施的完全是国家社会主义，所以他们把工厂土地完全收归国有；”(2)这个委员会是“废除政党的组织而为阶级的组织”“数年来俄国之所谓劳工专政者，实际上不过共产党专制。劳工终日只知政党之竞争，而真正之阶级战争故无从实现。”所以我们以为“宜组织劳工阶级大同盟。所谓劳工有两种：有脑力的工，有手力的工，我们只要问他这种劳力是否有益于人类。如是有益于人类的，又不属于治人的工作，（如政治家、资本家）我们应该认他同属于一阶级。又我们要希图世界革命，更要谋全球劳工阶级之大团结，我们应该以经济地位而分阶级，不可以思想不同而分派别。因为劳工阶级处于利害相同之地位，若以思想不同而起争端真是劳工阶级之催命符。”（参看《工余》九号 112 页）(3)“这个委员会的组织，不绝对服从首领，只是由各地方委派能负责任的可撤回的经理，以担任指导。”“所委派的人不是把革命的全权交给他，他们只是派往各省各城市的一个战斗员。”（参看《工余》十三号 190 页）

乙：你这三段话全是错误。

甲：你说话何以这样武断；难道你所说的就全是真理，别人所说的就全是错误么？

乙：你要知道，我们不是自由思想家，说什么真理是无穷无尽的，即马克思学说也不过改造社会问题中之一答案。真理，全凭脑子创造的，是无穷无尽的；从事变的真实关系上证明出来的，就有一定的。你这些错误，要逐句解剖非常烦难，总之，你没有科学的研究，没有历史的常识，没有空间时间的观念，因之你即没有社会进化的概念，所有社会的真实的关系你都看不出来。所有流通的事变表现在你的眼中都是死的，整个的。在第一段上，你不懂得什么是国家；你“亟认国家是资本家特意创造的(!)”因之你也就不懂得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你以为无产阶级专政“本为强权的共产主义派所要造出来的方法”（!）你何尝知道这是社会进化之客观的事物的势力，为马克思主义所指明出来的。在第二段上，1.你不懂得什么是政党。在你的意识中只是：政党即是官僚，官僚是坏人；共产党也是政党，所以共产党也是坏人；(好简单!)2.你曾未看过人群的组织，你以为于今全世界上的人只有一些治人阶级——官僚资本家——是坏人，其余的都是平民，都是好人。这些坏人都仿佛是一些海贼偶然打我们地上经过；而其余的平民都是归真返朴的：没有因农业国与工业国在生产上而有技术条件之差异；也没有因地域的限制，而有风俗习惯之不同；也没有因城市与乡村的关系而在劳动上有所调节；也没有一个人因向来生活地位不同，思想上有所偏向；也没有一个人有什么成见。而且这些平民接受无政府主义的宣传，都好比中了传染病一样：无人不中，无人不中到一样深浅。所以平民很容易一致，不须有什么优秀分子组织一个参谋机关为他指导方向，运用

战略，即将这几个坏人打得一溃而散，永不回头。“这时候阶级也废止了，战争也消灭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时候当天就来了！你知道人群中除开有产阶级和他的雇用人外，还有小资产阶级、“工人贵族”——他们不是“经济上治人者，”也不是“政治上治人者，”但他们是反革命者！——农民、穷农、半无产者和无产者么！你在法国常看过有工团因为有工人为增加工资缩短时间罢工，而宣告“La Patrie est en danger”（祖国在危险中）么？你知道工钱奴当中有多少是觉悟的奋斗的么？你听说德国一千五百万工钱奴，一百万是社会民主党么？你的最奇特的佳话，就是：“……不可以思想不同而分派别。因为劳工阶级（读者注意，此地“劳工阶级”系应用无政府主义者所下的界说。）处于利害相同之地位，若以思想不同而起争端，真是……”象这样，共产党自然是无用的了，但还有你一位同志说：“我们跑到各工厂里去，用书报演说把我们主义之完善及方法之容易告诉工人，俟工人赞成了，我们就帮助他们组织工会。”（参看《工余》八号 85 页）我不知道所演说的是不是演说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工人赞成了，”是不是赞成了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但你这位同志又接着说：“但劳工团体之组织应由劳工之自动，不应为一政党所操纵，以免因一时政见之差异，就把劳工阶级分裂起来。”——象这些混沌思想，全是由你们脑子里做梦发现出来的，别人真不好解！在第三段上，恩格尔早就给你指点成了笑话了。他说：试拿一个工场，一个铁路，一个海船说，这是很明显的，若没有相当的服从，因之也没有相当的权力，试问这些复杂的技术的机械，都需用很多的机器，要很多的人做有方法的合作，可以行使么？若我以这种论据来反对最狂妄的反强权者，他们定会答我：哈！这是不错，但我们所授与我们代表的不是一个权力，不过是一个简单的极清楚的委任状。

这班人想象以为我们换一件东西，只须换他的名称就是。若自治主义者只愿意说将来的社会组织会只许权力在由生产条件严格地规定的范围中，我们会相信的。但事实已表现有权力的必要时，他们还盲目的反对着，他们火热地反抗文字。

和你们无政府党人所最闹不清楚的，差不多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今天我很愿意再与你谈一谈。

凡革命都是一个“专政”。无产阶级为尽他历史的使命，推翻有产阶级，将资本主义的社会转变为共产主义的社会，将有产阶级推倒后必须有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是当然的。我们要知道，不是将有产阶级刚推倒，马上荣华福利遍地都来了的。大的资本家纵然可服了；但社会上还有无数群人与他未断绝关系，想乘机恢复旧制度，或不服从无产阶级的纪律的。因此阶级争斗在这时并未停止。无产阶级为使他的革命完成，势必要施行他的专政，为施行他的专政，势必要成立他的国家。这无产阶级的国家在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换言之，就是将资本主义转变为共产主义之唯一机能。他的工作约有下列十二项：(1)组织他的防卫，以抵抗内外敌人；(2)督率所有人都执行由他所采取的决定；(3)抵抗所有职员，自由职业的代表，专门家，以及尚未解脱有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的工人做怠工运动；(4)一致地全盘规划组织生产，不计及某一地方的或某一部分的利益；(5)依照劳动者的利益，不依照寄生者的利益，组织生产品和商品的分配；(6)强迫游民劳动；(7)从事公共教育之一个合理的组织(要知道多数在高等、中等或初等教科的人都是反对社会革命的)；(8)组织水陆交通机关；(9)征收人民中某一部分财产未充公的赋税；(10)在公共利益中与邻地组织通商；(11)组织一个工人卫队或红军（在劳动者是强迫的，否则一切争斗的担负返归到先进的分子身上)；(12)

最后在凡工人阶级所统辖的地方，有条理地分配劳力，应用器具及材料。于此可见无产阶级的国家，不是空的，是有一些具体的，重大的工作要做的。

甲：但是国家总是一个压制机关，抵抗反革命纵然是个利器，但工人也一样不自由受束缚。

乙：你曾看过有产阶级的国家有妨害于有产阶级的么？为什么无产阶级的国家一定回过来反对工人呢？国家是一个阶级用来对付别一个阶级的压制机关，他本身并没有什么罪恶。

甲：我们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任何有形式而具强力的国家，这就是说：反对资本主义的国家、军国主义的国家、有产阶级的国家和“劳工专政”的国家，因为既称为国就是强迫人顺从他的国的范围，何况更加上用专政的手腕以胁迫人嘛，因此无政府主义者不能不反对“劳农专政”的国家。（见《工余》十四号二页）。

乙：我首先要问你的就是“资本主义的国家”，“军国主义的国家”，“有产阶级的国家”，——这三个国家有什么分别？这一点在别人或许是小节，在你们无政府党人就关系重大，因为你们处处闹笑话都从这里起：有些事物其形象虽仿佛，其实质已全非，有些□动，其手续虽类似，其目的已大不相同，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而你们都不管，你们只是抱头抱脑说你们的，虽同名为国家，有的其名称虽不同，其东西是一个；有的就大有分别，你们也都不管，只因高德文，蒲鲁东，司梯奈，巴枯宁，克鲁泡特金，都开儿，托尔斯泰，这几位老祖都曾经反对“国家”，所以你们也要反对“国家”，——逢着国家就要反对。

我首先即问过你们是否也赞成阶级争斗，你说赞成，为什么要主张阶级争斗呢？因现社会分成两大阶级：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为什么要和有产阶级争斗呢？因为受他的压制。他

用什么压制呢？国家！因为有了国家，有产阶级可以将社会上所有事物都放在他的安排之下，所有势力（物质的和精神的）都集中在他的手中。因为有了国家，可以保持他的私有财产制，维持他的统治权，因为有了国家，他可以奴服无产阶级不让他爬起来与他站在平等地位争斗！无产阶级想要将有产阶级打倒，那么，首先就要将有产阶级打离开这架压制的机器——国家，又因为这架机器是由历史发展来的社会底最高权力，可以将一切事物，一切势力都放在他底安排之下；可以把持或创立一种社会制度：可以压制别一阶级——无产阶级要完成他的使命，继续他的争斗（不能放松！还要继续！）势不能不抱起这架组织完备，应用灵敏的机器，以废除私有财产，根本上铲除有产阶级底统治权。

所以，所谓阶级争斗，并不是抽象的一个无踪无影的自然力，你说“既称为‘国’，就要强迫人顺从他的国的范围”这是不错的，但是，倘你们主张无产阶级底革命，主张无产阶级底阶级争斗，反对有产阶级强迫无产阶级顺从他的国的范围是对的；若亦反对无产阶级强迫有产阶级顺从他的国的范围，是不是反对无产阶级有权做社会革命呢？

关于国家之发生，国家之社会势力，国家之在所有革命中的作用，国家之死——列宁在他的《国家与革命》说得甚清楚，不知你看过没有？为使你彻底了解无产阶级专政起见，特择要引出几段来给你看看。

国家决不是一种势力自外引入社会里来的，他更不是象黑格尔所认定的，是一个“道德观念底实际”或理性底产物。他是社会发展到了某一个程度上的产物，有了国家，仿佛即是昭示这个社会已经落在一个不可解的内部对抗中，成为他自身无法解脱，不可调和的冲突，为使这个对抗，换言之就是为使这个由相反的经

济利益所划分的阶级，不在一个无益的争斗中互相吞噬，人即觉得有一个特别的势力支配这个社会的必要。这个势力，即可折衷争执，维持这个争执放在"秩序"底范围里的一个势力，他是出自社会的，但他是高出社会以上并且渐渐与社会离远的。

"一个公共的权力（pouvoir public）之建设，不是用民众自动的武装汇合起来的，这种特别的公共权力是不可免的，因为自社会划分为阶级以来，民众'自动的组织'已经不可能了。这种公共权力，不止包有军人，并包有物质的要素——如监狱及其他种种压制的组织，这些要素，在部落的社会里人都不知道的。

"我们所以说一个特别的权力，因为每个国家底特有的公共权力都不是直接由武装民众和他的'自动的组织'同时汇合起来的。

"国家是一个'压制底专门的势力'这个由有产阶级压制无产阶级的专门的势力——或称由极少数富人压制数百万劳动者的专门的势力。应该代以无产阶级压制有产阶级的专门的势力——无产阶级专政，所谓以国家废除国家就在这里，以社会底的名义备有生产底方法的事。也就在这里。

"无产阶级利用他的政治的统治权渐渐从有产阶级身上拨出所有资本，所有生产底方法放在国家——组织为支配阶级底无产阶级——手里，以最可能的速度增加生产底总和。

"国家是一个势力的专门的组织，这个势力之组织，是在压制某一阶级的，然则无产阶级应该要压制的是哪一个阶级呢？一定是个掠夺者阶级，即有产阶级，劳动者需要国家，只是为打倒有产阶级底反抗的，并且只有无产阶级能打倒他，而得到圆满的结果，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是一个唯一的彻底的革命的而又能联合劳动者及其他所有被压迫者在反抗有产阶级的争斗中，以便根本

铲除有产阶级。

“掠夺阶级所需要的就是政治的统治权以把持他的掠夺——在一个极少数个人主义的利益上反抗大多数平民，被掠夺阶级所需要的也就是政治的统治权以便废除所有统治——在大多数平民利益中反对极少数近代的奴隶底主人，地主和资本家。

“无产阶级绝对应该备有国家的势力——势力集中底组织，强暴势力底组织——以压服掠夺者底反抗，以便将农民阶级，小有产阶级，半无产阶级——这些人民大众软化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组织中。

“国家不是时时存在的，并且有许多社会免了他。并且连国家和政府权力底意义人都不懂……于今我们大踏步向着这样一个生产底发展道上走：就是到了这时，这些阶级底存在不独不是必须，并且成了一切生产底障碍物，阶级底消灭和他的构成一样，是不可免的，到阶级消灭时，国家亦即消灭了，社会又重新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结合底原则上组织生产，而将政府这架机器送在一个相当的位置：放在古代博物馆里与纺纱车和燧石斧列在一傍。

“国家是全社会底官样的代表，他是集中在一个特别的团体里，但他无论如何，总不出这个标准：就是他总是为一个在当时单独代表全社会的阶级底国家——在古代，奴隶底主人底国家；在中世纪，封建贵族底国家；在现在，有产阶级底国家，当国家真成了全社会代表时，他即成了废物，到了没有社会的阶级应该要放在统治之下的时候；自阶级争斗底冲突和混乱及阶级底统治，及为个人生存争斗（是由现今生产底无政府所致）都消灭了的时候；到了没有什么压服，和没有需要一个专门制裁底势力的时候，即不需要国家了。

“一日，大多数民众自己压服了他的压迫者，即没有一个‘压

制底专门的势力'之必要，这就是在这种方向中，国家渐渐老死，不须一个特权的少数(特权的官吏和军队底长官)之专门的组织，大多数民众自己会直接成就这些事业，民众愈自担当国家权力的作用，这权力底必要愈觉没有了。”

请看，这完全是阶级争斗底科学底历史的研究。

我现在总括起来告诉你几句：革命即是阶级争斗；阶级争斗即是一个“专政”(Dictature)；国家即是被一阶级使用施行这个“专政”的；反对无产阶级底国家即是反对无产阶级底专政；反对无产阶级底专政即是反对无产阶级底阶级争斗或无产阶级底革命，——所以你说“阶级争斗是一件事，劳工专政又是一件事”这句话是不通的。

国家是阶级对抗中的产物：他是为一阶级所占据的社会的最高权力。无产阶级强夺这个国家，占据这个国家，利用这个国家，这正是无产阶级阶级争斗底具体的实行的表现；这就是说，这正是无产阶级真正在社会上握得了最高权。由被支配阶级一变而为支配阶级的地位，完成他的阶级争斗。

国家是由阶级对抗发生的，阶级对抗是由生产方法未完备的事实产生的，于今信赖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奇大的生产力；有火车，有电线，有无线电，有海底电线，有轮船，有几百，几千，几万人可以共同作工的大工厂，有可以普及到极偏的地方的新闻纸，因此乡村与城市的隔阂打破了，技术可以与科学联合，教育可以不是一个特别的组织往往为一部分所专有，而是普遍的东西了，最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都被资本主义的文明化了，更加上资本集中底事实，社会的阶级简单了，只剩了两个阶级：有产阶级，无产阶级。因此，无产阶级是有史以来阶级对抗中的最后一个阶级；他将他自己从掠夺他的有产阶级解放出来，同时即是将

全社会从阶级底对抗和阶级底掠夺中解放出来，因此，经过无产阶级的革命以后，共产主义的社会成立，生产力更加倍发展，阶级对抗的发现成为不可能了，阶级对抗废除了，由阶级对抗发生的国家即不须废除而老死了。

然则你还有什么可说呢？

甲：今天你有时间，我们再谈社会革命问题么？

乙：很好。不过我们定要抓住这个“社会革命底问题”，然后我们才有谈话底根据地。因为倘我们都有革命底要求，于是我们才要求对于革命底实际问题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否则我批评你们的无政府主义，说你们无政府不能实现不能维系我们革命底要求，而你们心目中并没有打算要实现无政府主义，徒说一些玄学的混沌思想，如“彻底清源的去寻求人类生活真正的道路”，“自然界底事和人类真正生活底实际”，“当彻底的了解人与人类底自然现象与正当的意义”。（见《工余》十六号 28、29、32）甚至你们对于社会革命毫不负责任，专拿一些“野心家”“权利欲”“官僚”“魔王”“拍马屁”……毫无意义的，只须不顾一切可以加之于任何人的谩骂名词来与反革命合作。

甲：好。现在我们就专讨论社会革命问题，不过你上次所说的我还有怀疑，我总觉得革命是消灭阶级不是保持阶级的；他是废除国家的，不是使国家底权力更加强大，“你们既然有此能力抢到一切权力，为什么不尽你们的力量推翻一切的权力呢”？（见《工余》十六号，34）“推翻的工作都不要政府专制都做成功了，推翻之后偏才要个专政将众人分工活动的一切集在一个地方听少数人挥使！”（见《工余》第十七期，7）

乙：你一说话就惹人笑。革命就是阶级争斗，无产阶级专政就是阶级争斗底逻辑的结果，无产阶级专政底形式就是无产阶级

的国家；这无产阶级底国家与有产阶级底国家不同，亦犹之有产阶级底国家与封建的国家不同是一样，即：封建底国家是寡头政府，是握在世袭的贵族手里，有产阶级底国家是巴罗门（parlement）政府，是握在工商业的资本家手中，无产阶级底国家是苏维埃政府，是握在劳兵农手中，这点上次我们已经谈过，现在不必再重述一遍。

假使阶级争斗，不是在我们脑中的一个抽象的观念，我们说阶级争斗当然即承认社会上有阶级存在，有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存在。被压迫阶级要推翻压迫阶级，首先即应该有本阶级底存在，他能最后征服了压迫阶级，一定要他本阶级底争斗底势力和一切争斗所必需的工具都能战胜压迫阶级，若要消灭阶级，阶级还没有消灭，即首先要消灭自己的阶级，这样要消灭阶级只有一法，先教本阶级自杀，不须怎样的科学的方法来推论，只须你平声静气地再思索一番："你们既然有此能力抢到一切权力，为什么不尽你们的力量推翻一切的权力（大概是包括推翻的人底权力在内！）呢？"这句话通么？

以我们看，革命底第一步最重要最吃紧的工作，不在推翻支配阶级时，正是在推翻支配阶级后：因为现今有产阶级底社会，差不多时刻都在动摇中，被压迫的民众不难乘机而起，将有产阶级底统治权轰散；但是，恰好到这个时候四面八方的敌人都统一前敌对他们下总攻击。他们在这时为能保持他们已得的胜利及达到最后的胜利，势必要组织阶级底最高权力攻打所有的反革命，同时更须组织生产和分配及社会上一切设施——若他们这样做了，这就是一个专政，这些我们在上次也已经谈过，现在也不能再重述一遍。

试举一个例子，在一九二〇年秋，意大利工人，不是已经占

据了工厂，农人占据了土地么？若照你们看，意大利底无产阶级在这次不是已经达到了目的，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吗？只因缺了一个有统一意志的坚强的共产党将所有革命的群众聚合在一个鲜明的旗帜之下，以致革命的群众未握得政权实行他们的专政，结果，反革命不单使用政权将他们已获得的胜利夺回，更蹂躏他们不遗余力，成了现在的世界最著名的法西斯蒂（fasistes)底专政，现在他可去问问意大利底工人和农人，你们既然已占据了土地和工厂，你们应该是“生产者就是管理者，管理者就是生产者，更要由各地方各产业的工人依照该地方该产业的经济的情形自决，不能要有一中央政府去指挥，一则……”(见《工余》第八号 87) ——你们为什么又放了手呢？或者你去告诉他们，“你们有力量在从前革命自能在以后用那力量更发展的维护、完成革命，从前不赖有专政，以后也须不上他”(见《工余》第十七号 5)

甲：“我们反对一切政治运动，”“我们劳动者所希望的不是夺取政权，是消灭政权；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是要把一切民众自奴隶状态中解放出来，是自由的无政府”，(见《工余》第十七期 2，3)

乙：你们说话，全不加分析，我且就你所说的话来问你：所谓政权是不是统治阶级底统治权？所谓消灭政权是不是被治阶级组织起来先打倒统治阶级底统治权，后消灭统治阶级底统治权？若被统治阶级组织起来，要消灭统治阶级底统治权，在这“消灭”(若我们稍有点时间的观念，总不会相信消灭是一刹那间的事!)期间，他自身是不是有一个统治权？

不错，我们是要把一切民众自奴隶状态中解放出来，不过民众要从奴隶状态中解放出来，是向支配阶级乞怜解放出来，还是要自身组成一阶级实行阶级争斗解放出来呢？阶级争斗，还不算是政治运动么？

甲："政治的运动不是引导我们进到民众解放的新社会去。"

乙：照我们的推理，我们不是把"政治的运动"当一个玄学的或教义的观念，以这个观念引导我们进到民众解放的新社会去，我们是说民众解放，推翻旧社会，建设新社会——这种运动叫政治的运动，由此可见"政治"二字，在你们脑中仿佛不是一个意象学的(idéoloque)名词，是一个永久的实体(être éternel)。

甲："政治的组织就是少数人要来剥夺大多数人权利的一种工具"。"政治家常借其政治上的优越权利以凌压平民，资本家借其经济上的优越权利以凌压劳动者。政治家因得政治上的优越权利，同时即可获得经济上的优越权利；资本家因得经济上的优越权利，同时即可获得政治上的优越权利，所以废除资本家同时要废除政治家，如废除资本家而不废除政治家，那么，必然有资本主义复活之危险"。(见《工余》第十六号33、34)

乙：哈！哪晓得你们将现社会分四个阶级：资本家和劳动者、政治家和平民。政治家是与别的阶级无关系的；他们的专门买卖就是政治；政治是为他们所创造的；政治是与任何别的社会的阶级无关系的，他是政治家个人凭空制造出来欺平民的。我以为稍有社会的常识的都不致说出这种无稽之谈；你简直不懂得政治是什么。

甲：政治这两个字，我想工胞中一定有一大半就不知道了。但是我们不妨解释明白告诉他们知道，我们现在借法文的politique 与中文的"政治"同义；法文字典的注解是：Art de gouverner état 中文的释义是"治国的方术"，就是治人的秘诀(！)讲到政治又不得不讲到使用政治的人，使用政治的人法文叫做：politicien，释义是：personne qui fait de la politique；中文意义是运用政治的人，简单说就是专门做政治事业的

人，我们中国有个很普通的名词就是政客。（见《工余》第十五号，9、10）

乙：我听了你这一段话，想不笑实在忍不住，若真笑出来，也未免太刻薄了。

甲：怎样？

乙：象你这样解释政治——解释 politique 一个字也未免太简单太便当了！象这样，我们以后解释一切问题只须抱一本 Larousse（法文字典）在手中就够了！若有人问我们什么是德莫克拉西，我们即打开 Larousse 告诉他：Démocràtie，法文字典的注解是：gouvernement où le peuple exerse la souveraineté，中文的释义是：由平民施行最高权的政府——但有人又说现在有产阶级的德莫克拉西（Democrety）即是金钱贵族政治（ploutocratie）！

“政治”这两个字，即照字义讲解，也有广义的和狭义的不同：有时作政治学解，有时作政体解，有时作政事解，有时又作政策解（在世俗间有时又作私人玩弄手段解），政治家在法文也是 politique adj，是指主持某种政治或施行某种政策以及担任国家事务的人。

但这样还只是解释了文字的意义，还未能解“什么是政治”这个问题。在你们，你们以为政治就是治人的秘诀；这治人的秘诀就是由少数专做治人事业的人造的。这样的仿佛认定了社会上除开因阶级底利益的冲突形成阶级统治底关系（即政治的关系）外，还有一些魔王专造一些政治的关系加入在我们的社会里，至于我们共产主义者，我们解决一切社会的问题，都不忘却社会底阶级的关系。政治是由阶级对抗形成的。阶级底统治是政治的统治，阶级底争斗是政治的争斗，争斗即是作战，作战要使用战略，战

略是政治的，使用战略就需要使用战略的人。

因此，所有阶级争斗的问题，小而至于部分的要求，大而至于夺取政权，都是政治的问题。只须社会上有阶级的关系存在，我们都脱不了政治的网罗，这话不是说我们要故意利用政治；是说社会上有了阶级、阶级对抗的本身即是政治，一切由阶级对抗所发生的事件，我们称之为政治的事件。

例如自十九世纪上半期以来，所有工人阶级底劳动立法运动（如规定八小时工作，限制儿童作工的年龄，限制妇女工作底种类……）是不是政治的运动呢？一九二〇年秋，意大利工人和农人底失败，是经济的失败，还是政治的失败呢？去年哈福尔(Havre)大罢工，当初是出于经济的要求，其后哈福尔的县长默叶(Meyer)和议员薛哥福利(Siegfrid)都加入了，本开尼(Poincaré)枪炮也加入了，这时工人底争斗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呢？米索里尼(Mussolini)在意大利组织法西斯蒂(Fascistes)底工团，这是一个政治的现象，还是一个经济的现象呢？京汉铁路工人被残害，北京学生在众议院门前，遭毒打，这是不是政治的问题呢（只因政权落在帝制余孽底恶势力手里）？

又如一般资本主义的国家，自一九一九年以来欲弥补他们的大战底损失，遂设法掠夺工人阶级，延长工作时间，减少工资、破坏工人底团结……这是资本家政府底反动的政策；工人阶级应聚合起来，采用种种的共同的行动来抵制，这是共产党人的纠合工人底大众，使他们准备争斗底政策；亚姆士特丹底工团国际怕与革命的分子接触失了他的群众，极力从他的工团中排斥革命的分子，这是改良派社会主义者底分裂政策；共产党人处处以工人阶级底利益做前提，纠合所有劳动者来做共同的争斗，以期工人阶级早日聚合起来达到最后的目的，这是共产党人底统一前敌底政

策。法国一般自命为左派的政党(Bloc des gauches)感受法西斯蒂底攻击，想借此利用劳动大众现在帮助他们，为他们复仇，将来又拥护他们，捧他们上台——这是有产阶级底政党之欺骗政策；共产党人迅速指点迷途，使工人不要再跟他们后面跑，要以 Bloc ouvrier 对待 Bloc des gauches(以工人党对待左派党)——这是共产党人底革命政策。

甲："我现在简单的问你一句：譬如铁工、木工、土工……等的主人待遇他们太酷薄了，他们的生活太痛苦了，联合起来成立一个联合会和他们的主人对抗，有时罢工，有时占据工厂，这样争斗也可以说是带有政治性质么？这种争斗，也可以说是政治争斗么？(见《工余》第十五号，17)

乙：由你这一段话，足见你们平日所谓"阶级""阶级"，实际上你们对于社会的阶级的关系，并没有个明了的认识，你们在社会上所见到的，尽是一些散乱的民众。

在阶级统治底社会中，言论、集会、结社等权利是有限制的，近代工钱奴不知经过几次的争斗，几次的流血，才获得"一部分"言论集会结社等权利——即从有产阶级手中夺得一部分政权，可见铁工、木工、土工等不作散乱的暴动，能够成立一个联合会与他们的主人对抗已经是政治的行动了。若他们有时罢工，有时占据工厂，马上宪兵警察一齐来了，捉的捉，杀的杀，有的应处以死刑，有的应处以徒刑——这是经济的现象，还是政治的现象呢？若他们要达到最后的解放，他们不独与他们的主人反抗几次，他们势必要打倒他们主人底阶级，推翻他们主人底制度，成立他们自己底制度。为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先要与他们的主人作很长期的争斗，渐渐自身团结起来，组成一个坚强的阶级，备有种种争斗的机关(工团、合作社、工人议事会，政党等)。一旦

将他们的主人底统治权打倒了，他们马上即须自身组织成支配阶级压服他们的主人和他们主人底阶级，建设他们自己底社会，在这革命的争斗期中，他们不独对反革命应该下猛攻，即一些犹疑不定的分子都应该排除，以免扰乱革命的队伍。为什么呢？因革命是绝对的坚决的行动，不是可试一试玩的，革命一失败，反革命即着着逼人！——若木工、铁工、土工……等这样做了，这样就是共产党人称之为专政。

甲："政治一物，在他的本质上，只是少数者想征服多数者，支配多数者的方法。所以号称以多数者支配的德莫克拉西以及无产阶级的政治等等在学者书案上或者可以成立，在实际上绝对不能成立"。（见《工余》第十七期，2）

乙：所以政治究竟是什么，你还未弄清楚，你们被近代有产阶级欺骗人的"全民政治"欺骗了，因而你们即否认政治底本身（你否认他，其奈他本身存在何！）。政治不是"一物"，是一个抽象的名词。他的"本质"，我告诉你：当在纯粹的农业社会中，生产工具简单，交通不便利，人民安土重迁，他们的政治思想也不发达，因此他们遂容易为少数武人所征服，产生家天下的绝对的专制政治；及工商业勃兴，自由都市上产了一般富的市民。在这时产业发达了，交通便利了，因之这般市民底政治的常识也发达了。在这时，寡头政治不能维持了，无论谁，再施行寡头政治也成为不可能了。这般工商阶级要想推翻封建贵族，成立他们的统治，唯一的形式就是集合各工商阶级底派别成立巴罗门，利用巴罗门共同宰割全社会底利益，这样遂成立现代民主共和政治；其后因自由竞争和资本集中底结果，从各地人民中造成大多数的无产者，这般无产者渐渐觉悟起来次第成立合作社、工团、工厂委员会等组织。他们先以这些组织为争斗机关，后以这些组织为基

础建设他们的统治权，以成立苏维埃的民主共和政治；最后，因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社会的阶级由繁化简，无产阶级成为有史以来阶级对抗底最后一个阶级，无产阶级将有产阶级最后消灭了，即将全社会底阶级消灭了，从此阶级统治底事没有了，政治即跟着消灭于无形了。——请看这就是政治底“本质”；你们所谓政治底“本质”就是这么一回事！

这篇谈话本是预备同《工余》杂志社研究下列几个社会革命底问题：阶级争斗，无产阶级专政、国家（L'εtat），政治运动，共产党底作用等，前四个已在《少年》第七号、第八号和本号上，次第发表出来；后一个本拟也在这一号上发表，只苦于没有篇幅，不得不仍待下期，不过，以后倘有篇幅，对于中央集权，俄国底新经济政策，我还愿与《工余》杂志社诸君作一研究；因这些也是他们所不满意的。

作者附识

甲：因为要做政治的运动即免不了带政治臭味的政党，政党即是官僚政客，所以我们反对政党。

乙：你们是否也反对无政府党呢？

甲：无政府党不是政党。

乙：所谓政党简单地解释即是主持某种政见的一派人，你们无政府党，难道没有政见么？

甲：我们是有所主张；但我们的主张不是政治的。

乙：我且问你！别人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你们反对“任何”专政；别人主张组织无产阶级的国家，你们反对“任何”国家；别人向工人宣传希望他们信共产主义，你们也向工人宣传希望他们信无政府主义；别人在莫斯科组织第三国际，你们也在柏林组织无

政府国际；——别人的主张都是带政治的臭味，你们的呢？带政治的香味——我以为至少也要带政治的香味，断不能说完全不带政治味！

因为不懂得什么是政治，所以你们也不懂得什么是政党。政党不是几个野心家特意创造的，是由阶级争斗必然产生的。政党是附属于社会的阶级的；每个阶级为拥护或争夺本阶级的利益必然地要产出他的政党，这个政党就是他本阶级底争斗底前驱。所以我们翻开历史一看，即见到所有政党都是历史的产物，都是因历史上有种种利益不同底阶级，因而产生种种不同的政党。

在中世纪末，一般自由都市上工商阶级与贵族阶级发生冲突，渐渐要取贵族阶级底地位而代之时，竟产生共和党民主党等；当法兰西大革命时即先形成依稳当 (Girondins) 蒙达尼 (Montagne)、甲角板 (Jacobins) 等政党；在有产阶级中有工业资本、商业资本、农业资本、银行资本利益之分歧，故又有各种不同的政党（如英国自由党，保守党，法国 Bloc national, Bloc Des gauches radicaux…）；即如中国，自海禁大开以后，受不住国际帝国主义底侵掠，满清底寡头政治遂发生动摇，首先形成立宪党，进步党，最后又形成具雏形的国民党；满清政府推倒以后，民主派又不能得势（因他的阶级底势力还没有形成），政权仍落在帝制余孽之手，因此遂形成专以取得做官发财为目的底安福部。

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渐渐形成被压迫的工人阶级，因之遂产生种种不同的社会党（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党）。当初因为历史的发展尚未成熟和工人阶级底生活地位也有种种地不同，因之同一工人阶级创造各个不同的政党（初期的社会党人，无政府党人，改良派的社会党人……），最后由他的发展底途径中，工人阶级中形成一部分最积进最有觉悟的分子，不特认清了他的历史的使命，

并从长期的争斗中获得丰富的经验，认清了完成这个使命的所有必须的方法。——这一部分最积进最有觉悟的分子组织起来就是共产党。

所谓共产党是什么呢？共产党就是一群把同一目的，有同一的意见，采同一的手段，做一致的行动的人们组成的一个政党。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将有产阶级的社会变为共产主义的社会和废除阶级。他的意见是什么呢？——资本主义会崩坏和共产主义会完成都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底利益是绝对冲突不可调和的，无产阶级的解放只有无产阶级自己才可获得。他的手段是什么呢？——阶级争斗，无产阶级专政。他们的行动是什么呢？——处处服从无产阶级革命的纪律，拥护无产阶级底利益，因时因地不同采用种种革命的战略（如统一前敌，工人政府，与民主派联合战线……）以取得无产阶级的最高权而达到无产阶级专政，再由无产阶级专政以成立共产主义的社会。

所以共产党，若从客观的见地说，他是历史的必然的产物。因为经过长期的争斗，工人阶级中自有一部分觉悟的分子，从种种不同的政治团体外创成他本阶级的最坚决的独立的革命的政党；若从主观的见地说，无产阶级中处在各种地位的人生活于极不同的社会条件之下，这种分歧时时在群众底心理中生出分歧。所以无产阶级是处在永久变动的状态中，决不会采取完全一致的思想。有工人生在城市傍的；有的还是新近才从乡间来的；有的是国家的办事人，银行和商业底雇用人；有的是农业的工人；有的是有技能底工人；有的是没技能的工人；有的是大工厂的工人；有的是小匠人；有的是出自小有产阶级，新近才落在无产阶级中，完全还没有脱离他们旧的成见；这些不同的地位的人，自然对社会的现象有各种的概念和有各种结合的团体——我们为谋无产阶

级早日解放，共产主义早日实现起见，势必要纠合已有觉悟的分子组成一个有明确党纲，有统一意志的政党，统率那些工人阶级意见不同团体上同一正确的轨道。

甲：我以为“劳工团体之组织，应由劳工之自动，不应为一政党所操纵，以免因一时政见之差异，就把劳工阶级分裂起来（见工余第八号，3）。今宜组织劳工阶级大同盟。所谓劳工有两种：有脑力的工，有手力的工，我们只问他这种劳力是不是有益于人类。如有益于人类的，又不属于治人的工作（如政治家资本家），我们应该认他同属于一阶级。又我们要希图世界革命，更要谋全球劳工阶级之团结。我们应该以经济地位之不同而分阶级，不可以思想不同而分派别。因为劳工阶级同处于利害相同之地位若以思想不同而起争端，真是劳工阶级之催命符……（见《工余》第九号，8）”

乙：你们说话真是不加思索，思想是行动的标帜，有种种不同的思想底人可以做一致行动么？难道革命是不要取坚决一致的行动么？工人阶级因各种地位生出各种思想，因各种思想而创造出各种行动的团体。这各种行动的团体都各个扩张他的势力，希望全工人阶级就他的范围。最后谁得胜利即是谁真正认清了历史的使命。当你们无政府党人设法要使你们的思想——联合主义（Unionisme），反代办主义（Antifonctiannisme）反国家主义（Antiéatisme）……还有反共产主义——在工团中得势时，你们是尊重工团的独立么？只有当共产党人在你们旁边主张集中主义和无产阶级暂时的专政时，你们即大叫强迫，侵犯工人独立。在各个地方社会主义者和改良派的工团主义者都一致要使他们的党纲战胜。你们无政府党人带着工团主义的假面孔也是如此。这是你们的权利，但要知道这也是共产党人的权利呀！

你们老同志马拉铁司打报告你们“意大利无政府党的运动”有几句话说得更明显:“工团联合会约有团员五十万，主要办事人皆为无政府主义者，主要的意旨皆为无政府主义的原理……在罗期加纳、马尔矢、里居连三大城完全为无政府势力范围……他们暗中组织反抗政府及社会党的政党的机关，所谓社会党的政党即指改良派，马克思派共产党的……”(见《工余》第十五号，28) ——所谓“应由劳工自动”“不应为一政党所操纵”在那里？所谓“不以思想之不同而分派别”在那里？

甲：我们无政府党人的势力是由工人倾向无政府主义来的，所以仍是由工人底自动，不是为一政党所操纵。至于说“不以思想之不同而分派别”是说……(说不出!)

乙：是的，你们的势力就是由真理得来的，别人的就是用魔术欺骗得来的!

甲：我总以为“同处于资本制度之下，社会党人不应该互相非难的，不特不应该互相非难，而且要互相扶助”。

乙：一点也不错，但是你要知道是谁当此阶级争斗正吃紧时与有产阶级的报纸异口同声咒骂共产党! 是谁不分畛域时时处处为无产阶级底当前利益去争斗! 季诺维埃夫在国际共产党第四次大会上说:“在第一次大会上，我们即说:‘无人提出这个问题:你叫无政府主义者或工团主义者。我们只问你:你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抑是赞成帝国主义的战争呢？你是赞成一个不可调和的阶级争斗还是不呢？你是反对有产阶级还是赞成有产阶级呢？若是赞成反对阶级的敌人底争斗，你就是我们的人，……”“……这是很明白的，于今在国际共产党第四次的大会和红工团国际底第二次大会上，我们对无政府党人和工团主义者的态度不能还守着第二国际的态度。我们认定所有切实赞成阶级争斗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

党人都是我们的兄弟”——请看我们是不是故意互相非难呢？不过我们共产党人处处以无产阶级革命为前提。革命是最坚决一致的行动，所有违反革命底利益或革命的必不可免的纪律的，无论是社会党人或其他党人都在排斥之列，这是无可如何的事，否则即有妨害于革命。

甲：为什么在你们共产党人，“只共产党人方谓之有觉悟的工人，否则谓为资本家之走狗呢？

乙：工人阶级中有不觉悟的分子，离开本阶级的营垒去拥护有产阶级的利益，这是有的事；但我们并未说过所有未觉悟的工人都是资本家的走狗。我们谓共产党人是工人阶级中一部分最积进最有觉悟的分子，这并不是我们主观的自夸，是凭客观的观察上说的。因为上面我们已经说过：共产党是工人阶级中最积进最觉悟的分子组成的。所谓最积进最觉悟者，就是说这些分子对于他们阶级的历史底使命：取得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废除阶级都有明了的认识，有争斗的决心。共产党除开工人阶级底利益无利益。他并没有什么特权要闭门自守的。他努力使最有知识最有能力的工人归于他，归于他的学说，归于他的组织，归于他的行动。他努力使一切已成立的工人底组织（工团，合作社，体育会，文艺会及其他）受共产主义的影响。他指挥种种的核心(noyau)到处宣传：工厂里，造船厂里，矿场里，银行里，办事室里，兵营房里，船舱里，他煽动工人的团体，兵士的团体，以及体育的团体等。他又向女人宣传，向少年人，向幼童宣传。他的宣传是多种类的，但是一致的；在各种表现和方法之下处处是一样的学说，一样的纲领，一样的目的。

甲：你说到这里我有三点疑惑：

(1) 你说共产党是工人阶级中一部分最积进最有觉悟的分子

组织成的，其实你们共产党尽是一些官僚政客组成的；

（2）“无论那一派政党，当他未得政权时，一定把他的政见说得天花乱坠，将来我得了政权后，就怎么样造福平民。但目的已达，则面目全非，平日之所谓造福平民者，不过领取薪俸，交结权贵，即社会革命之共产党亦何独不然。”（见《工余》第九号 8）当勃列项(Briand)，克鲁孟梭(Clémenceau)米勒兰(Millerand)未得势时何尝不也是叫工人：Camarades! Camaades!（同志！）及工人选举他登台后，遂把工人忘记了。共产党包办革命，足见你们说‘工人阶级底解放只有工人阶级自己才可获得’是欺骗人的了。“我们之所谓工人阶级是真正的，不象你们组织一个政党就算工人阶级。”（见《工余》第十二号，6）

乙：第一点：在这点上我分四层答复你：（1）当工人阶级底势力未雄厚时，的确是有一些官僚政客掺入工人的政党里。但阶级争斗逐渐发展，工人阶级对于本阶级底利益逐渐明了，这些官僚政客不是中途背叛，就是上不得战线被工人开除了；（2）“工人阶级中的分子”不一定是指工人分子。别的分子是工人阶级化的也是工人阶级中的分子。马克思，昂格思，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列宁，托罗斯基，并不是无产者，但无人能否认他们是无产阶级中最坚决最勇敢最有觉悟的分子。这般有产阶级中的知识分子加入无产阶级底队伍不是偶然的，也是历史的事实。共产党宣言说：“如象我们已经看见的工业底进步将很多的支配阶级底派别(factions) 抛到无产阶级中，或至少要使他们生存动摇。这般落伍的有产阶级分子亦为无产阶级带来好多进步的分子，最后，每次阶级争斗到了一个坚决的时候，支配阶级和全旧社会崩坏底历程激起一个剧烈的变动，竟使一小派统治阶级脱离本阶级而结合于将来所附属的革命的阶级。亦如往日有一部分贵族阶级跑入有

产阶级，于今也有一部分有产阶级跑入无产阶级，最显著的就是这般对于历史的运动底全般有理论的认识的”；（3）一个共产党在他的组成上不能绝对是无产阶级的。只要他的征收的基础或他的思想底基础是无产阶级的，只要无产者在组织底各层上占多数，只要他营垒坚固，谨防着时时有乘机利用的小有产阶级分子闯进来；（4）在共产党中“知识分子”的问题，只是防范和纪律的问题；严加取缔，严加训练，尽量使他本身无产阶级化（第三国际……）——一句话在共产党中这个问题只是“做”的问题，不象你们无政府党人挟着“小孩子底畏怯的心理”，有眼不看事实，专门疑神疑鬼。

第二点：在这点上分三层答你：（1）我还要请你谨记着，政党是阶级的。有产阶级底政党，时时是欺骗无产阶级的（但未曾欺骗过有产阶级！）近代有产阶级生来就与人做继续不断的争斗：当初与贵族阶级争斗，其后又与他们本阶级利益相冲突的派别相争斗，时时与外国的有产阶级争斗。在这样争斗中他都要以“德谟克拉西”“造福平民”“保护祖国”这些名义号召无产阶级，求助于无产阶级。每次结果当然是无产阶级受骗，但这种情形，不能拟之于无产阶级自己的党。正因为历史的教训(屡次受骗)，无产阶级才创立对一切党派独立的“自己的”党（共产党）来做参谋机关；（2）无产阶级在与有产阶级长期的争斗中，一定经过很多的挫折；或是被认识未清的党引错了路（如大战中各国底社会党，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或是被别的阶级中人欺骗了；但是倘使在阶级争斗底复杂的情形中，一个有统一意志的政党是绝对地必须的，无产阶级只有努力创造真正能够引导无产阶级底解放的政党，决不能因噎废食，否认“任何”政党，连自己的都在反对之列！；（3）各阶级有各阶级的欺骗者或背叛者，但各阶级亦有各阶

级的尽忠者或牺牲者。

你们只看见勃列项，克鲁孟梭，米勒兰，无产阶级遂抛弃他的政党么？事实上完全相反！无产阶级每经一次失败即更认清他的目的；每经一次背叛即更坚固他的壁垒。你们用这种‘举一以例百’的逻辑，见工人阶级底政党中曾经有过认识未清的，或欺骗的，或中途背叛的首领，即反对政党的本身，犹之乎往日一般悲观主义者见社会中有恶人，遂厌恶人生，抛弃人类。殊不知无论何种恶人都是在一定的时代一定的社会的条件中产生的，决不能因有恶人而断定全社会或全人类底人都是恶的！

第三点：你们有一个死抱着不放的成见就是认定“政党”就是社会上无所归属的“官僚”“政客”，因此你们认定共产党在工人阶级中就是自外闯入的几个官僚政客；果真如此，共产党当然是要逐出工人阶级以外去。要知道共产党即是工人阶级本身。工人阶级与有产阶级争斗，渐次创立他的种种机关。他有工团，合作社，工厂委员……——他的四肢和耳目口鼻；他又有他的政党——他的头脑。人身徒有四肢和耳目口鼻而无大脑，则不能发生行动；徒有大脑而无四肢和耳目口鼻亦同样地不能发生行动。我们断不能谓人有四肢和耳目已足，而责骂大脑之独断专横。

所谓‘工人阶级底解放只有由工人自己方可获得’者，是说只有由工人阶级自身觉悟起来，在各种形式之下团结起来，采用一个不妥协不调和的阶级争斗，才可达到解放的目的。但是事实昭示我们，工人阶级不是全体一下都是觉悟的。我们上面已经说过，工人阶级各分子底地位不是一致的，他的觉悟也有先后缓急之不同的。当初总是一部分先进的觉悟的分子认清了他的解放的目的，团结起来做一个中心；再以这个中心来取得其余的工人阶级。所谓“取得”并不是说“占领”或“隶属”，是说宣传其余的工人

阶级，取得他的信任。迨其余的工人阶级信任了，加入了这个中心了，这时这其余的工人阶级不是“其余的”了，也是这个中心里面的主人了。

关于这第三点托洛斯基说得很痛快：

“无论是党或是工团，都不是说要‘隶属’无产阶级，是说要得他的信任，但人能得到他的信任只在用一个由经验的光明证实出来的正确的方略。但这个方略是在什么地方，是由谁用一个批评的和有方法的态度小心筹划出来呢？谁以这个方略宣布于工人阶级呢？这个方略不是自天上落下的，也不是自工人阶级自己发出来的……”

“工人阶级是以他自己为他的目的，这句话，若剥去他的神秘的封面，应该是指无产阶级底历史的目的，是由按照他的阶级的社会的地位，由他在生产社会和国家(L'état) 中的作用来决定的。这样是绝对不可辩论的。但这样对于我们现在所要研究的问题底知识毫无补助：用怎样的方法，无产阶级才可以达到对于由客观的地位决定的历史的目的有主观的了解呢？若无产阶级可以全体一阵直接达到他的历史的目的，则党和工团都用不着：无产阶级的革命将与无产阶级自己同时并至了。实际上无产阶级认清了他的历史的使命所经过的历程是很长而且极摇荡的，充满了内部的冲突。经过一个长期的争斗，一些证明，一些错误，累积很多的经验，发展底途径和方法的正确的概念才穿透于最优秀的分子底脑中——这些最优秀的分子遂构成无产阶级底前驱 (L'avant-garde)。这样不独完全适合于党并适合于工团。工团亦是起始于行动的工人底一个小核心(Noyau)，其后幸赖有丰富的经验，取得群众的信任才逐渐发展。一般有产阶级的学者见革命的团体引导争斗从工人阶级中竖起他们的势力，不独以‘工人阶级自己’反对

工人阶级底党，并反对他的工团，他们告党和工团想隶属工人阶级。这是《时报》(De tempo)遇着每次罢工都这样写的。换别的辞语说就是有产阶级的学者以'客观的'工人阶级反对'主观的'工人阶级。因为只有由他的觉悟的少数，工人阶级才渐渐成为历史的主旨(Sujet De L'histoire)……。"(完)

连载于《少年》第七号，1923 年 3 月 1 日；第八号，4 月 1 日；第十号，7 月 1 日；第十一号，8 月15 日

“工人与政治”

行　　侯

这篇文字，既已脱稿，又见到《工余》十六期里列悲君对于《工人与政治的商榷》底意见。

列悲君主张“根本的推翻政治”，实较 p.p. 君对于政治只是一个消极的否认者，又别具一番见解。我对于列悲君“根本的推翻政治”底主张，是完全同意的。只是问题之呈于前者，不在政治是否应当“根本推翻”，而在使用什么方法才可以把政治“根本推翻”？马克思主义者认定政治不是由一个消极的否认便可以“根本推翻”；也不是由几度手枪炸弹的使用便可以把政治“根本推翻”，政权是存在于阶级对抗之上，在阶级对抗存在的社会里，则一阶级用以压迫别一阶级的权力——政权的使用，是必不可免的。政治只能随阶级对抗的消灭而消灭（“到那时候，事物的进行，已经把阶级的对抗消灭；到那时候，生产的全体，已经集中在结合的个人之手，则一个公共权力将失掉了他的政治性质”——马克思）。所以要“根本的推翻政治”。第一，必须消灭那引领到阶级对抗的生产条件；第二，必须消灭阶级的本身，无产阶级专政，就为完成这两项使命的(理由详后)，所以马克思主义者认定无产阶级专政，是到无政治惟一的必经的途径，列悲君在一方既已主张“由下层阶级联合起来”，“根本的推翻政治”，是已承认工人阶级政治斗争之必要，而在他方于人家对工人阶级政治争斗的主张，却又使劲的加以否认，毋乃自相矛盾？此外，列悲君的意见，较 p.p. 君所说的为概括，可以附

在本文内解释，不另作答。

作　者

我曾在《工人旬报》上作过《工人与政治》一篇文字，意在予工友对于政治争斗一个简明的概念，只能说到表层，未曾说到里面；只能说到大要，未能说到详尽，不图工余社的 P.P. 君便于此以辞害义，妄测无端的加以驳义，以致弄得满天飞跑，却又未能中到要害，我既感觉到我前文说的过于概括，加上 P.P. 君这番穿凿，益滋读者以误解，便不得不再来解释一下。

但在回答 P.P. 君以前，有几点须得申言：

第一，工人阶级的政治争斗，不是任何人可以煽惑得起来，也便不是任何人可以否认得下去；这种必然的步趋，完全是由他们的生活条件来决定的。在资本制度的怀里孕育出来的工人阶级，已和中世纪的佣工、学徒、农奴的生活条件不同了。资本制度的生产法，他把工人集中到都市，已将社会的和私人的生活革了命。在资本制度之前森立的各大都市，实为训育无产者对于政治上感觉力和组织力的良好学校；各种集会、大饭店、消费合作社、互助会等通通是使他们互相了解、互相承认一个利益之公通的工具。他们已成为意识的行动的一个阶级。他们已明白他们的支配阶级，怎样的运用政权以来奴服他们；现实的政象，怎样影响到他们的经济地位，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已明白政权在阶级对抗中的作用，他们必然的起而为政治的争斗。故在十八纪末的法兰西大革命，无产阶级便与有产阶级同时并起，以夺政权；一八七一年巴黎的工人阶级已曾尝试的去破碎有产阶级那架统治的机器——政府；一九一七年俄罗斯的无产者占据政权，已

经过五个年头了。在中欧匈牙利的工人阶级，也曾尝试的夺取政权，德意志的工人政府早晚就要登基了。中国在半世纪以前，西方的资本帝国主义即已侵入，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结果，破碎了中国旧有的经济关系，把在这旧经济关系下生活的无产者，从乡村里驱逐出来集中到都市。现在中国各广漠城市中的手工生产者和资本主义化的机械生产工人以及交通工人，运输工人，他们的生活条件，完全改变了。他们为求他们在现社会的生活发展起见，对于政治上相当的权力和日光空气有同样的需要，我们试看现在国内工人阶级壮烈而且方在扩大的政治运动就可以知道这种澎湃的趋势了。

第二，生产手段（即一切生活本源）的垄断者屈伏劳动者于经济隶属地位之下，是劳动者生活贫困、智力低弱、人格堕落、政治依赖的总因。工人阶级的解放，是求经济的解放，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但是私利的阶级他怎样才能垄断生产手段？怎样才能屈伏劳动者于隶属地位？他是使用什么方法以维持这种垄断继续这种屈伏？不用说，是因为他把持了统治的最高权力在他的手里，所以工人阶级的解放，是求经济的解放，为求经济的解放而争斗，是政治的争斗，因为经济权关连于政治权，有产阶级是凭借政权以巩固他的经济的掠夺制度。

第三，阶级争斗，便是政争，因为到山穷水尽的时候，总是为着权力。罢工呢，当他蔓延及于全国的时候，是摇动有产阶级的国家基础的，这样也符了政治的意味了。要想推翻有产阶级，要想打破国家，便是进行政治的争斗；要想创造我们自己阶级底机关去驾御旧制那般反抗的有产者，不论是何等样一种机关，那便是拿到了政权，因为我们给“政治斗争”所下的义解，便是被支配阶级努力去破碎支配阶级的政治权力的争斗，我们给“政权”两

字所下的义解，便是一阶级用以反抗别一阶级的组织权力。

明此三义，然后再来进到《工人与政治》一问题，便不难迎刃而解了。

P.P. 君说“阶级斗争不能离开政治，当从政治下手，由政治完成其理由安在？倘若不能把理由说出来，便妄以为‘不能’或‘当从’未免太宗教式了……”

其实我那篇文字虽粗浅，然并没有忽视了这个“不能”和“当从”，只可惜 P.P. 君断章取义，对于我所解释这个“不能”和“当从”的地方，乃竟熟视而反若无睹，现为免除 P.P. 君斥我为“宗教式”的“妄断”起见，只得不惮烦的再把前文抄两段给 P.P. 君一看。

“就最浅近最初步的说，工人阶级，他要准备作战，他必得建筑一个作战的本营，这就是说必须团结起来。结合的自由是极其须要的；工人阶级一步一步的集中到都市，他要于广漠的同伴中，互相认识，互通声气，出版集会的自由，尤其须要到紧。工人阶级在现社会是末有地位的，他既不能一口气用手枪、炸弹把现社会轰掉，他要在现社会之下生活发展，试问这些生活发展必具的条件，非用作战的形式取得，他会从天而下么？”

这一段就是说明阶级斗争，为甚么要从政治下手。

“我们终究要从我们的敌人手里，抢到一切的政权，由我们使用，使用以来压倒我们的敌人，使他无产阶级化，使他与我们为同一阶级，那末，从此便无阶级的对抗，即政治本身也就失掉他的作用了。”

这一段便是说明阶级斗争，为什么要由政治完成。

本来阶级斗争为什么当从政治下手，由政治完成一问题，是个再大没有的问题，不是这简单的几句话，所能说的详尽。p.p.

君既已集矢于这点，我也感觉得这点是《工人与政治》一问题的重要关键，我们现在就不妨再来讨论一番。因为政府是最高统治权(Souveraineté)所寄，而国家又是代表这种最高统治权的，所以我们现在讨论到阶级斗争为什么当从政治下手，由政治完成一问题，首先便得于国家有个明确的认识。但是我们要考究国家的本性，便不是从拉鲁时(Larouric)字典上把他对于这个名词所下义解照抄，便可以敷衍得过去的，我们要站在阶级斗争的立场来考究国家的由来和作用。

国家的产生不是如上古希腊政治思想所认定的，“国家是自然而生的”，不是如中古政治思想所认定的“国家是神造的”，更不是如民约论者所认定的“国家是民意结合的产物”。他——国家——的作用，既不如国家的讴歌派——黑格尔以为国家是“理想的实现”，“理性的肖像”，那查尔以为国家是“实施人类文明伟大进步”的工具(见他的《工人纲领》中)——所诂释的那样神圣；也不如国家的咀咒派——无政府党人以为国家是人道就地正法的刑场（见《工余》十四期)——所诂释的那样顽狠。国家是社会的产物，因为社会发展到了一个程次，由生产条件引领出来在相反的经济利益中的阶级对抗，社会自身无力解除一个超乎社会以上的势力来支配社会，来解除这个对抗，——就是由一个阶级使用这种势力压服其他的阶级，使之就范，不能起而与他争斗——是必然的，这个势力，是社会的出路——就是国家，(语本恩格思，见《家庭私产和国家的由来》)故国家本身，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初无作用，他的作用是历史的社会的由阶级的作用来决定的。国家即是一个一定的阶级的政权之把持者，在中世纪，国家的本身便是封建的诸侯，在有产阶级的社会，国家的本身，便是资本家——第三阶级，他除了维持阶级利益以外，并无其他的社会作用。老实

说："政治即是一阶级压迫别一阶级的组织权力"（见《共产党宣言》）是由一个时代的支配阶级，操用以来维持他自己的特权地位，以压制那个时代的被支配阶级的，现实的政权（俄罗斯除外）是把持在有产阶级手里，他的唯一作用，即在弹压工人阶级的反抗，破坏工人阶级的团结，箝制工人阶级的自由，阻止工人阶级的发展，剥削工人阶级精神上物质上一切的利益，总括一句：就是奴服工人阶级于资本统治的铁轭之下，供他的宰割掠夺。所以工人阶级放弃政治上的争斗，便是甘于永劫为奴！所以我们在消极方面阻止工人阶级的政治争斗，无异在积极方面拥护有产阶级的统治权！

既往的历史昭示我们：一个阶级的解放，是原政治的解放而解放的，有产阶级孕育在封建制度的怀里，他因为在经济上有了地位，便在政治上一步逼紧一步的追取，所以在中世纪的市民，因为封君要抽取他们的赋税，他们便要求政治权力以为偿，他们借以踏上封建制度的政治舞台，所谓"代议政治"——至今已成为有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即发源于此。他们因为在政治上的地位反映到他们的经济发展上，使他们在经济地位的势力日益扩大，因经济地位的扩大，更促进他们在政治上地位的伸张，他们终于从他们的支配阶级手里，夺取一切的政权，而建设起资本的统治。

无产阶级他要求自身的解放，历史的、事物的，实际指示他，只有望着国家，即有产阶级的最高统治权力出发，一步逼紧一步的进取，把有产阶级这架统治的机器，一部分一部分的占据，或一部分一部分的取来捣碎，工人阶级把有产阶级那架统治机器占据一部分，他便在现社会里得着一部分的权力；他把他捣碎一部分，有产阶级便有一部分使用不灵，工人阶级便脱出一部分的羁

绊，得着一部分的解放（全部占据或全部捣碎，一时是办不到的）。工人阶级他非把有产阶级那架统治机器占据一部，或捣碎一部，他便不能发达他的经济组织以上经济的战场，他非把那架机器全部占据，取来捣碎，而建筑起自己使用的新的统治机器，他便不能化生产的手段为全民所有。

工人阶级他要爬上支配阶级的地位，建筑起他的新的统治机器，这便是说：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专政在革命中，是一种革命势力的使用（L'emploi de la force rivolutionnaire）是所以区别和平革命和激剧革命的（参看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P.23）。革命是使用应有尽有的强权的行动——因为惟有力乃能制服力，势力是新社会的接生婆——从胜利中出来的革命党有藉恐怖方法以强权威服其反动党，以维持其统治权的必要，因为一个时代的支配阶级和与他为缘的旧社会秩序，是经过长期的培养而成熟，已经根深蒂固牢不可破，断非由一个单纯的暴动，便可以一口气给这些尽量的推翻，革命阶级当了这种严重关头如果不能使用革命势力把住政权，他便不能压服反动，把打败的历史中堕落阶级压将下去，把旧有的社会秩序彻底的扫荡，他便不能运用新机使胜利的历史中新兴阶级发荣滋长，把新的社会建筑起来，这就是甘心把在革命中已经取得的地位捧给敌人，这便是革命机能的自杀!

工人阶级他要暂时自身僭居支配阶级的地位，不是为争夺阶级的特权和阶级的专利，他是要操纵了这架统治的机器，才可以从他的敌人手里，夺取一切生产工具，猛烈地用这些生产条件消灭旧有生产条件，消灭那引领到阶级对抗的生产条件，消灭阶级本身的存在（无产阶级是人类的最大多数，他又是历史中最后的一个阶级，他把他的敌人降服以后，便无阶级的存在了），撤去

他固有的阶级最高权（阶级消灭到一阶级用以压迫别一阶级的最高权无所用），并撤去最高权的性质。扫荡有产者的旧社会与其阶级和阶级的对抗，用一个“自由结合”来替代之，在这个“自由结合”中，各人自由的发展，会是全体自由发展的条件（语本马克思，见 Rapopport(报告):《历史哲学》中《政治理想的进化》章）。这便是共产主义的实现。

国家即统治的最高权力，原来不是圣灵的产物，所以不会由我们一个空洞的否认，便有什么神秘的力量，把他灰化，我们要废除国家则当考究他的来源，找到他的去路，使用必然的手段，把他送进坟墓里面去。所以惟有马克思主义者，乃真实的能消灭国家。所以我们不愿意治人，我们也不愿意为人所治。（此地所谓的“我们”不知是否是指工人阶级，如这个“我们”是工人阶级的“我们”则“我们”虽“不愿意治人”人却不客气的“愿意”治“我们”，“我们”虽“不愿意为人所治”人却硬要“我们”“愿意”为他“所治”，将怎样办呢?）我们认定治人是一种罪恶，所以人家若问我们对于政治的主张，我们很简单的回答，主张无政治。（未免太简单了！恐怕事实不会容许P.P.君这段简单的回答罢！）换句话说，“就是无政府，因为政府是政治的制造厂”这类不着边际的空话，是丝毫不能影响到政治本身的实际存在的！

（1）P.P.生说:“欧洲的劳动运动差不多一世纪了(其实在中世纪的学徒便有罢工怠业种种反抗他们的主人的运动，不过运动的形式较为简单，P.P.生说欧洲的劳动运动，只差不多一世纪，是错了)，劳工所得到的利益何在？劳工者的境况何如?一般劳动者至今仍旧留在颠连困苦中，重要原因虽多，要之工人没有觉悟到政治是污浊的勾当，总要妄想借政治的方法，做劳动解放运动，所以愈闹愈远……”

欧洲一世纪以来的劳动运动，直到帝国主义的大战以前（一九一四年），我们可以说没有做出很好的战绩。我们分析其所以致此的原因：

第一，自忠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国际解体以后，第二国际遂支配了欧洲的劳动运动；他们颇妄想以 Conquête de la majorité（译作获得多数之意）的方法（老柏白尔 Bebel在一九〇四年亚姆斯特坦的会议所提出的，是第二国际的根本观念）利用有产阶级的统治机关——巴力门parlement——做成社会革命；他们只是在有产阶级现政之下鼠窃狗偷的谋改良工人阶级的地位，而不知，也就不敢去破碎有产阶级那架统治机器，谋劳动者根本的解放，所以他们竟成了劳动者和资本家中间的缓和剂，反而使劳动者和资本家不能四目相望，短兵相接。

第二，则在一派唱高调的无政府党人，他们处在资本统治之下，犯着一种政治的“否认病”：他们在劳动者中间高唱与政治绝缘，催眠了劳动者的政治觉悟，遂致忽视了政治上的争斗，资本家的统治权于以安全的维系到现在。所以“欧洲一世纪以来的劳动运动”“劳动者”没有得到“利益”，“仍旧留在颠连困苦中”，乃与工人阶级的政治争斗说无与；而且正因为工人阶级不能作政治上的争斗工作，以致“劳动的解放运动”“愈闹愈远”。自一九一七年十月俄罗斯无产者的革命开了花，一九一九年三月继续第一国际的工程的第三国际成立于莫斯科：他是集中全世界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毅力，开始向全世界的资本主义示威；他是能以 La défensive et L'offensive（译作工人的保守和进攻之意）以抵制 La politique offensive du capital（译作资本的进攻的政策之意）的；他能捉住一切作战的生活的实在利益；他能使用种种的 tactique（译作策略之意）以应付一切的 événement（译作事变之

意），因此革命的机能于以复苏，现在无论何种国家，凡有劳动阶级在那里生活着，奋斗着的，都有了共产主义的出版物和微细分支的共产主义团体，因此全世界的劳动运动风发泉涌了。

（2）P.P.生列举布列阳（Briand），克里孟梭（Clemenceau）米勒郎（Millerand）一类叛逆的官僚派社会主义者的轶史，以象征无产阶级政治争斗之非，其实这样的例证，乃是拟于不伦。第一，布列阳，克里孟梭，米勒郎一派社会主义的叛徒，借工人的政治行动以谋官做的勾当，与共产党人所主张的工人阶级政治斗争说，乃如风马牛之不相及，不知P.P.生以何因缘把他相提并论。第二，如果说有人借工人的政治行动以谋官做，遂断定凡主张工人阶级作政治行动者都是谋官做，这样的说法，与谓无政府党人中有“下品的”“拆白式”的党员，遂断定凡无政府党人必定都是“下品的”“拆白式”的同样的为不合逻辑。P.P.生为欲破坏工人阶级的政治争斗说，在理论上苦无从措词，于是异想天开，乃抢拾一类不相干的政客轶闻，以为掊击之武器，而忘却了这个是“拟于不伦”。

（3）P.P.生说：“现在俄国凡人不服共产党所立下的条规的，就说他们是反革命党小有产阶级者，想大家已听到莫斯科国家的工厂法则了；一个工人迟到五分钟，所谓共产主义的国家，说他是违反规则，是一个无政府党，或反革命党，罚他去充军!!（见去年新劳动总会在St Etienne开会时 Barghi的演说），另外克龙斯大特Cronstadt的水手，为罢工的事情，被红军杀了无数；这是号称劳工国家的正义。工友们，俄罗斯国家对于无产阶级没有什么好处……于此可见一般了。”

P.P.生在此所引例证，是否属实，兹亦无从稽考；不过这类新闻，我们也时常在法兰西资本家报纸上见到，大概比Ba-

rghi的演说还要可靠！我们现在不欲以不好的心理，来否认P.P.生的引证；但我们第一要明白无产阶级的国家，是用以来压倒他的敌人，而不是用以来拥护任何人——不问他是阿猫阿狗的自由。我们知道工人的群众，是极为复杂的，其中一部分，思想是落后的，态度是犹疑的，甚至于复古的（如天主教的工团），反动的（如法西斯蒂工团），英法和其他各国的基督教的和自由主义的产业组合的组合员，何尝不是劳动阶级的一部分？那些站在施达曼(Scheidemenn)、刚百尔(Gombert)、孔萨旦(Konsorteri)、米索里利(Mussoleni)后面的劳动团体，不用说也是劳动阶级的一部分。但他们站在劳动阶级的地位，却要违反劳动阶级的利益，在工人运动中作怠工(Salotage)，叛他们的同阶级的朋友，与反革命合作，以服务于有产阶级。象这样的劳动分子，即在无产阶级的国家中，也是不容他们自由行动的，是要处罚他的，不是处罚他的利益，是处罚他的愚顽。假定P.P.生所举克龙斯大特的水手事件而不无丝毫属实处，则其事实必属此种。第二无产阶级的国家，不是只要挂着无产者的头衔，便可无条件的享受一切安富尊荣的。我们知道俄罗斯经过五年帝国主义的大战和革命后白卫军几度的蹂躏，加以国际帝国主义者的封锁，产业已是凋敝不堪；从胜利中出来的革命的无产者，他要以顽强的努力，于可能的速度以内，回复他那产业的原状，而且急求改进，以准备实施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非加倍奋斗不为功；我们见到列宁的《共产党礼拜六》就可知道先进革命的俄罗斯无产者奋斗精神的一般了。在这样情形之下，自然不能容那一类安那基式的、浪漫式的游闲怠惰分子，逍遥自在。假若P.P.生所举莫斯科工厂法则的事例，而不无丝毫属实处，则其事实，必为此种。无产阶级的国家，自有无产阶级的纪律，何必大惊小怪。至

于说“俄罗斯国家于无产者没有什么好处”，这不仅是你们无政府主义者如此说，保恩加勒(Poincare)、基尔松(Gurzon)米索里利和全世界的资本帝国主义者通通如此说。

(4) P.P.生说：“我们认定在政治上作争斗，非但于我们主义自身有背，而且有害于劳工朋友；我们认定经济组织，如果不能达到善良地步，政治也成其无所谓政治了（其实无政府党人要彻底的推翻政治，并非是主张一项必得舍弃一项，特恐行侯君未肯深研究一种主义遂要发议论）。”

“经济组织达到善良地步”，自是要图，然欲举此谈何容易？难道P.P.生还以为在资本统治高压之下，工人的“经济组织，有达到善良地步”的可能么？在我们，实不能作此梦想。我们以为要使工人的“经济组织，达到善良地步，”首先便得推翻有产阶级的统治权，推翻有产阶级的统治权，便是进行政治争斗！P.P.生也说：“无政府党人，主张彻底的推翻政治”，我请问：“彻底的推翻政治”，还是经济的争斗，还是政治的争斗？如说“彻底的推翻政治”是经济的争斗，则恐怕为常识所不许；如说这是政治的争斗则P.P.生又何以自解于“在政治上争斗，非但于主义自身有背而且有害于劳工朋友”之言？“在政治上作争斗，既于主义自身有背，而且有害于劳工朋友”，政治又是“污浊的勾当”，有如梅毒，偶一传染，便身无完肤；在以清高自许，大有不食人间烟火气味的无政府党人，自然望魏阙而远引，可知“彻底的推翻政治”一语，出自无政府党人，不过是偶尔兴到，妙欲装饰以自娱，借以弥缝其革命说之残缺不完，而塞捂击者之口。及至回到本旨，则又图穷匕见。“无政府党人，主张专从经济方面着手”，“在政治上作争斗，非但于主义自身有背，而且有害于劳工朋友，”这不是单纯的经济斗争说是什么？这不是“主张一项而舍弃一项”是什

么？作者顽愚，“未能深研究一种主义”，也就不敢“妄发议论”，还请P.P.生有以语我来！

(5) 德意志的工团主义者，受托尔斯泰的影响最深，中了“无抵抗”的流毒，结果乃至于清净无为；法兰西工团主义者受浦鲁东的影响最大，流入个人主义的英雄见解，结果乃产生工团的fonctionnarisme(这个字是吏员包办之意,可以译作“官僚主义”，译为“专办主义”殊嫌欠妥。) P.P.生说：“从来因为专办主义的原故——显明一点说，就是工人自己不与闻工团的事业，让一个总书记——头领——去干他们自己的事业,弄出很不好的结果……”恍惚工团本来是圣灵的，只是被几个天外飞来的“首领”玷污了，“工人自己不与闻工团的事业，让几个头领去干他们的事业，”是不是工团主义“弄出来的不好的结果”？是不是工团主义破产的明证？法兰西工团现在多数已加入与国际共产党合作的（即第三国际)红工团国际;P.P.生如果稍为留意国际工人活动的消息，当不否认这种事实；不知P.P.生又根据何种事实，把我那“此类工团现在已不疑惑的把他们的作战方向转到政治一面”的说法,加上两重疑号(??)？

(6) P.P.生说：“我们以为无论何等小的幸福，都要个人自己去做才能成功……我们只不赞成有几个头领包办或发命令；我们愿意劳工朋友自己办自己的事业……我们不愿象包办者一样，在那里包办一切……让几个头领来垄断与统治”。

我们认定无产阶级的解放，不是说当由无产阶级全体中的各“个人”各自为战的“去做个人自己的事业，才能成功的”。我们知道无产者的群众中，其革命的觉悟，决心和勇敢，是不能同在一水平线上。所以无产阶级的解放，当由无产中的觉悟的活动的少数集中的，坚决的团结起来，有纲领有计划的引着大多数来到觉

悟、行动的路上，而去干革命的事业。这个观念，在革命的工团主义者的见地上，也是如此：不过这个“少数”，在我们则称之为无产者的“前锋队”，(L'avant-garde)，在他们则称之为“行动的少数”(Minorité agissante)；在我们则称之为Communiste(共产党人)，在他们则称之为Syndicaliste Révolutionnaire(革命的工团主义者)(见Bulettin Comnuniste 5㊟ année, ㊟17法兰西工团主义者卢梭Louzon答托罗斯基的信中。)

你们——无政府主义者谓工团主义者所主张的“少数”则是合乎“正义”的，共产党人所主张的“少数”便是“头领”“发号令”“包办”“垄断与统治”；这真是朝四而暮三，则众狙喜，朝三而暮四，则众狙怒，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乃类狙公之狙。

(7) P.P.生说：“我们以为讨论税率工厂法不是什么争斗，不过是某种议会或委员会受当时工人势力所胁迫所产生的效果……”

我们以为讨论税率和工厂法，不是“工人”“胁迫某种议会或委员会所产生的效果”；乃是“工人”阶级取作战的形式，向有产阶级的统治机关——议会要求和他讨论的。P.P.生在一面却又说：“‘五一’八小时的纪念日，是劳工朋友自己的生命和血换来的；……工人待遇损伤、保险等费，也是各工人自己争到的……我请问八小时制和工人待遇，损伤，保险等费的规定，是不是属于工厂法的范围？既然是劳动者的生命和血换来的，为什么又说是某种议会或委员会受工人胁迫所产生的效果？既然是工人的生命和血换来的，还不算争斗么？原来P.P.生以为工人的政治行动，或带政治性质的行动，都是经济的争斗；只有号称劳工代表的议员在有产阶级议院中的活动，才是政治的行动：P.P.生这样的“完全”了解阶级争斗，作者只有五体投地敬服P.P.生见解

之高明了！

（8）P.P.生说："政治既然有人用他为压迫剥削别人的工具，还不是污浊的勾当是什么？自身不负什么好与坏的责任，这好与坏的责任，将放在什么地方去呢？"

政治因为人家用他为压迫剥削别人的工具，便是污浊的勾当，便当负坏的责任；本此推论，盗借刀以杀人，你将说刀能杀人，便是害物，这杀人的罪恶乃在刀而与盗无关，如此，恐怕为常识所不许！不知P.P.生何以闹出这类的笑话！？

P.P.生不懂得什么是政治，什么是政党，什么是政党和阶级的关系，什么是政治在阶级对抗中的作用，所以说出："把有产阶级征服以后，是否肯抛弃政权，以与平民为伍"的话。我只简单的反问P.P.生，"有产阶级征服以后"，社会中是不是已经没有阶级存在？阶级既不存在，则阶级的政党何由而产生了？阶级既不存在，则一阶级用以压迫别一阶级的权力何所用？政权失了作用，政党背后无阶级，这少数人的政权，何由而把持？

（10）*"使他们与我们为同一阶级"的说话，不是说：有产者与无产者为同一阶级以后，还有不同的阶级的存在，是说使有产者与无产者站在同一水平线上。比如某校生徒，原分两级，今把这两级合并而为一级，P.P.生能说这样的说法为不通么？这些地方，原无关要义，而且走出题外，不过P.P.生既欲于此故为挑剔，好象显本事的一样，则作者为尊重P.P.生的用意起见，也只得一一予以回答，请读者恕我的不惮烦了。

连载于《少年》第十号，1923年7月1日；

第十一号，1923年8月15日

---

* 原件无(9)

批评曾琦君底《神圣联合与统一前敌》

林　蔚

综观曾琦君在《先声》第三十二号上所发表那篇《神圣联合与统一前敌》之长文，得悉其立论底要点并无什么联合底诚意和主张，不过敌意攻击各党派，好为其新造底青年党喝彩和宣传罢了。《国民》对此，已有批评。但我再就其"滑稽之至"处，加以纠正。

凡是政党，必有其政治主张，换言之就是"包办国事"底方略。不然便不得谓之政党。所以就是曾君自己新造底青年党，人虽止数十，也是一样要想掌握政权，发表他对中国底政治怎样做，经济怎样做，教育怎样做，这就是说青年党对于"今日中国之国事"怎样"包办"。但曾君批评他党之"欲以一党包办国事"者，多为"自欺欺人"是何其矛盾!

我们觉得在曾君所谓"内乱如是其孔多，外患如是其急迫，民众如是其涣散，教育如是其废弛，实业如是其凋敝，交通如是其梗阻"底中国，不宜"小党林立"蹈"法国之覆辙"，宜效"英美"之组织大党，以担任革命工作。且逢此"万恶滔天之军阀，资本帝国之列强"亟须打倒底时候，如革命党人不谋集中其势力，统一其计划，迅速其行动，还要"任新分子之各自团结"，而后，"各

就其已有党员加以训练”，又乃“进而与他党联合”，“以行大规模之革命”，未免有点延长军阀和帝国主义之压迫而妨害国民革命罢！

法国在已经“小党林立”之后，鉴于“国势之危险乃倡为神圣联合之说”。今曾君“鉴于国势之危险”，且已知“吾人共同之大敌乃在顽梗之军阀、腐败之官僚”、“蹂躏弱国之列强”，而却主张未加入“已成政党”底“新分子”，“各自团结而成为大同小异自树一帜之新党”，是果欲何为？我看青年党底政治主张各条款并无强过国民党处，经济主张底分红制和劳工保护既不若共产党之彻底，亦不若平均地权、大产业国有（即民生主义）之带社会主义性质。如此何必定要分道扬镳？岂真一个大党底执行委员不够分配吗？（见《赤光》第五期《我们的态度》一文中张子柱君告同志周恩来语）盖其无意于真正革命亦可想见了！且即如曾君底主张“小党林立”然后进而“神圣联合”，但联合原是一时底现象，曾君能保其不象“混合”那样“时起冲突，互相牵制，转令革命难以成功乎”？本来“混合”如果不行，则“联合”亦必无效，这倒要请曾君注意比较一下。

曾君一面高唱“诚心诚意，联合新党，一致作战，共赴前敌”；然而他一面却将“所认为善类而属于新党”的如国民党、共产党等，凭他那“极端之唯心论者”底老法子“妄相揣测，恣为说评，以为攻击之资料”，这真是自乱其鲜明之旗帜，而示人以暧昧之态度！现在我要借用你的朋友胡国伟君的话来规劝你一下：“若不问友敌，只是排除异己，横加牵制，自乱革命行伍”，将“于革命前途发生障碍”。如果你“真欲救国，正不必以疑忌之眼光、狭小之态度对待已成政党”。共产党底国民革命与联合战线底旗子，已高竖诸东方大陆之上了。国民党为集中各派革命分子之故，亦早已

与“热心革命之团体”——共产党合作起来了。你们这“秣马砺兵，旦夕且发”底“新生之团体”——青年党，快快与国内那“秣马砺兵”出“发”已近三十年，至今还正在鏖战底国民党去会师罢！

论到共产党作国民革命与共产主义者加入国民党底问题，国内底共产主义派报纸解释得很多，即《赤光》对此亦经恩来、卓宣诸同志发挥得极其明白，不知曾君何故将已解释了的话，翻来覆去地说？只好请曾君再看下《赤光》底三、四、五、六各期便可了然。尤足笑者，曾君一面劝共产党人起来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而一面又责中国共产党不学在“欧美”者之“日以鼓吹劳工革命，推翻资本阶级为事”。又他一面劝共产党应本其“共产主义”，“与他党联合一致”；而一面又非难共产党各分子加入国民党作更合实际底联合。曾君亦知“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为何党何报所认定所叫出之口号否？曾君亦知“混合”比“联合”为更加密切、更合需要，而做国民革命工作时，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毫无“生吞活剥”和“同床异梦”之弊否？如果是“生吞活剥”、“同床异梦”，则共产党人又如何能加入国民党去做国民革命底工作？《共产党宣言》之所指示，第三国际之所决定，中国共产党之赞成加入，国民党之议决收纳，曾君假装不知而指为“生吞活剥”“同床异梦”，即离间革命分子之嫌，亦不怕“闭眼瞎说”、“不知为知”、“混乱是非”、“自作聪明”么？从今以后，你握笔为文时，最好是要先想一想再写！

至说“当此直系当权之日，虽民治派之要人尚不见容于北京，而共产党之巨子转得安居于首都，盖其无意于中国革命，虽军阀亦窥见之矣”。曾君此话果何所见而云然？据我所知：北京自直系当权以来，民治派(?)要人除掉自愿南下者外，尚未闻“不见容于北京”之说。反之，共产派人陈独秀几乎被捕，李大钊被监视，我

倒闻得了一些。此外如各地民权运动大同盟之遭解散，当年黄爱之被杀，去岁林祥谦、施洋等之被砍被杀，北数省之学生会凡揭出反抗军阀、反抗国际帝国主义旗帜者均遭解散，以及《向导》《新青年》之在京在沪被封，这又不独北京为然了。本来这些事在我们革命者处之并不算回事，只是以“至诚无妄之心”底曾君竟如此“蒙蔽”事实，殊令我莫解奥妙了！且曾君须知共产党在中国尚是秘密的组织，以秘密组织的分子在北洋军阀势力盘踞的地域而能暗中活动未被驱逐杀戮，凡我们革命分子都应表其同情。乃曾君竟以此刻薄语出之，然则曾君非至共产党人在北洋军阀治下被杀戮净尽不认共产党为革命党啊？哼！这个回答只须借用无政府主义者恶恶君答你的话，肯定你的文章乃是“专于对人”“专责他人”好了！

《赤光》第七期，1924 年 5 月 1 日

实话的反感

伍　豪

被私产制度践踏坏了的现实社会，最容不得人说实话。饰伪弥漫在人的心里，偶尔有人将内幕揭开，便弄得人人都大惊小怪。罗素说:“我爱真理，甚于爱英国”，无怪一般国家主义的先生们有时因过分爱国（亦即是盲目的爱）便要抹杀真理了。

我们因说实话，自然不免开罪于一般讳莫如深的饰伪君子，尤其是爱惜名誉的“长辈”，但我们决非如《先声》报国伟君所说：“若专以骂人为能事”者。在国伟君认同志任卓宣致曾琦一书“满纸都是轻薄之辞，谑而且虐，全不向理论方面着眼，只是断章取义地胡言乱说”。其实国伟君所指的轻薄之辞，许多都出自曾琦君平日惯用的辞句，若言“轻薄”，是曾君先犯了此病；若言“胡言乱说”，是曾君自已“胡言乱说”了。又曾君致赤光社信，亦谓卓宣同志“独摭拾鄙人之诗词，恣为冷潮热讽之语”。难道曾君的诗词，非曾君的主张所在么？惟我们深信唯物史观的人，倒要特别重视这类人，当兴高采烈或是侘傺无聊时所发表的言为心声之诗词——尤其是唯心论者之诗词呢？

且曾君批评共产主义者的文章早于《赤光》批评曾君的文章，在曾君责人之辞便不为谩骂，在我们录来借用便成谩骂。国伟君等岂真是未曾察觉者？

又曾君和其朋友们之责备共产主义者，多部分是从脑子里任意为共产主义者造舆论，自立自破。而我们批难他们的文字，敢断言没有一语是出于他们自立说法以外的臆造。曾琦君和其朋友们，我们纵因说实话而引起你们反感，但我们还要告诉你们：这就是唯物史观论者强似唯心论者之最大真实处啊！

《赤光》第七期，1924 年 5 月 1 日

航空学会的害群之马

恩　来

留法航空学会本为一般有志于航空事业的中国朋友所组织，谋同业的发展，集众志以成城，其用意未始不善。乃近来这个学会的创始者周道（即周培超），竟有假公图私的事实发现。其特著者为当张作霖代表来法购买飞机遣送一批学生学习驾驶，经各团体联合会反对正烈之时，忽暗往学校充当这批学生的翻译员。至外间传闻其虚称中华民间航空有限公司有三百万资本以至为定货而与法人失信等事，也都似因之证实。

这样一个惯于欺骗的军阀之御用人，他不但是航空学会害群之马，他并且还公然为以反抗军阀为职志的旅法各团体联合会的职员——庶务股的委员。旅法的全体华人啊！尤其是航空学会的朋友，各团体联合会的会员啊！我们岂应终此缄默一声不响？

《赤光》第八期，1924 年 5 月 15 日

为周道事答湖南学生会书

恩　来

湖南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公鉴：

于《先声》报端得读贵会致我的公开信，一悉种切。我之攻击周道，本因惜其以航空的好身手甘为军阀的御用人而不辞，益以向外定货不实，故遂认其为航空学会的害群之马，初与贵会无丝毫之损。今事隔两旬，既未见航空学会出头否认，又未得周道来函辩正，乃贵会忽于周道尚未"将此事源本详报"贵会"备查"以先，便来函责难，一口咬定我系"不负责任之攻击"，系"有心揣摩秦桧"，系"捏造事实，毁人名誉，自犯欺骗之罪，似是假公济私"。我真不知何所根据。固然贵会"为维护会员公共利益计，奖善惩恶责无旁贷"，未尝不可来函质问。但既承问难，又何以武断地说："倘贵刊所举第二项确系事实……无劳贵刊为之披露，法报应早已有详尽纪录"？然则凡法报所未纪录的"漏网之鱼"，我们即不应公然宣布么？周道为军阀的御用人！我认为是航空学会的害群之马，贵会竟以"周道君之行动视为当然之态度"。是贵会已确认周道有第一项事实，不过结论的判语与我不同。我固不能强贵会承认我的结论，但贵会亦不能谓我"惯作空言""捏造事实，毁人名誉"。至贵会既问我第二项"究系何人谣传"（我本言"外间传闻"，乃贵会改为"外间谣传"），又当贵会未得周道"详报"以先，

何以又能断定我系“将捏造者自己开脱不负责任”，我系“捏造事实，毁人名誉，自犯欺骗之罪，似是假公济私”，我系应“锄”之“奸”？且我所攻击的为一中国人周道，无关湘事，乃贵会竟以湘人自限。三湘民气，我素所佩，但不能因佩服湘中民气，便连一周道为军阀之御用人亦视为当然之态度不准批评。我想湘中革命青年未必便尔作如是观罢！

我在《赤光》第八期发表的评论，原为负责之言，今再作一更切实的负责声明以了此公案。

一、周道为张作霖所派来习航空术的学生作翻译员一事已千真万真，毋待讨论。只是贵会以此“为当然之态度”，而推因于此帮习航空术的学生“与吾人同负有革新中国政治之责任”为“一律反对”、为“不通之尤”。在我则以为私人派遣指习专科的学生根本上与官费生大有差别。官费生在学业上不受限制，在责任上对抽象的国与政府负责，此何能与私人遣送的学生学科受人限制，责任已有实际对象——军阀资本家等——相提并论。故我们对资本家穆藕初之收买学生反对，对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之招收学生反对，更何况军阀张作霖之遣送学生习航空术明明为其穷兵黩武之用的又焉得不反对。即使退一步说杨守仁先生之为“举人”、之为“随员”，黄、宋、蔡诸先生之“曾拾一领青衿”，犹能改为革命钜子，此帮受张作霖遣派的学生未始不可以变为革命钜子“为民国效忠”，但我们须知杨、黄、宋、蔡诸先生之可尊重处并不在其为“举人”，为“随员”，“曾拾一领青衿”，以及为“留日学生”，而在他们后之能改为革命钜子。且此等事又非能预期，更非能依样画葫芦地来衡现正受买的一般青年。因果如此，全中国皆无一可反对之人了。况此次张作霖派遣来的学生，不但我们不能断其将来能“为民国效忠”，且就联合会致他们的公函促其表明态度，经二

月之久终未得复的情形看来，已知他们是甘于“助桀为虐”了。又奉天学生来源，《先声》报第三十期固明明载着“张作霖派代表带领其心腹十人，每人给予学费三万方来法学习飞机”，我们又何必代为辩护？学生既是张作霖的“心腹”了，是为其“心腹”当翻译员的周道，我称之为军阀之御用人，一点也不冤屈。

二、外间传闻其虚称中华民间航空有限公司有三百万资本以致为定货而与法人失信事，我亲闻之于航空学会会员沈超、毛克生两君。沈君致毛君信中指“周道之妾”有云：“中华民间航空有限公司三百万之资本向外人定约，今信用已失，则我辈将来对于外人购货，颇有阻碍进行，目下又招外人之耻”。沈君且亲口向我说：这件事航空学会会员都知道的。我有人证，我岂曾造半点谣言？“也都似因之证实”，我尚是忠厚立言，否则照沈超君等的谈话批评，恐更要严刻多多。

最后，我正告贵会我是何人之御用人，我是真实主义之御用人。我为拥护真实，我不□得罪一切，唯贵会谅之！

《赤光》第十期 1924 年 6 月 15 日

请看反革命的青年党
之大肆其捏造

希　贤

《赤光》曾发出一段话说："当青年党讨论办理《先声周报》时，张子柱说："报纸仍就如是办起去，评论自然增加，新闻却不可减少，因为新闻我能时常更改或假造，以能使人愤激为目标。所以新闻是重要的……"。这一段话自九月十五日登出至今，张子柱已完全默认了。可知造谣是他们所不讳言而且公开的了。现在《先声》五十七期又登出张子柱在《旅法各救国团体（？）国庆（！）纪念筹备处》通告一则，意图欺骗旅欧华人，使他们都来笑骂革命党人，所以更大肆其捏造！不意国民党驻法总支部出通启：《斥青年党》。参加法西斯蒂国庆纪念会底共产主义者又针锋相对地出一通启，报告参加真相，指出他们的捏造来。现在我还要把他们欺骗旅法华人底地方略举一二奉告大家：

青年党说他们的"国庆纪念"是"旅法华人"的，当晚"侨法各界人士约四百余人"到会。其实，当晚全数的五百人，大□青年党人嫖的法国窑子，吊的法国膀子和其法国房东等要占其半。在这二百名华人中，革命党人占一百余，下剩的多是青年党人，"音韵悠扬"地"奏""乐"，"肖妙之至"地"扮""演""体态活泼"地"跳舞"。他们干了一夜。这本是青年党底十月十日俱乐会，"跳舞

会”，他们偏说是旅法华人底国庆纪念会。请看，这是何其的捏造！何其的欺骗！他们在《先声》五十五期上用“国庆筹备处”底名义登启事；在十月十日用“旅法各团体联合会”底名义散法文开会程序；在《先声》五十七期上用“旅法各救国团体国庆纪念会筹备处”底名义登通启，因为捏造的无定，所以应用也不一。这就是欺骗旅法华人底一个大破绽！至于说与二百多法国娼妓和房东跳舞，就叫“联络法国人民之感情”，音乐戏剧乐一场就可“使”他们“了解我国之真象”，不是与三岁孩子底话么？他们叫法警来捉共产党人，反被在门旁底共产党人说退了。当国内直皖战于南，奉直战于北底时候，而他们反歌舞于花都，我们更不知这是谁在“贻笑外人”，“暴露中华民族之丑态”？请大家想一想。

《赤光》第十八期，1924 年 11 月 1 日

请看《先声》周报之第四批造谣的新闻

希　贤

惯于捏造新闻底《先声》（参看《赤光》七、十二、十六、十八各期），现在又炮制出一批新闻来了。最明显的是：

（一）　该报五十九期上说："苏俄欲实行遣兵压迫中国，……军事委员杜洛茨基已于昨晚离开高加索至中国边界指挥集中此次之苏维埃军队，……目下驻高加索之苏俄军队五万人，已由杜洛茨基调至中国云。"（这是十月十六日消息）。

（二）　十一月二日，四川、湖北等七省勤工俭学学生会召集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总会于华侨协社，《先声》在其六十四期上说："十一月二日有曹德三，吴季蟠两人在华侨协社召集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总会代表会议。"

（三）　十一月三十日旅法各团体谈判会决议推八人组织旅法各团体临时代表团，请集学生总会职员和李不韪开会，居中调解。《先声》记者胡瑞图到会参加，后在其报纸上说道："结果推定……七人，克日带领付继光（该总会主任书记）面会李不韪，令其无条件交代，否则决以武力对付云云。"

这三件事，只要知道中俄边境至今还无红军来攻、或杜洛茨基从前离高加索到莫斯科，今又离莫斯科到高加索养病事，只要

读过勤工俭学学生总会通告，和旅法各团体临时代表团通启，便知《先声》捏造新闻，用不着驳了。为看新闻而读《先声》底人，应知反革命派就在迎合你们的需要，捏造新闻来宣传你们，欺骗你们呢！

《赤光》第二十一、二期，1924 年
12 月 15 日及 1925 年 1 月 1 日合刊

你们就是“反革命”和“军阀的走狗”

肇　　橹

青年党人胡国伟在《先声》六十三期上发表两篇□文：《谁是‘反革命’》和《谁是军阀的走狗》。

我现在大声答复胡国伟君一句：你们就是“反革命”和“军阀的走狗”。

你们的《先声》完全站在反革命方面说话。苏俄是革命的，你们反对；广东是革命的，你们反对；国民党是革命的，你们反对；共产党是革命的，你们反对。这不是“反革命”是什么？现在我试将你们谩骂广东革命政府和国民党领袖孙中山的例子举几个出来。《先声》四十五期假造蔡元培的话说“广东政府”“累到民穷财尽，庶政不振”。《先声》五十七期站在陈炯明方面说“孙氏为粤人之公敌，现已动员实行讨伐以为粤人除此大害”并诋“北伐”为“率众窜入邻省”。此等事实充满了你们的报纸。但是段祺瑞呢？你们以为“不足深责”；陈炯明呢？你们简直不曾赞一辞，这不是“反革命”是什么？

曾琦与研究系“暗送秋波”；周铁鸣为齐燮元驾飞机；周培超(即周道)为张作霖的走狗当翻译；邓孝情为王宠惠的旅欧中华国民外交会当办事人；胡国伟、梁志尹等捧王宠惠为领袖，组织旅

欧中华国民外交会，为官僚网罗青年。这些人不是军阀的走狗么？至于陈炯明的旧部张子柱为陈炯明组织旅欧反革命机关——青年党（见《赤光》第十八期《青年党才是陈炯明在法所设立底反革命分部啊！》）更是由秘密而公开了。其实你们不仅为“军阀的走狗”，且为国际帝国主义的走狗。美国帝国主义机关——青年会在法分部职员张子柱是你们的领袖，近且与美国帝国主义爪牙李钫祥重行勾结，去年双十节你们办“国庆”“跳舞会”，你们很光荣地去请法帝国主义的国会议长班乐卫来参加。这是你们为国际帝国主义的走狗之铁证。

有些人说你们的“内除国贼，外抗强权”是“内联国贼，外结强权”的面具，此语可谓洞见肺腑。然则你们还能说“青年党是爱国的革命党”“共产党是凭借外力争夺政权的卖国团体”来资掩饰么？至于胡国伟说“陈独秀……以宗亲之谊俯首帖耳摇尾乞怜于陈氏（陈炯明）”之前……后来独秀提倡“百善以淫为首，万恶以孝为先”的新文化（!?）的话和他称独秀为“老狗”，都是反革命党和复古派诋毁那个打倒中国封建社会思想如家族、礼教等的领袖之言！陈独秀是军阀的敌人，革命的首领，胡国伟现在这样残酷无理的攻击他，简直证明了胡国伟是复古之尤，反革命之尤，军阀走狗之尤！一句话，旅法界中最顽固最腐败最反动最可鄙弃的分子！悲乎，堕落的胡国伟！

《赤光》第二十三期，1925 年 1 月 15 日

《先声》周报之狂吠

京　岐

旅法反革命报纸《先声》对于革命党人谩骂、诬毁不遗余力，最近之于国民党态度便是很明白的证明。在该报去上年从“超然派”自居的时候尚少有所顾忌，待去下年因其宣传所谓“国家主义”和“全民革命”较激烈时，“超然派”的面具已自行揭破，所以攻击国民党便更进了一步。及于最近宣布所谓“青年党”宣言及党纲后，便完全以国民党为其眼中之钉了。他们是军阀的走狗，帝国主义的爪牙（其事证屡见于《赤光》上），故对于军阀和帝国主义之仇人——国民党痛恨不置。但他们不学无术，对于国民党的主义、政策不敢发一辞，而只用些最卑鄙最无聊的手段如挑拨之言论及荒谬之记载等来无理取闹。最近他们更不惜捏造事实、窜〔篡〕改事实，把无的事说有，把小的事说大。该报七十期的《孙中山属于美籍问题》、《广州商团店户受政府之苛刻》、《广东财政统一之无望》、《驻法国民党内部之纠纷》。七十一期的简要电讯中之香港电《孙中山至今始知段曹为一丘之貉耶》、《邻之厚君之薄也》、《任卓宣自讨没趣》，不都是这样的么？《先声》一则从“统一”二字为北京政府攻击广东革命政府；再则以为“段祺瑞不足责，孙中山才足责”；三则站在反革命的商团那边谩骂广东政府……。反革命党要攻击革命党，这是一定的。他们不可以理喻，所以我们

对于他们的评论和新闻，在目前认为没有驳斥和解释的必要。我们只希望党中同志，须一致攻打反革命派，勿为其挑拨之言论所惑，党外朋友，须了解《先声》周报的用心，勿为其荒谬之记载所欺骗。

《国民》第十二期，1925 年 2 月 25 日

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

伍　豪

新近旅法学界中有些人集资编印了一种非宗教的册子，名“无所谓宗教”。这本是一件好事，而且是当做的事。在那本册子中，“如何掘去宗教之根”一文，要算是杰出之作，只可惜文中最后一段竟以共产主义和宗教同列，殊令人大惑不解，且适足为全篇根据科学精神反对宗教的污点。著者曾谓“吾人不能于物质世间之外，复有非物质世间。”“……吾们的人生，是实际的人生。”“生活颠困为物质世间之缺憾，……这是社会组织及经济组织的问题，应让社会改革者去解决。”总此数语已知著者是接近唯物史观的了。著者信社会改革当重科学精神，然则科学精神又如何？著者说：“……种种社会上问题，我们发现了他的不安，我们便立当研究一个改革的办法，有了办法，我们立当去实验过了，如果有错，我们也可拿以再去更改，这是唯一的科学方法。”“我们只有去究研、去试验，终可以试验出一个最良最适的制度，除了我们不去试验，不肯改革，则终身困苦……”

我们试问问著者，马克思所提倡的共产主义有一点不合于上边列举的话么？在马克思以前，社会主义成为有产阶级中人的清谈，共产思想还存留在乌托邦中。自马克思出，一本科学的精神，寻出“物质世间”的最大缺憾在现代经济组织，而生产力的变

迁，更足以使此经济组织有必须崩溃之势。另一方更从人类史中，找出阶级争斗的痕迹，知道现今的“下层阶级”（凡加“”符号的字句，都是用著者语）乃是依附现代经济组织之下的最后最困苦的无产阶级。欲“铲除痛苦的根源”，消灭此阶级界限，顺着经济变迁可能的趋向，自不得不想出“一最公平的分配方法，最有效的生产制度，使生产者公有其生产品，而公同分享之”：这便是共产主义所由来，也正是马克思全部经济学说给以明确证明的。至于革命，更是“铲除痛苦”的不可避免方法。除非我们抱无抵抗主义，“求上帝无形之安慰”，“不去试验，不肯改革”便罢；否则欲用一个研究出的办法去实验，没有不妨碍旧办法的，没有不与他冲突的。

马克思正因为立论准乎“实际”，研究出来的改革办法必须“实验”，所以才主张实行革命的共产主义，信此主义的人，所以才能勇于实行。别的社会主义派别，或者还可容留宗教思想，惟独共产主义者对此种“牺牲弱者庇护强者”，长人依赖性，诱人容忍，“锢蔽思想”的宗教却深恶痛绝。国际共产党因此认宗教是人类中一种毒药。

至著者谓共产主义具有宗教精神，我真不知其何所见而云然，岂也受了罗素谓马克思主义已成了宗教的暗示么？其实罗素所指多在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本来革命精神多出之热烈的情感，理愈明，信愈真，感愈切，革命的精神遂能愈久而愈坚。这种培植情感使趋重“实际”的精神，不但改革社会须要他，便实验室中也不可离他须臾。牛顿没有他，引力原理未必发明；安斯坦没有他，相对论不会出世。在我们现在看来，牛顿有些地方的精神未免白用，但是安斯坦以前二百年的科学世界，果是谁的领域？且当其时，即至现在，又谁能说他是迷信？

迷信和信仰何别？别在其所信的理论与方法，能否用在“实际”上来“试验”，换过来说，便是能否合乎科学精神。所以同一参加情感而成为意志的“信”，乃有“迷信”和“信仰”之别（其实只说一“信”字便足）。再申说一句，凡有所“信”都不应趋越于理智范围之外，出此便为“迷信”，准此，我们能说纯本科学精神探求出来的共产主义具有宗教精神么？

共产党人对于他种为有产阶级作辩护，或是无形中阻人前进，引人空想未来天国的种种学说，“不能接受，不能容忍，”而更加上合乎“实际”的批评，这正因他有信仰主义的热烈精神和改革社会的决心。他决不能学自由论者之徒尚空想，还以为是乃本诸科学精神。为要解决物理学上的问题，所以牛顿，安斯坦各信他们的发见为“不易之良方”；为要“铲除社会痛苦的根源”，所以我们才信“共产主义为不易之良方”。假若我们对于马克思本着科学精神研究出来，急待试验的共产主义，信而又疑，不去实行，我们又何必谈“信仰”，又何必谈“试验”，谈“改革”。相信安斯坦学说的人，才肯替他证明日蚀的移动是合于他的理论，替他奏此凯旋。那么，相信马克思学说的人，视马克思的著作为可贵可重，又何足怪？凡是相信某种人的学说，对于其著作，无有不珍视之理，何况急待试验的学说，便甚言之为“经”为“典”，也无可议。

教徒对于神父牧师只有迷信，即心知其非，口亦不敢言。至于共产党人一方服从领袖的指挥，一方时时监督其行动！著者止知俄党爱护好的首领，也知各国共产党人时时驱逐其不良的首领么？即在俄国当日，此类事亦极多。

共产党当然不要“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自由论者，但共产党也决未曾想造出蠢如鹿豕只知服从的党员。旧式的军队除掉被愚弄和服从外无他事，今日的红卫军却有了劳兵会议。军队犹如

此，他种组织，更不待言。

著者对于《资本论》亦曾读过未？不知其从何而证明“资本论所搜集之事实，即以最有力的暗示，利用人类好杀的兽性，以激动其报复及争权的野心。”因为资本论搜集的“事实”（注意此两字），甚有伤“上层阶级”的体面，多是些残暴掠夺的罪状，遂谓马克思借此与人以暗示。马克思本此以主张共产主义，主张“下层阶级”当将握特权的“上层阶级”赶走，好消灭阶级界限，此不仅暗示，马克思且曾彰明较著地嚷出来了。但著者如此说法，不惧犯有拥护有产阶级的嫌疑么？然则又何解于“铲除痛苦的病根”与“生活颠困为物质世间之缺憾”之言？若以宣布一种阶级一派人的罪恶便以为“利用人类好杀的兽性，以激动其报复及争权的野心”，则《无所谓宗教》一书也具有宗教精神作用了。

至其谓“驱下层阶级以杀上层阶级，率共产教徒以制服异已……”我们第一须认清在共产主义中所认定的“上层阶级”与“异已”果属何人？共产党人指导劳动阶级驱逐有产阶级和附属他的军阀官僚，更使之由有产化为无产来尽人人劳动的义务。这种解脱人类全体，引人向善，并使之有路可走的精神，岂轻轻可以“报复争权”等字样抹杀掉的么？至于杀与不杀，那纯视反革命的举动如何为定。革命是不能不流血的，除非著者与读者是抱无抵抗主义的人，尚可以“杀”字动人，然而又何解于“消灭”此不平的政治组织与“铲除痛苦的根源”之说，且更何解于“科学的精神”？

强他人迷信其教条，故基督教说爱之结果为杀，共产党人不仅不说那“爱仇如友”的空语，且也未尝“强他人同其信仰”。反过来，恐怕那有产阶级却正在利用宗教精神使人人麻醉于“自由思想”好听的名辞之中，无形中却为旧制度作了保证而不自觉呢！然则“十字军之东征”“左手执《克兰经》右手执刀”的譬喻，也止有放

在“上层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异己”身上为当了。

至于说到“得势”的赤俄，则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更使指导无产阶级、以无产阶级利益为利益的共产党人充当先驱，乃政治经济过程中的必然趋势，有何足怪！若谓“以首领之意旨，强迫人民服从”，著者亦曾知赤俄政治上的首领须服从劳动会议（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及人民委员会的决议么？著者亦曾知劳动会议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常变更人民委员会的决议么？而劳动会议代表更有为无产阶级中人撤换的事么？再“人民”是何所指？若谓赤俄首领为拥护无产阶级利益起见强迫反革命派的人服从，有类于罗马教皇，立意未免滑稽。著者试沉心想，今日世界除赤俄外，果是何种阶级的天下？我们果受了何人的强迫而须得服从？且所已得的自由又是什么？不要说实行反抗旧制度，反抗“上层阶级”了，便是为拥护被压迫阶级利益而有所结合，有所主张，也要常常受那维持特权阶级的法律干涉，而社会上受了宗教精神之毒的人不一定是教徒，更要轻蔑排斥你到了万分，并且有生以来便无形中受了各方教育的限制与暗示。试问自由在哪里，自由思想更从何说起？旧制度旧思想既然把人心锢蔽得这样，一旦无产阶级为解放人类全体，而夺得政权，在过渡期中为要肃清旧毒，扶植自由的新芽，对他如何能不加以限制？不然，还得请出“沙”，请出克伦斯基政府来好了，但又何必“改革”，又何必“实验”？又何必“实现出一最公平的分配方法，最有效的生产制度，使生产者公有其生产品，而公同分享之”以图“铲除痛苦的根源”，而得到未来真正自由发展的协同社会呢？

著者自信为拥护科学精神爱好自由思想的了，但他文中这最后一段话，实太不科学的了，太不肯跳出旧思想的圈套中来自由思想了。

著者立论着眼在“掘去宗教之根”。但此“根”隐伏之所，决非在科学的共产主义中，凡是那描写出一个理想的天国，而无法实现的一切学说主义，都还有宗教迷信的毒根在内，即著者“成功即在目前”之言也都含有几分心理上不科学的宗教毒质在内，想又为著者所忽略了。凡真拥护科学精神，爱好自由思想的人，也都有责任去纠正他!

《少年》第二号，1922年9月1日

罗拜在罗马教皇脚下的中国学生

耻

不堪生活压迫而跑到法、比资本帝国主义的走狗神父雷鸣远跟前讨饭吃的中国学生已万分懦弱而可怜，但不料他们中间竟有丧心病狂甘心认贼作父联名上书罗马教皇请派人到中国建立什么“本笃修院”以流毒内地的，我们纵忠厚，也不能不骂他们是无耻之尤!

此事出之于去年夏间，他们上罗马教皇书的原译文为：

“至圣圣父，吾侪中国教友，谦恭敬畏，趋伏圣座前恳请在中国创立本笃会院。吾多数学生有寄居玛来苏布吕热及索赖本笃会院者尤共表同情。忆昔欧西归圣化，人民诚服宗座，多赖该会诱掖辅导，乃收实效，然则该会固宜发展于我国也。

兹查有索赖修院神父名若利叶者，昔为海军舰长，在中国有年，精通吾国语言文字，及其同会数人极愿牺牲自己前往中国创此新事业……统观中国现状，设立本笃会院，恰然迎合时机，而又仪型流俗，政府绝对不加阻力，可断言也。故敢竭诚请愿恳祈圣父提前派遣若利叶神父及其同会修士早到中国，就地筹备一切。吾侪深悉若利叶神父怀抱利器，胸有

成竹，于组织中国修院，必能措施咸宜……所有恳请设立本笃会院者实欲促使吾国同胞早归圣化也。伏祈圣父俯察东亚神子之愚诚，而锡以嘏福。”

在此书底稿之后，还有雷鸣远的一封公信，信中说：

“同学公鉴：径启者，兹有索赖修院神父若利叶，昔为海军舰长，寄居中国多年，现不忘情于中国，拟与同会数人前往创立一本笃修院。查该院耑司在网罗古典，阐扬文化。若创设修院于中国，实沟通中西文化之泉汇，远深望其得告成功。兹特以留欧中国学生名义上一请愿书于罗马教宗。伏乞各同学于中法文呈文之下，分写各人名字，以便奏请圣座，至成斯举。……

一九二三年六月十日　雷鸣远启”

信后随列有十四个地域的名字，这便是表明此十四处均有猪仔式的中国学生，当我们得到此项被泄漏的秘密文件时，上边已有三十二人签名；他们的姓名，可以不必宣布。

这样一件“令人发指”的事情，我们诚不识签名于此“呈文”上的人是何心肝，而能这样谦恭敬畏，趋伏圣座前，恳请罗马教皇派遣一个“昔为海军舰长寄居中国多年现不忘情于中国”而文“怀抱利器，胸有成竹”摇身一变为神父的若利叶前往中国创立什么“固宜发展于我国”“欲促使吾国同胞早归圣化”的本笃会院！并且还要假借“留欧中国学生名义”。哼！你们若是稍有天良，你们□曾扪心忏悔否？无耻的宗教徒！

但我们也决不拒人为善，果使你们有丝毫悔过之心，你们便宜立即与雷鸣远绝缘，恢复你们当日劳动神圣的生活。这样，便是你们真忏悔的表示，而且你们也将从真实劳动的努力中醒悟到你们现时跪在天父面前祈祷的虚伪！

《赤光》第三期，1924年3月1日

可注意的中法友谊会

林　　蔚

由“中法监护中国青年委员会”摇身一变的“中法友谊会”，近来忽将他的机关收拾得非常精美，会内有会客室、阅报室，专门欢迎中国学生惠临，并且看戏有半价票，诊病有义务医生，媚外的成绩好的，可保送入学，发给学费。我又曾亲闻该会中人言，勤工俭学学生报名宜快，日内即得选拔一些学生送入学校。

这样一件可耻的法国帝国主义走狗收买中国青年的事件，我们实不应轻于放过。他的内幕可指出的有：

（一）　中法友谊会雷鸣远已伸进手去，凡他所荐举的学生，均被送往学校，领取学费。

（二）　中国青年监护委员会原为与华法教育会和中法大学委员会相抗的机关，今他鼓吹学生至友谊会报名，至少亦必含有借此可以把持将来庚子赔款一部分在法施行中法教育之权的野心。

（三）　中法友谊会的主持人与法外交部有密切关系。固然友谊会过去的费用不少是从中法两处捐助来的，但他这次敢于这样大作，至少亦必是金佛郎案快将承认之兆。

（四）　他用报名和选拔法，一方既失普遍求学之旨，他方且可任意收买些驯服的中国青年。

在如此包围的情势中，旅法的中国青年啊！我们终应有相当

的办法拿出，并且要有公共一致的主张拿出。

《赤光》第八期，1924 年 5 月 15 日

评胡适的“努力”

飞　飞

胡适先生本是我们所敬爱的一个人，他的思想和言论很有些令我们佩服的地方，但我们看他最近在“努力”周刊中所发表的一切政论，却使我们非常失望，且更使我们的革命主张得到坚确的反证。

有人说，胡适提倡白话诗，有人去尝试，等到他提倡手枪炸弹，却没有人去干了。其实有没有人去干，那另是一个问题，我们所失望的，乃是胡先生对于政治太缺乏了革命的精神。

在“努力”第四期中，有人问他：“还是取革命手段呢？还是取改良手段呢？还是先破坏后建设呢？还是在恶基础上建设好政府呢？”他的答案是：“最好双方分工并进，殊途同归”。我们真不解一方要在恶基础上“努力”建设“好政府”，一方认定非先破坏不可，这个工怎样分法！怎样能殊途同归？除非胡先生先站在两者之间袖手旁观，等到双方打得不得开交时，他再来领着“殊途同归”。

胡先生是以“打图起屋”的人自居，而以“烧房子”的人待人的，但是房子还没真烧，他却要告人先来做“收拾颓椽剩瓦”的事，自己以为可以在那里打图好备起屋了。果然他所打的图是烧了房子后的新图，那还可听他在那里把图自玩，如是一张好图，尤可供大家的研究，只是他所打的图样是要在破漏将倾的房子上添补

丁，添那不可能的补丁，这不但徒劳无功，且更阻止革命的发展。

胡先生先迷信“公开的南北和会”，继迷信公开的“各省会议”会能解决时局，实现统一。姑无论在现在的群盗割据，争为雄长的情势下难以做成，且决难有真正民意的代表，便是会开成了，便是大家真肯“把袖子里把戏都摊出来”了，试问如何能有满足各方欲望的结果？不满足便争。如果人民象胡先生所说，“用手枪炸弹罢工罢市”对付分赃会议的办法对付他们，他们竟不争了。然而各大军阀又肯容忍么？不容忍，还不是一样地要用手枪炸弹罢工罢市的办法么？与其这样弯曲（但这还是我们替胡先生推论如此，他并没有这样坚决主张），何如不直说“打倒军阀”呢？这不又是胡先生缺乏革命精神的明证么？况且手枪炸弹罢工罢市止能做革命的导火线，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若徒以手枪炸弹罢工罢市来恐吓，则手枪炸弹，他有躲避之法，罢工罢市他更可以军队来压迫。这样薄弱的主张亦自不能与有组织的革命视为同值。

胡先生的政治主张，所谓“我们最低限度的要求”，自然离着我们共产革命的政治主张很远，但即便合于民主政治的要求，在现在军阀跋扈列强侵吞的中国情状下，也止有一个民主革命才能达到，才能完成民主共和的工作。然而胡先生竟不作如是想，以为在世界帝国资本主义和军阀的支配之下便可建立“好人政府”实现其政治主张，这不是做梦么？

现今的中国在世界帝国资本主义包围之中已夷为半殖民地，一举一动都受列强干涉，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而胡先生偏认在此列强均势之下有利可图，漠视北京东交民巷所牵线的英、美派外交家，竟认其为“好人”，信美国政治家（即美国帝国资本

主义的走狗）可亲，特跑到代新银行团游说、鼓吹宪期借款的美顾问芮思施家讨论宪法问题。张作霖明明已是日本的爪牙，英、美的政府又正向直系军阀送秋波了，而胡先生竟还赞成“由政府公开的调解直奉的私斗，消除那逼人的战祸”的主张，还以为这是“最大胆的”计划。军阀卖国还要调解，我们真不知是顾忌军阀啊，还是怕投鼠忌器啊？这样短视的外交眼光，这样敷衍妥协的政论，而想做“全国的观象台，斥候队”，而以为是乃“研究事实，观察时势”的主张，我们真不敢信服。

“没有好社会，哪有好政府？没有好政府，哪有好社会？这一套连环如何解得开呢？‘噼！’的一声，连环解了！”这是胡先生最得意的“努力歌”，但是我们竟不明白这位哲学教授指示人“干”的地方，究在何处下手？然而他却说了“从下手处下手！”这样地笼统话，能令我们满意么？

胡先生又曾宣誓说“各行其是，各司其事”，我们便不恐惧他这话同样会被各大军阀，新卖国贼的外交系，基督教徒和要钱的议员们拿去利用，他自己这种圆滑的精神已实足阻碍革命精神的发展了。

因此，我们乃敢大胆地指出胡先生已是缺乏了革命精神的人，知此乃知他在“努力”上所发表的妥协的统一会议主张，伪和平的联省自治办法，和能说不能行的他们好人政治，都是些不落实际的废话，凡是有革命精神的少年们岂能受其蒙蔽！

“太坏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恶势力偏不容纳这种一点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这也是胡先生说的，我们便因此假定胡先生确有迫得不得不上革命道上的那一天，真能做他所谓“君期我作玛志尼”的玛志尼，然而绕了这些道儿，迷惑了民众多时，这是何等的不经济！

胡先生答“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说“我们并不菲薄你们理想的主张，你们也不必菲薄我们最低限度的主张，如果我们的最低限度做不到时，你们的理想主张也决不能实现”。但我们却要代答胡先生道：“我们却很菲薄你们的最低限度的主张，而尤其信依着你们最不努力的方法，你们最低限度是永远做不到的。至我们的主张，只有用政治争斗的革命手段才能实现，我们殊不愿上你们无革命精神的大当”。

《少年》第六号，1922 年 12 月 15 日

胡适等之政治主张与我们

R

胡适、蔡元培也公然发表政治主张了！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本是最违反人性的话（也是圣人故意矫正人性的话）。一个人的生活或其所赖以生活的事业或其生活欲，如屡受不可堪的压迫，但令其人不肯听天由命，没有不想把支配生活的政治或经济，或其他，来自己处置的。近年中国的教育是不是已被压迫到几乎不能继续的程度？所以至此，最显著的因缘当然在政治。那么，靠教育吃饭的人，逢政治表面略有可为之机，公然出而发表政治主张，又何足怪？

所以胡适等现在之想参预政治原是当然之事，在这一层，他们的活动是无可非议。所可非议的，不在其来主张，乃在其所主张，不在其活动，乃在活动的方向。

他们的主张与活动方向总而言之，不外趁机，改良，无根本不可变的主张，而随机会迁化。不察病原，早晨头疼，早晨医头。晚上脚痒，晚上又来治脚，这个，我们是不屑细论。我们今当简单明白告大家以四事。

第一，一个人或一阶级的政治主张总是为其人、其阶级自身的生活利害而发。胡适等是知识阶级的人，即靠知识生活的人。傥其主张能成功，他们的生活与事业固然应能得安了。大学校长，

大学教员，固然可以因此越发作的稳了。以医学博士为职业的人，固然可以从此更能显扬其职业了。可是至于一般小民，至于农工，生活如何则犹难必。不但不能必其利，至少一部分必且要适得其反。根本原因即在士绅与农工，生活方法不同，智识阶级历来是资本阶级（靠资本生活的）的附庸，必不敢过于得罪资本阶级，利害如何能与农工小民相容？晓得这个，职业非大学校长、大学教员、医学博士的人，如也要生活得安，还非出来自作主张不可。你们如但能助人呐喊，你们必落得百劫不复！

第二，胡适的根本主张不外好政府。大家想想，他这所谓好政府，是不是能更好于美、英、法、日、德的政府？便令其理想，不止于此，然充其办法条件所及，所得的是否能愈于此？这当不难一言而决；便令胡适及其朋友的好政府真能得到，必不过与今日、美、英等政府是一丘之貉。这等政府，不但现状，便其趋向，便其可能，大家当已明见了。在这等政府之下，劳动阶级（靠自家劳动生活的），养活人而治于人的人，还不是同样的生活不能得安。我们究何取于此？我们究何取为“打这个不必要尖”而弛人前进之心？

第三，他们主张好政府，他们主张优秀分子结合抵抗恶势力。一个日报曾问以优秀分子怎样才敢结合，自我们看来，今日中国政治之坏，并不在有优秀分子不能结合，而实在并无几个优秀分子，并无几个好人（为慎重，说无几个，事实也许并一个也无）。就令有几个象煞的优秀分子、似乎的好人，能力也都欠缺的利害，如果真有好而能的人，政治绝不会糟到这个地步。既然如此，主张好政府而唯现成的优秀分子是赖，究何异于空中筑楼阁？

第四，他们的主张如此了。我们自己怎么样？我们的主张，

自信比他们的，切实的多。我们并不立时主张什么好政府。我们主张即刻要有的只是一个共产党，公开的共产党，强有力的共产党，极有训练的共产党，万众一心的共产党。他们要求好政府，他们并不能实现好政府。我们见共产党之必要，我们自己就可组织共产党。有人必说："无好政府，不容共产党之发生。"是的！美国政府，自美国留学生看来，总还下得去罢？然而竟不允许共产党。俄"沙"也未尝容许过共产党，然而强有力的共产党竟能成立，因之而有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的空前革命，只赖其力，维持至今，根基日固。共产党是劳动阶级的代表，是劳动阶级的先驱，是要使人人□得其所的，是不许一人逾其分的。共产党主张的，因此绝不是少数人的利害，共产党的人必须是劳动阶级或同化于劳动阶级的。必须有死也不改的信仰，必须了然于同阶级人彼此利害的共同，且认除此共同的利害，别无利害。必须对于现世的恶，誓死不相容，这样的人，中国是有的，必须由这样的人，当仁不让，造成强固的共产党，中国事乃有可为。

《少年》第二号，1922 年 9 月 1 日

旅法的中国青年应该觉醒了

——投机、改良与革命

列　父(赵世炎)

一

越是被压迫的人，其阶级觉悟、革命之观念发达越速，这是一定不易的。但若遇有无产阶级之叛徒，其反动的行为不见于无产阶级壁垒森严之外，而反发生在群众的队伍以内，矫其性情，昧其良心，染受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而变为投机者，改良者，这又是历史上常有的事实。我们认为在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对于这种事实是要随时随地能够加以辨别的!

在旅法的中国青年中，形成为无产阶级的队伍的，自然要算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了。最近有两件事实令我们证明：一个是在勤工俭学生中宣传革命所起之反动；一个是华工因教育运动而团结一致。对于前者，我们已可以从事实上指出这些反动者之无意识，可怜、可悲；对于后者，我们可以察看华工在现在情况之下，其阶级觉悟之观念尚未发达，故惟教育运动是重要的工作，而惟有这一种工作，才能完成他们的使命。固然，不用得说，华工的本身已是一个阶级了；至于勤工俭学生，我们亦已认为形成为无产阶级中之队伍的。在过去的历史上，现在的情势下，以及将来

的命运之中，勤工俭学生所处的地位，都是一种被支配的地位，除了瞎子疯子以外，这是无论何人都不能否认的。勤工俭学生欲求明了这种地位之观念而且谋所以解脱，便没有职业上的差别，而正与青年的工人和农人一样，必须先为自己的生活条件而奋斗。在这个生活条件奋斗的过程之中，勤工俭学生所当觉悟的是在现社会制度之下，没有妥协可言，没有正义人道可言。小资产阶级空想家所供给我们的协调的概念，完全是我们现生活中的麻醉药剂；至于糊涂暧昧专门制造日本帝国明治维新时代之毒恶空气，而发为言论以向我们宣传的，那更是要为我们所排斥屏除，不留余地了。

二

我们的同志世炎曾经屡次在勤工俭学生会评议部中说明：我们一般朋友在学生会中之努力是一致的，始终不懈的；我们努力的着眼点是在全体的利益，同时也为我们自己的利益——一个人说作事完全是为人而不为自己，那是自欺且欺人的。我们青年革命主义者的奋斗，为人，同时亦为自己——我们是共产主义者，同时又正是勤工俭学生；我们以勤工俭学生的资格而来过问勤工俭学本身的事务，这是必然的；我们所过问的事务，处处本共产主义的见地，这又是一定不易的。这个，在群众中间当然无所用其奇异；在反动的分子的客观的事实上，亦犯不着叫他们神经过敏而致于大惊小怪。因此，我们的态度是始终光明坦然，我们对于反动者之无聊的举动在暂时只有置之不理，听其自生自灭。至于在形势上成为对敌——实则毫无所谓——的所谓的无政府"党"人之随便乱说，我们站在共产主义旗帜之下的青年同志，只有在学理上愿与无政府主义者辩驳讨论。若是出之以嬉笑谩骂的态度，

完全不具有主义信仰的青年的精神，则我们绝不至认为有作相对的回报之价值，而但与对待无聊的反动者一样，虽然是太宽泛了，但其意义本是相等的——暂时只有“置之不理，听其自生自灭”了！

同志世炎这种说明是相合的——合于我们青年共产主义者的态度的。然而事实又教训我们：在无产阶级队伍里面，这种态度竟不免是消极了！我们还是必须审定我们的积极的工作，而所谓积极的工作之标准，仍不外乎如本志第三号上所发表的“我们的职务”一文中里面所申言的，也正如同志世炎所说，我们的努力是要始终不懈。我们之所以见到如此，乃因我们看出在无产阶级群众中，革命之宣传尚未普及，而反动者竟乘势而起，一般毫无所知者竟可以自称为改良，投机派，占据在一种混沌的群众观念上而利用其弱点以为其宣传了。在另一方面，所谓的无政府主义者，只知高唱自由，忽视了现代社会生活所决定的群众意识，专门占据在抽象的观念上，发些空论，以迷惑群众。我们见到这种事实，自然不能忽视了我们当前的工作：我们共产主义者的行动，就是要随时随地能把问题与事实打落到实际上面。

三

为了一个“十万元”的津贴的问题，我们勤工俭学同学曾作一次最后的团结了，然而七八个月的努力，现在怎么样？我们同学曾经能够跳出被支配的地位以外么?!为了一部分的同学被宗教的诱惑，许多人曾经大声疾呼的攻击了，然而至于今日怎么样？在“天主”的魔旗下面，反跑去一百多个我们的旧伴侣?!!为了团结的要求，欲表现勤工俭学之真正声音，同学们踊跃募捐把学生周刊组织成，然而时间不久，为着供给少数人投机改良之把持的牺

牲，充分的暴露了一些丑态，至今又几乎不能存在!!一千多勤工俭学的同学们，大家都到哪里去了？这样清显的事实，明白、深刻的教训，大家还不应该觉醒过来么?!!!

《少年》第七号，1923年 3月 1日

健社纲领草案批评

J

当健社初成立时，偶尔听着有些批评底话，我以该社尚无何种活动，而又是不能于无事实之中学“人云亦云”地来相批评的，所以莫能有意见发表。近来得该社纲领草案一读后，知道他们是主张社会民治主义（即社会民主主义）的。就此纲领全部来看，大致都还不差，唯其中实有许多不妥当处，兹特据理条列已见，以作批评，此外初无他意。倘语言有直率处，请健社诸人原谅，以下便是我的批评了。

该纲领草案中开始有云：“多数人怎样团结呢？盖人类各有良知；凡由良知发表的己见，必可得多数人的同意；团体的成立，即本于各个人的良知。”团体大概是成立于各个人相同的要求和相同的利益上面，绝不是“本于各个人的良知”。良知是什么？良知就是对的么？由良知发出的意见就可得多数人的同意么？这实在还是一个问题，如何可为团结底根据？这几句话简直是唯心论者底常谈，失掉了社会主义本唯物史观见地主张改造经济组织社会制度底立场了。因为一个唯心论者底改造社会之意见，就是改造人心，与社会主义底出发点不同。但看后面“此正吾辈联合有觉悟的同志组织团体力图改革的时候了！”一语，可知健社之成立，是于各个人有改革中国社会底觉悟和要求，然而这样前后相

矛盾起来了!

对于"阶级"的认识，该草案说："酿成阶级的病源，完全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制度，"这话是不合事实的。我们知道人类底历史是阶级争斗的历史；阶级是有史以来就有的；在上古底贵族与平民，自由人与奴隶，在中古底领主与农奴，行东与佣工，就是很好的证明；不过因资本主义生产把他化简单罢了，所以不能象那样的说法。看此纲领中所谓："社会民治主义改革的目的，不单独解放无产阶级；并且要把现在受陷害的人类一齐解放。"由前面所说："近世的社会，……由这种经济的进化，把人类分为有产与无产两阶"来看，把有产阶级推翻，把无产阶级解放后，所谓现在受陷害的又何所指呢？再看后面"我们的主张，不欲使无产阶级为将来有特权的新贵族；但期其废除资本阶级和各种有特权的阶级"数语，知道他们阶级的认识，很有点欠明了。并且无产阶级革命后，是要把他的敌人无产阶级化的：既然，那时便人人俱属无产阶级了；如果无产阶级为了将来"有特权的新贵族"，即是全人类底地位增高，有何不可？况且莫有旁的阶级存在或受压迫，所谓"有特权的新贵族"，从何说起？总之，任何社会主义者，"阶级"二字是要闹清楚才好的，万不可稍有忽略之处。

读到"民国以来的政权，都是军阀在操纵……中国底社会黑暗如此，社会的危亡在所不免，个人底生存岂能有幸？"这一大段，描写中国有革命之必要，可谓十足！但是后头有段乃说："中国现在文化，政治，经济的状况都未达到大改革的程度。"这种主观的判定，未免令人失望！就中国政治来说：他们已知道军阀残暴，外国资本家掠夺，人民痛苦，政治污浊，健社也是到了中国当"力图改革的时候"而成立的；然后还说"未到大改革的程度"，这是何等的矛盾!?就经济上说：他们知道中国有少数资本家，知

道经济进化有向资本主义走底趋势，所以说："倘不设法预防，将来也总要达到欧美现在的现象！"可是"俟工业等物质能力进步，……然后始有大改革底机会"一语怎讲呢？这不是又有姑息中国资本家之嫌么？最后看他说："并且不插入政途，掌握政权，则变私有生产为社会化生产的目的也不能实行"数语，毋怪乎他们"经济的改革""变为""政治的竞争"是"插入"，原来他们是不主张"革命"的，所以全部纲领，始终未说及他们要革命的话。健社的人们！这种资劳携手的办法，够了，中欧社会党改良派（中欧此等人大率已"插入政途，掌握政权"了，）底运动，已给我们证明其不可能了，莫要再蹈覆辙罢！

纲领中还有几句最错谬的话，就是："近世谈社会改革的，大要有两派，一派专从政治下手，排斥社会主义；——民治主义，帝国主义足以代表此派——一派专着眼社会主义，绝端否认政治；——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者足以代表此派，"民治主义在封建社会史之最后一页，倒是"谈社会改革的"；现在他的寿命，已到末日：因为有产阶级快被推翻，所以有产阶级共和也就不能存在；而现社会的病象，也正是有产阶级用他造成的，如何把他当"谈社会改革的"看？"帝国主义"乃资本主义极发达时底凶恶形象，今承健社诸人不弃，把他当"谈社会改革的"看待，未免太过于优礼有产阶级了！在这谈社会改革的四派之中，却未说及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为"谈社会改革的"派别中之最占重要之位置者（这话不是我夸大，是举世之公言，反对者亦不能否认的），如何可以舍弃？在他们或者以社会民治主义即共产主义，殊不知现代的社会民治主义与马克思时代底社会民治主义大不相同；我前以此问健社中人，他亦承认，而且以此为健社纲领之一缺点。另外，我觉得他们把社会主义认为是管理经济问题的，民治主义认为是管政治问

题的，而此“二者是互有密切关系的，绝不能偏重一面”，所以他们主张社会民治主义，似乎连社会主义，民治主义，社会民治主义底意义，还未了解似的一样。

末后这纲领规定：“社员须特别注意，确实履行本规约第二条及第六条修养和准备的条件。”第二条是：“凡本社社员，须备左列要件：（1）守信尽职、克己爱人等常德；（2）一种学术或职业贡献于社会”。第六条是：“凡本社社员须确实履行左列之责任，并每季将经过情形，报告一次：（1）择任政治或社会事业中一种以上之改造及调查；（2）担任农工商会、教育会、协作社等一种以上之组织及联合”，这样的改良办法，还革命吗？四十年前底马克思，他就认定欧洲应作无产阶级革命；但到现在，一般社会党改良派都说时机还未到。这样，我真不知中国要到何种程度才可以革命？若是去干“催促进化”的“工业”“政治或社会事业”，那末，“修养”又修养什么？“准备”又准备什么？我真有些不懂解了。

《少年》第十一号，1923 年 8 月 15 日

四、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问题的论述

缺页

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

蔡　和　森

独秀先生：闻公主张社会主义而张东荪欢迎资本主义，两方驳论未得而见，殊以为憾。和森为极端马克思派，极端主张：

唯物史观

阶级战争

无产阶级专政，

所以对于初期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共产主义，不识时务穿着理想的绣花衣裳的无政府主义，专主经济行动的工团主义，调和劳资以延长资本政府的吉尔特社会主义，以及修正派的社会主义，一律排斥批评，不留余地。以为这些东西都是阻碍世界革命的障碍物(其说甚长，兹不能尽)；而尤其深恶痛绝参杂中产阶级思潮的修正派，专恃议院行动的改良派，动言特别情形特别背影以及专恃经济变化说的投机派，以为叛逆社会党爱国社会党都是这些东西的产物。窃以为马克思主义的骨髓在综合革命说与进化说(Revolution et evolution)。专恃革命说则必流为感情的革命主义，专恃进化说则必流为经济的或地域的投机派主义。马克思主义所以立于不败之地者，全在综合此两点耳。马克思的学理由三点出发：在历史上发明他的唯物史观，在经济上发明他的资本论，在政治上发明他的阶级战争说。三者一以贯之，遂成为革命

的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完全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现今全世界只有两个敌对的阶级存在，就是中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中产阶级以上没有第二阶级，无产阶级以下没有第五阶级。因为交通发达的结果，资本主义如水银泼地，无孔不入，故东方久已隶属于西方，农业国久已隶属于工业国，野蛮国久已隶属于文明国，而为其经济的或政治的殖民地。因此经济上的压迫，东方农业国野蛮国的无产阶级之所受较西方工业国文明国无产阶级之所受为尤重。因为西方工业国文明国的资本帝国主义常常可以掠夺一些殖民地或势力地带以和缓他本国“剩余生产”“剩余劳动”的两种恐慌，而分余润于其无产阶级.(贿买工头及工联领袖，略加一般劳动者的工资，设贫民学校以及可以买工人欢心的慈善事业，使工人阶级感怀恩惠)，因此西方大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常常受其资本家的贿买笼络而不自觉，社会党、劳动党中改良主义投机主义盛行，而与资本主义狼狈相倚，此所以社会革命不发生于资本集中、工业极盛、殖民地极富之英、美、法，而发于殖民地极少、工业落后之农业国俄罗斯也。因为俄罗斯在经济地位上久已隶属于西方工业国，而他那上古式的农业生产法又抵当法（小机械农业）、美（大机械农业）机器的农业生产法不住；所以农产品一入国际市场不能与法、美相竞，因此农民及无产阶级受国际的经济压迫便异常之大，加以大战破产，社会革命遂起。由此就可推论中国社会革命了。中国受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经济压迫到了那步田地？自身的生产方法还是三代以上的，自己不能供自己的需要，五大强的商品，开始由大炮送进来；继之由本身的需要扯进来，这种经济侵略孰能御之。大机器生产品日日浩浩荡荡的输进来，于是三代以上的手工生产者一批一批的失其职业。现在中国失业人数到了那些田地？换言之就是为经济压迫不能生活者的人

数到了那些田地？我敢说一句，现在中国四万万人有三万万五千万不能生活了。到了这个地步，三万万五千万人惟有两条路走：(一)流为盗贼、土匪、流氓、痞子，以至饿死、乱死、战死、争夺扰攘而死……(二)三万万五千万人公然自行提出其生死问题于中国社会，及为中国经济的主人翁五大强之前，请其依我们的意见解决。如其不能，我们恐怕免不了社会革命的运命。到了这个时候，革命之爆发乃是必然的趋势，也如自然力的雷电之爆发一样，行所必然，什么成败利钝都不会顾，什么改造的理想家、大学问家都也把持不下的。这是最大多数的生死临头问题，纵然革命的经济条件、生产条件不具足，革命后会被围困封锁而饿死，但使群众一旦觉悟，与其为盗贼、土匪、流氓、痞子而饿死、乱死、争夺扰攘而死，死得不值；毋宁为革命而战死、而饿死，死得荣誉。社会革命的标准在客观的事实，而不在主观的理想，在无产阶级经济生活被压迫被剥削的程度之深浅，及阶级觉悟的程度之深浅、而不在智识程度、道德程度之深浅。自来一般中产阶级学者或空想的社会改造家，好以他个人的头脑来支配世界，视社会改造或社会革命为几个圣贤、豪杰、伟人、志士、思想家、学问家的掌上珠、图案画和绣花衣，任凭他们几个人的主观理想去预定，去制造，去点缀，去修饰，去和颜配色，去装腔作势，去包揽把持，去迟早其时，去上下其手，指挥群众如此如彼的做去便是，这真愚妄极了。我敢大声唤破这种迷梦；社会革命与染有中产阶级色彩的思想家和被中产阶级学说、教育、势力薰坏的改造家全无干涉。任凭你们怎样把你们的理想学说绣得好看雕得好玩，总与无产阶级的生死问题不能接近，不过在资本家的花园里开得好看，在资本家的翰林园内供他的御用罢了。一旦无产阶级的生死问题迫来，有如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饥民要面包，兵

士要停战，工人要工厂，农人要土地，乱七八糟爆发起来，任凭那些中产阶级学者及自命为理想的改造家，凭依军阀财阀而结为神圣同盟，也是遏制不住的。今日中国大多数的生活问题迫到了这个田地，贤人派的力量纵大，恐怕有点遏制社会革命的自然力不住！马克思的革命说完全立于客观的必然论之上，革命既是必然的，然而我们无产阶级的觉悟者何以要去唤醒同阶级的觉悟呢？（一）因为我们自身既已觉得痛苦之所由来（不由命运而完全由于私有财产制），便僵然不能终日。（二）对于同阶级的人有同病相怜的同情。（三）任其自然实现，时间延长，牺牲数量太大，无产阶级每日直接间接死于穷困者不知若干，直接间接死于战争者不知若干。若过三、五、十年再经一次世界大战，纵少又要死伤四、五千万。具此三个理由，所以我们无产阶级早已痛不堪痛（今日由段祺瑞下动员令送到这个战场上去死；明日由曹锟、张作霖下动员令送到那个战场上去死！天灾、人祸、穷困、死亡，日日团着我们!!!）忍不堪忍了，还论什么革命的经济条件具足不具足。不过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在计划上讲起来，殊有于未革命以前，做一个大大的经济变化运动之必要。这个运动怎样做呢？就是我们无产阶级社会党，应亟于各大都会组织同阶级之失业者、最下层的贫困无告者，第一步公然起来向政府论南北要求“生存权”和“劳动权”，迫令政府即向五国银团大借实业外债。第二步要求监督实业借款的用途。第三步要求产业及政治管理权。独秀先生：现在英、法、美、意的劳动运动，刚才接近第三步，还没达到目的。我们若有识力、有决心，必可于最短时期突过欧美的劳动运动。我以为社会运动为社会革命之起点，社会革命为社会运动之成熟，即综合 evolution et revolution 之意，如此才可立于不败之地，而不致流为卤莽灭裂毫无计划的感情革命主

义，和审时度势、坐以待毙的投机主义。我深以上列三个具体步骤，为中国社会运动、社会改造的不二法门。盖承此纷争破产之后，四、五年中，资本主义必勃然而兴，与其待军阀、财阀勾结五大强来巩固资本主义于中国，不如由无产阶级先发制人，取其利而避其害。盖生产之三要素，中国具二而缺一（有劳力、原料而无资本），全国生命遂握于五大资本帝国之手。若我们无产阶级不用先发制人之计，则必受制于人，则必坐待资本主义之来而无可如何，则必待五大强国社会革命之后我们才能革命，那就真闷死人，真不值，真不经济了！先生！劳动解放绝不是一个地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问题，乃是一个世界的社会问题，马克思社会主义乃是国际的社会主义，我们绝不要带地域的、民族的色彩。中国的阶级战争，就是国际的阶级战争。说中国没有大中产阶级，阶级战争用不着的，固然是忘记了中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忘记了外国资本家早已为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主人，而说中国的阶级战争就是最大多数的劳动者对于本国几个可怜的资本家的战争，也同是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也同是忘记了外国资本家早已为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主人。故我认定中国的阶级战争乃是国际的阶级战争。中国已经兴起了的几个资本家，和将兴起的资本阶级，不过为五大强国资本阶级的附属罢了。我认定全国人民除极少数的军阀、财阀、资本家以外，其余不是全无产阶级，就是小中产阶级，而小中产阶级就是无产阶级的候补者。你看现在中国的中产之家有几多能自给其生活，教养其子女，而不感穷困者。故以我看来，中国完全是个无产阶级的国，（大中产阶级为数极少，全无产阶级最多，半无产阶级——即中等之家——次之）；中国的资本阶级就是五大强国的资本阶级，（本国极少数的军阀、财阀、资本家附属于其中）中国的阶级战争就是国际的阶

级战争。独秀先生！我是极端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我的主张不是主观的，乃是客观的，必然的。因为阶级战争是阶级社会必然的结果；阶级专政又是阶级战争必然的结果；不过无产阶级专政与中产阶级专政有大不同的两点：(一)中产阶级专政是永久的目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暂时必然的手段，其目的在取消阶级。无产阶级不专政，则不能使中产阶级夷而与无产阶级为伍，同为一个权利义务平等的阶级，即不能取消阶级；不能取消阶级，世界永不能和平大同。(二)中产阶级专政假名为“德莫克拉西”。而无产阶级专政公然叫做“狄克推多”，因此便惹起一般残人的误会和反对。其实这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任你如何反抗，历史的过程定要如此经过的。

以上拉杂写了一长篇，请先生指正，并请交换意见。和森感国内言论沉寂，有主义、有系统的出版物几未之见(从前惟《星期评论》差善)，至于各国社会运动的真情，尤其隔膜得很。甚想以我读书阅报之所得，做一种有系统、有主张、极鲜明强固的文化运动。意欲择定论机关之同趣者发表之。

蔡和森

1921.2.11.在法国蒙达尼

附：

陈独秀复信

蔡和森先生：

我前几天回到上海才见着你的信，所以久未答覆，实在抱歉

之至。来信所说的问题甚大，现在只能简单说一说我的私见。

尊论所谓“综合革命说与进化说”，固然是马克思主义的骨髓，也正是有些人对于马克思主义怀疑的一个最大的要害。怀疑的地方就是：马克思一面主张人为的革命说，一面又主张唯物史观，类乎一种自然进化说，这两说不免自相矛盾。鄙意以为唯物史观是研究过去历史之经济的说明，主张革命是我们创造将来历史之最努力最有效的方法，二者似乎有点不同。唯物史观固然含着有自然进化的意义，但是他的要义并不只此，我以为唯物史观底要义是告诉我们：历史上一切制度底变化是随着经济制度底变化而变化的。我们因为这个要义底指示，在创造将来的历史上，得了三个教训：（一）一种经济制度要崩坏时，其他制度也必然要跟着崩坏，是不能用人力来保守的；（二）我们对于改造社会底主张，不可蔑视现社会经济的事实；（三）我们改造社会应当首先从改造经济制度入手。在第（一）（二）教训里面，我们固然不能忘了自然进化的法则，然同时我们也不能忘了人类确有利用自然法则来征服自然的事实，所以我们在第（三）教训内可以学得创造历史之最有效最根本的方法，即经济制度的革命。照我这样解释，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什么矛盾。若是把唯物史观看做一种挨板的自然进化说，那末，马克思主义便成了完全机械论的哲学，不仅是对于历史之经济的说明了，先生以为如何？此理说来甚长，我这不过是最简单的解释，很盼望赞成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加以详细的讨论。

独　秀

《新青年》第九卷第四号，1921 年 8 月 1 日

共产主义与中国

——从经济现状上立论

伍　豪

共产主义之为物，在今日全世界上已成为无产阶级全体的救时良方。欲期未来社会造出自由发展的人群，自不能不先使现今的人类脱去物质上的桎梏；欲期今日世界的经济乱象，阶级对抗情势，文化颓机不再长久下去，自不能不先使现今的人类全无产化了，好绝灭这个最大的乱源。因此，凡有人心的人都应能感觉出共产革命的切要。但在中国，这种观感似乎尚未能深种于人心之中。有些知识界中人尚谈虎色变，有些人竟意存鄙视。至于无产阶级中人因为知识的幼稚和信仰者宣传的不力竟致切身的问题莫由认识，这更是一个最大的憾事。

共产主义果与中国无缘么？他能够解决世界的乱象，为什么中国不可以找他来作救时的良方？

我们不宜人云亦云，误认中国尚须守着那机械式的变化，尽量接收那流毒西方未已的资本主义。赶机会图改良在欧美已暴露了他的无能，我们也不必来走这条死路。乘火打劫，在中国不但做不到，便是有朝一日幸而从中取了一点渔利，于大多数贫民阶级又有何益？

我们虽是中国人，我们的眼光终须放到全世界上来。我们不

必想取捷径，也不必畏难苟安，全世界无产阶级为创造新社会所共负的艰难责任，我们也应当分担起来。

世界上只有一个共产主义能使这个责任无国界无种界地放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也只有他能使中国民族得列于人类中间彼此一视同仁。

我为简明地解释这个关系，特把他分篇来说。

此篇先从经济现状上立论。以中国今日的情势，开发实业，似乎已成为不可争论的必然趋向，其实究用何种方法来开发他，却大可注意。适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来开发实业，其结果不仅使中国变为舶来品的销卖场，且会使中国各地布满了外国的资本家。舶来品是由国外输入的，狡猾的外国资本家不愿绕这个大弯，且不堪于其本国市场的竞争和劳动革命的迫切，他们都会来择肥而噬。利用中国的贱工、原料和无心肝的市侩，难得意□留学生，于是中国的铁路、航路、银行、工厂、矿山、邮电间接直接都归到外人手里了。不要等到将来，便是眼前的中国，试问一问“果是谁家之天下?”新银行团既在那里虎视眈眈，引虎入室的又有那归国的留学生，和特重外国语的学校学生，来唱里应外合的活剧。裁兵借外款，办实业借外款，限定留学生专学一点一偏的科学，用退还的赔款来接济，这除掉眼光太狭的日本人有点异议外，欧美各国大都表示极端的赞意。其中心宁复可问!

排除外资而仍用袭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来开发中国实业，则其方法中所必须先决的条件：1.强有力之有产阶级的政府，2.民间多量资本，3.科学的人材与机械的自造，4.关税自定权，5.国内生产力与消费力的均平，在中国今日竟无一事可以备格。如此，而欲提倡国人投资，而欲空言抵制外货，而梦想军阀将变为财阀，这也无怪以暗结外股的张謇认为中国的实业家，以毫无企业

能力的梁士诒称为中国财神，以只知浪费的督军视为中国将兴的财阀了。

且无论是外资或内资，只要以资本主义的方法来开发中国实业，其同一结果总是压迫贫民阶级使之成为纯粹的无产阶级，困苦颠连，以致历劫难复。我们从这个观点上，永远要与资本主义为敌，更绝对不能容许拥护这个主义的方法在中国滋长茂盛起来。不要说他无真正发展中国实业的可能性，便是有，我们决不甘从属于他。

资本主义如是了，我们且看社会主义者所主张的开发实业方法究属如何。

讲国家社会主义的人，以为实业开发可以藉国家之力来一手包办，以免掉私人在企业上的竞争。生产集中，利用大规模的计划来开发缓进国家的实业，消除私人间的竞争：这是我们所赞同的。但是国家最高的统治权究竟在何种阶级手中握着？民主政治普遍选举是不是欺人之谈？有产阶级不倒，国际间的经济竞争，侵略政策是否便能消灭？自私的资本家是否便能容一切产业收归国有？农业问题又将作如何解决？且在中国，打着国家社会主义的旗帜，外资将如何排斥，内资将如何聚集？以中国的国情和民性，民主主义的“好政府”如何能凑立起来？便令胡适等的“好政府”，江亢虎、张嘉森的“德意志社会民主主义”都能如愿实现，但他们后边所凭借的民众与阶级究竟是什么？所开发的实业究竟是为了何人？

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已有了十年以上的历史，他利用中国人的惰性和容忍，竟与些思想堕落者结成了不解之缘。他们都自命为提倡科学的人，其实他们只会高谈那空想的艺术，高谈几个“真”“善”“美”的名词，论到实在的开发实业的方法，恐怕除掉毁坏大规模生产，反对集中制度外竟无什么具体主张。也许有时候要提

倡协作社，但消费协社是有助于工业家，而生产协社则不但在中国难有兴起之望，便在欧洲也都气息奄奄无能为力，因为他断难与有钱有势的资本家相抗。无政府主义既这样空洞，所以具有无政府思想的蔡元培，自认为无政府党人的李石曾、吴稚晖辈一遇到当前的政治经济问题，才会手忙脚乱，弄出与无政府主义相反的主张出来。

由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法国工团主义和英国行会社会主义，他们在政治上的见解虽至今还无法相容，但在经济制度上却有一个相同之点，便是都主张产业自治，都反对生产集中。工团主义是带有革命性的，所以还主张大同盟罢工，行会社会主义竟要以妥协与渐进的手段，民主主义的政治，来实现产业自治，结果乃变为劳动运动中的左右派了。不革命而实现产业自治，英都无望，何况实业不振、经济权握在外人手中、工人无知的中国。革命后而产业自治，试问以中国土地的广大，工人知识的幼稚，交通运输机关的不备，世界资本家的联合压迫，民族性的散漫，从何而自治起？若知其弊而不得不以统一的机关为之施联络，为之图进步，为之谋便利，为之坚防御，则共产主义所主张的劳动会议制度和最高经济会议的组织乃正是使工人于工场管理，农人于田庄共产之外能得到个相当的集中和联络机关以便运用，这岂要徒说产业自治的人在那里鼓煽人心！再行会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各派中要算最狡猾最调和的，其坏恰如受资本主义之毒最深的英国人性。以中国情形，要用他的方法来开发实业，也只好让那些到了湖南才知中国人穷的张东荪辈闭着眼睛坐在屋里乱讲去罢，好坏都与贫民无关，本来他们都是些英国绅士派的模仿者啊！

最后，我们要论到共产主义了。在共产主义中，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自要占极重要的部分，我们本着他的见地，深知社会上的

经济制度多是随着生产力发达情况而变迁的，资本主义的害处不在他的生产渐趋于集中，乃在他的自由竞争，互相侵略；不在他的大规模生产，乃在他的生产陷入无政府的状态中；不在他聚集工人到工场门口来，乃在他以少数工资换得多时间的剩余劳动；不在他利用科学，乃在他闭塞工人的知识。欲求保存这个产业革命后的优点而消灭其毒，则除变更经济制度外实无他道。本来旧制度已束缚现在生产力的发达了，在自然趋势上，终久必归崩溃，但我们决不能明知其为害于世，复使他在中国得苟延残喘起来。

资本主义的祸根，在私有制，故共产主义者的主张乃为共产制。私有制不除，一切改革都归无效。共产主义者决不作枝叶的问题，要大刀阔斧地来主张共产革命。革命未成以先，一切罢工、减时、加薪、自治、国有、协作等事件都不过被视为训练劳动群众帮助革命进行的种种手段，一旦革命告成，政权落到劳动阶级的手里，那时候乃得言共产主义发达实业的方法。因为政权在一个生产阶级手中掌着，并且要消灭阶级界限，所以只有共同的生产者，将没有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分别，掠夺者和被掠者的分别了。劳动者是无祖国的，所以乃能联合起全世界的劳动者来消灭这个竞争和侵略的野心，而产出共同生产的大计划。共产主义发达实业之大计在此，由此乃能使产业集中，大规模生产得以实现，科学为全人类效力，而人类才得脱去物质上的束缚，发展自如。

由此看来，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尤其是在中国，实负有变更经济制度的伟大使命，也只有他，方说得起变更，因为他是应着生产力发达的需要而加以顺势的变更，并非加以抑止，加以修正，加以和缓的。

他所以为中国之利的，在其为彻底的改造良方。依着现在中

国的时势，一切缓和修正的办法都无所施，至于抑止，则中国民族根性与科学革命产业振兴本已格不相容，还不能和现代生产力变化的趋势抗。那么，抑止的学说又有何效！转不过使无抵抗，宁静无为，知足常乐，隐遁的思想在中国人脑筋中多孳生点，好便于外国资本家的侵略掠夺罢！

总归一句话，中国现在的经济情势，除去努力预备革命，实行共产革命外，实无法可解。

中国人诚然穷得不堪，但因开发实业，而接收外资，而受外人监督，想为我们所不忍为。提倡国内投资，不仅我们不愿为，亦且国家情势不得为，国际情势不许为。至于别种社会主义，更是陷中国于歧路中的麻醉剂。

我们与其在现状中作法自毙，莫如大彻大悟集合众力一心一意地从事革命。

“宁缺无滥”，这是改造中国的必要精神。实业暂时可以不开发，新银行团的款子却不可以再借，资本家的机会却不可以多造。教育暂时可以不扩充，外国暂时可以不来，教会立的学校却不可入，中外资本家捐助的教育基金，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和穆藕初资助的学费却不可要。

我们唯其知到（道）教育实业的发展都系于我们民族的经济状况，且更知其为当务之急，所以才大声急呼宁舍去一时的小利而图全民族全世界永久的相安。我们唯知其急，所以才主张大家都赶紧团结到同一的旗帜下，以利进行。预备之期越短，我们所认为缺憾的也越少，绊脚的锁链也捆得越少了。

共产革命的主要条件便是经济革命。在革命未成功前，我们只是个破坏，无所谓建设。革命成功后，生产的劳动阶级建立了强有力的政府，消灭了私有制度，集中了资本，公有了农田，重

用世界上无作用的科学家来帮助无产者开发实业，振兴学术，更进而求生产力和消费力的均平配合。凡是现今中国资本家所难以先决的条件，到那时都将不成问题。只于暂时的国际封锁或是国际干涉或许不能逃免。但是他们的联合是资本家，我们的联合乃是无产者。所以全世界的共产革命乃是最后一着。不管中国是前列，是后列，我们必须预备着，从事着，也永远不许忘掉。

“全世界的无产者，团结起来啊！”

（二二，八，十六）

《少年》第二号，1922 年 9 月 1 日

革命救国论

伍　豪

国的界限，自从各民族间开始商业交通后，各个统治阶级遂都用他作成对内号召统一、对外兼并他国的武器。及资本主义勃兴，各国的资产阶级更是挟其方兴之势，运用这个武器——国——对内压迫被统治阶级的一切反抗和革命，对外抵御强敌并凌辱那产业未曾发达的各弱小民族；于是全世界凡经资本主义铁蹄所踏践的地方，概都形成了同样的两大阶级：一是压迫阶级，一便是被压迫阶级。

压迫阶级是以各强国的资产阶级为中心，各产业落后国的封建军阀只不过是他们的爪牙；至被压迫阶级则工业先进国中的无产阶级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弱小民族都是站在同一被剥夺、被欺凌境地的。且在他们中间，以经济地位说，不论无产阶级，便是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小资产阶级，也都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之故迟早都要走入无产阶级队伍中来。所以全世界的被压迫阶级若是看明白了此事，正宜速行运用这个国的利器来攻打敌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弱小民族，要群起来做国民运动，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工业先进国的无产阶级要日夕图谋阶级争斗，以便打倒国内资本主义，同时更应联合起来一齐向压迫阶级进攻，也正如他以国际的资本进攻被压迫阶级而不分国界的一样，而且

当着他自己引起不可免的国际战争时，被压迫阶级的解放日子便到了。只要弱小民族的国民力量胜过一时的侵略者，无产阶级的团结力胜过当时的统治者，则一个革命的爆发也成了自然之势。前者的例子是土耳其，后者便是俄罗斯，而俄土在土耳其国民运动中的相互关系，更足证明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实有联合的必要和可能，且世界革命的伟大工作也正要在这个联合中期待实现。

*　　*　　*

至我们中国呢，凡是稍明事理稍识事实的人，大都能承认中国已夷为列强的半殖民地，非革命不足以图存了。且就世界的情势、国际的地位来说，弱小的民族若不从国民运动企图国民革命入手，而仅右倾于振兴实业图谋救国，或竟左倾于毁坏一切自由行动，则结果转不过为国内无可发展的列强资本主义延长其遁在尾闾的生命而已。有志气而不甘堕落的中国人，何能忍此！

革命是无疑而且确定了！但我们须看清我们的敌人和我们国民革命的势力究竟何在，且谁又是我们真实的友人。

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的列强——特别是英、美、日、法——自是我们最大的仇雠，他们挟其工业先进国的机械力，奴隶了我们农业国的散乱民众，掠夺我们的原料，强销他们的货物，以金钱诱惑中国的军阀、官僚，于是借款约成，继海关共管、邮政代管后，有盐税共管、铁路共管、江河共管，驯至全部财政共管，乃便要完全实现共管中国了。但不有内贼，外贼何能张牙舞爪的肆无忌惮！要不是清廷昏庸，庚子之变何致损失如斯之巨。袁世凯若不急图帝制，二十一条何致签成。段祺瑞苟非志在卖国，中国人民的肩上何致压上一笔巨大的参战借款。曹锟、吴佩孚若不是一志在总统，一志在武力统一维持甚么北洋正统，又何致开门揖盗，自华盛顿会议席上迎来些自家承认的太上政府。陈炯明果非

志在排斥国民革命领袖，又何致勾结英国香港政府，延长广东内部的战祸至今未熄。有了这一干图私的新旧军阀——封建余孽——再加以专做牵线人的外交系，做掮客的洋行买办和趋炎附势的滥官僚，于是卖国的勾当乃越发做得兴旺，而帝国主义的列强亦遂特加他们以青睐。有时几个帝国主义者吃起醋来，或是几个军阀恃宠而骄，于是军阀相互间的战争乃遂在列强的嗔笑中一来一往，而中国人民遂匍伏在枪弹底下讨生活了。总之，他们的罪恶祸害是数不尽的，我们只要认清这全是国际帝国主义者从中作祟，我们便能找到我们共同的敌人，而且相信他们进攻我们——全中国民众——是永远站在同一战线上的。

我们既做国民运动，我们必须先认清国民革命的势力，然后才能有团结之可能。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工作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了，而且辛亥革命又曾将共和招牌挂张起来，但我们如要从中找出一派可靠的革命势力，则我们相信只有海外华侨可足当得起一支革命的主力军。因为只有他们接触国际帝国主义的强盗为最早，故他们希望一个必须保护侨民的民治国来做他们海外发展的后援，乃属当然的需要，无论入保皇党或同盟会，其心理上的希望皆属一样。不过满清政治的教训使他们倾向革命的心易于胜过改良的错误观念就是了。第二派革命势力，直至一九二二年香港海员罢工时起，始渐渐从工人阶级队伍中涌出。一年多的膨胀，至一九二三年“二七”京汉工人大流血后，北方的劳动势力虽稍受一时挫折，但全中国的劳动阶级——特别是交通机关、矿山、工厂常与列强资本势力接触，备受中国军阀凌辱的中国劳动阶级——终将为国民革命中一派最可靠的主力，这是毫无疑义的。第三派中国的知识界，自从“五四”运动后顿呈活气，中间虽因受新文化运动的恶影响消沉了两三年，但近一年来又复现出蓬蓬勃

勃的朝气。其中，尤以青年学生为最能无所忌惮的反对列强，反对军阀。第四派便是新兴的工商业家。依他们现时的阶级地位说，自然很难单独去号召一种革命，虽说是他们也渐觉悟到军阀不打倒，列强不赶开，他们的工商业是万难独立振兴的，除非他们甘于卖国、甘与外人合办。但他们中间的开明分子也渐能与革命派表同情了，自己也知要起来过问政治，这不能不说是好的现象。而不久的将来，终会有一部分人来走入救国的革命队中。第五派革命势力，现在方在酝酿期中，这便是庞大的农民阶级。农民的势力果成与否，全视努力之人多寡为断。至农民本身，国际强盗之为害，他们或还感觉较少，但军阀的祸国殃民，他们已能□信无疑了。

上述的五派，是中国国民运动中最值得注意的革命势力。若能合此五派的革命分子于一个革命的政党统率之下，则国民革命的成功必不至太为辽远。在历史的使命上说，中国国民党是负有这个革命统率之责的。过去他因为忽略了革命势力真实的存在和各派的经济地位，以致革命十二年不但新的革命势力未能集中到国民党旗帜之下，便是国民党唯一的后援——海外华侨也有动摇之虞，这不能不算是国民党至大的失计。

我们知道国民党近来已起首改组了，我们且深信此次改组后必有可观，但我们所最切望而且不惮重复申说的，便是国民党今后当注意于国民运动中五派可靠的革命势力之发展、团结和引导，千万再不要误认新旧军阀的四派势力之调和可以得到那骗人的和平统一！

最后，我们要说道在国民革命运动中我们可引为友之国，自不外与我们立在同一境地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弱小民族和无产阶级之国的苏联俄罗斯；这些，我们是要与他们以统一前敌的

国际联合，来企图世界革命而促成我们国民革命成功的。

*　　*　　*

如此，我们才不致染上旧日列强所运用的国的武器的祸害，而能使我们“革命救国”的主张发现了新的意义，人类历史上展开了新的记录。

《赤光》第二期，1924年2月15日

论工会运动

伍　豪

“工会”这两个字，依英文 Trade union，人都译作“工联”，依法文 Syndicat 多译为“工团”，依德文 werkschaft 亦似可译成“工联”，但据我们想，在中国劳动运动中，为求便于运动，合于工人们向用的惯例起见，似还是一律都称作“工会”为妥。我们的主张如是，特地先在此提说一下。

工会和行会

在工会运动以先经济社会中本有行会组织的痕迹，这不但欧洲如此，便在中国也是同样地循着这个途径发展起来的。只是行会和工会究竟有别，他们各自的基础和本质都有他们各自的生产状况做依据，决不是仅从他们团体的形式上看来便可武断地说他们无甚区别的；便是英国一部分社会主义者所提倡的“行会式”社会主义，在他们思想中，容或有受了旧日行会组织暗示之处，来主张分散大工业，行产业自治，但实质上生产状况既异，经济组织已变，无论怎样改法，终不会循着原道而回，与旧制恰相吻合的。在手工业自由市时代生出的行会，也只有产业的封建式社会能容留他，十八世纪工业革命一开始，他所存留的组织痕迹，便飞得无影无踪了。同时应运而生的，便是工会运动。工会组织

多是建筑在赁银劳动工厂劳动者的身上，这与欧洲中世纪依着家庭工业而生的行会组织完全不相同了。组织根据既异，运动的目标也完全不能相比。行会目标重在自和，彼此希图尽一交易标准，俾各无损伤，这是由个人协商中生出来的组织。至工会目标，则重在外抗，协助以图自存，这可以说是由个人自由竞争中反映出来的组织。目标的分别既明，我们由此可知一个时代的生产状况影响于一个时代的劳动组织至巨，丝毫不可以假借。凡是违背了这个进化的趋势来图改造，没有不失败的。行会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之不易使人倾信，多半因缘于此。

工会运动的目标

工会的组织既是应着产业革命而必须生出的组织，于是这种运动乃成了有意义的运动。惟是工会运动的目标究何在呢？依卫布（Webb）说，这个目标是在于保护和增进工资的标准。白王他诺（Brentano）和宗巴尔（Sombart）则说工会是用以补助其会员在罢工时候的缺乏和要求增加工资以保护他们的利益的。这两种简单的解释在工会运动开始的十九世纪确是如此倾向。又第二国际曾接收奥国产业主义者白劳恩(A. Braun)的解释，谓工人的组织乃是以这永久的工银职业组合于资本制度的范围内来保护劳动状况的改良，并为阻止情状变坏而奋斗。但这种解释我们是不能满意的，我们深知道依着产业集中和劳动阶级加大的趋势看来，工人的组织决不会自安于在产业内为一部分的职业组合，他必要振拔起来掩盖全部产业。从前在欧洲罢工也算是犯罪的，工会的组织也是时时受政府和资本家干涉的，但现在资本社会却认工人团结的势力为不可侮了。依此趋向，我们乃敢大胆说工会运动是要改良工人状况，引导工人为经济的奋斗，协助工人政党

图谋工人阶级的解放，取消工银奴役，以达到最后共产主义的胜利的。这样目标一定有些旧式工团主义者和产业主义者以为这是出了工人应做的范围了。其实未来的世界，应是劳动者的世界，不当再存有私有产业的人，在他们原是承认的。欲实现这种理想，不从政治和经济革命中双方打出，难道听着资本政府永远逞着他的威权，使工人阶级受着无尽的剥夺么？我们信真正懂得工会运动目标何指的人，必不甘如此地坐以待毙。况且工团主义所自出的法国工团现在已变了“所有政权归工会”的口号了，迷信仅以总同盟罢工和以产业自治便能实现共产社会的工会运动者亦可以醒醒了罢！

工会的组织

组织工会的份子，据极严格的意义说来，自以在工厂、矿山和交通机关中的赁银劳动者为最合格。但据一般情形说，则凡是赁银劳动者，无论其为工业的，农业的，商业的或社会公务的，无分其为劳力与劳心的，皆有从事工会组织的任务。换言之，便是工会组织本是极普遍的，但工会运动却须依着近代生产状况的变化和资本主义的直接影响而以前述的三项劳动者为其中坚。

组织工会的方式如何？依着旧有的惯例，多是从同职业的联合下手。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年欧洲的工会运动大半都依着这个方式做的。然而这种职业组合现在却已渐渐露出他的破绽来了，他的不利之点约略是：1.劳动组织本贵乎力量集中，职业组合常常因职业类别太多，反将劳动者分得太零散了；2.劳动者对资本家的争斗贵乎步骤一致，乃同一产业中的劳动者常常因所属的职业组合各别而互异其见，致罢工怠工等事常易生出许多内部阻碍；3.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职业组合常常因同一产业

中的组合不一，致使全产业的状况，任何种工人方面都不能知晓。这三种缺陷，都是极明显的事实，现时弥补这些缺陷的，便是产业组合运动。产业组合是要以产业类别为联合的出发点，而非仅以各个人的技能和职业类别来分组合。举例来说，如矿工组合昔日除去坑夫以外，尚有矿中工程师，救火夫，机器师，坑夫书记等等组织，而今则都可统属于一个矿业工会之下了。这种趋向在英德各国大产业组织中已多见诸实行，而且尤便于要求产业国有和工人参加管理的进行。至在革命后的俄国，则此种运动已成工会组织的普遍方式。现时俄国的产业组合分得极其简明，总其数不过在二十种上下，而每种工会所包含的人员都极其众多，运用亦极其灵活，这便是产业组合适于为工人阶级奋斗的一个明证。

联合职业

工会的组织无论其为职业的或产业的，其开始的进行总当以各个地方的某种职业或某种产业的劳动者联合为组织的单位。本此单位然再进而求一区一省的联合组织。省是以政治关系分的，区则多以经济关系为别。例如中国的京汉、京奉……的铁路工会，招商局，太古，……的海员工会，株萍路矿工人的联合，便全不是用省界可以划分开的。由省或区的联合，进而为全国的联合，再进而为国际的联合。在这条联合线上，永远是以某种职业或是某种产业为联合的标准的。另外的一条联合线，便是开始系在一个地方的各种工会的总联合上头。由此地方总联合的单位，乃进为一省的总联合，进而为全国的总联合，更进为国际的总联合。在系统上说，这两条联合线的前进原是很清显的，但实施起来，国内国际全不易按部就班去走。其中错杂最甚的是国际间的联

合，尤其是在劳动革命预备期中的国际联合。我们看看现在两个国际工会（莫斯科的“赤”和亚姆斯特丹的“黄”）的决战和各个国际部分工会的破裂情状，便知此种一时变态是不可遏止的了。

工会的行动

工会运动的目标有了，工会的组织成了，紧接着一步便是须问我们如何运用此工会机关。解答这个问题，须顾及我们运动的目标而分作两项来说：一项是革命前的预备，一项是革命开始后的奋斗。在前一项中，起首的活动便是扫除劳动运动的障碍和增进工人的地位。这种活动方法须视各国的情形而定，并须因各国特异的情形而各异其方针。同样的工业先进国在英美所急的是失业工人问题，在德法便是八时工制的动摇问题；在政治上虽同是防范复古派的抬头，但在德国第一步是保住共和，在法国是反对资本政府侵略政策，在意大利直须反抗现政府而维护劳动者的生存了。至在工业落后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则政治上的活动常常急过本身的状况改善。其在事实上也是非等到帝国资本主义的束缚略见解放以后，工人所受的压迫常不易减轻。显著的例，便是中国，中国现在要拿旧式工团主义和产业主义的空想来限制工会行动，则不但工人阶级翻身无日，便是中国的全民族恐怕也要永远奴役于世界帝国资本主义的重轭之下了。劳动运动的障碍减少了，工人的地位增高了，但这个决不能满足工人希望，工人最大的活动还是革命。以工会的机关来促进工人的阶级觉悟，宣传无产教化，散布革命种子，这实是现今各国工会运动中的最大任务。

其次说到革命开始后的奋斗，此层我们只须拿俄国工会现时所担负的职务来说。俄国工会——特说为产业组合——“在今日

实是种种产业中所有工人的永久组合；他实足代表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的重要基础之一；他要移转他的重心到经济组织的领域以内，以图在为共产社会建设和消灭社会阶级的工人所有努力中来作有力的参与”（第一次产业组合全俄会议的决议文中语）至参与的事权最显著的便是各个工会都有督理各自所属的产业的生产和产业状况之权。在地方上，工会联合会为公共经济会议的重要参与分子；在全国，则全国工会联合会（俄名为全俄职业同盟会议）得选出三十人为全俄最高经济会议七十名定额中的委员，一边地方公共经济会议及其他机关又得间接选出其代表补其余额。由此可见工会在俄国实已握住全俄的经济生命了。其在政治（即苏维埃）方面，则各地苏维埃选举虽云由劳动者直接选出，但情势上实与工会有极密切的关联，此又无能否认的。革命后的俄国工会责任如此，持与革命前的各国工会责任相较，可说一个是在建设一个是预备破坏了。

工会与工党

“工党”这个名词，我们是用以代表一切属于劳动阶级的政党，并非指某一党说。工会与工党在向来的惯例，多是成为一种对等和联立的形势。举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柏白尔（A.Bebel）时代便以为社会党是管政治方面事，而工会是管经济方面事的。因此他们遂决定，凡有必须以同盟罢工来做武器的时候，双方必须开对等会议来决定，这便是所谓对等权利的原则。但这种见解在我们看来是错误的。工党的组织本是集一部分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和少数愿从事劳动运动的中等阶级中人而成的。他在作用上，只是要做成劳动运动的先驱，社会革命的向导来率领劳动群众。他本应除掉工人利益而无其他利益，他的行为如能获得工人

的信任，则工会对他自不论政治的经济的策略都能一致接受。否则象叛卖工人阶级在大战前后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英国劳动党、法国社会党……虽也算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但究有何用？因此，我们乃知工党和工会的关系是极密切而永不相欺的。世界革命的完成须要全世界的劳动者先组织起来，而在这组织和革命的期中，尤要认一个忠实的工党来作工会的指导，使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好源源不绝地走入工党。真实的例子便是俄国革命的成功乃正因为工人阶级有了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啊！

《少年》第六号，1922 年 12 月 15 日

共产主义革命将怎样在中国实行？

李　慰　农

硕夫：

接研究会通信三，知你已将“共产主义革命将怎样在中国实行？”一个问题正式提交研究会讨论，这个问题既是我提出来的，我当然要先发表我的意见。

共产主义革命将怎样在中国实行？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先，我们必得要研究的是共产主义革命原则是怎样？中国社会现状与需要又是怎样？得了结论之后，再从结论里面去找实现方法。因此这个问题要分三段去讨论。

A、共产主义革命原则是怎样？

照马克思的推论，资本制度——私有财产制度——的必然结果，将一切财产集中到少数人——有产阶级——之手，一切生产关系由个人的、家庭的变为社会的。但是他的生产却不是为的社会需要，而为的是商品销行。在这种矛盾生产之下，遂成了定期经济恐慌与生产□□。同时一部分人则骄奢淫逸，支配一切，一部分人则奴隶牛马，困苦□□。在这种不平等的局面之下，遂造

成二大对抗阶级——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不断地明争暗斗。到末了，就是这种制度的崩坏与共产社会的产生。因此，共产社会革命是建基在阶级争斗上，他的目的是在打破私有财产制度，使一切生产关系准诸社会的需要。

B、中国社会现状与需要怎样？

有许多不加考虑的人异口同辞都说中国没有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所以没有共产革命的资格（a）。这是一种最谬误不过的见解，我们必得要详加驳击的。我们要问中国有没有有产阶级，首先要问有产阶级的定义怎样？按法文有产阶级是 Bourgeois，他的解释是 Classe Bouvgeoiseune classe intermétdiaire entre la noblesse et le peupe 就是中世纪贵族与平民中间的阶级，在现在就是有产阶级，更明显些说就是有财产的资本家、财主等的集合体。中国各大都市的各大小工厂、商店、公司是什么？各大村庄的地主财东又是什么？若说中国没有有产阶级，真是自欺欺人之谈。不过中国是农业国家，因为地理上、生活上种种关系，产业发达非常迟滞，几十年前中国还是手工业时代。江浙丝绸业，河南、山东绵绸业，安徽、直隶、四川绵织业，如江西磁业以及各地裁缝、木匠、泥水匠等皆是，最近受了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潮流的洗荡，有产阶级新形式已渐渐显露出来，旧有的手工业也跟随这种潮流一天天的滚落下去了。试看各乡村与各城市的手工厂无形消灭与有形破产即是明证。随着产业进化与资本集中的趋势，中国已从小资产阶级最盛时代努力向着大资产兴盛途中进发了。不幸庚子之后，中国已变成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商品消费场和原料供给场——殖民地——中国全国国民悉数变成经济被侵掠者。一切经济独立条件——借贷自由、关税自由等——都被剥削干净。拽住中国有产阶级之头，使他永远爬不起，日日

在划定圈子之内讨生活。在另一方面则政权未掌握到手，保护工具不具备，军阀专横，战祸连年，闹得全国不安，更使他们生意肖条起来。有此种种原因，足令中国有产阶级不能尽可能的力量去发展或者竟没有发展的可能。但这不特不足为共产革命的阻碍，反是促成共产革命的机会。因为他们的组织不完密，拑制无产阶级的本领尚未学得到家，无产阶级还有活动的可能性，实际去说，中国既成了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中国共产革命对象，一大部份是外国资本家（中国资本家是附属品）与本国作恶的军阀，至于中国无产阶级的形成，那更奇妙了！在各工业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形成是伴着有产阶级的，可是中国则不然，无产阶级形成已在有产阶级之先，这个道理很明显，上面已经说过，中国已不是完全独立国了，国内有产阶级既受压抑不能伸张，外国有产阶级，又受主权限制，不能随意经营，结果遂造成一切资本制度之下相因而至的物质要素——交通建筑——不能备具而被机械商品所压倒的手工工业反与日并进起来(b)，生活日高，生产无以适应，失业日多，工厂无以供求，于是乎遂造成中国今日的兵匪世界——恐慌扰乱——人们只知道在工厂做工的人就叫做无产阶级，却不知道兵呀！匪呀！乞丐呀！都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压迫之下无力营生的无产阶级呀！此种现象，现在还一日千里的鼓着劲儿向下滚，将来正不知依于胡底咧！中国是农业国家科学进步极幼稚生产方法最粗笨，自机器生产品输入中国之后，一般人民，消费欲望大长，而生产方法却无力改进，有消无长，人民生活遂日趋困顿了，失业破产连类而至，也不是无因的事，试观中国社会，一种烦闷不安的现象达到何种程度，拟之“滚油锅里煮虾子”有过之无不及罢，象这样社会，将怎样维持安宁！只有朝破裂途中走，但是这种破裂究竟要取什么方式呢？是又不得不加以考

虑了，有许多人说，共产主义革命是在有产阶级形成与生产条件具备之后的，那末，中国此时，确是未到这步田地，还是提倡资本主义，开发实业好了，俟有产阶级形成之后，无产阶级再来革他们的命罢，这真是胡说乱道了，要知道资本主义的立足点是在自由竞争上，他的要素是：借贷自由与关税自由，这两种条件之在中国已无一具备，虽欲效颦，何以着手？退一步说，纵使此种障碍有法驱除，资本制度可行无碍罢！而在理论上是将社会进化前轮向后倒推，在事实上将造成有产阶级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有产阶级朋比结合，私订条约拍卖一切，可怜的中国无产阶级不过供他们的永远牺牲两重宰割罢了。等待他们根深蒂固之后，无产阶级已打入十八层地狱里，能不能够翻身，我们且置不管。这种长期无产阶级痛苦，谁肯作俑，谁能忍受呵！！时代变换了，阶级争斗呼声已深入无产阶级的脑里，历史经过的惨状，已明白摆在人们的眼前，这种惑人听闻的鬼话，恐怕无所施其伎俩罢。

至于马克思的经济史观，在一方面是照着经济进化程途由既往而现在而将来，指出一个线索来，而断定其应该怎样，在别一方面则就资本制度本身，而指出其破绽来，而断定其结果将归于怎样，并不是说共产社会一定要在资本制度发达之后才可以产生的，否则俄国革命，便不应成功。不过他的革命期间要延长一点，破坏建设都在这一个时期中做，等到生产条件具备、阶级消灭之后，共产社会实现了。中国有一句话“前车覆辙来者之鉴”。资本制度结果已将全世界造成两大鸿沟，杜绝人类进化，举世界的最大多数无产阶级，正在他们压迫之下，呻吟呼号欲自解放而不可得（俄国例外），我们难道还要抱着头儿朝里边钻吗？马克思已明白告诉我们，资本制度之下的生产方法是合于经济进化的，它的谬点是在分配权限，不操诸生产者自身而操诸少数支配阶级——有产阶级

——之手，那末，我们此刻要破坏一个，建设一个，避去这个劣点，撇掉这条错路，一直的向着共产社会进发就是了。唉！按照实际情形去说，中国革命正轨，也只有共产主义一条路呵！因为他是不背社会进化合乎中国人民需要的，除此之外，不是错路，便是多想的，讨论到此，已得了结论，我们进而可以讨论现实方法了。

C、共产革命用什么方法在中国实现？

由上面所讨论而得的结果，我们已经知道中国受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侵掠压迫，在经济上已不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了，一切国民无阶级无界限的都处在奴隶地位(c)，所以中国无论在那种制度之下，或某种阶级利益之上，都有恢复独立的必要，换句话说，也就是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势力，中国在内政上，还是封建式的群雄割据时代，这些蠢猪，不特不知道什么是社会进化正路与人类应取方针，并且不知道怎样才可以巩固他们自身的利益？一年到头只顾闭着眼睛在国内乱闹，横着膀子，在社会乱撞，十几年来，闹得鸡犬不宁，生灵涂炭——工不能做工，商不能营商，农不能耕田，学生不能读书——这更是中国社会前途的莫大障碍物，无论那一阶级，只要想过安稳日子的人，莫不咬牙切齿、日夜设法，要扑灭他们的，所以打倒军阀，也是中国任何进步革命前的先决问题（d)；但这两种工作，究竟怎样着手？马上采取共产主义革命么？共产革命是纯粹无产阶级的，是反抗一切有产阶级的，以中国现在无产阶级状况，除少数交通便利都市，方开始团结训练之外，其余大部份受着产业不发达的影响，尚在杂居散处的状态中，实力是很薄弱的，勉强造成革命局势，中国的有产阶级，势必托庇于国际有产阶级之下，群起反抗，以中国现在半独立的国家，门户洞开锁钥全失，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势力已布满了中国的腹心，里应外合，四面夹攻，一举手就

压碎了，到了此时，不特革命局势难保，中国将变成纯粹奴隶地位，一听国际有产阶级的宰割，所以共产革命之先，还有扶助民主革命的必要，因为他是政治上比较进步的革命，可以号召全国人民，可以合力打倒军阀，可以合力图谋独立，但是这种革命，毕竟是第三阶级的，与第四阶级不相干，他们在革命之先，虽有许多利害关系与第四阶级相同，到革命成功之后，就纯粹处在相反的地位了，政权既掌握他们之手，就要把持一切（e）；照直不打弯的朝着资本制度上走，无产阶级又变成他们的眼中钉了。这个时期之内，若无相当实力，政治法律是丝毫占不到地位的，结果将落一场空，蹈法国1789年革命的前辙（f），所以这种工作，在中国变态社会之中最重要而又最困难咧！所以在这种革命之前，无产阶级绝不能不有充分准备的，这种准备，就中国现状看起可分四大范畴：农、工，兵匪和学生，现在再一一分开来讨论。

1. 工人　这种工人，纯粹指交通便利各大都市的工厂、公司工人，以及散工车夫等而言，他们的人数虽不十分占多数，他们的力量是最容易集中的，是可以直接与有产阶级交锋的，所以他们是共产革命的先锋军，我们负有共产革命使命的人必得亲身插入里面做组织宣传指导的工作，一步不可放松的，必得将所有工人，一齐搁在我们指挥之下，革命□□□□□的。

2. 农人　中国是农业国家，毕竟农人占最大多数，中国农民受历史上两大原则——遗产多子分与人口增加率——支配，土地自然不易集中。农民还可分成若干等级，大农、中农、小农、贫农、佃户、农工等，中国过去的种种革命不含丝毫经济性质——纯政治的——结果不过更换几个支配者——掌握政权的官僚——（g）并不动摇到农人生活基础，纵然其间不无横征暴敛。事实发现，他们根本租传的吃饭不管闲事惯性，也只得低头忍气□□的，

可是共产革命则不然，首先就要动摇他们的生活关系，变更他们的旧日习惯——没收财产，建设新观念——这个时期他们是不由得不动了，他们要拼命的来抵抗的，并且这个反抗，不只是大地主与财东，中、小农都会附和的，这却是个重要问题，那有轻易解决的道理？同志之中有许多人说，中国共产革命，农民是不成问题的，只要保持他们不动——守中立——就够了，殊不知在这样变动之下，怎么叫他们不动呢，不是昧于事实的理想吗？要想避免这个反动势力，只有团结农工、佃户、贫农三个阶级去抗制其余的，所以组织农民——与俄国虚无党的走入民间不相同——也是中国共产革命前的重要工作，万万不能忽视的。组织农人方法，我以为要从农会与农民教育入手，农会是无产农民的保护机关与团结的基础，可以用他作政治的争斗，可以用他来抵抗地主的剥削与官厅的压迫，只要同志们肯亲身到乡下去，一定是有效果的，为取得农民信用起见，在农会里面，可附办各种合作社——消费合作、借贷合作等——教育是宣传与训练无上的工具，中国的教育固然黑暗，而乡间教育，至今尚未立基础，无数青年，还在受那人间地狱的私塾苦刑，同志们如肯亲身往乡下去，正是及时之雨，不愁无处安身的，并且没有外界压力的，农民特性，天然散处，集会结社，比较困难，加以交通阻隔，不易着手，惟一机会，只有学校，以中国乡村那种古风万丈的特殊情况，能够代表一切的只有稍识之乎的先生们——绅士、小学教员、私塾教师、学校学生——我们能够将他们拉到一齐来（绅士除外，余皆有可能性）力量放大了，在最近间内，万一人数不够分配时，一县只要有一两个同志，插身高级学校（职教员均可）里就可设法造就他们的，在各县高小学校以上的学校里，可提倡设立讲演团，利用年暑假期使各学生们在各乡集镇上讲演，同时农会巡回讲演员，

可随时随地指导一切，在各乡镇的保卫团中，我们同志也要插身进去做宣传训练的活动，总之，只要机会在前，绝不使他错过便是，我们最后目的是要做到工会农会联成一气，如此则革命根基方建筑得稳固，而革命后的各地方苏维埃一举手间就可以组成。一切反动势力都用集中权力去扑灭他，控制农民反动，当然不成问题了。即在民主革命期间的争夺政权，与迫定工农法也非利赖*这种广大民众势力不可的。若丢弃一大部份农民不管，不特共产社会不能实现，即民主革命后的新战斗力，亦将无法整顿的，同志们不可不注意呵！

3.兵匪　兵匪原来是两件东西，我现在将他们合在一起讨论，因为他们同是无法营生的失业游民，同是掠夺做生涯，他们的形式虽异，他们的实质则同，并且在他们活动方法中，也有许多相同点，所以我将他们归併在一起，我很相信在中国共产革命前途中，兵匪是个催生婆，他们当兵匪的原因，既是在求生，那末，能够指点他们一条好的求生路子，觉悟过来，就是无产阶级的好朋友了。所以我们同志有投身兵匪做宣传组织运动必要的，不过这种工作，含了不少危险因子，凡做兵匪运动的同志们，所当注意之点是：在兵匪之中已经有了一种先入的寄生打劫主义——青红帮——我们要变化他们首先要破除他们旧有的顽固观念，尤其是他们的首领，不然，必定要生流弊的咧！

4.学生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学生界已渐渐觉悟过来，一种改造社会呼声，惟有他们喊得高，虽然他们的思想不能一致，而共产主义思潮总算接受得最多，而且传播得很快，未来的共产社会革命，一大部份要仗他们做指导者。工人、农人，能力是很薄

原文如此

弱的，就中尤以中等学生为最相宜，因为他们的地位，多半是中产阶级，或是无产阶级候补者，能升学的很占少数，这些不能升学的先生们，在学校里已养成一种好管闲事的习惯，出了学校之后，谋个饭碗又大大的不易，社会上的重要位置又占不到，低下的事，他们又不肯干，于是乎就只得寻隙捣乱了，若无一种主义去笼罩他们，他们势必走入邪路，去当绅士，当讼棍，当兵匪，一切反动势力，都由他们一手造成，能有一种主义去笼罩他们，使他们思想上发生变化，脑筋里存一种希望，拿着他们那种捣乱本领去干革命事业，收效是无穷尽的，我所呼吁，往乡下去的口号取材也在他们咧！所以在学生界中，我们有积极宣传主义与吸收同志的必要，因此我们同志必须插身学校当教员，当管理，想出种种方法去训练他们，指导他们作社会运动，鼓励他们到民间去，这就是我的学生运动观。详细方法已由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施行，我无再说必要了。末了，我还有几句话要讲，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一方面要夺取政权，一方面是不离弃群众的，这篇文字，到此地为止罢。

李慰农　28. 4. 1923

附：

回　　信

慰农：

关于“共产主义革命你怎样在中国实行？一个问题，你的意见我大体都赞成”。不过我觉得你的文中有些文句不妥的地方，兹举

出如下：

(a)“共产革命”宜改为“共产主义的革命。”因为说‘共产主义的革命’就是指明这一个社会革命是建设在共产主义的原理原则上，换言之就是说建设在阶级争斗和‘无产阶级专政上’说“共产革命”即不免被人疑惑我们要求立地就实行共产。

(b)“交通建筑”宜改为“工厂、机器、铁路、电线……”“而被机械商品所压倒的手工工业，反与日并进起来”宜改为“而机器生产品压倒手工业的速度反与日并进起来。”

(c)“一切国民无阶级无界限的都处在奴隶地位”这句话也不妥，因中国底军阀资本家及其他一切寄生虫并不同无产阶级处于奴属地位，我们常说在中国这种半殖民地国家，一般实业家和商人同样底受军阀蹂躏和外国资本主义压迫的痛苦，是在说这般实业家和商人也厌恶军阀和外国资本主义，因为这后者都与他们的营业有妨碍，阻止他们的资本主义底发展。但他们的社会的地位毕竟比无产阶级好，他们毕竟是掠夺者。

(d)此处一句也不十分明了。

(e)“但是这种革命毕竟是第三阶级的，与第四阶级不相干……”这一段话，我也认为不妥。中国底无产阶级现在做民主革命，不是白白地为第三阶级帮忙，是为自身解放底直接的利益。因中国无产阶级现在的解放底要求，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是独立的民主共和国。所谓独立者，就是要排斥外国帝国主义底侵略和束缚，所谓共和者是要打倒军阀底横暴以取得相当的言论集会出版等自由和劳动者底地位底改善——这些都是无产阶级底自身的直接的利益，亦即是无产阶级解放的第一步。一旦“独立民主共和国”这个标语成就了，无产阶级经过这次民主革命底争斗一定取得很大的势力，即进而要求无产阶级专政。第四阶级即与第三阶

级对抗。但不得预料在这时政权就全落在第三阶级之手，由他把持一切。鉴于中国政治和经济的状况及国际的情形，中国无产阶级在这时，一定不在第三阶级之下。在十九世纪之初，法兰西的有产阶级以共和底名义号召所有被压迫的民众卒推倒封建社会贵族和僧侣底专制，取得了政权成立他的统治，同样的，中国现在的无产阶级以独立民主共和国底口号纠合所有革命的分子打倒军阀和排斥外国帝国主义，卒以此而得了权力实行他的阶级底专政。有些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以为'民主共和国'即是指有产阶级底共和国；听到民主共和国，他们即联想到欧美已经形成的共和国底图形。因此，他们以为中国无产阶级现在要求独立民主共和国，援助民主革命，是帮助别人造房子，同时又明知这个房子造成时是于己不利要给他拆毁的。殊不知所谓'独立民主共和国'并不是专门名词如门窗，□扇；他是一个政治的标语，无产阶级拿这个标语可以夺取一些具体的利益。

(f)"中国过去的种种革命不含丝毫经济性质——纯政治的——结果不过更换几个支配者——掌握政权的官僚……"这话是不对的。所有的革命都是政治的争斗；他的起源最后的分析，都是经济的——都是起源于民不能安居乐业。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如此。至于结果依然是寡头政治，只换了支配者，这是由工商业未发达，大多数民众不能与国家权力接近的原因。不过我们须认亲〔清〕一点，中国历史上权贵争夺权位如现在督军们争夺地盘是一样，不得谓之革命。

又关于农人一项，你不免有些近于理想的描写——如说"组织农人方法我以为要从农会与农民教育入手""而乡村教育至今尚未立基础……同志们如肯亲身往乡下去，正是及时之雨……以中国乡村那种古风万丈的特殊情状，能够代表一切的只有几个稍识

之乎的先生们……我们能够将他们拉到一齐来力量就大了，在最近期间内，万一人数不能够分配时，一县只要有一两个同志插身高级学校里，就可设法造就他们的……在各乡镇的保卫团中，我们同志也要插身进去做宣传训练的活动。”

你说“只须机会在前绝不使你放过”，这是不错的，但机会还有缓急先后之分，而且革命的事业，要处处注意到政治的重要的。比如要派一两位同志到各县去，跑到极偏僻的乡村去充小学教师即不如来到重要的都会上组织人力车夫，挑粪夫和搬运夫或办新闻报纸或办各种夜校，居在古风万丈的乡村稍识之乎的先生们，纵然受了我们的共产主义宣传，但是到了革命的争斗时，他们处在那偏僻的地方有什么效用呢？

在共产主义的革命中，总是城市上的及交通机关上的工人操重的作用。因为他们便于组织，便于集会，便于受政治上的训练，便于做政治的争斗。次之就是日与都会接近的农业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故我们对于这种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是应该尽可能的组织起来，使他们与都市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作革命的争斗。此外如散乱在极偏僻的乡村的长工或短工，虽也是无产阶级，但因他们的政治地位太落后，不能组织起来做革命的争斗，只有由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时，将大地主或富农底土地分一部份使他们知道保护无产阶级底共和。至于有土地仅以自给的农人，也只有在革命时不闯动他们的财产使他们保守中立。富农和大地主完全是反对无产阶级底革命的，所以无产阶级对他们也是取攻击的态度。

兵匪底宣传，一定要等我们回到中国去，身历其境地观察他的可能性，此刻是不能详加规划的。

宽　30. 5. 1923

《共产主义研究会通信集》第三号，1923年

中国共产党与其目前政策

R

顷见《先驱》第九号，是中国共产党已在国内露出眉目来了！我们不但无量欢喜，我们更要即向大众呼吁：凡是有良心，有诚意，明白事理，舍私谋公，而不想过分出风头的共产主义者，都应立地聚集于彼，以厚共产革命的势力，以速共产革命的成功，我们又看见他的目前政策：他是要与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各革命的社会主义团体，结成联合战线（统一前敌），以完成民主战争，建立真面目的民主政治，这种办法，乍看诚不能不诧异，然平心静气就中国现势一想，便不能不见其出于不得已，他这种办法，与现在德国共产党赞助民主派，共同抵抗反动党，用意是无大异。凡是明白事理之人，如何能不谅其苦衷？但我们也不能不明白告诉大家，而请大家切记：那种办法究竟不是共产党的终极目的，那种办法究竟不过一种手段，而且也不是象无产阶级专政一样的，共产革命的普遍的必然手段，只不过处象现在中国情势之下，不得不取的一种特殊手段，采取这种手段的时候，必须牢牢记住：自己的正手段乃是劳动会议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自己的本目的乃是生产共有，分配共管，无阶级，无国，无家，无政府的共产社会，更要不忘为一种行动与终极目的不同的党派，结成

统一前敌时，必须保持住自己组织的独立！必须得机即把自己的终极目的向大众标示！

《少年》第二号，1922年9月1日

反对帝国主义联合战线怎样在中国应用？

D.

一

欲将反对帝国主义联合战线在中国应用，必须分析中国社会之各派状况，然后才有下手方法去研究如何联合作战。

中国的统治权仍然在帝政遗留下的军阀（北方）及由革命造成的新军阀（南方）之手，此等军阀计分为三大派，各派均依照军阀存在之原则结托一派帝国主义的国家为其后援，如下表：

北方及中部	直隶派之吴佩孚	——倾向美国
	奉天派之张作霖	倾向日本
	安徽派之段祺瑞	倾向日本
南方	联省派之陈炯明	——倾向英国

吴佩孚颇有反对日本之表示，而同时有极力拥护亲美派的倾向，因为他只看出日本武力侵略的危险，不能看出美国经济侵略的危险。

张作霖与段祺瑞之亲日，不但有过去的长久关系，最近且以

日本之援助，其军队已占领福建省，将联合浙江督军卢永祥（段派军人）以为段派之地盘。他们的势力巩固起来，不南向和亲英的陈炯明冲突，便北向和亲美的直隶派冲突。

南方的联省自治派为广东省之陈炯明，湖南省督军赵恒惕及云南省督军唐继尧为重要人物（贵州省及广西省在上列三省势力支配之下），尤以陈炯明为主要。陈炯明以反对孙逸仙之故，自然乐于与向来反对孙逸仙之英国（香港政府）结合，英国人更乐得利用陈炯明以排除民主派孙逸仙在广东之发展，因此两方自然勾结起来。最近由英国借款二百万金镑与陈炯明，以巩固其地位，陈炯明遂赞助香港政府压迫工会之政策。陈炯明反对孙逸仙，吴佩孚反对张作霖与段祺瑞，此时孙逸仙方与段张联合攻取福建省，陈吴间遂自然有所联合。这两方面的联合，只与其敌人（张作霖与段祺瑞）之后援——日本帝国主义者——有所冲突，而于两方面自己之后援——英美二帝国主义者间——却无甚冲突，因为英美势力在南方之冲突不若日美势力在中国北部冲突之甚。

二

中国民族以地大物博交通不便之故，得日久停顿在家庭的农业及手工工业之自足的经济状况之下，因此资产阶级不易发展，因此封建式的军阀家长式的政治得日久保其余焰以至今日，因此幼稚的小资产阶级至今还未发达到势力集中能够独立争斗的程度，因此现存的各党派无论其心理上或将来的目的上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与否，而他们在现在实际上无一不欲倚靠某一派帝国主义者及一派军阀以自存及发展，其现状可分析如下表：

1）新兴的实业家
2）全国大部分商会
3）教育界大部分
4）进步党
5）基督教徒
——倾向吴佩孚——美国
——（反对{张作霖 段祺瑞}——日本）

6）广东香港商人
7）益友社
——倾向陈炯明——英国

8）交通部
9）安福部
10）国民党
——结合{张作霖 段祺瑞}——日本
（反对吴佩孚——英国、美国）

以上十个党派中，国民党是属于革命派，其余九个都是非革命派。这九个党派中，新兴的实业家是近数年来在上海及其邻近地方起来的，欧美式的工厂工业都在他们手里，他们已有由小资产阶级进到大资产阶级的倾向。教育界之大部分，尤其是由美国毕业的教授，与新兴的实业家相结合，好政府主义者就是他们的代表人物。全国的商会是大部分富裕的小资产阶级之代表。进步党原来是三种分子合成的（一）海外富商，（二）国内富商，（三）官僚，这个党此时虽已无形解散，他们的分子还能在社会上自由活动。基督教徒内有许多富商及官僚，美国传来的青年会（Y.M.C.A.）在新兴的实业家及高级学校教授团体内均占很大的势力。这五派人的共同口号是“教育实业救国”，他们已见到军阀是他们的障碍物，他们也反对军阀政治，然同时他们始终总想结托一个最好的最有力的军阀（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来制服别的军阀，来统一中国，好让他们来发展教育及实业。他们这样软弱的心理；是他们所处的经济地位造成的：一方面他们在经

济上已有相当的地位，已有可以自存及就现状而徐图发展之基础，其政治上的地位已与统治阶级接近，因此他们自一九一一年到现在始终不赞同革命的行动，致失了他们现有的经济政治地位；他一方面他们阶级的发展究竟还在幼稚时代，没有达到独立争斗的程度；这种半发达的经济地位自然造成他们厌恶军阀而又结托军阀的矛盾心理。他们所以反对日本亲近美国，是因为他们一方面已有获得资本发展教育实业的需要与可能；一方面看出美国是有输出余资之必要的国家而日本则否，而且只看出日本货物输入之目前的障碍而未看出美国资本输入之将来的危险；他们这种反对一派帝国主义而又亲近一派帝国主义的矛盾心理，也是他们的幼稚的经济地位造成的。

广东香港的商人都是商业资本家，一方面依赖英国银行家之资本，一方面极力排斥日货。益友社分子原属国民党党员，因为他们经济地位较优（如金星公司派即唐绍仪一派等），遂自然趋于保守的倾向，与国民党脱离，而与联省自治派之军阀结合，这两派人虽以经济的地位造成他们反对革命的心理，而同时他们经济的地位尚不似上五派有急于利用外资发展自己的实业之需要与可能，所以他们虽有排日的表示，同时却未有与上五派同样的亲美倾向。

交通系完全是一班卖国的官僚，他们自清朝末年以来即利用盘踞交通部交通银行及各铁路等国家财政机关，以勾结外国帝国主义资本的手段，达到他们官僚的财政资本之目的，只要能达他们的目的，任何军阀任何帝国主义者他们都愿与结合。安福俱乐部本是段派之小徐一手造成的，他们的分子是军阀官僚及极堕落的知识者，他们因为羡慕交通系之富厚，想利用政权夺取交通系窃据国家财政机关之势力，造成了新交通系，如著名为中政府向

日本借债之经纪曹汝霖、陆宗舆等都是新交通系之代表人物。这两派本都是反革命的，他们在过去极其反对国民党，在将来也必然反对国民党，现在与国民党合作，不过是被吴佩孚压迫的一时现象。

国民党在中国各党派中是唯一有革命倾向的，但党员中以由世家崩坏的知识者及经济地位极低下的小资产阶级居主要地位，他们的革命势力，一方面不站在劳苦民众的基础上，一方面又不站在较发达的资产阶级的基础上，所以自一九一一年一直到现在他们革命的事业总是因为力量不足而自然成了流产的现象，并不是因为他们一时间政策的错误；他们的经济地位过于低下，所以他们造成资产阶级的好梦，还在推倒现在的统治阶级北方军阀，自己取得政权，以国际资本发展实业的未来世界，这是他们趋向革命的唯一原因；同时又正以经济地位低下，眼前无自己发展实业的需要与可能，所以眼前在经济上没有一定结托一个较富厚的帝国主义者（如美国）之必要；在另一方面，经济地位既低下而又无广大民众的后援，所以自然不得不结托肯为他们后援的任何一派帝国主义者及任何一派军阀来达到他们眼前需要的革命目的。

三

在以上十个党派以外，还有一班有革命的倾向而无党派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在社会上亦有相当的个人或小团体之活动，这种分子大部是由世家或小资产阶级受经济制度变动的挤压而将堕入半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之知识者，他们当中最进步的分子一遇世界革命潮流，也会发生剧烈的革命运动（例如一九一一年之革命及一九一九年之学生“五四运动”），但是这种非阶级化的浪漫

分子固然易于捲入革命运动，同时亦易于变为反革命的运动，所以象他们这派人在各国历史上曾做过革命的功劳，也曾做过反革命的罪恶。他们若失了适当的指导及适当的组织，便是革命运动中最大的障碍物。

农民居中国人口百分之六十以上，其中最苦的无地佃农在一千万以上，他们富于保守性，同时也富于原始的民族运动之本能，他们所受外资输入物价腾贵的痛苦最足引起他们排外的感情；他们在政治的经济的地位，均没有结托帝国主义者的需要与可能。

中国工人运动虽还在很幼稚时代，然而半殖民地被压迫的种种事实逼着他们开始做劳动运动时即富于革命的倾向和民族的感情。他们在政治的经济的地位没有结托帝国主义者的需要与可能，亦与农民等；他们不但没有此种需要与可能，而且半殖民地之工人备受帝国主义者掠夺的苦痛，他们比先进国的工人阶级更易于起来反抗帝国主义。

四

在以上的社会状况之下，中国共产党应该首先努力组织工人、农民、及小资产阶级之革命分子为反对帝国主义联合战线之主力军，再逼迫其余较进步的小资产阶级加入此联合战线，至少也要他们消极的离开帝国主义的牢笼不做反对的运动。

在这战线上，我们应该用“建设统一的独立共和国”为口号以推倒一切帝国主义及帝国主义的附产物——本国军阀。

《少年》第七号，1923 年 3 月 1 日

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

Y.K.

"怎样将共产主义搬到中国去应用？"——这仿佛是中国共产主义者一个重大的很难解决的问题。所以一般猜忌的、嫉妒的、莫明其妙的痛恨共产主义者，动辄拿这个问题做最后的攻击，以为提出这个问题就足以完全抵塞了你们共产主义者底口！

根据他们对于共产主义的推测或传闻，认定共产主义就是象他们脑中所想象的，他们遂热烈地攻击共产主义；其实还是他们自己弄错了。为解答这问题，此地只能略述几个重要点。

一、共产主义不是一个老公式，人即拿这个公式去迫令事实符合。他的理论的方法是从经济发展底实际上辩证出来的，不是成立于某一个改革家所创造的理论上的。所以共产主义者底主张决不是偏僻奇异的或高尚纯洁的永久不变的真理；他不过是看得清楚说得不错，要综合所有的革命的势力向正确的最后的目的去进行就是了。

二、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底反面。于今资本主义已发展成了国际的，于是反资本主义的运动也成了国际的。这就是说于今资本主义已发展到了一个程序：各种垄断和银行资本底统治成立了，输出资本占一个格外的重要了，一些国际的托辣斯互相瓜分世界开始了，一些最重要的资本主义的国家瓜分全球底地面告终

了；于是几大资本主义的国家不独以资本统治了他们本国工人，并统治了殖民地底民众，因之在反资本主义方面竖起两大势力：资本主义国家底工人和羁束在外国资本之下的殖民地底民众。

三、共产主义的运动就是世界无产者底解放运动。资本主义既将全世界都拉入他的牢笼，遂从各地方底人民中造成最大多数专卖劳力生活的无产者。资本主义生来就是压迫和掠夺的；及变为帝国主义，他更是抢掳的。举凡所有国际的、各国的种种危机、穷困、变乱……归根结底都是出自这些压迫、掠夺和抢掳。共产主义认定：因资本主义发展底结果，人类的将来是属于无产阶级。要想根本上铲除这些压迫，掠夺，抢掳等制度，只有各地无产者相继组织起来，取得世界的权力。各地无产者底缰索是与有产阶级的制度同时废除的。各地无产者一日不解放，即人类和平一日不能实现。

四、帝国主义掠夺殖民地，即以他的机器的生产力与殖民地手工业的生产力竞争，足以致殖民地于枯死而有余。乃他更限制关税率，占据重要的商埠，压迫赔款，乘机借债，矿山开采权，铁路建筑权，以及其他种种专利底抢掳政策，殖民地除少数特权阶级外，大多数民众都不知不觉地枯干了。因为殖民地底财富是这样被外国帝国主义剥削去的，殖民地底工业也不能发展，大多数民众虽成了无产者，但还是散乱的，不能有严格意义的无产阶级。因此民众底知识是很幼稚的，革命的思想首先只显现于少数受过教育的中等分子。

五、帝国主义为保持殖民地永久任他掠夺和抢掳，第一重要的事就是阻止民众势力底发展，尽可能的方法维持殖民地底特权阶级（军阀和其他腐败官吏）；勾通他们，借他们的手施行掠夺——在这里应该加上几句，就是在这种情形中，半殖民地（即

假点独立的虚名，只任各个帝国主义底掠夺和抢掳，未为某一帝国主义所统治的国家如中国、土耳其）比殖民地更苦。因为真正的殖民地不过为某一帝国主义所统治，任一帝国主义所操纵，虽是痛苦，倒还安静些。半殖民地门户是开放的，今天这个帝国主义勾结这个军阀，明天那个帝国主义又赞助（军事的和借款的赞助）那个军阀，结果酿成不断的内乱——所以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底革命运动，在推翻国际帝国主义时，首先即应将民众底势力组织起来，打倒当地的特权阶级。

六、殖民地底无产阶级，在组织的势力上说，既很幼稚，他的现时有力的敌人又不完全是当地的有产阶级，殖民地底革命分子也不单独是无产阶级——因感受军阀摧残和帝国主义掠夺不独是无产阶级——所以殖民地底革命运动当初不是纯粹的无产阶级的运动，无产阶级底党派应综合所有革命的势力，联络所有革命分子来做向无产阶级革命底第一步底工作：打倒当地的统治阶级，推翻国际帝国主义。

七、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底大战，是世界资本主义崩坏底爆发；一九一七年底十月革命，是世界共产主义成立底开始。从此苏维埃俄罗斯成为世界无产阶级底祖国，即世界无产阶级争斗底大本营。俄罗斯的无产阶级，在责任上说，他已先世界的无产阶级自行解放出来了，他有责任应该帮助其余尚在资本统治之下的无产阶级，在他本身上说，无产阶级是世界的，他必俟各国无产阶级都相继解放了，他才能算是真正的完全的解放；在他的能力上说，他已将国家的权力握在自己手里，所有国底资财和方法都放在他的安排之下。只须他的能力能够，他竟可以毫无顾忌地拿出来帮助所有被压迫者和被掠夺者来攻打世界的反革命。——所以苏维埃俄罗斯底成立，在世界上占一个格外重要的

位置。他是世界未解放的无产阶级一个坚固的依靠，尤其是近东和远东底被压迫民族。

依据上列几个理由，所以中国共产党——即一群对于上列七点有明了认识和有统一意志的人——在现时约有以下的主要的工作：

1. 组织工人和农人；

2. 教育青年学生；

3. 增高工农人底社会的地位（民权运动，要求增加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改良待遇……）；

4. 指示民众底革命的方向：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

5. 苏甦革命的势力（如指示革命党和其他较有意识的军阀底责任，个人加入国民党去工作……）；

6. 联络所有革命分子——感受军阀蹂躏，外国帝国主义压迫和掠夺的分子——同上一样的轨道；

7. 谋东亚被压迫和被掠夺者底通力合作；

8. 引导民众依附世界无产阶级底祖国：苏维埃俄罗斯。

请看以上就是共产主义者要搬到中国去的共产主义。这全不是象一般反对者脑子里所想到的。

《少年》第九号，1923 年 5 月 1 日

列强共管中国的步骤

飞　飞

列强侵略中国的方法，自从华府会议后划分势力范围的主张已完全为利益均沾的说法战胜，于是近两年来表面上只见列强势力一天比一天来得凶猛，而实际上便是这协作奏了凯旋。

在协作中，英美立在冲要地位，日本自是欧战中乘火打劫后的失意人，但他也决不甘心，故退还青岛使了种种手法，终得和北京政府结了个名还实不还的条约。新银行团借款，终因日本几次阻挠，不得畅行。扶助直派促成武力统一之局，本是英美得意之事，然而要不是日本受九月一日地震的损失，怕曹锟也难安然进了三海。我们拿奉皖两派和政学系在九月前那种摩拳擦掌的气势和九月后以至曹锟贿选成功时的情形一比，便知日本洋大人的靠山一倒，他们统都成了纸老虎。日本独逞之计既难行了，他很会看风使舵急转直下，于是协作之局乃更增了声势。

我们看看临城通牒有十数国签字，曹锟贿选成后，日本的国书立即重换了新的，长江外舰联防，日美首先表示合作，粤关税问题起，五强的军舰同时开往广州；这些，全是证明强协以谋我的步骤已渐趋于一致。最近为无线电台问题，日本虽因三十年专有权的关系，起与美国后占二十年专有权的相抗，但英国果从中调停得当，又未尝不可将日美专有改为国际共有；而且奸滑而善

于图利的英国帝国主义者，也正惯于弄成此事。

果然无线电的共管再图成了，则海陆交通，重大财源，殆无一件事不为外国强盗盘据；及一旦新银行团的借款再告成功，则全部共管之局即现。到那时共管中国的事实便由这先画龙后点睛的手法中完全实现了。亲爱的国人！尚想酣睡到几时呵？

《赤光》第一期，1924 年 2 月 1 日

军阀统治下的中国

伍　豪

北洋派军阀的势力，在中国历史上已占有二十多年纵的地位。近数年来吴佩孚更以北洋正统的号召，打倒段祺瑞，赶走张作霖，傀儡一阵黎元洪，然后以先宪后选的手段拥曹锟进了三海，他自己也随即正位直鲁豫巡阅使。吴秀才这样一气呵成的北洋正统之争，浩浩荡荡地南征北伐四五年，似乎北洋派正统后横的地盘又可继袁世凯之后而更行扩张了，但这不过是吴秀才一种梦想罢！我们且先看看曹锟窃取总统，吴佩孚做了“传统长子”后祸国殃民的成绩：

一、曹锟贿买猪仔议员，用了一千三百多万资本。这笔大选费的来路是王承斌从直隶各县摊款、金丹罚款、直隶省公债二百万元、预征直省地丁二百万和井陉矿务局向外国银行抵借现款九百万等项中支出的。

二、曹锟为要博得列强的欢心，列强也以交换觐见为名，于是临城案的通牒北京伪政府全部承认了。

三、曹锟的总统本是英美帝国主义者一手造成的，伪政府深恐日本吃醋，竟于曹锟登台旬日之间承认了日商擅发的俄发债票利息和参战借款的转期。

四、威海卫退还交涉，经山东人民再四奋争，而结果洋奴顾

维钧回答山东人的批示竟说："……归还威海卫系属英国善意，故无条件交还自难强英人以必从。"于是威海卫又继青岛而去了。

五、吴佩孚为要贯彻他的武力统一迷梦，不惜指使北政府卖国以快己意。美国军舰助赵恒惕在长沙示威，日本宜阳丸替吴佩孚运军火入川，北政府暗示外舰占据粤海关，这全是此事铁证。

六、王克敏为要替曹家政府买好于法国，竟收买报纸三十家，以图金佛郎案得于暗中恢复。

七、直军入川入湘，孙传芳攻入浙边，陈炯明、沈鸿英在广东骚扰，山西阎锡山将受直派的排挤，这全是吴大将军殖兵政策的德政。

八、外交系以孙宝琦老板做幌子的卖国内阁于本年一月中组成了，开台第一出，便是顾维钧演他的拿手好戏，卖了三条铁路——山东的烟潍、直隶的津赤和沧石——给英国财团，借英金二千万磅，成为袁世凯后的第一次大借款。（事载《工人旬报》三十七期）

够了！够了！这些祸国殃民的强盗、洋奴，我们若不将他们赶走净尽，无法无天的罪恶将更从此层出不穷了。

*　　*　　*

是的，但赶走他们是反直派诸人们能胜任的么？我们知道黎元洪为要过足总统瘾而南下，于是托庇日人，勾结政学会，接近唐绍仪，收买议员南下；但结果毕竟因金钱势力远不及曹吴，竟弄成买空卖空的僵局，而自己也不得不跑到日本去藏拙。次之，皖系、奉系都只为日本受了九月一日地震的影响，不能尽力助段祺瑞、张作霖的饷械，于是马厂誓师的活戏乃不得于曹锟贿选成功后演出。虽说现在浙卢、沪何有蠢然欲动之势，但孙传芳若不逼之于南，齐燮元若不以淞沪警察厅长事逼何丰林，则老奸巨滑的卢

永祥决不会立起反直之师。再次，则四川的熊、但，滇唐，贵刘都在自顾不暇，而且更是不应与谋之人。总之，这一干军阀、官僚、政客们的反直运动，不但一时不是曹吴对手，便是真能倒曹、倒吴，他们又何尝不可继续曹吴的卖国工作。十二年循环的军阀祸国之局，真将我们教训够了！

*　　*　　*

新旧军阀既都不足恃，[illegible]可待以救中国的，只有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联合起来，实行国民革命。而现时中国国民党实在领袖此国民革命群众的地位上。我们试看年来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在广东奋斗的经过，便知全中国中真能集实力与北洋军阀抗的实仅此一支孤军。假使陈炯明不几次阻挠北伐，现时南方革命势力至少也可伸张到长江南北。即就最近说，曹锟贿选成后，孙中山方将举兵北伐，陈炯明又出死力将中山困住；虽近报广州已转危为安，陈军已退败下去，但死灰尚可复燃，况甘心从贼媚外的陈炯明后方又有英政府、吴秀才做靠山，前途的胜负亦正未可预料；然而孤军转战的孙中山却已疲于奔命了，负有革命使命的国民，果忍长此作壁上观么？

*　　*　　*

不，国民革命运动亦将兴起了。

第一、全国有觉悟的工人，自从京汉路流血后，大都看透了北方军阀和外国强盗的恶毒，表同情于革命派国民党的日见其多，因为他们深知香港海员罢工胜利得到南方政府助力不少。

第二、自曹锟图谋总统开始，全国学生总会即通电否认北京国会政府，并请孙中山指日北伐。及曹锟贿选告成，安徽学生对猪仔议员首先激起了群众的惩戒运动。

第三、中国农民本来是最称驯良的，但近因迫于军阀的祸

害，亦渐渐知道团结反抗了。上年广东海丰农民因飓风大水为灾要求地主减租，田主竟勾结陈家军捕去农会职员二十五人，遂激起十余万农民的反抗运动。又湖南衡山的岳北农会已拥有会员四万余人，复能四出宣传，颇引起地主的极大恐慌。这两桩事实全是证明中国农民是可以在不久的将来走上革命战线的。

第四、《响导》报载："最近山东省政府强迫征收产销税，税则之苛及于小菜大蒜，于是激起沿胶济路十余县人民剧烈的反抗，全体罢市，殴毙税吏，拒绝官厅，结果停止征收才没有酿成大变。"其后"山东奸商丁敬臣以三百万元运动包办青岛一带盐田，与日人狼狈为奸，事为盐户侦悉，即起反抗。"又有"吕某在山东财政厅承揽山果税，遂引起历城、长清、滕县、南山……等处山果商贩之反对，以性命为孤注，阻止征税之进行。"及年底十二月，山东滋阳、泰安、宁阳等七县花生商人，又因财政厅私委省议员王某包办津浦路济南段的花生税举行全体罢市，反抗增长印花税价。这几件事一方因足以证明列强欺凌、军阀压迫最甚的山东商人已涌起革命潮了，他方也实足与全国商人一个团结反抗的暗示。

好了！如许多的革命潮头已渐涌起于冷净无波的中国民众海中，我们相信不久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均将会冲上前锋来做弄潮人。

《赤光》第一期，1924 年 2 月 1 日

亲美派的中国人听着

飞　飞

上海一月十三日的电报，有云：

此间中外各报是日发表一由美国寄来信件。该信疑系美国国务卿许士所写，寄与某共和党员，托其转递在中国传教之亲属。该信大旨为：中国近日情状甚足使外人灰心。九国条约之成立，承认中国完全自主，外人因中国已有实力之政府履行其对外之义务，故希望其从此可大进步，以分享在华权利。不料谋杀劫掳美人之案及其他华人对外不满意之行动，层见叠出，足以证明中国内政之不明，官吏之不守法，危及在华外人性命权利。美政府为美国侨民起见及责任上，对于中国现在趋势，实不能不设法筹商对付云云。

本来“中国内政之不明，官吏之不守法”，全由列强故意认当道军阀为“中国已有实力之政府”，勾结其“履行”外国强盗所认定的中国人应负的“对外之义务”所致。因为列强和军阀这样勾结，民间的不安和不平遂触处爆发。人民谋自立急，军阀与以摧残也益甚，而列强更助军阀张威，于是暴动革命的举动自日益扩大。今美国帝国主义者不自反省，反因其不安然“分享在华权利”而要

“设法筹商对付”。美国帝国主义者啊！中国人非尽懦弱，终有一天会使你们看得见“中国已有实力之政府”。到那时你们才能懂得甚么是你们的“在华权利”！但同时我们也望亲美派的中国人玩味下美国国务卿这番教训。

《赤光》第二期，1924 年 2 月 15 日

国际帝国主义乘火打劫的机会又到了

伍　豪

段祺瑞赶走了张勋，日本的势力随即霸占了北京政府；吴佩孚赶走了张作霖，英、美的势力当即继承了日本一向在中国的地位。陈炯明叛卖了孙中山，英国的香港政府乃即成为广东的太上政府。这些过去的事变，都是国际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所施行的乘火打劫的惯伎。我们本已受够了这些教训，但惯爱做和平梦的中国人——特别是江浙人——却依然昧于此类情势，有时还不免要跪在洋大人面前，请他们来解中国之围，至少或也要请洋大人的傀儡来图谋那不可能的和平，如赞助何东和平会议一类事实，这种"倚仗洋势"的心理，几乎要成了衰颓的中国民族的第二天性，说来真是可耻可叹！

但是眼前又快横着一个事变了，据最近法报电讯：江浙的战机因着苏齐增防和以海军防沪，闽军窥浙的举动将逼使浙卢沪何不得不出于一战。于是外交团决议三个条件：（一）沪宁铁路不得运兵，上海不得发生战事；（二）各国速行组成联合舰队；（三）警告中央政府及军事当局者，不得损害外人生命财产，并须负责赔偿战争中外人或〔各〕种损失。这是三个明明白白乘火打劫的条件：扩大的联合舰队借着这个题目实现了，铁路共管又正可扩张

到沪宁路，转瞬便将到沪杭路，而赔偿损失又正好作为将来敲诈一笔大款取得某项权利的张本。惟事变虽如此明白，然而我们不敢说惯爱做和平梦的多数中国人——特别是江浙人——不会象上次直皖战争时天津寓公以天津幸有三十里内不许驻兵的外国条约的同样心理来“欣然承受”此三个要求。国人们！以我言为苛么？请各回省下：“倚仗洋势”的心理在我们中间较鸦片的流毒胜得几何！

《赤光》第三期，1924 年 3 月 1 日

救国运动与爱国主义

伍　豪

我们昌言救国运动是根据于国际政治经济情势、弱小民族地位，非内倒军阀外倒国际帝国主义不足以图存的见地而来，决非狭义的爱国主义运动。狭义的爱国主义运动的流弊，至少对内会造成法西斯蒂——亦即是义和团——的局势，对外会养成帝国主义的野心，这种趋势，非特为中国现时情形所不许，即或有造成的可能，我们着眼于革命图进化之途的人，也决不容有此误谬的主张引导国人入了歧途。

我们为救国而倒军阀、倒国际帝国主义，但我们心中却不容丝毫忘掉与我们受同样苦痛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弱小民族，亦即是全世界的被压迫阶级。并且我们若认清事实，果想将军阀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打倒，我们也非与全世界被压迫阶级联合一致来打此共同敌人不可，故我们的救国运动乃必须建立在国际主义上面。

且国际的强盗近日来已看出我们救国运动的趋势，他们于是故造新闻，不说中国排外举动极盛，便说中国拳祸将再发生，这种颠倒黑白的流言，很足以摇动我们全世界被压迫阶级的联合阵势。我们甚望明达知变的革命同志，要谨慎发言，万勿错乱了我们革命的步骤，阻碍了世界革命的行程。否则不幸竟驱国人走入

反革命队伍中。这将使全中国或竟至全世界要感着如何遗憾啊？我们岂能不慎之慎之！

《赤光》第三期，1924年3月1日

弱小民族的国的主权收回运动

翔

在国的界限未消灭以前，任何国土的统治阶级都需要一个独立的主权之行使，而在主权被剥夺的弱小民族的中国尤其需要一个主权的收回运动。

在埃及自从素来抗英持拒货不协作主义的查乐所领袖的国民党，在选举中取得胜利组织政府后，埃及政府的对英方针便较以前强硬许多，最近为卢曹尔古坟公开事，埃及政府终能行使其统治主权屈服了蛮横强占的英人卡突耳而决定三月一日公开展览。

在土耳其，最近土政府曾于亚垂安漏布耳封闭法人所办学校，收回教育主权。

这两事虽是小小的主权收回运动，但在埃及、在土耳其毕竟能实现了，至在我们中国，不但关税主权收回运动的声援极其微小，便是外国人在中国土地打了中国人一掌的小小惩罚权，也都无日收回，而且逐日逐月的还继续将未失的主权逐件失掉。似此，比起埃及、土耳其来，真将愧死！

《赤光》第三期，1924 年 3 月 1 日

两个不惹人注意的问题

飞　飞

在去年，上海、汉口两地租界上泄露出两件遥遥相对的洋主人和外国捕房残杀中国人的案子，这在普通人——特别是租界上的中国人——的观念或竟以为司空见惯，无足惊奇，但我们却愿把他写出来以领教列强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的所谓“司法文明”。

去年四月间，一个在上海当西崽的宁波人乐志华向洋主人告退回家，他的主人忽无端的冤他，说他偷钱八百元，立刻送他到巡捕房中受那非法的拷问：“吃雪茄”，“浇冷水”，打得血肉横飞，死去三次。乐志华的亲供中描写这件事情曾说到“……到第三次醒后，他们又拉我起立，去我的手铐、衬衣……把我平空吊起。那西探说声‘请他吃雪茄烟’，登时我的鼻孔里插进一支纸捻，纸捻的一头点起火，火烟直冲心肺，满身的急汗，满脸的眼泪，淌过不已。西探哈哈笑得真得意。我还记得他早就说过：‘你若不全招，必定打死你，我是老上海，打死个中国人有什么稀奇！’……日探忽又束紧我的肋骨，上上下下压得喘不过气，晕过去。醒转来满身又是浇得冷水淋漓。死来死去不知道几多次。……”后来乐志华依此供辞在上海英按察使署告那捕房的二西探、二华探、一日探，但结果两个施刑的西探竟被法庭宣告无罪了。然而另一方法庭也不得不承认乐志华的残伤系出于虹口捕房中。但结果何又

如此，我们只须将《字林西报》——英国帝国主义在华的机关报——说的话录出一句便能知其所以。

“盖此等被控情节关涉一切西方人之‘威信’，假使成立为罪案，则决无一人不感觉吾人所自夸之‘文明’已遭污玷矣。”

其次，在汉口日商本多洋行厨役华人田仲香，十二月二十日被该行诬窃表练，先打断田臂，继送日捕房，用毒刑拷问，用麻绳痛绞，至二十一日因伤致死。捕房通知洋务公所会署员杨培往验，杨见田伤痕遍体。多数华工往捕房质问，又被武力驱逐，日本义勇队消防队武装上街示威。

国人们！这便是“文明”国在中国所施的“文明”法律！你们若能感到此“文明”中有丝毫野蛮凶残的气息，你们便应懂得国际帝国主义的“威信”究是些什么东西了。并且旅法的工胞们，你们于九死一生之余，苟回想下马赛大院和军事待遇下的法兰西的“文明”滋味，你们也更可懂得帝国主义者的威信了。可怜乐志华和田仲香也不过是你们万分之一的写真！

《赤光》第三期，1924 年 3 月 1 日

三百多条生命换来这样三条要求

翔　宇

关于日本军阀浪人乘着日本大地震后人心慌动的时候，惨杀华侨三百多人，并华工共济会会长王希天一案，经北京政府派王正廷赴日调查的结果，北京外交部仅根据他的报告向日本驻京公使芳泽提出照会作下列三个要求：

一、日本政府关于此案之调查及惩罚，应请逐次发表。

二、日本政府对于受害者，应从速支付抚恤金。

三、日本政府应担负此后不得再有此类事件发生。

死了三百多条生命，经了各方面的呼吁，只博得区区这样三个要求，比起临城案绑了十几个外国人便闹得全国翻腾，自北京总统以下都吓得唯洋大人之命是从的那番景象，真觉得中国人的生命自视得比狗还贱了，更何敢比于洋大人。

总之中国人遭各国帝国主义者的蹂躏、贱视、残杀，无处非然，如最近传出的美侨残杀中国水手（事载《工人旬报》第四十二期）和日商逼死贾初敏二案，事情重大固不能比诸留日侨胞三百余人之被杀，但被压迫的中国人无分有产阶级无产阶级之同被各国帝国主义者欺凌则一；在勾结外人的军阀统治下的中国政府之不能为中国人索命尤属当然事实。我们永不要信这般列强与军阀互相勾结的现时中国政治能有希做保护我们国民生命之望了。

生命悬在他们手中，怕死也要死，死里逃生，我们只有出于革命一途。报仇雪恨在是，救国安民也在是。

《赤光》第七期，1924年5月1日

又是一个乐志华和田仲香的继死者

飞　　飞

乐志华案在去年已如此这般解决了，田仲香案虽闹至过年，但还不是依然要不决而决。且接着又一个乐志华和田仲香的继死者出现了，我们且看二月底天津妇女日报的记载：

汉口快讯，据租界洋务会审公所所长杨厚卿对人言，本年二月十三日早据捕房电称东孚洋行缢毙棉子客贾初敏一名。当经转请夏口地方检察厅派杨检察官莅场。据贾初敏之子贾香甫供称：民父向在汉口开贸杂粮行，因与东孚洋行棉子交易有年，现尚有代东孚向棉子客人办货之款未清，民父亦无力代垫。于数日前东孚行伙陶云章带信至汉川，诈称其他事故，谎民父来汉，将民父关闭他行，至五日，致民父迫极自尽，求作主等语。当经杨检察官验明，贾初敏实系自缢身死。

以职司警务的捕房打死乐志华和田仲香尚有那样结果，更何况被日商逼死的贾初敏有何冤可伸，何主可作？只是从前杀的是西崽、是厨役，现在杀的已进一步是小买办了。全中国的国民看

啊！全中国被压迫分子的生命在帝国主义者的眼中看来，全都不如狗贵。纵是洋奴，也正难逃洋大人淫威下的横死。

《赤光》第七期，1924年5月1日

北洋军阀的内哄

伍　豪

封建阶级的武人，因各谋私利，争为雄长，演成互相征伐之事，常较资本阶级因自由竞争而引起的国内战争，多得无算。此其故：一、由于封建武人利在兼并土地，横征暴敛，好广积金钱，而资本阶级则利在图谋其本阶级在政治上的权力分配及经济上的自由竞争或携手合作；二、由于封建武人所恃者武力，资本阶级则恃资本。本此现时中国的封建余孽军阀乃遂兵祸年年互相残杀，成为不可避免的内哄非至覆灭不止了。

在中国军阀中，自以北洋军阀为主干。自曾、李练兵湘淮，满清帝制的金瓯便已生了裂痕，及袁世凯小站练兵，更树立了北洋军阀的始基。至帝制倒，袁世凯兴，随袁氏而起的“王龙、段虎、冯狗子”便顿时有各树一帜的异心：惟王士珍手无重兵，虽一试国务卿、两试总理，终无多大发展，卒让冯国璋、段祺瑞造成了直皖两系，以争北洋正统。袁世凯死，冯段互相争霸，结果军师徐世昌虽坐收了一时渔人之利，但重要政务仍不得不仰鼻息于皖系军阀。继着吴秀才捧着曹锟为直系军阀复仇，于是一战胜段，再战胜张，驱徐驱黎，终至浩浩荡荡地将曹锟拥进了三海。这样一气呵成的直系天下，宜可以使北洋正统的招牌在曹锟手中稍延时日了。殊不知四围的军阀还未倒，而直系的内部亦起了正

统之争。本来此次拥曹首功为保津两系的冯玉祥、王承斌和王毓芝、高凌霨、吴景濂、边守靖等；洛系吴佩孚、宁系齐燮元不过尽赞襄之助。乃论功行赏，吴佩孚、肖耀南、齐燮元各得一巡阅使，王承斌得付使，而冯玉祥"竟不与焉"。及组阁，高凌霨又排吴景濂，终至吴景濂连一议长也失掉，逃津。孙宝琦阁成，知孤立无援可危，乃内联津系外结段、卢，以张声势。然因此却得罪保系要人，于是内王（王毓芝）外王（王克敏）协以排之。但孙宝琦亦自不弱，居然能两使国会提出查办王克敏案，而金佛郎案与中俄交涉亦遂成了他们政争的武器。金佛郎案王克敏实主大谋，近日王更以非金佛郎案解决中国财政将无办法为言以暗示孙阁非承认不可。至中俄交涉则因东交民巷日、法、美太上政府之反对，法国在道胜银行收买的中东路股票事和苏俄在蒙告撤兵条件与冯玉祥垦边雄图有碍故，顾维钧、陆锦、王克敏、王毓芝、冯玉祥乃在外院内府大事挑剔，硬行延搁中俄协定不与通过。北京城中的内哄是如此了，至外方呢？吴秀才自拥曹登位以来，隐然以长子将承正统自居。这种态度自然醋起了与他平日比肩事曹的直系军阀。而他所提拔的后辈亦知急起直追，模仿昔日吴对曹的态度，渐以自成一系。好个奸险狠毒的吴佩孚如何不看懂此局，于是撤王承斌、张福来、郑士琦、肖耀南的师长兼任，使他们各自成个光杆督军。留蔡成勋督赣赞助。安徽设军务帮办。遣使赴浙联卢，助温树德与杜锡珪争衡以牵制苏齐新起的势力。尊段所以制奉；联陈降赵所以制粤；重用周荫人驱逐两王（王永泉、王永彝）正所以防□孙傳芳；用杨森、刘湘、刘存厚、邓锡侯协以图川，及成都、重庆既下而又以刘存厚督川，邓锡侯长川以启刘湘杨森之争。俾北军得以长久留蜀，此与以北军驻扎岳川同一心事。吴秀才的锦囊妙计如此，但一般军阀

也非尽是蠢才。吴既以撤师长兼任倡，于是大家也就请君入瓮，吴亦不得不辞兼第三师师长，而各个督军更眼灵手快，师长由旅长升，旅长依旧补了亲信之人；冯玉祥、王承斌、齐燮元更谋保、津、宁三系的亲密联合，在长江流域肖耀南、马联甲、齐燮元更有联盟的传说。在豫张福来为换省长、师长事已曾一度负气至京，与冯玉祥有所联络；山东郑士琦为换师长，熊炳琦为换青岛商埠督办与吴佩孚强占胶济路收入事，亦对吴极感不快；似此种种，直系的内部未等曹锟"龙归北海"便已破裂得如此之甚，一旦曹真死了，吴有何力能进三海？且就广义的北洋派看，皖派在浙在闽力尚不薄，臧致平近已连克漳、泉二州了。奉系虽在养精蓄锐时，但不久必为直系的劲敌。在山西阎锡山虽无四略野心，但直系终不能指挥自如。故今春有京遣刺客的秘案发现。在陕西刘镇华坐镇关西，远已不复为直系所有。四川、湖南的军阀虽多降直，但北军如长久留川，吴佩孚如迫令湖南取消省宪，或迫令赵恒惕供给军饷，则夔门以内和三湘七泽间的反直风云必仍层出不已。论滇黔虽唐氏兄弟和刘显世已为新兴军阀，但必为直祸无疑。广西陆荣廷、马济固又已降直，然因此迫得沈鸿英、林俊廷近又向孙中山输诚，虽其成否不可知，要亦属于直为不利。至破坏革命最力的陈炯明，虽与洛吴早已私通，只是他终不敢揭破他的联省自治假面具，亦适足为将来不能真正助直之证。

由此一段军阀祸国史上看来，北洋军阀的内哄，非但直系无术自解，即反直系亦同样无法解脱。今日的反直军阀，又何一非当年曾一度当权的军阀！总之时至今日——亦即是生产力发展到这个时代——封建军阀的末运已至。北洋军阀的内哄亦不过证明此混乱之局，军阀自身决无能力整理，尤其是受帝国主义列强煽动勾结的军阀更无能力整理。代之兴的，只有国民革命派。

只是军阀内哄是他们自身的事，一旦国民革命派苟稍抬头，他们必会捐弃前嫌一致来压迫国民革命势力，正如资本阶级在彼此的竞争期中时刻会转来一致压迫工人阶级一般。因此，我们国民革命派在此北洋军阀内哄的混战中须要严密我们的战线，严防我们的敌人——军阀和其所勾结的帝国主义的列强——才不致为敌所乘而打散我们的集中势力。

《赤光》第八期，1924 年 5 月 15 日

再论中国共产主义者之加入国民党问题

——答胡瑞图、吴樵甫、威重三君

（三君文见于《先声》报第十三、三十四、三十六各期，本文双括弧“　”中句皆系三君语）

恩　来

近两月来《先声》报接二连三地发表了反对中国共产主义者加入国民党的文章，我现在总起来作一次解答罢。

第一，瑞图、樵甫、威重三君所共同反对的是瑞图君所谓：“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奋斗，而他们同时又保着他那不明了半共产主义者的丑态，便未免过于滑稽”。共产主义者为做他共产主义所能解释亦正三民主义所解释的国民革命工作而加入国民党，滑稽何谓？共产主义者是兼信合于共产运动在中国的第一步革命工作的三民主义有何不明了，有何“半”字可加？瑞图君真是“甘心盲目”、“发昏”、“骂人”！你还是主张“全民革命”的人，试问“全民革命”能离开无产阶级么？因为觉悟成的无产阶级革命分子必然地要信仰共产主义便拒绝他们加入“全民革命”队中，则你只有寻找那必然要信资本主义而口中讳言资本主义的有产阶级为伍了。

第二，我之所谓决不是三民主义所能左右，也不是共产主义

所能改变的，乃是说中国的实际问题、物质条件必需要中国实行国民革命各派分子合作，便是没有三民主义、共产主义——自然不会没有的——这个实际依然存在，故说不是主义所能左右改变。而三君竟误解为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则谁也不能不承认共产主义应受三民主义所左右所改变：——“既不是三民主义所能左右……就应该从实际有利益方面着手，暂时不要谈主义”；“中国共产主义者之加入国民党是为三民主义所左右，是共产主义的改变”。谁左右了谁，谁改变了谁，这要看实际情形始能决定。假使今日之中国共产主义者自加入国民党后抛弃共产主义不信或忽视了无产阶级的最后敌人——有产阶级——不管而后方得谓三民主义左右改变了共产主义者，但乃与共产主义无涉。实际是如此吗？三君虽愿意我们上此圈套，我们却决不“甘心盲目”“发了昏”“走错了路”。至“不要谈主义”是樵甫君说的。为要解决政治经济纠纷，时时会有主义名词出现，不过共产主义是包括政治经济全部的改革工作就是了。若要不谈主义，除非不想解决政治经济纠纷。樵甫君连一个主义如何发生的常识都无，还来讨论主义，算了罢。

第三，瑞图君问我“既说三民主义不足济将来阶级争斗之穷，又何不直接行共产主义革命？”这与威重君所说“但共产主义的主张明明是‘阶级革命’，明明是‘打破私有制度’，明明是‘无产阶级专政’，怎么周君是共产主义者，也主张‘国民革命’呢？”为一话的两面。不错，我们共产主义者是主张“阶级革命”的，是认定国民革命后还有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的“阶级革命”的事实存在。但我们现在做的国民革命却是三民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合作以推倒当权的封建阶级的“阶级革命”，这何从而说到“国民革命”是“阶级妥协”？且非如此，共产主义革命不能发生，“打破私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自也不能发生。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

第二步。虽说走到第一步，无产阶级尚未得到真正生路。

第四，填写信奉三民主义志愿书的事，三君也都大惊小怪认为大不了的事。其实你们只须问中国共产主义者加入国民党后是否真心干国民革命。假使你们找不出中国共产主义者在现时没有干国民革命的证据，你们便无理由谩骂我们“发了昏”“违背良心行动”“被人家强迫”“一时发昏”去填志愿书。因为三民主义原是指导全国民党人从事国民革命工作的。离开“国民革命”，三民主义在现时何所依附？我们讲信实，只是问干不干。若是说信了三民主义便不许信将来政治经济组织还须经一度改变，信了便违背了绝对服从之律，则谈爱国主义的胡国伟君，持极端国家主义的曾琦君更绝对不可信将来世界会有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了。因为爱国主义、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大同世界多是背道而驰的学说。但他们偶在文字言谈中露出此意，我以为尚是他们受经济压迫的自觉之征呢。

第五，樵甫君谓“凡有革命性的党派和个人都可联合在同一战线上，但不可混合”。这原是与曾琦君同一鼻孔出气的主张，不值得同志林蔚一辩。只我要告诉你的是：国与国的军事共同行动，因言语国籍的不同只能做到统一主帅，党与党的革命或政治的共同行动却可做到加入。党与国原不是纯然一物不可类附，况加入国民党的并不是共产党乃是共产主义者呢。若论党史则英国共产党人之加入工党，英国工党包含有数个政党。美国共产党人之加入劳动党。土耳其共产党人之加入国民党。何一而非你们所谓的“混合”？樵甫君请你多知道点这类你所谓“党人史中的笑话”罢。且加入之利有：对外目标一致，好集中革命势力；对内能坚固各个革命分子的决心，消弭某些部分人的目前部分利益的争执；训练统一，步骤一致，不复有时同时否的阻碍，号令集

中，指挥自如，易于杀敌。除这些外，中国共产主义者更能以国际的关系促进国民革命成功。这又是中国共产主义者在国民党中特负的使命了。威重君说我们应“立刻退出第三国际的地位”，何其见之小啊！

这些都是从我在《赤光》第五期上所反〔复〕说的：“事实不可假借，一部分事实不能代表全体，死脑子不能理会流动的事实”之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辩证出来的。请你们要仔细理会！

《赤光》第九期，1924 年 6 月 1 日

为徐树铮来法告旅欧华人

徐树铮在段祺瑞上台之后来法，显然带有莫大的政治作用。

我们知道代表日本帝国主义底皖、奉军阀，现在已成为代表日、法帝国主义底皖、奉军阀了。为皖系军阀首领底段祺瑞，现在已成为皖、奉军阀首领底段祺瑞了。徐树铮是皖系军阀底健儿，段祺瑞之宠子，他这次来法不是把他们所新代表底法国帝国主义加以深切的勾结么？同时，段祺瑞是大借款的好手，而中国财政困难又只有解决金佛郎案亦是他的工作之一。因此可知徐树铮来法，是在于当卖中国人民于法国帝国主义底贩子手！

卖中国人民于法国帝国主义底贩子手底巴黎公然营业，我们被卖的人民能安然顺受而不竭力反对么？

旅法华人在昔有反对卖国贼朱启钤之壮举，旅德华人在今上年有毒打卖国贼梁士诒之伟绩，旅比华人在今下年有痛击帝国主义走狗宗教徒之热烈表示，足见旅欧华人不独主张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而且还有这些勇于实行颇足称道的事实。现在我们应该加倍地继续进行，以对付朱启钤、梁士诒及宗教徒底精神来对付徐树铮，使军阀不能公然在旅欧界中行其勾结帝国主义之阴谋。起！起！起！旅欧华人快齐声大叫：

打倒贩卖中国人民底军阀！

打倒勾结帝国主义底军阀!

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一九二四、一二、二九

《赤光》第二十一、二期1924年12月15日及1925年1月1日合刊

段祺瑞政府与工人阶级

觉奴（肖朴生）

《赤光》第二十四期已经将段祺瑞政府底治绩披露过，单就他那些治绩来看，还不见得他坏过曹、吴。

但是据《向导》九十五期所载，段祺瑞已经开始向工人阶级进攻了。

京汉工人曾梦想以为反直系军倘若战胜了吴佩孚，一定可以给工人们以恢复工会的机会，一定可以重振京汉工人底组织以保护自己经济的利益。但是段祺瑞给与工人的答案，却是“压迫”两个大字。他宣言禁止恢复一切为吴佩孚所解散的工会，这不是他明目张胆的在开始向工人阶级进攻么？

工人阶级是中国民众中最强大的革命势力，这是帝国主义所欲得而甘心的。军阀是帝国主义底走狗，故军阀必摧残工人阶级，然后可以满帝国主义者之意而不负其走狗的职务。这些都是不足怪的。所可怪的就是段祺瑞执政才十多天就把帝国主义走狗的威风摆得这样十足，中国工人阶级以后还能在段祺瑞底政府下过活吗？他实在坏过曹、吴呵！

《赤光》第二十五期，1925 年 2 月 15 日

为孙中山先生逝世告旅欧华人

中山逝世所给与人类历史底不可磨灭的创痕已经刺动了全世界工农和被压迫民众底一种不可言喻的哀悼。我们如果仅仅说中山是中华民国底创造者，我们如果仅仅把中山当成中国一国底历史的伟大人物看待，人类底这种不约而同的哀悼，就将成为不可解释的无知的蠢动了。

全世界工农和被压迫民众已经认清了中山底意义：他是被压迫民众底先觉；是反帝国主义底前锋，是联合世界工农和被压迫民众以解放中国并解放一切被压迫者底天使。

现在全世界分为两大营寨，一方面是施压迫的国际帝国主义及其代办者封建军阀；一方面是被压迫的工农阶级和弱小民族。后者因为奋斗底结果，已经有了一支得胜军，就是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联邦。后者底军营里面又有一个聪明而诚实的总参谋部，就是第三国际。中山不是共产党员而是隶属在这个军营里面的一位将军——一位伟大的领导四百兆被压迫民众向帝国主义进攻的精明而果敢的将军。

中国人只有照着中山底领导前进才能得到解放，因为只有照着他的领导前进才能打倒帝国主义及其代办者封建军阀。

旅欧华人呵！我们深信你们因洞悉欧洲“文明”而觉悟到解放中国底要道比一般国人都要快；然而这件事却要以你们明白认识

中山与否来作证明。中山不是一个抽象的英雄与豪杰，整个的具体的中山指示了解放中国底要道。

旅欧华人呵！在中山底最后一息中，念着列宁，念着莫斯科，念着全世界的被压迫民众，人类底最大的希望已经安慰了他的最后一息。他最后的精神，他最后的思想已经在这最后一息中渗透在广大的群众中去了。他留下的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物质的势力；这种势力要完成他的工作，使中国人民和一切被压迫民众都得到解放。

哀悼中山的旅欧华人呵！我们的最大光荣就是得让中山底最后精神和思想渗透在我们之中，我们的最大的光荣就是得为中山底工作的继承者。起来！旅欧华人！起来振臂齐呼

打倒一切军阀，打倒一切帝国主义！

中山底工作之完成万岁！

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

《赤光》第二十八期，1925年4月1日

中山逝世与国民革命

朴　生

(一)

中国革命运动远在三十年前，而中国国民党底最初形成即在庚子义和团运动与辛亥民族革命之间。这种革命运动自始至终是代表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与封建制度的运动。这种运动发端于中山，而自始至终百折不回担当指导这种运动的也只有中山。我们可以说中山是中国革命底始祖，我们亦可以说中山是中国革命底灵魂，三十年来的中国革命史都是中山一手造成的。

然而我们回顾三十年来的中国革命史，能够说这种运动自始至终便是一种国民革命运动吗？自然不能。(一)因为过去的种种革命组织从兴中会到改组以前的国民党并不是根据党纲及策略相同而结合的革命底政党。(二)因为过去的种种革命组织并没有广大的群众作基础，而仅仅是一些热心革命家结合成的团体。(三)因为社会各阶级及革命党人对于革命底观念异常模糊。中国革命运动能够成为真正的国民革命运动，实在是近两三年的事，在这种真正的国民革命运动中，自然要产生一个真正的国民革命底政党。即使国民党不改组，也必然要产生一个新的国民革命底政党。中国国民党之改组乃是中国国民党为要应付中国国民革命底需要而完成它的历史底使命；中国国民党之所以能够改组成功，即是

因为在中山领导之下的中国国民党始终是革命的；中国国民党亦仅仅因为中山底领导才得着新的生命。

此时代表中国国民革命底政党就是中国国民党。此时中国国民党已经有了它的革命的正确方针：打倒军阀，推翻帝国主义。此时中国国民革命底忠诚而伟大的首领就是中山先生。

一个革命党只有在它能够引起它的敌人底最大忌恨的时候才配得上说是一个革命党，一个革命底首领；只有在他能够引起他的敌人底最大忌恨的时候，才配得上说是一个革命底首领。此时的中国国民党已经为军阀及帝国主义者所忌恨。此时的中山为军阀和帝国主义者所忌恨更何待言！一年来为军阀和帝国主义者所咒诅的中山竟然死去，他们之踌躇志满更何待言！

（二）

中山逝世以后，我相信全中国人都要表示诚恳的追悼，唯其如此，那些反动派乃不得不惺惺作态也来示表追悼中山，因为他们借此希望减少人民的反感，因为他们借此想来愚弄国民党底诸首领。但是他们骨子里呢？实在有说不出的隐哀与愿望。他们以为中山死去，他们的一切愿望都可以达到了。我认为他们的心理可以分成三派：

（一）在帝国主义方面。他们以为中山是中国国民革命底首领，有了中山中国国民革命势力才能如此一日千里，现在中山死了，中国底国民革命势力必会消灭，至少必会衰弱下去。过去一年帝国主义报纸常常造谣说中山已死就是这种心理。

（二）在军阀方面。他们以为中国国民党是中山底党，中山死，国民党便失去统驭的人，国民党必然会因此分裂或瓦解。如此，南北军阀可以横行天下，尤其是北洋军阀可以完成他们的武力

统一底好梦。去年中山还没死，吴佩孚硬说据易经推测中山已经死了。就是这种心理。

（三） 在反革命的各党派方面。这一派自然应该把国民党的右派分子算进去。在反革命派方面，他们以为国民党做了一件滔天的恶事，就是收容了共产党人，他们以为共产党这个怪物加入了国民党比什么都可怕。国民党所以和苏维埃俄罗斯友好，就是这个怪物主持的。而中山呢？确是始终主张共产党这个怪物加入国民党的。现在中山死了，国民党右派必然可以驱逐共产派出党，从此共产党这个怪物就不能做一点事了。在国民党底右派方面，他们以为中山是始终袒护共产派的，若不是中山，他们老早就把共产这个怪物赶到爪哇国去了。现在中山死了，他们右派一定可以得势，一方面挟制那些“引狼入室”的左派，一方面开除共产党人。如此再没有人说国民党是“赤”化党了。如此，一方面不得罪军阀，一方面不开罪“友邦”，可以博得全世界欢迎。现在就旅法的情势看来，已被开除和尚未开除的国民党右派分子一方面已经和反革命的青年党联合，一方面公然反对总支部就是这种心理。

以上三派的心理，都是非常卑污下流可耻的心理，在中山死后自然要忘乎形神地流露出来。果真实事能与他们的心理相合吗？这是我们所应当批评的。我们应该把他们这种错误心理指出，叫他们赶快收拾他们的野心！

（三）

我现在且把帝国主义、军阀和一切反革命派底种种错误心理指出：

第一，凡是一种革命都是一种特定的历史底产物。有被压迫在封建制度下的工商业资产阶级，便必然有民主革命，有被压迫

在封建制度下的无产阶级，便必然有共产革命，在被压迫在半封建制度及帝国主义底强权下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便必然有国民革命。国民革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中山能够倡导国民革命，能够指挥国民革命，决不能创造国民革命。中山既不能创造国民革命，则国民革命之不随中山之死而终止，尚何待言！我敢说帝国主义存在一天，帝国主义与军阀互相结托以掠夺、压迫中国人民的事实便存在一天。这种事实愈为人民所认识，那便国民革命运动愈加发展。所以帝国主义者的心理是与事实不相符的，是错误的。

第二，凡是一种革命底党，必然有他的群众的基础，这种党的意义，便是群众底集体的意识底表现。这种群众底意识不是抽象的理论，乃是物质的力，首领底意识亦必须要为群众所认识乃能成为物质的力，而且他的意识仍然屈服在群众意识之下而为群众意识之结晶。明乎此，就知道中国国民党已经不是孙中山个人底党，而是全中国革命群众底党；明乎此，就知道有觉悟底群众就必然能产生一个坚固的党，纵然国民党底老头子（首领）都因中山之死而腐化，国民革命底种种物质条件，即国民党底物质基础仍然一些儿不动，这是我敢断言的。所以军阀这种心理是错误的。

第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民运动，必须要与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众联络一致向帝国主义进攻，这乃完全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底物质条件所决定的。因为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全世界底经济组织已经成为整个的、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众都锢闭在这整个的帝国主义底经济组织之中，如果这个组织底全部不发生变动，任何一部分底无产阶级或被压迫民众要想得到解放是绝对不可能的——例如苏俄也不能单独完成它的解放事

业。国民党之必须与全世界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底共产党联络以此；国民党之必须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底大本营——苏俄及其总参谋部——第三国际联络以此；国民党之必然要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此处更无解说的必要了。一切反革命派不懂得这个是不足怪的，因为反革命派本来是不主张国民革命的，所以他无须要懂得国民革命的策略，他要反对国民革命只消反对国民革命底策略便足了。他们以为这种国民革命底策略是任凭人底脑子创造的，而且他们以为个人的力量是可以超越群众的，因此，他们以为中山死这种策略便要被抛弃，因之共产党人便要被开除。他们不知道中山死，国民革命是永远继续的，这种国民革命底策略之必不会因中山之死而被抛弃，匹如国民革命之必不会因中山之死而终止。明白这个就知道反革命各党派底这种心理是错误的。至于反革命的国民党右派呢？他们不能在中山生前排除共产党人，他更不能在中山死后排除共产党人，因为没有一个革命党有权利开除一个革命党人，一个革命党人也没有权利退出一个革命党。中国底国民革命运动只有一天一天的发展，一切反革命的冒牌的国民党右派只有被开除，所有新的革命势力，只有日集中于国民党旗帜之下。反革命的右派呵！你们果真是中山底党人么？请你们遵照中山底遗训做去，否则你们终归于要为群众所唾弃的！

我把以上的种种错误心理指出了，一切反革命底人们请平心静气想一想。

（四）

中山死后国民党内部果真一点变化也没有吗？那又不然。中山逝世是中国国民革命前途最大的损失，这种损失是没有东西可以补偿的。然而我来研究国民党内部底变化，却不是要来计算中

山逝世底损失，因为这种损失是不能计算的。

此次中山北上在京津方面与北洋军阀周旋底种种经过和北洋军阀对中山的态度很足以惊醒左中两派，左中两派首领此次必定要受军阀、尤其是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者很大的教训，他们的革命观念只有更强固更左倾的。此次中山之死，若死在未到京津以前，北洋军阀虚与国民党委蛇的假面具还不致暴露得这样十足。那时北洋军阀，尤其是段张冯诸军阀一定说“假使中山先生不死，我们便要如何拥戴中山先生”。他们借此，可以说许多便宜话来愚弄左中两派首领。恰巧，中山之死在到了京津以后，军阀底种种对不住中山的事实，已经完全给全国民众看了：中山要开国民会议预备会议，段祺瑞要开善后会议，中山要人民团体参加善后会议，段祺瑞拒绝人民团体底参加。现在中山死了，北洋军阀无论如何表示尊重中山，能够愚弄左中两派首领吗？他们能够说：“假使中山不死便要怎样怎样拥戴中山”吗？至于中山到京津后，帝国主义底报纸如何毁谤中山，帝国主义底警察如何阻碍中山底革命宣传，如何帮助北洋军阀，左中两派首领是亲眼看见的，他们当然更认识帝国主义和军阀间是怎样的互相勾结来阻碍国民革命了。所以我敢断定中山逝世，国民党底左中两派不但不会发生变化，而且或者以后他的革命观念更能正确，更能左倾以致国民党完全革命化。

至于右派呢？他们本来就是反革命的，中山生前他们已经朝不待夕的要去投降北洋军阀，中山死后他们更要无所忌惮的反革命。凡此都是我们意料中的事。然而这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问题，这个只有使国民党左右派底分化更明显。换言之，就是使革命派与反革命派底分化更明显，以致完全分成两个东西，使反革命派老实不客气的去组织一个反革命的政党，或附属于别的反革

命党。必须要如此，国民革命的阵势才能够分得清楚，必须要如此，国民革命的战场上才能分最后底胜利。这是国民党底好现象而不是坏现象，并且是今后必然的现象。

至于南方新兴的军阀呢？他们有许多是隶属于国民党底右派的，这些军阀本来和北洋军阀没有许多差别，只因国民党一时不能放弃那种传统的军事行动，所以要暂时利用他们。中山在时早已看见他们是不可靠的了。在商团的事件中，中山早已看出他们“阳奉阴违”了。只因中山在时还勉强可以统制他们，中山死后他们彼此间因争夺权利的关系或者互相攻击，或者投降北洋军阀都是不可免的。然而这个也正是国民党进步的好现象，因为只有如此，才可以使国民党毅然决然放弃其军事行动；只有这样，国民党才能够把它的全力用在宣传民众组织民众上面去。国民党此后或者失去广东，但是它失去广东以后在一定期间可以得到全中国。这些都是我们所盼望的呵！

现在没有很多新的事实来供我的参考，然而我敢就我所已经知道底事实来推定国民党底将来趋势，我敢相信我这种推定是不会很错的。

（五）

中山逝世与国民革命底影响和关系大约如上所述，我的总结论是：

一、中山逝世是国民革命前途最大的损失；但国民革命决不因中山之死而终止；

二、中山逝世以后国民党左右派底分化必然更明显以致于使国民党完全革命化；

三、中山逝世以后国民党将因右派诸军事首领底互斗或投降

北方军阀而完全放弃军事行动。

国民党左派诸君呵！你们要做到名称其实的左派，你们应该遵守中山遗训：推翻军阀，打倒帝国主义，革命到底！你们目前第一重大的工作就是肃清内部，使国民党完全革命化。

《赤光》第二十八期，1925 年 4 月 1 日

第五卷

回顧

缺　页

周恩来谈赴法勤工俭学*

（一九三六年）

那段时期周恩来参加组织“觉悟社”。这是一个激进团体，那些社员后来分别成为无政府主义者、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其中一个是邓颖超，她于一九二五年同周恩来结了婚)。到一九二〇年，四个觉悟社的创办人，包括周恩来，参加由陈独秀和其他亲法份子组织的勤工俭学计划，去了法国，觉悟社也告结束。

周恩来说：“去法国之前，我读过《共产党宣言》、考茨基《阶级斗争》和《十月革命》等书的译本。这些书是由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社出版。我也同陈独秀以及李大钊见过面，他们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办者（周恩来没有提到当时他是否同毛泽东见过面)。

“一九二〇年十月我坐船去法国。在船上我遇到很多湖南来的学生，他们是毛泽东组织的“新民学会”的会员。其中有蔡和森和蔡畅两兄妹，他们一九二一年在法国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二年我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一个创办人，开始为共青团全力工作①。两年后我去了伦敦，逗留了两个半月。我不喜欢伦敦。后来我去法国，工作了一年，搞组织建设

---

* 题为编者所加

① 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从社会主义青年团发展出来的一个组织。——原注

工作①。一九二二年我们的共产主义青年团派代表去上海，申请加入一年前在上海建立的中国共产党。我们的申请得到批准，于是共青团成为党的一个组织，这样我也就成了共产党员。在法国参加创办共青团然后变成共产党员的包括有蔡和森、蔡畅、赵世炎、李富春、李立三、王若飞和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陈延年后来在上海拉洋车，来组织起洋车夫。在反革命时期他被捕，经过拷打之后被杀死。他弟弟一年后——一九二八年在龙华被处决。

“我们在法国的中国学生会，有四百多人参加了共青团。变成无政府主义者的不到一百人，另外大约一百人参加了国民党。”

对法国的中国留学生给予经济支持的有中法教育协会、蔡元培和李石曾。周恩来说：“许多爱国的老先生私下里帮助我们这些学生，他们完全没有个人的政治目的。”周恩来在欧洲时候的经济支持者，是南开大学一个创办人严秀。许多中国学生在法国要做体力劳动，但是周恩来没有，只是在雷诺汽车厂学习劳工组织时做过一个短时期。他补习了一年法文以后，就完全从事政治工作。周恩来对我说：“后来有些朋友说起我用了严秀的钱去做共产党员，严秀就引用一句中国成语说：‘人各有志’。”

周恩来在法国、伦敦和德国度过三年之后回国，途中在莫斯科停留一个短时期，吸取指示。一九二四年底他到达广州……。

摘自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
1972年增订本附录三：《周恩来生平》

---

① 朱德也是由周引导认识共产主义的。——原注

回忆赴法勤工俭学*

（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五日）

蔡　　畅

“五四之后，我哥哥和毛泽东到了北京，在那里组织了‘留法工学团’，而同时，另一个女子向警予和我亦在长沙组织了一个‘妇女工学团’。

“一九二〇年，这个女子——后来她成为中国最优秀的女革命家——跟我的母亲、我哥哥和我一道到了法国。毛泽东没有到法国去。在十六个同时赴法的女子中，向警予比任何一个都优秀得多。除她之外，所有这些女人中没有一个人后来做过一桩重要的事情，他们全都是湖南的学生与教师，跟向警予和我一道加入共产党亦只有两个人，但不久又都退出。据我所知，有两个现在在‘上海美术专门学校’教书，至于其余的人，我全都不知道。向警予呢，她成为中国最前导的女共产党员，一九二八年在武汉被杀。

“这是中国留法学生中的一部份，他们一面做工，一面进学，因为大战之后，法国非常需要工人。领导这一运动的两个无政府主义者，一个是当时在法的吴稚晖，一个则是北京的李石曾。李跟法国政府谈判，移工人和穷学生到法国做工，每人各出特定川

---

* 题为编者所加

资百元，没有钱的，可向法国政府借用。当时毛泽东和我的哥哥到了北京，会晤北大教授杨昌济（毛泽东发妻的父亲）。他把他们介绍给李石曾。我们不愿意做无政府主义者，又都想利用这机会到法国念书。我们不想请李代为借钱，恐怕这会限制我们的活动，因此我们向一位富有的亲戚（上海某纱厂的厂主），借了路费。在赴法途中，我们坐的是船底下的四等舱，待遇简直和畜牲一样。

“我们是按这商定移到法国去的第三批。周恩来和罗迈他们是第一批。此外共产党员在这一次到法的还有李富春——后来他是我的丈夫——李立三、赵士〔世〕炎、王若飞、傅忠〔钟〕、郭南珍〔隆真〕(女，译音)。何长工(工人)和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乔年和陈延年。这些人中，陈延年在一九二七年清党时被杀；陈乔年在一九二八年被杀；郭南珍一九三〇年在济南被杀；赵世炎一九二七年在上海被杀。王若飞后来则成为陈独秀的尾巴。傅忠现在则在红军大学，李富春是甘肃省苏维埃的代理主席。

“一九二〇年和我们一道出国的男学生，约在一百人以上。留法的学生大部分是在一九一九和一九二〇年出发的，从一九一九年这商定开始到一九二三年年底，‘留法工学团’前三批到法的人已在一千人以上。但在我们的‘二月示威’(说明见后)之后，中国政府就限制了工学团遣送人员的数目。自然，还有许多学生是由中国政府派往法国留学的。

“当我们初到法国时，中国学生中有两种主要的思想潮流：(一)民族主义，他们以为救中国最好的办法就是振兴实业，发展教育，使中国进化强盛，并抗拒帝国主义！而(二)是相信社会主义革命的人。社会主义派中的领导人物是我的哥哥蔡和森、向警予和我自己。我们在法国组织了一个‘新民研究会’的支会，继续作社

会问题的研究。初时我是属于‘教育救国派’的民族主义者的，但随即就信仰社会主义纲领的正确。我们本来没有社会主义的组织，直到一九二二年的‘二八示威’——留法中国工学生举行示威并包围中国领事馆之后，我们为着继续对抗这种官僚制度，就组织了一个社会科学研究团体‘励志会’。

“引起这次‘二八示威’的原因是这样的：当我们到了巴黎之后不久，我们便在无政府主义者的‘中法教育协会’控制之下。有些学生是无政府主义者，这协会对待无政府主义者的学生，比对待别的学生要好得多。在我们出国之前，我们曾得到这样的保证：我们不惟有工作的权利，而且有求学的权利。但有许多人到法之后，都没有读书的权利，为着生活，他们必须不断作工，因此，我们要求使馆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当时使馆人员是同情无政府主义者的，但我们认为无政府主义并不能救中国，我们反对。这一运动提出了如下的三个口号：‘争取读书的权利’、‘争取吃饭的权利’、‘争取自由思想的权利’。这示威运动是周恩来、陈延年、赵士炎（他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一九二七年为国民党杀害）和我的哥哥领导的。

“示威的结果很简单，使馆用分裂学生阵营的方法，把这纠纷缓和下来。服从命令的允许给以津贴，而拒绝妥协的，象各社会主义者，则只有返回工厂和学校，并且要求公寓和饭馆的主人，把账单送到使馆去。最后，我们竟被迫发动我们的‘十月革命’。

“吴稚晖曾经竭力诱导学生信仰无政府主义，在示威时，亦企图排解，但给学生打了一顿。这次的示威我亦参加。后来被拘留了一天。我的母亲和向警予以及别的十六个女人，亦同我一样。这些人中，后来只有六人参加社会主义派，其余的人则站在无政府那一方面。

“在一九二二年的‘二八示威’之后，全体工学生分成三派：即社会主义派、无政府主义派和理想的社会主义派。当时我们没有共产党，连社会党亦没有。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社’有二百个社员。学生中的三分之一，则为无政府主义者，但我和我的哥哥对无政府主义始终不感到兴趣。社会民主派的人后来大半成为国家主义派，如李璜和曾琦，而知识分子的无政府主义者如巴金，现在仍然没有改变。而无政府主义派的工学生，后来却大半成为社会主义者，就象曾是他们的领袖的陈延年(一九二一年春，陈独秀开始在上海组织了中国的共产党，但他在法国的两个孩子，却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很反对他的父亲，直到后来他们变成共产主义者时，他们之间方才有了友好的关系。当时李立三亦是同情无政府主义者的)。而在这三派之间，自然还有许多学生，并没有政治的立场，只想以实业和教育‘救中国’。而那些受政府津贴的学生，他们在政治上并没有改变。我们‘励志会’中的会员，不尽是社会主义者，但加入了之后，却多半马上成为我们的同志，其余的则都是属于国民党的。

“二八事件发生之后，政府人员和无政府主义者，已看出他们无法控制和影响学生们了。因此，吴稚晖领取了一部份庚子赔款，在里昂建立了中法大学。表面上，这是用来解决留学生的半工半读问题的，但大学成立之后，他马上改变态度。只收容无政府主义者和有钱的留学生，贫苦的工读生却反而不能进学。

“为着对这表示抗议，我们在一九二二年发动了我们的小小的‘十月革命’，当时差不多有一千多工读生参加包围中法大学，但这运动因法国警宪的干涉而归失败，有一百零四个领袖且被强迫送回中国。我的哥哥——他是负责领导这一示威运动的——王若飞、李林(译音)和林卫(即林蔚)都在里面。周恩来本来亦领率另一队

学生，由巴黎到里昂来参加示威的，但在到里昂途中，听到有一百零四人被捕的消息后，就折返巴黎。

“不久之后，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周恩来、陈延年、赵士炎等在法国组织了中国共产党的支部，这巴黎支部是欧洲第一个支部，后来巴黎总部又在柏林建立了另一个支部。于是所有的社会主义运动都转到共产党方面来了。

“一九二三年年头，党刚成立不久，我即刻加入了共产党，同时又和李富春结婚。巴黎支部有七个发起人，但在我加入以前几天之内，它已有了三百个党员，开始时所有的党员都是工读生，但不久之后就有工人参加，而当我在一九二四年离法时，它的五百个党员中，已多半是劳动者。当时党曾猛烈攻击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结果被法国政府禁止活动。在我离法时，它已被迫秘密起来了。

“一九二二年六月，我开始在一家电灯厂做工，每天十小时工作可得八个法郎，夜里我便学习法文和读书。后来我又在别的三家工厂中工作过，其中有一家是橡皮鞋厂，一家是印刷丝手巾工厂。工人的待遇非常恶劣。工厂在七点钟开工，但我们却要在六点钟到厂，以便一个一个的进入工厂；在我们离厂时，每个人都被搜过。厂里不许工人相互谈话。这些工厂有许多中国工人，待遇的恶劣跟法国工人完全一样。那些法国工人对我们非常友好，因此我们做了很好的朋友。

“当我在巴黎时，一万个在大战时到巴黎的中国工人还住在那儿，此外还有一千六百个学生。当时在法国做工的学生共三千人，分为八组，并有一个中国职工会。这职工会附属于法国总工会，并分设五个分会。工读学生全都参加，我亦在内。工人与学生一道做工，使得工人们在思想上大受学生的影响。这些工人

现在有许多还在法国。共产党员们多到莫斯科去念书，不久之后就回国参加大革命。现在除少数仍跟红军一道外，大部份的人都在一九二七年被杀了。

“我是一个党的活跃的工作者，我丈夫亦是一样，他在一家机关车厂做了四年工，始终没有念书的机会；但我在初到巴黎时，幸而还能够进一家初级学校念书。我是负责党的组织部的工作的，当时党除我之外只有四个女党员，有两个是湖南来的，其余三人就是郭南珍、钱若明*和熊继坤*(都译音)。后两个后来退党。

“我在巴黎做了两年工之后，一九二四年，党派我到苏联。我在东方大学念了四个月书；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爆发后，我便回国。我和我的丈夫李富春被派到广州作革命工作。我们到广州的那一天，正是廖仲凯被刺的日子，即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

摘自韦尔斯《续西行漫记》：

《共产主义妇女的导师——蔡畅》

---

* 钱若明即张若茗，熊继坤即熊季光。

自传的一页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日发表）

王　若　飞

我于一八九六年生于贵州安顺城内一个地主家庭中。亲祖母早死。只在五岁前，我是九十多岁的曾祖父最宠爱的小孩。自曾祖父死后，庶祖母即将我父亲逐出（她偏爱其亲生的伯叔）。我母被留作磨房推磨与厨下烧饭工作，而我与妹妹则成了祖母伯叔每日拳打脚踢的东西。七岁时才被舅父黄齐生接到贵阳（连同母妹一块）。我父亲当时流浪各地，自己衣食都照顾不过来，所以我童年时代，完全是在舅父家中养活长大的。我舅父家庭也很清贫，完全靠教书过活，他创办达德学校，我即在该校读书（这个学校现在已有三十七年的历史，有学生一两千人）。舅父及许多进步教员，经常灌输我们以反清革命的思想。十五岁时，遭逢辛亥革命，我也兴高采烈参加当时的学生队，担任稽查城防工作。这时许多过去受政府监视迫害的份子，都成了当时政府的要人，我大舅父也作了实业部长，二舅父则任贵州政府出外联络的代表。

哥老会组织突然公开了，所有武装部队都加入哥老会，下层群众也在哥老会组织下纷纷起来。但因为他们侵犯了地主阶级的利益，破坏了地主阶级的旧秩序（不还地主租债，并向地主要款），地主阶级的代表戴戡、刘显世、任可澄等，乃勾结滇军唐继

尧，假名北伐，于一九一二年一月进兵贵阳，将真正领导贵州光复的军事力量、政治力量，完全扑灭。我也自此年离开学校，到一个最爱我的老师蔡衡武先生所开的书店作店员，一面做事，一面读书（老师的小女蔡之璋现在延安工作，是党员，当时还在提抱，现已三十左右了）。继续了两年之后，又随我大舅父到铜仁矿务局（开采锑矿）工作。民国四年冬，滇黔讨袁军起，舅父黄齐生代表贵州政府出外联络，命我携款行至辰谿被扣，经过月余以无确证释放。乃赶到上海，随舅父遍历南北各省许多地方，于民国五年冬天才经四川回转贵阳。民国六年，即在达德学校任小学教员。是年冬考取留日学生官费。同时我舅父也因受当局故意为难、压迫、遂于残腊风雪中，匆匆相偕离家远出。从此以后即未回过贵州。民国七年初到达东京，为了领官费挂名为明治大学学生，实际完全自己看书，未上过一次讲堂。这时已受十月革命影响（一九一八年），尽力搜读社会主义刊物。民国八年，因五四运动回国，参加一般宣传工作，并参加舅父黄齐生先生所领导的“贵州教育实业参观团”，到当时所谓“模范县”的南通及“模范省”的山西考察。十月回到上海，值李石曾、吴稚晖等提倡赴法勤工俭学，遂向蔡衡武先生借到三百元经费，买船赴法。到法后，只住了三个月学校，其余三年多时间，完全靠作工来维持生活。为寻职业，曾流寓了法国比国许多城市，受过多次失业与饥饿。工余集合同志，研究社会主义书籍，参加法国职工会组织，并进行对华工的教育，帮助他们争自由的工作（当时旅法华工约二十万，他们没有居留证，不能自由行动与找职业）。又到处访求思想前进的同志，结识了赵世炎、陈延年、蔡和森、罗迈等。当勤工俭学生争取里昂大学读书运动失败后（我是这运动的一个负责人），许多困守在里昂校舍中的好同志被迫押送回国。我们幸而在外留

下者，则继续进行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运动。于一九二一年正式成立，出版《赤党》《少年》等刊物。一九二二年加入法国共产党；同时得到国内中央信(廖焕星带去的)，承认我和赵世炎等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三年春得中国党在莫斯科代表之帮助，参加第一批（十二人）到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满足了我多年以来渴望。

《解放日报》1946 年 4 月 20 日

回忆留法勤工俭学时代的王若飞同志和黄齐生先生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徐　特　立

我和王若飞同志及黄齐生先生初次相识，是在法国，时间是在民国九年，即公历一九二〇年，至今日计二十六个年头。我和黄先生在国内都是以教育为职业。若飞同志当时还是青年学生，我们去法国的共同目的，是勤工俭学。若飞同志及现在西北局宣传部长李卓然同志和我，同在一个工厂作工。黄先生是在我们的寄宿舍照料饮食起居。稍后一点，李立三同志也在此作工。以后王、李和我先后加入了共产党，成为同志。黄先生始终是我党的朋友。留法学生在一九二二年就有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由团又转为党的组织，这不是偶然的。当时留法学生中两大派，其一为官费生及有钱的自费生。两派在国内的社会地位和在法国的生活条件，都不一致的。当时的华法教育会的压抑勤工俭学生的错误方针，更使勤工俭学生斗争性加强，因而提高了革命力量和阶级觉悟。其中最激烈的斗争是中法合办的里昂大学的问题。

里昂大学在国内筹款和与法政府交涉房屋等，都是以解决勤工俭学生求学问题为名而进行的，但后来学校开始招生，都是从国内招来有钱而不勤工的学生，及收华法教育会的职员素不勤工

的人们为学生，拒绝勤工俭学生入学。为勤工俭学而办的里昂大学，竟成为贵族学校，名实相反，引起勤工俭学生愤慨。

里昂大学的校舍，原来是欧战时的营房，除大学使用外还有余房。当时勤工俭学生找工不易，生活艰难。其失业者又无租金租房屋，由于入里大无望，乃希望里大给他们以余房作暂栖之所，以为可以不花房租，又可用洋油炉自己弄饭。这如意算盘不幸被当局拒绝，因此就有勤工俭学失业学生自动迁入余房屋居住，但迁入后，即被当局封锁，迁入者不能外出。这时正是双十节纪念，被囚禁的勤工俭学生失掉了自由，而从国内来的及华法教育会来的学生，大开其双十纪念大会，欢舞之声达到被囚的勤工俭学生的耳鼓，天堂地狱，两相对照，令人忍受不了。又加上以勤工俭学生的名义创办的学校，而主人翁反是不勤工的贵族，这种愤慨更是火上加油。于是在双十节那一天被囚的学生全体绝食一天。这时被囚的一百零四人，尚不知学校当局已函请驻法公使交涉遣送他们回国。

吴稚晖先生当时是学校当局，又是华法教育会创办人之一，他是辛亥革命的爱国学社中光复会派，谁都相信吴先生是与北洋政府对立的，不料吴与北洋系的公使陈箓在压迫勤工俭学生上合作。于是一百零四个勤工俭学生就被武装装入囚车中，押送轮船上回国了。当时有些学生很悲痛的说出下面的话："我家破产才筹了船费和其他用费，希望学成回国，今天法文还没有学好，竟押送回国，无面见我的父兄。"当时还有少数跳营房围墙而致跌伤的，有被围墙外狗咬伤的。若飞同志是这一运动的组织者，他来到巴黎约我与黄齐生先生赴里昂去，与吴稚晖交涉。这时我和黄是相信吴之为人，一到里昂见了吴，吴却大声说："勤工俭学生不守纪律无办法，筹款不成问题。"我和黄回答说："不守纪律是由

于失业，不能求学又不能生活下去，有钱必然有办法。吴先生对筹款的方法怎样？”吴答：“我已写信给陈箓，要他筹款。”这时我们以为吴是一个在野的名流，陈箓是国家的公使，吴有何权力命令公使筹款？只是对我们一个欺骗。吴还说了一句极无聊的话，他说：“勤工俭学生如果有办法，我吴某卖屁股也愿意去做。”以往我和黄先生及若飞同志还以吴为圣人之流，因此我们也不怀疑。但他这一次却使我们对圣人失望。经过这次事件，我们不觉转到革命方面来了。若飞同志及他的舅父黄齐生先生，我们三人就成为至友。黄先生始终是共产党的朋友，且在共产党还没有产生之前，就是李立三、李卓然等同志在工厂作工时代的朋友。他到法国是领导他的学生来到法国勤工俭学，却和他们一起过辛苦的劳动的生活。他不摆教育家的架子，做宿舍的勤务工作，这是他能和共产党长期作朋友的本质。

平民留学生和贵族留学生两个营垒的对立在法国最为明显。徐世昌任总统时，曾捐国币十万元，徐的代表朱启钤到法时捐五万元，其名义均是救济勤工俭学生。但前十万元是支给华法教育会间接分配，结果得款者不是勤工俭学生，而是不勤工的学生。后五万元直接分配给勤工俭学生。因此华法教育会出版的报纸对于徐世昌登报致谢，对于朱启钤的五万元则称之为收买勤工俭学生的收买费。又湖南省政府为救济本省勤工俭学生，第一次捐国币一万元就由华法教育会工作人员中的几个湖南人分了，真正作劳动工作的湖南学生一文未得。第二次寄二万元交章士钊先生，其中一万元在湖南就分给了其一个女生姓舒名中的，是章的亲戚，夏寿康的儿媳；准备赴法时，在上海分了二千元。舒是我的学生，分割情形是她告诉我的。另一万由蔡元培先生带到法国交给华法教育会了。后来因为他们之间有矛盾，而勤工俭学生又找

到书面凭据，这一万元才要出来给学生分用了。

华法教育会的报纸，过去总是替勤工俭学鼓吹的，但到了和勤工俭学生争执款时，则每一张报纸都有一些侮辱勤工俭学生的文章。勤苦的学生能到欧洲求学，是蔡元培和李石曾诸先生倡导的，我们应该感谢他们。但是华法教育会被褚民谊、曾仲鸣、萧子昇等利用，而吴稚晖又与公使勾结，结果限制贫苦学生留法的办法也订出了。以后留法者要缴国币五千元做保证金，才办护照。从此杜绝了贫苦学生留法的出路。受高等教育之权被贵族及其走狗所独占，而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也就日益增加了。黄齐生先生和我在法国时已经是四十岁以上的人，自问当时还不是革命的人物。由于中国没有改良的道路，迫而出此，一逼再逼，终于使我们竟成了革命先锋队中之一员。还留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就组织了“CY”（按系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缩写——编者），后改为留法中共支部，而被迫回国的也多参加了革命，多成为大革命时代的中坚人物：如蔡和森、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向警予、刘伯坚、林蔚等同志，他们已在大革命时期及内战时期牺牲了；剩下的如周恩来、陈毅、聂荣臻、李富春、王若飞、李卓然、蔡畅、罗迈、李立三、何长工等同志，都是我党独当一面的干部。至于当时华法教育会中某些人物，自己既不需勤工，却有勤工俭学生捐款可得；过着阔绰的生活，拿到博士、硕士学位：如褚民谊、曾仲鸣等有些已当了汉奸。还有肖子昇、肖子暲两兄弟：子升和华法教育会那一些人在一起，生活很高（他以前是我的学生，我常去规劝他，我在法最后一次见他时，他租十六元一月一间相当阔的房子，我和齐生仅租六元一月的小房子），后来他就和褚民谊等一起当汉奸去了。子暲（即现在的肖三同志）和勤工俭学生在一起共辛苦，终成为我党重要干部。

创造世界，基本上是靠贫苦人的奋斗，其他阶级出身的分子要靠和贫苦人在一起奋斗，才能改造自己。我和黄先生幸在二十五年前加入了勤工俭学的队伍，二十五年后才加入我党，因此直到今天还没有脱离革命队伍，还为国家民族独立、民主、和平奋斗。王若飞同志和黄老先生现已粉骨碎身而死，我对于十三位为民主、和平而死者都有无限的悲悼。同时对反民主和反和平的反动派也增加了无限的愤慨；并引起我对于二十五年来的反动派的愤慨，因拉杂写之，以志愤慨和哀悼。

《追悼‘四八’遇难烈士纪念册》，晋察冀边区暨张市各界追悼“四八”遇难烈士筹委会编，1946年4月25日

哀忆若飞老友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郭　春　涛

大约是民国九年秋天，于法国巴黎南方的一个小城蒙达尼，有一日下午，我的住室里引来了三位客人：一位是年长者，这就是黄齐生先生；两位和我年龄相若的朋友，一为若飞，一为梅君（现已忘其名矣）。当时，据和森介绍，他们是专门来求学的，因为他们都是爱国志士，愤恨北洋军阀当政的腐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横暴，特遨游各地访求志士，共同救国。这是我与若飞见面的第一次，我对他的印象是：坚强、勇敢、热忱、善于言词。若飞在法国时，一面做工维持生活；一面抽暇奔走各地连络友人。后来留法勤工俭学同学，由他的推动，曾组织了一个工学世界社。最初发起的有四十余人，以后参加者竟达三百余人，当时留法学生中之爱国积极分子几全被吸收。工学社开成立大会的时候，有的主张采用无政府主义来改造中国；有的主张采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中国；当时主张走后一条路线的是若飞与和森，若飞以滔滔雄辩，舌战群雄；和森则以洋洋数万言《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之文字，贴于会场壁上作宣传，主张前一条路线者，亦不少有力份子，今日多已转变成为延安之要员矣。当时两条路线的争论，互不相下，几至停会。中间由和森夫人向警予出来调停；

两种主张暂不作决定，保留待下次大会讨论解决，始得圆满成会。工学社成立后，无形中变成了当时留法学生之领导组织，对同学的思想起了决定的影响。这可以由当时留法学生的几次运动中看得出来。第一次是：留法同学对“勤工俭学”认识之争辩，大打其笔墨官司。有的认为：勤工俭学，是“主义”，可以终身行之，既可行之于法国，亦可推行于中国以至全世界。有的认为：勤工俭学是“手段”，不过是穷苦学生暂时借此学习法国革命思想与谋生技能，准备回国革命之临时办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之“勤工”，即无异帮助资本家增加剩余价值，在资本制度残酷剥削之下，普遍推行“俭学”更属不可能。有钱的学生与倾向无政府主义者，多主张前一说，无钱的学生与倾向马克思主义者，多主张后一说，若飞亦是主张后说最力者，争辩的结果，后一种见解得着了支配的势力。有一次，北洋军阀政府派吴鼎昌到法国借款，总额为五万万法郎。工学社召集临时大会讨论决定号召留法同学反对借款。不数日，学生齐集巴黎示威者约四百余人，一面要求中国公使陈箓宣布内容，表明态度；一面推举代表向法国政府表示反对意见，阻止借款。而中法政府当局则一面高压，一面利诱，以拆散示威同学的阵线，同学为之动摇者颇不乏人。当此危急之际，若飞则暗中离开巴黎，潜往各地同学集中地点，劝其发电，或自行拟电拍发，以鼓励巴黎示威同学坚持到底。后来陈箓被打，法国政府答应考虑学生之意见，借款代表之吴氏亦一时销声匿迹，示威学生始行分返各地。又一次，工学社发动同学往里昂示威，向里昂大学中国方面的主持人吴稚晖氏要求里昂大学开放，容纳全体勤工俭学同学入校就学，而一般贵族教育家及贵族学生则反对此意见，主张只允许经考试及格者入校。勤工俭学生，在生活高压之下，除极少外，多无法参加考试，终被摈斥。当时主张严格甄别

考试者，今日之大汉奸褚民谊亦系其一。若飞对这次运动奔走卖力最多，我亦因此而被追回国。其时，大约是民国十年。我从此与若飞分手，与工学社诸友离别，流光易逝，忽尔二十余年矣。去夏，若飞由延来渝，奔走和平团结，闲常得与谈论国事，听其言论之透辟，见解之深刻；观其立场之坚定，态度之沉着；不禁肃然起敬，时生“自惭落后”之感。这次若飞乘机回延之前夕，复闻其分析时局，了如指掌，正冀其回延安后带来佳音，从早促成和平民主之实现。不意数日间，惨遭意外，竟成永别，回忆音容，无限悲痛！特记其过去生活的片断，以志哀思；借供研究若飞思想与生平者之参考，或不为无益。

《追悼“四八”遇难烈士纪念册》，晋察冀边区暨张市各界追悼“四八”遇难烈士筹委会编，1946 年 4 月 25 日

关于王若飞同志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肖　　三

一九二一年在法国蒙达时地方一个公学的教室里，桌椅摆成四方形。这里集合了几十个留法勤工俭学生。在教室里的柜子上、墙壁上贴着蔡和森同志硬译的《共产党宣言》等——长长的纸上写着和森的粗大的密密的字，一张连着一张。走入会场时，大家就围拢着看。一会，大家入座，开会了。蔡和森、向警予、罗迈、罗学瓒、张昆弟、李富春、袁子贞（华工中的领袖，河北人，高个子，略能文，大革命后在天津牺牲了）……都发了言，以和森同志说的最长，次数也最多。几天之后，组织成了一个“工读互助社”，社章的第一条是：“以实行社会革命为宗旨”。

这是一个旅法中国人中间最初的社会主义的组织，但成分的绝大多数是湖南人，而且多是新民学会的会员。这个圈子是无论如何要打破，要扩大的。首先就找在蒙达时公学的和在蒙达时各工厂作工的其他勤工俭学生。王若飞同志那时一时在巴黎，一时来蒙达时。在蒙市时也一时在公学学法文，一时又在橡皮鞋工厂作工。他的豪华的才学，他的进步的思想，我们早就知道和敬佩的了。大家都认为他是同志，就直邀他加入这个社会主义的组织，他欣然接受了这个提议，大家都非常高兴。

特别值得欣幸的是，若飞同志在旅法中国勤工俭学生中间交游颇广，经过他，这个小小的团体又吸收了不少进步的青年。及至赵世炎同志由巴黎乘车来到蒙达时，在郊外一个树林子里，在暖和的阳光底下，大家席地而坐，尽情痛快地畅谈了几个钟头之后，旅法进步青年们中间过去好似有几个集团，彼此间也似乎有些隔阂的现象，至是完全改变了，思想行动都一致起来了，由哈佛尔、哈佛娄经巴黎到蒙达时到克鲁佐到圣铁田……这几处勤工俭学生与华工中的进步分子的“统一战线”结成功了。这个社会主义的组织后来扩大到了几百人。而结成这“统一战线”的使者，首先是王若飞同志，然后就是赵世炎同志。

这个“统一战线”发展的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成立。周恩来同志、蔡和森同志、赵世炎同志、陈延年同志、王若飞同志、罗迈同志等都是党的组织者和领导人。这个旅欧支部后来在中国革命运动中起了它很大光辉的作用。多少这个支部的成员后来牺牲在与中国人民底敌人搏斗的火线上！到现在还有多少它的成员在继续与敌人搏斗！不幸，非常不幸的是，若飞同志为了和平与民主事业英勇奋斗，这次竟这样悲惨地殉难了！我写到这里，禁不住热泪夺眶而出呵。

让我再回忆几件事吧：

在巴黎十三区意大利广场的附近，一条叫做哥得伏化的不大的街道上，十七号门牌的一个小旅馆里，就是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机关所在地。这里住着六七个人。决定了：脱离生产专门工作的只二人——赵世炎同志和陈延年同志。其余陈乔年同志等就都白天去附近工厂作工，晚上回家帮助印油印，出刊物。王若飞同志也去一个作云母片的工厂工作。每天作工九小时，得工钱九个佛郎。这样的工资是很低的，因此每天早上在家里随便吃点面

包、茶水即赶快去上工，一直到正午十二点休息半小时，出厂来吃午饭。若飞同志和我们只能在一家小馆子里吃几块面包和有时吃几片鱼，再则喝四分之一公升的红酒，就算一天的正餐了。晚上回到小旅馆又只能吃一盘煮洋芋或几节廉价香肠。但若飞同志从来是很快乐的，他的潇洒的风度，豪放的笑声，常能传染人。他有时直是倜傥不羁的。

在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时，若飞同志是非常勤谨而有心得的。他学习时的特点之一是，作笔记时写得很快，很详细，教员讲的每一个字他都能记在本子上。

（下略）

摘自《极大的悲痛，极大的愤怒》，《追悼'四八'遇难烈士纪念册》1946年4月25日

赴法勤工俭学时期的陈毅同志*

（一九四九年五月三十日至六月四日）

秋　　羊*

本来在这一篇东西中，我不应当提到我自己；但在陈毅将军的十几年读书生活中，我同他朝夕相处，先后竟有八年之久；如果剔除了我这样一个不重要的人物，反不易显得陈毅在事业上创造的伟大。

陈毅在学校时就叫陈毅；他也有一个号叫“仲弘”，但现在已很少使用了。他是四川乐至县的人，今年计算是四十八岁了。他并不和许多共产党员一样是农民出身，他的父亲在满清末年还作着湖南省内的一个县官或者府官。在陈毅五六岁的时候，由父亲带到湖南“任上”去住过几年，直到九岁或十岁父亲丢了官，才回成都来住在东门外的牛市口。父亲虽说作官归来，却并没有钱，牛市口的家是很破烂的，全家的生活异常清苦。

在成都甲种工校时代

我同陈毅认识是一九一八年春天的事；这以前，他是同他的

---

*　题为编者所加。秋羊是金满城的笔名。

亲哥陈炎在成都甲种工业学校念书。这学校是中学程度的职业学校的性质；里面也有机器实习等功课。这学校在成都最出风头的并不是他们的功课而是他们的足球队；他们足球队中的若干有力人物，陈毅便是其中的一个；因为他打第四排，所以外号叫做“陈 Four”，他的极灵巧的盘脚，几乎可以把敌人脚上的任何球都勾来为自己使用。

在一九一八年春天，李石曾和四川省长杨沧白，为了提倡一种半工半读的留学办法，在成都创办了一个学校，这学校的名称是长得可怕的，它叫作“中国留法勤工俭学会成都分会留法预备学校”，宣称毕了业就可以到法国去留学。

陈毅便放弃了甲种工业而去考这一名不见经传的学校；我呢，为了不信奉上帝而被华西中学斥退以后，也去报了名。

考取留法预备学校

可是我们真不幸，全考在备取中去了。学校开学以后，我们差不多三两天总要去探询一次备取生可否入学的消息。我们竟迟到一个月以后，有一天那么凑巧三个人在同一时间去探询，同时望见“陈毅、杨持正、×××准予入学”的字样，陈毅、杨持正和我，我们三个人由于意外的高兴，互相谈起话来了。青年人总是那么热情，三人立刻成了今后不可分离的朋友；后来竟闹到好些同学讥笑我们，喊我们作刘、关、张，我们不但不生气，反而常以此自况。

这留法预备学校，校址在成都的爵版街。学生一共有一百三十人左右，功课大都以法文为主，说的是一年毕业。李石曾虽是提倡人，他却不是校长，而且也不曾到成都来过。教员中有很多留法学生，至今这些教员在社会上还知道的只有两个，一个是画

家林君默，另一个便是青年党的李璜了。

陈毅的学生生活是很吃苦的，他经常只穿一件蓝布长衫；冬天的衣服也没有加厚许多。每天早上，他差不多要走十华里的途程才能达到学校，而晚间又要如此走回去。我几于每逢星期日都要到他家里去吃饭，但在我的记忆中他有闲招待我的次数很少；不过因为他的哥陈炎同是留法预校的同学，伯父、伯母对我竟象自己的家人一样，所以我对每星期的来回走二十里路去吃一顿澹泊的饭，认为是一件极愉快的事。饭后，我们在田野中看那些一片黄的油菜花，或者到最近的锦江楼去吃茶，都觉得满有风味。天黑我要回学校宿舍，他常又再送我走四五里才折转去。

陈毅天资好，功课考得不错；但我却要公正的说明，他并不是很用功的人；至少在学校的课本上，他是不十分使用功夫的人。我同杨持正和他三人，都差不多是同样的懒人；学校只要一下课，时间又还不到他返牛市口时，我们便去一个有名的花园双柳村吃茶，或者少城公园吃茶，或者以半元钱吃皇城坝的回教牛肉馆，大家以学生时代的见解，纵论古今天下大势。我不知道他的政治见解是否当时便有些成熟，但我知道他的古书读得比我同杨多得多。至少那时他已会写旧诗而我则至今还不会。

读兵书，做旧诗

最近常常遇见一些知道我同他相处过很久的朋友，于闲谈中总向我提出这么一个问题："陈毅是一个文人，何以带兵带得这么好？"如果在我的记忆中来寻求他这一种萌芽的话，我觉得他的多读古书恐怕有点关系。我想起他曾经介绍我读过几本兵书，除孙子十三篇外，有黄石公的《三略》和姜太公的《六韬》。（按《六韬》、《三略》实是伪书，但当时我们不知道。）

"你将来想带兵么?"我问他。

他说他完全没有这个意思。他说他是听见他父亲或者另一位前辈说过，读兵书不一定是带兵，而是为人处世都需要的东西，尤其是处朋友之间，例如"攻心为上"，例如"知己知彼"等，都可以作活的运用。另一好友杨持正（此人是四川著名的杨遇春杨侯爷的孙子，现尚在法国），更从而在他家里的古书堆中，找出了好几本这一类的书。不过大家当时的注意点是寻求这书中能够拿到社会上应用的格言，谁也没有想到谁会变成一个大将。而且我相信今日的陈毅，如果他不再重新翻古书的话，他一定已忘了这一批当时所热心读过的书，一如我今日已再背不出三略中的任何文句一样。总之，我回忆三十年前的陈毅，无论如何发现不了他有军人的气质和修养。老实说，那时候距满清还没有好远，我们还忘不了那以文取胜的头名状元的典型；我们主要的目的，还是特别注重书读得多和文章写得好。所以我们虽在留法预校念书，而预校的功课十分之七是法文，我们还是不十分注重法文。要在课外读书的时候，我常常看见他拿一本《资治通鉴》或《史记菁华》；而我也常常拿一本《史记菁华》或一本《资治通鉴》。他与我不同的地方，就是他时时要拿一二首新作的五、七言律诗或古诗给我看；而我则只有点头而不会了解他作得好或者不好。我记得他所佩服的诗人是二黄，一个是江西派的黄山谷，一个是清末的黄仲则。但这两位仁兄的诗如何好，我至今也弄不明白；因此他在这方面很有些生气，又劝我读他的亲戚谢无量在中华书局出版的《诗学入门》，结果我读了一阵也没有入门，而陈毅的旧诗到一天一天地更叫知音者佩服了。

官费留法，离开家乡

一九一九年年初，学校当局宣布了一件叫我们伤脑筋的大事，即是：学校在两月之内要大考了，在一百二十名预备学校的勤工俭学生中，只有前三十名才有官费留法。三十名以后只有自费去。陈毅、杨持正和我，三人都是破落户，自费留学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立志三人都非考前三十名不可。我们议决：如一人考不取，两人的官费分与他用；两人考不取，考取的一人也不去；总之三人要有福同享。为了达到这目的，我们三人在两月之内，有好多夜完全没有睡觉。陈毅尤其辛苦，他每天要走二十里的途程，不能不一面走路一面读书。好在结果我们的成绩很好，杨考第六名，我得了第十名，陈毅考了第十六名，陈毅的哥陈炎也在三十名之内；大家真是踌躇满志；榜发以后，陈毅第一次开始喝酒了。

所谓官费，是杨沧白省长拨了一万二千元出来，前三十名学生每人分四百元；我们大约是在那年的六月便出发到法国。除三十名官费外，还有三十四名自费生，一共六十四人。各人先回故乡乐至、仁寿、峨眉等地辞别父母，约好一月之内在重庆会齐。七月初，就坐了轮船到达上海。这一群学生就住在徐家汇放了暑假的南洋中学内。等了两个月的船。

到　上　海

花花世界的上海，好多学生都经不起环境的薰染，因此而堕落的大有人在。惟有陈毅最为沉得住气，他除了偶然喝一点酒，开一听罐头荔枝或菠萝解渴外，他很少进戏院或游戏场。天黑，他总是等着我回来，同坐在南洋公学内的溪边，望着对面马路上

灯头很亮的往来汽车，他告诉我这就是人生最大的乐趣。过了差不多一个月我才明白他等我的用意，是不准我不回来；而且我的不读书贪玩的事，他已经写信告诉我的哥哥了。我的哥哥除了来信责备我以外，郑重地向我说，你这位朋友，不但是一个志诚君子，看他的来信，他将来必成伟大的人物，叫我对于这一个人要一生一世地好好地结交他。我们的友谊已由于他这一种作人的恳切处而进了一大步。

不久到法国的船有了，我们须准备一切行装。这时候陈毅提议了一件傻事，而我也赞成了这一件傻事；我们把预计已无甚用处了的钱，买了两大箱子中国线装书。陈毅的见解是到了法国，法文书是不消说容易买到，但中文是我们的命脉，要没有书怎么办？于是《史记》、《汉书》、《庄子》、《老子》，……买了一大堆。这些书后来竟丢在巴黎一个工人宿舍中，我们从未翻过一次而回了中国。

我们在上海曾听过吴稚晖、张溥泉用英文向我们演说，这都是重要的。但对于陈毅影响最大的我想要推康白情的一段演说了。康白情现在广州文化大学执教，热心教育，是我们的好老师。当时他的《草儿》刚出版，五四运动刚刚才过去二三月，他就由北京到了上海亦召集我们作鼓吹新文化运动的演说。听了他的演说后，陈毅感到无比的兴奋和极大的震动。他懂了他的演说而我则没有懂。他找着我谈《新青年》的问题。大约康还介绍了一些书给我们读，陈毅是马上要去买这些书，他告诉我他从此不作旧诗了，他要作一个有新思想的新青年。

出　　国

我们大约在九月中旬动身。船由黄浦江出口，陈毅极高兴谈

吴淞炮台和崇明岛的地形，他一直望着崇明岛不离开船头。可是船一过崇明岛后，他就开始不能支持了，他晕船了。他的身体虽然十分健康，但晕船病使他狼狈不堪。我比他支持得稍久一点，但终于也睡倒了。我们三天三夜不吃饭，一直到了海防。见着陆地，病好了，大家高兴，吃了很多中国饭，结果再上船，似乎又吃坏了。陈毅一直不断地生病，到了马赛，我记不清是不是他的脚肿了，不能动，是有人背他上的岸；上岸即住在法国一个公立医院中养了差不多半月的病。病后他赶到巴黎，与其他的学生过同样的生活。

由于"勤工俭学"四字的号召，产生了今日中共的若干重要人物；这里我似乎应当赘说一下所谓勤工俭学是怎么一回事。

在巴黎睡地板，吃冷水面包

当时的法国总理班乐卫，李石曾同他是同学。为了沟通中法文化起见，李同班商量好送一千乃至一万个中国学生到法国去半工半读。我们当时的想法，以为是半天读书，半天作工；那知道李石曾的办法，是要这些学生们先到工厂工作，以积蓄来读书，而这些学生们又根本不会工作，法国工厂当然也就不客气地拒绝。幸好班乐卫出力写信介绍，大工厂卖了面子，允许每厂中安置四五人。而当时四川、湖南的学生先后已到了四百人左右，一时还安置不完。这些安置不完的学生就在巴黎城外法华教育会的楼上、楼下地板上睡觉。用汽油炉子自己烧菜。钱呢，由教育会每天发五法郎的维持费(约合中国钱半元)。有的学生并不烧菜，单吃面包和自来水。陈毅和我都住在教育会好久没有工作，吃了很多次的"冷水面包"(当时成一名词)。间或加一点猪油或巧克力，都算是一种浪费。巴黎的天气很冷，我们五法郎的维持费还

要积蓄一些下来买大衣，所以吃的方面毫无讲究的余地。发维持费的人是刘厚；登记名字的是曾仲鸣；我永远记得他们对待学生们的态度，活象慈善家布施穷人一样。当过湖南某中学的校长的徐特立先生（中共中委、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已经是四十多岁的人了，也来法国勤工俭学，同样领过维持费和吃过冷水面包。

进克虏伯兵工厂做工

大约到了一九二〇年的春天，我才进了哈佛的大炮厂，陈毅则进了克虏伯兵工厂。实际上我们在工厂不是作工而是学作铁锉工。所以工厂等于白送我们一笔维持费。陈毅约有十二法郎一天。

在工厂学了半年铁锉工以后，我们就同教育会交涉不愿作工要读书了，加以四川省政府又汇了十几万法郎来放在郑毓秀手里，她似乎也不好意思不拿出来分配；于是四川的学生，愿意读书的便可以退出工厂。除了我们的好友杨持正已同法国女人讲了恋爱不想读书外，我同陈毅便再聚首于圣日耳曼公学。这学校说起来也不过是一种高中程度的功课，而我们觉得最苦的是要用大部分时间去读法文；其次几何、代数这些功课常常赶不上法国学生。不过陈毅似乎满不忧心这一点。我不知道谁在中国寄了些《新青年》一类的杂志给他，他很喜欢去读这些杂志。同时那位校长只知道要中国人的较高的学费，对于学生的功课马虎已极。所以方便了陈毅从事课外的种种活动。

在圣日耳曼公学，从事爱国运动

到了一九二一年的夏天，陈毅的政治意识就渐渐地显著起来了。他好象同当时也在法国的李璜、曾琦已有相当的往来（这一

点他却没有告诉我），他也似乎化了名字在周太玄主办的《游欧周刊》上发表文章，但这些他都不肯同我说；我只看他天天忙着在写甚么，后来我才想起这时期大约他正在投稿。

这时学生中已开始萌芽了一种爱国运动。中国驻法公使陈箓，当时同法国政府正在进行借款；把中国的好多权益都抵押给法国人。这时候陈毅和一位四川同学李家秀和另外几位忘了名的湖南同学（大约有李立三在内）便以油印通讯的方式，号召起全巴黎区的勤工俭学生（那些非勤工俭学的留法学生，竟没有一个人参加），约四百人左右，在巴黎中央市场的广场上集合，然后就到公使馆去找陈箓叫他宣布借款的真象；一面向法国政府表示我们反对这一次借款。

陈箓不肯见学生代表，派了他的秘书出来应付。这位秘书我只记得他姓王，是一位白白胖胖的漂亮小子，他用官僚态度向学生说了几句话就挨了打了；头也打出了血，几乎送了命。公使馆立刻打电话叫警察来，学生们有一部吃了法国警察手中的短棒，大部分则从地道车逃跑了；幸好这一次并没有人被捕或受伤。不过陈毅从中央市场回来以后，非常气忿。从那时起，他便不大读书了。我记得我们就忙碌起来。陈毅似乎是我们中唯一能写白话文的人，他全天在忙碌起草；有那么多的宣言、通讯，竟使得他天天不得闲了。

法国有一种“胶印”，是把一种特制的墨水写在一张胶纸上，然后反印在一张有光道林纸上，就可以印出六十份至一百份东西来。这时候起草是陈毅，写字的是李家秀，我们许多人担任印刷和寄送等各项工作。圣日耳曼公学，俨然成了勤工俭学学生运动的司令部。但我们完全是出于自发的个人行动，没有组织，没有章程，也没有甚么“自治会”或其他社团一类的名称，没有党派色

彩，虽然陈箓最后终以共产党的罪名而陷害了我们。

号召勤工俭学生占领中法大学

打过公使秘书以后，勤工俭学生们觉醒了自身是受着甚么人的欺骗；于是对于李石曾的信念开始动摇起来，尤其恨他所使用的刘厚和曾仲鸣等。郑毓秀也被我们请来质问过一次，要查她手边握着的四川、湖南各省政府付托她管的勤工俭学的专款。那一次如果不是学生中有郑毓秀的追逐者李鹤林等保护了她的话，她一定挨打了。

由于觉悟到勤工俭学不是我们所理想的前途，到了法国两年还没有进到一个正式的学校，于是发生了第二次运动。那时李石曾、吴稚晖在里昂利用庚子赔款及法国人赠送的一座大房和花园等办一个中法大学，勤工俭学生们就要求无条件地进这学校。但学校当局表示非考试不可，非缴费不可。圣日耳曼的司令台于是发出号召，全体集合去占领这学校。但因为巴黎距里昂有八小时的火车，所以那一次只集合了一百零六人。不消说陈毅是首先在内了；我自然并没有离开他；还有就是现在大家知道的李立三，还有一位我们同学认为他的前途有绝大办法的、极能干的赵世炎（可是赵回国不久为反动派枪杀了）。

被捕、入狱、绝食

我们一百多人坐了火车，到达里昂，直扑中法大学的校址。学校还未开学，校内只有一个唯一的办事人褚民谊。这家伙看见学生们来了，吓了一大跳，表面上对我们十分客气。我们就在还未完工的各课室中展开行李就住下了，表示非在此读书不可。

褚民谊一面敷衍我们，一面却打电报给陈箓，叫他设法对付

我们。陈箓勾结了法政府，说这些闹事的学生全是“布尔什维克”，于是派了大批里昂警察来逮捕我们。来的时候恰巧我们正在开会，于是没有一人例外，全部被捕，六部囚车，几十名武装警察，就押送了我们到一个陆军监狱。这要说实话，这监狱除了不能出门而外，倒绝不象犯人的住所。里面有图书馆藏有几千部书，有咖啡厅可以打纸牌喝啤酒，有花园可以散步。每日三餐都有肉吃，只是没有床，大家都睡地板。

在监狱中不知不觉过了两个月，陈箓还没有解决的方法。十月十日三十节(恰巧是民国十年十月十日，所以我们叫作三十节)那一天，我们就议决在监狱中绝食一天，表示抗议。这一天我们在花园中开大会，唱卿云歌，法国人一切全不懂得，看见大家不肯吃饭，那监狱长急死了，立刻拍电给陈箓，表示不欢迎这一批太可怕的犯人。适巧吴稚晖到了法国，陈箓派他来向我们演说，这倚老卖老的家伙就把学生们大骂一顿；于是群情愤激，要主张二次绝食。陈箓打听到这些消息，便一不做二不休，用武力把我们押送回中国。法国人小心，竟使用两个警察押一个人的稳妥办法，使我们无法脱逃，终于被迫上了船。

这是一九二一年十一月的事，陈毅当时是二十岁。

被押送回国

在这一事件中，陈毅大大地露头角了。除了一切文件多半由他起草外，在槟城、新加坡、西贡、香港各地去向侨领接头和宣传的四个代表中，就以他为最重要。我们沿途接受各地的侨胞赠送了不少的食品、用品以及现款。

提起这一段历史，我始终忘不了李立三的一段有趣的小故事。李立三那时叫李隆郅，极少说话，最易害羞脸红。有一次

川、湘同学两方面赌下围棋，四川方面是陈毅和我及一位姓苏的，湖南方面则为李立三及一位姓汪的；四川说湖南的棋下得臭，湖南说四川的棋下得并不香。于是李立三便和陈毅作了主将，在船上大厅中比赛起来。李立三的棋显然是越下越不支了。他的脸由白而红而紫，在大家的嘲笑之下他生气了，把棋子和棋盘一齐抓了起来，跑到船边抛下海去了。而这一副围棋，是监狱中花园里的黑白小石经多人捡了来作成的，李立三把它丢了，直气得众人想打他，但陈毅则始终挂着笑容，十分高兴他的胜利。

回到上海后，陈毅一直是我们的四位代表之一，并写着他的文件，向各方面找津贴，救济这一百多名穷学生。在上海以津贴维持了约有三个月以后，终于不能再维持而大家分散了。我是去了北京，住在李石曾为我们创办的中法大学（起初还只叫陆谟克学院），陈毅则回了四川。这是一九二二年春天的事。

秘书、参谋、编辑

在四川的陈毅，起初作了杨森的秘书；但大约还不到三个月，又改任了陈书农师部的参谋。今日他同刘伯承为莫逆之交，大约便在这时期认识的。不过我始终相信，虽然这在一时期他结交了不少的四川军人朋友，但他今日军事上的成就和他的这一段生活却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他后来表示并不高兴作这些事，而且实际上不久也辞去了它，回到重庆《新蜀报》作了编辑，在报人的生活中，并没有发挥他的抱负。在这里他倒发生了一件很美的罗曼司，而他作的那一首新诗就成了他一生的最值得纪念的作品之一。原来他在《新蜀报》发表了一首用意极深的诗：

孩子，有谁欺负了你？

有谁是你的仇敌?
你不要叫别人把他杀死,
你还要好好地保护他的生命,
好叫他死在你自己的手里!

这一首主张亲手杀仇人,用意十分深刻的诗,竟引起了一位美貌的女郎给他来了一封信,表示对诗人有无限的缠绵。哪个男子不善钟情?诗人竟也爱上了她。可是这一对情人一生只见过一次面,而便永远不能再往来了。少女生长旧家庭中,有一个母亲左右不离,诗人作了很大的努力才冒险到她家中去会她。母亲也在场。这认识英雄的少女,颤巍巍地亲手捧了一杯茶来递与客人,背着母亲的身,茶杯下一颗金戒指掉在青年诗人的手中了。女郎丢了一个眼色回到母亲身旁,……事后陈毅向我形容当时的情景,他说他幸福得几乎昏眩了。可是从此他们竟不可能再有第二次见面的机会。他得着我大大夸奖中法大学的信,于这年的秋天就来北京西山碧云寺读书了。

到北平进中法大学

一九二五年在中法大学毕业,在校三年的期间,陈毅和我实际上等于在那里自修。中法大学的教员有李石曾、徐旭生、张竞生、宋春舫、李书华、高鲁等,他们所担任功课的钟点都很少,讲的也没有系统,各人都讲自己喜欢的学问,也不管学生们需要不需要。如李石曾讲生物学,宋春舫讲戏剧,李书华有时还讲没有一个人听得懂的相对论,张竞生则讲孔德实证哲学,……于是陈毅和我,我们只有拚命自己发展。陈毅最爱的是新文化一套书籍,科玄论战的若干文章他非常感兴趣,报上一有他就收集。

从“思想家”到“文学家”

不知道是当时的风气呢还是我们自己的追求，我们都想变成“思想家”；当时陈毅是把叔本华、尼采、孔德、卢骚之流都看作思想家的。这是直到毕业那一年，陈毅才同我提出我们来努力作一个文学家。

陈毅的家始终是穷的，他和我一样，中法大学读书的钱，只靠四川省政府每年一百二十元的津贴。那时全年伙食要用六十元，其余六十元他大半用来买书，衣服大家都穿得很破旧。在我们毕业那一年，我因为兼任了一个法文专科学校的教员，每月有四十元的收入，我们才比较充裕起来（当时我们的经济是不分彼此的）。

从那时各方面看来，说陈毅要变成一个文学家，是一点也不值得我们诧异的。文字的修养，他比我强得多，也进步得多。下面一件小故事可以证明：

我们从来没有吵过架，他也向来没有同我开过一次玩笑；但是有一次我要到秦皇岛去找我正在追求中的女友，在临走时我向他说：

“我到了那里，一定给你写信。”

“写信？你老先生的信我最受不了的是一派仁兄阁下，满纸之乎者也，不知道你甚么时候才可以改良！”他第一次如此嘲笑我。

我脸红了。我知道我太不进步；我允许他以这一次到秦皇岛去为起点，立志写白话信。我在旅行中，努力用不纯粹的白话写了好几封信给他。归来时他对这一件事只轻轻点了一下头，说，有些进步了，但他还劝我多读《新青年》。（以下略）

摘自《从书生到将军的陈毅》，上海《大公报》1949年5月30、31日，6月1—3日

对世炎的回忆

（一九六〇年九月三日）

李　立　三

我是在一九一九年冬到法国的。一九二一年初先后到法国的中国勤工俭学生已有三千余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去法国的华工有十余万人。这么多学生和工人，但中国大使馆对他们的生活、学习毫不过问。这时蔡和森、向警予等同志便发起求学运动，想组织学生示威运动来强迫中国官僚解决学生的学习问题。这个运动发起之后，我和蔡和森看法不同：蔡和森同志认为，我们要革命就要学习，勤工俭学不可能，应该争取中国政府给学生津贴以解决入学问题，我则认为不应该宣布勤工俭学不可能，并且还应动员国内贫苦学生继续来法以接受新思想。同时在法国有这么多华工，应在他们中间进行工作，为将来革命准备干部。当然我们的意见还不是本质上的分歧，只是作法上的分歧，因为我们都是主张搞革命的。

根据我自己上述看法写了一篇文章，题名□□□□□*，署名佐夫，寄给《旅欧周报》，但他们不敢登，因为当时大部分同学是拥护和森同志的主张的。我便写信督促报社，并且表示：如果不

---

* 据查此文题为《读蒙达尼勤工俭学同人意见书》，发表于《旅欧周刊》第67号，1921年2月19日——编者

登则请把稿子寄回来，过几天以后他们把它发表了。文章发表之后，徐特立同志写了一篇文章**表示赞成我的主张，几天以后收到世炎同志一封信，信中表示同意我的主张，并说要见我。我当然表示欢迎。当时我和鲁其昌、黄齐生、徐特立等人住在三侠盂；世炎、罗汉等人住在三得建。隔几天他便来见我。

这是我第一次和赵世炎同志见面。见面后谈得极为投机，看法完全一样。

在对“二八”运动问题上，赞成我们主张的人已增加为七、八人。除我和世炎同志外，还有刘伯坚、刘伯庄、陈公培、罗汉、周钦岳等人。当时我和世炎同志商量成立一个劳动学会，我们本想定名为共产主义同盟会，但因为当时的八个人中有的还不完全是拥护马克思主义，所以叫做劳动学会。

二八事件包围大使馆，我们没有参加。事后出现一种谣言，说我和世炎是受了陈箓的收买，因此，对这次事件不积极参加。其实，我和世炎虽不同意这次行动，但对中国大使馆勾结法警殴打学生的行为表示愤慨，因此，事件发生之后，我们便明确的表示：（1）坚决反对大使馆勾结法国警察殴打学生；（2）应建立一个群众性的勤工俭学学会。为此，我们劳动学会的八个人，联名发表宣言，号召全体学生团结起来，反对大使馆勾结法国反动派殴打学生。至此，人们对我们的怀疑才解除了。宣言发表之后，我们着手建立“勤工俭学学会”，不久三千多勤工俭学生当中的绝大部分便报名参加。劳动学会正式成立时，我们明确的提出要革命。第一步应先把华工组织起来，记得世炎在会上还讲了话，大意是说：孙中山如何由少数人搞起革命，我们是无产阶级必须组

** 据查此文题为《驳蒙达尼同学的公启》，连载于《旅欧周刊》第68—69号，1921年2月19日、26日

织工人进行革命……等等，当时我们读马克思主义书籍是很少的。我是个翻砂工人，我的法国师傅是共产党员，我受他的影响很大。当时我们要革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这是很明确的，但是如何革法，这是不太明确的。

和森同志没有参加我们的“勤工俭学学会”，若飞、延年、乔年同志等都参加了。勤工俭学会委员会由世炎同志主持。劳动学会是勤工俭学学会的领导核心。

勤工俭学会成立以后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些发起人和负责人是留在巴黎还是下厂作工，如果把大批的会员动员进工厂，而我们几个负责人留在巴黎，显然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怀疑。如果到工厂作工，勤工俭学会的工作又无人负责。因此，我和世炎同志商量我们两人分先后也进工厂，于是我同第一批学生到了克鲁梭钢铁厂。这地方是华工的中心，约有二千多名华工。个把月后（约在一九二一年三、四月间）世炎同志在巴黎把学生安排好以后也到了克鲁梭，我们便在一起作工。

在巴黎时，我和世炎同志研究过一个问题，即与蔡和森等同志的团结问题。我们始终认为和森、蔡畅、李维汉、李富春等同志虽未参加勤工俭学会，但他们和我们同是主张革命的，而且当时和森同志明确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们当时组织了工学世界社，因此，决定主动的和他们联系，由世炎同志给和森同志写信。以后世炎同志到克鲁梭工厂时绕道到孟丹石找和森等同志面谈。谈了两三天，结果意见完全一致，双方表示争论已经过去，今后要共同研究问题，共同革命，大家都谈马克思主义。世炎同志回来后，我们非常高兴，认为他们都是勤工俭学学生中的优秀分子，此后我和世炎等同志认为，为了更好的在华工中进行工作，并加强对勤工俭学生的领导，只有原来的劳动学会是不够的，而应该

成立共产主义同盟会，来统一领导华工和学生的工作，为了这件事世炎给和森同志写信征求他的意见，和森同志表示同意，但主张名字叫少年共产党，我们表示名字不计较，只希望有这么一个核心组织，把华工会和勤工俭学学会统一的领导起来。记得当时还搞了一个华工俱乐部，出了一个刊物叫《华工周报》是油印的，世炎写，因为他字写的好，我印。

同年五、六月间"工学世界社"开会，请我们派人参加，我去了，和森同志在这次会上提出成立少年共产党的动议。郭春涛等人坚决反对。我是赞成的，但因为是客人所以只能发表个人意见，但不便争论。这次会没有达成协议，少年共产党没有成立。会后我回到克鲁梭。

不久后，知道吴稚晖他们以照顾勤工俭学生为名，在国内捐了一大批款并取得庚子赔款的一部分建立里昂大学。但是所有学生都是在国内招的（主要是一些官僚子弟）不收勤工俭学生。当时我和世炎等同志商量一定要搞一个运动来反对吴稚晖这些人，争取里昂大学招收勤工俭学生入学。一方面通知巴黎的勤工俭学学会，另方面与和森同志联系，他们都一致同意。我们提出要争取比国内来的学生先到里昂，强占校舍。巴里、克鲁梭、孟丹石来的大队学生到里昂前都派有自己的先遣队，我和世炎、和森等人都参加了各自的先遣队。各队到里昂会合起来，有104人，学校方面知道我们要来便把所有的校门都关了。我们决定先打开一个房子暂且住下，等国内学生到了之后，再派代表同他们联系，以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当我们住下之后，便来了几百名法国警察把我们包围起来并强迫我们离开。这时根据世炎同志提议，我们印发了法文传单，反对法国政府压迫中国学生。我和世炎等同志出面和警察交涉无结果，反而把我们104人押上囚车送到一

座营房里拘囚起来。我们便从囚车窗口向外撒传单，我和世炎不在一个囚车上，在团结内部、坚持到底等方面世炎作了很多工作。

在双十节我们绝食一天以示抗议。商议时本来打算较长时间的绝食，但内部有人不同意，而对外宣布时并未说明是一天，吴稚晖等人害怕事态扩大，因此在我们宣布绝食后便着了慌，吴稚晖来和我们讲话，我和世炎也起而讲话驳斥他。骂他出卖中国勤工俭学生，和法国政府勾结压迫学生。吴稚晖看说服不行，便回去了，与法国当局商定把我们押送回国。听外面进来的同学告诉了我们这个消息，我便和世炎同志商量下一步如何办。当时认为回国也好，到国内去进行革命。但同时又认为法国还有那么多勤工俭学生和华工没有人领导也不行。世炎劝我留下，我则认为他是“勤工俭学会”的负责人，因此建议他留下，他同意了。但是世炎同志怎么出去呢？以后想了一个办法：和外面商量好，找一个和世炎模样差不多的人，进来探望我们，进来后把探望的条子交给世炎同志，他自己留下来，这样便把世炎同志换出去了。而我们这里还是一百零四个人，警察也没有察觉。

我回国后先到当时粤区党委联系，以后从广东到了上海见到陈独秀，商议了成立旅法党组织的问题。接着中央派我到湖南，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进行工作。此后曾和世炎他们通过几封信，但内容时间已记忆不清了。在一九二二年初，世炎同志等误听到一个消息，说我在湖南被枪毙了，为我举行过一次追悼会，一九二六年在国内和世炎同志见面时，世炎同志把这件事情当作笑谈告诉了我。（1960年9月3日，记录稿，曾经李立三同志修改。）

摘自《“一大”前后》（二）《对世炎的回忆》，
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8 月

关于中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些情况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

高　承　元

中国社会民主党，其原始组织为“健社”，该社系一九二二年冬，由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及参战华工数十人——有孙倬章、陈天侯（名师）、潘无我、陈侠、杨赓陶、徐特立（后转入共产党）、王乾、毛升选、韩少琦、袁守信、邹昌平、叶长龄等——在巴黎所创设；主张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实则是社会改良运动），建设中国之共产主义社会。出版了《巴黎丛刊》，参加了工人社会主义国际 I.O.S. (Internationale Ouvriere Socialiste)；并于一九二三年五月间派杨赓陶出席了工人社会主义国际的汉堡会议。

到一九二四年七月十四日（法国国庆节日）① 正式改组为中国社会民主党，吸收了巴黎及其近郊，甚有远在他国的俭学勤工生，汪颂鲁、皮应麟、徐邦杰、陈子和（邦政）②、王培骎、史乃绍、李文伯、曾哲之、何言硕（何由英国来）等四、五十人，在

---

① 所以选用这一个例假日，是因便利参加成立大会的人，他们都是在工厂做工的。——原注

② 陈邦政，湖北大冶县人，与国民党广东人惯做官僚县长的陈子和不同。——原注

巴黎近郊哥仑布一间咖啡馆开成立大会。议决了政治纲领十余条，其重要者有：(1)主张施行普通〔遍〕选举，把民主共和深化；(2)土地国有；(3)发展合作社组织；(4)劳动者有参预企业管理之权；(5)推行八小时工作制；(6)女工分娩前后享有十二星期例假，照发工资；(7)工人有罢工退工之完全自由；(8)实行社会保险及工作到六十岁工人之养老金制度等。纲领有序文，长万言，大概援用饶勒斯（Jauris, Jean，法国社会党人机会主义者代表，与德国之伯恩斯坦 Bernstein 理论相当）理论，吹嘘通过议会活动、办合作社、分红利等步骤，资本主义就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之说。制定了党章、规定党的组织与机构，设总部于巴黎，欧洲各地及中国内地各设若干支部。总部机构设干事会(干事六人，包括总书记)、议事会（议事三人）及监事会。并选出汪颂鲁为总书记、史乃绍为《奋斗》周刊（党机关报）编辑，发行了《奋斗》周刊一百多期（每期五百份)。《奋斗》宣传内容，大致是要求民主，要求召开国民会议，反对北洋军阀封建统治，反对帝国主义；介绍了弓伯谟利（Compèremorel）的《社会主义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翻译了普列汉诺夫、饶勒斯、勃鲁姆等论著，无非是修正主义的论调。《奋斗》并刊登了国际消息，都是根据工人社会主义国际的汇报（Information）而编写的。

社民自正式建党而后，渐渐发展至百余人。同时也有不少人如孙倬章等由法归国，在国内也发展了数百人。留法的绝大多数是勤工俭学生，或参战华工：其工资每月大约五、六百佛郎，约合中国币五十元。少数是技术工，工资七、八百佛郎，约合中国币七十元。也有一些经庚子赔款委员会选送入法国各大学的。在国内发展的党员大都是教员、学生和小职员、店员，绝少工人。一句话，社民党员成分一般是小资产阶级，工人贵族或工会官僚

在社民党内是没有的。

……

从一九二四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至一九二八年，整整四个年头，在巴黎继续开过代表大会三次，干部也改选了三次。这二、三、四各届所选出的总书记是史乃绍、王乾、陈子和（邦政），后来这些人也在一九二八至二九年间回国了。

巴黎总部在这四、五年间，和国内同志隔阂甚深、极少联系。巴黎总部只在巴黎开它的空名代表大会，巴黎根本不能指挥国内党员。巴黎干事会只是关起门干些鸡毛蒜皮的事。在这种情况之下，社民机构必须改革，组织必须扩大，已是人所共识，所以一九二九年之改组已成为客观之必然要求。

*　　*　　*　　*

在一九二三年冬间(在健社成立后一个周年)，另有一部分留法俭学生（俭学而非勤工，由学院免费供给膳宿，并免学费，无须各人入厂工作以维持生活)，主要是法国里昂中法学院的学生，也组织了一个政治团体，叫作“竞社”，其政治纲领（里昂纲领）略近于社民（即健社纲领)，其创建人为翟俊千、黄巽、张云、何衍璇、张务源、狄膺、何其昌等，其由德国来参加者有高承元。创社时约有社员五、六十人。后来在中国发展至五百余人。其机构初设总部于里昂（在巴黎设支部)，至一九二五到二六年，一再在北京、广州召开了两次代表大会，制定北京纲领，并将总部迁回国内，设于北京，再迁广州，并通告全体社员应一律参加国民党。事实上社员们也多参加了国民党工作。至一九二七年国民党背叛了革命，毒害人民、投降帝国主义，政治日趋腐败，该社多数人对国民党大大失望之余，认为非另与其他革命的党团结合，无复致力民主革命与社会革命之途径。首先由高承元、张务源、

翟俊千等于一九二八年间参加了社民（上海支部）。酝酿半年之后，遂于一九二九年三月间两个政团正式合并，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联合全国代表大会（即社民第五次代表大会），出席代表有孙倬章、韩少琦、鲁成、王培驟、史某（忘其名）、高承元、翟俊千、张惕源、周云锦等九人，代表党员三百人，议决了合并“竞社”。同时召开“竞社”结束会议，决议解散“竞社”，全体社员得自由加入中国社会民主党（实际加入者约百分之五十，其间凡接近了国民党反动派政权者如张云、狄膺等都不参加）。

……

第一次联合代表大会依照新党章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九名，当选者杨赓陶，孙倬章、高承元、韩少琦、翟俊千、张务源、鲁成、黄其弼、王培驟。并决定总部组织暂设三部：（一）总书记，选出高承元担任；（二）组织部，设干事一人，选孙倬章担任；（三）宣传部干事，选定翟俊千担任。另选派杨赓陶为出席工人社会主义国际代表。又决定运用统一战线原则，仍用国民党名义作政治宣传。即日刊行《青天白日》半月刊，宣传民主革命，打击国民党右派专政，揭露国民党祸国殃民，杀害无辜，投降日帝美帝之罪行，并以此作为党的机关报，选定高承元、孙倬章兼该刊总编辑，韩少琦、翟俊千、陈子和、罗粤峰、周一夔等任撰述。又命史乃绍编撰社会民主 A. B. C. 把上海纲领详细解释，以供党员研究。

……

社民改组以后举行总登记，新登记结果约有四百余人，新旧党员各居其半（竞社社员为新党员）。于是在国内广泛开设支部，除原有七处外，增加天津、郑州、万县、贵阳、广州、曲江、惠州、梧州、昆明各处支部。……在北京出版了《晨光》半月刊，成都仍继续刊行《民力日报》，在上海刊行了《穷汉》三日刊。

……

本来社民是由两派信奉不同主义的人们组成：一派信奉饶勒斯主义，以陈天侯、潘无我为首；其他一派则信奉考茨基主义，以孙倬章为首，内部互相矛盾。到了抗日战争，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时，在内外压力下便瓦解冰消，党人便各走各的路了。

摘自《中国社会民主党史料》

〔稿本〕，1967 年 7 月 19 日

留法、比勤工俭学的回忆

（一九八〇年五月）

江　泽　民

前　言

在五四时期以前就兴起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由于吴玉章同志的直接号召和组织，在我们四川省曾经有过很大的发展。

早在一九一二年四月，吴玉章同志在北京同李石曾，吴稚晖等一起曾倡办了留法俭学会。同年夏天，吴老回到四川，就广泛宣传留法俭学的好处，着手组织一些贫苦有志的知识青年到法国去学习，并成立了四川的留法俭学会。据吴老回忆：那年夏天，当即就有何鲁等一批青年人，从四川奔赴法国。一九一四年一月，吴老抵达法国进入巴黎法科大学研究政治经济。同年八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法国为了解决缺乏劳动力的问题，曾到中国招募华工。吴老于一九一六年在法国与蔡元培、李石曾、法国人欧乐教授、穆德议员等人，共同组织了华法教育会，目的是对在法国的大批华工进行教育，并希望国内贫苦学生能来法留学，因此早在一九一五年，就以“勤于作工，俭以求学”为目的，组织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会。一九一七年二月，吴老回到北京，同李石曾、蔡元培（当时正任北京大学校长）又创办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即法文专修馆）。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交通阻隔，

赴法勤工俭学的人很少，这个运动没有能够广泛发展起来。

不久，伟大的十月革命震撼了全世界，欧洲出现了革命的高涨。这就使中国人的眼光开始转向苏联，转向欧洲。但当时又很难到苏联那个世界革命的中心地区去，只能到靠近苏联的西欧；又加上在法国已有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及华法教育会的组织，所以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特别是在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逐步传播，才有大批爱国的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青年，抱着振兴实业，改造社会的宏大志愿，奔赴法国、德国、比利时等国实行勤工俭学，以寻求革命真理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一九一九年底的一篇通讯报道说："自停战后，以勤工俭学来法者，至今已有百五十余人之多，而已在中途者，尚有六十余人，此诚留学界可喜之事。闻国内青年，怀抱以工求学之志，而欲来法实行者，颇不乏人。"（引自《东方杂志》十六卷十二号一九四页，一九一九年十二月版）。一九二〇年，周恩来同志写的《旅欧通讯》中又指出说："据各省勤工俭学生委员会调查，勤工俭学生的总数有一千五百余人。"（引自天津《益世报》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二十日）勤工俭学生今考之于华法教育会名册之上数额，盖已至二千人矣"（引自天津《益世报》一九二一年五月九一十五、十七日）。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数目，直到二十年代末期，没有确切数目的依据，但据说共达三、四千人，特别是以湖南、四川两省人数为最多，都各在四、五百人左右，只是四川省的江津县一个县就有三十余人之多。

总之，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五四运动的推动下，发展很快，从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就蔚为大观，形成了一九二〇年末的高潮（以后逐年就低落下去了）。我就是在这个高潮之际，投身于这一运动赴法国的。

出国前的准备

我的老家在四川省江津县吴滩场(即村镇)，这里也是聂荣臻同志的故乡，我们的童年都是在这个贫苦的农村渡过的，并在同一个初小学校念过书。

我的父母含辛茹苦供我上了二、三年私塾和四年初级小学之后，由于家境贫寒就再也无力供我求学了。正在合家为此而感到苦闷的时候，我祖父的一位世交、江津县的教育家，也在本场居住的唐九臣先生，恰好受聘在重庆平儿院教书，他叫我到他那儿去学习，同意在经济上给予一部分补助。于是，在一九一六年初，我十三岁时，就离开故乡，到重庆进了平儿院。

重庆平儿院，是重庆聚兴城银行老板杨希仲（曾留学美国）创办的一所完全小学，是他办的一项慈善事业。一般的是招收无父母无依靠的孤儿来学习的，所有费用都由学校负担，称为“公费生”。由于这所学校办得较好，颇有盛名，所以也有些人把子弟作为自费生送去学习。这里的教师对学生管教极为严格，有些教师经常体罚学生，他们相信只有这样的严师才能出“高徒”。

在重庆平儿院高小班学习了三年，除了上课之外，我经常和赵其文（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今年逝世）、侯昌明、戴廉儒等同学去游览重庆的名胜古迹，漫步在长江、嘉陵江岸边，欣赏这座古老的山城，深感祖国的伟大和可爱。那时，我们还不懂得革命的道理，但却为祖国不断遭到列强的蹂躏而愤慨不已。重庆早已是通商口岸，设有各国领事馆，有一条街就叫领事巷（在打枪坝），外国人还开办了不少的洋行、公司，享有治外法权，外国商船兵舰在大江中任意往返。看到这些情景，使我幼小的心灵，感到沉重的压抑。有时就和同学们一起高唱当时富有民族主

义思想的歌曲《中国男儿》，互相倾吐重振祖国声威的抱负。

一九一八年底，我在重庆平儿院毕业了。正在徘徊于今后的前程时，恰巧在一九一九年初我得知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招生的消息，便兴冲冲地去参加考试。由于它的招生对象是中学毕业生和具有同等程度的青年，而我却刚高小毕业，没有考上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因为我在平儿院学习成绩不错，一连三年保持了同年级的第一名，受到杨希仲的器重，还曾把我的作文功课拿去欣赏观看；同时，该预备学校又系民办公助性质，杨希仲曾以巨款捐募资助的缘故，这时便出面保送我进了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

那所预备学校就设在重庆市内一座夫子祠里边，教室简陋，设备很差。学校的组织比较松懈，学生们上课就来，下课就走，没有宿舍、体育场所。在校内主要学习法语、中文、数学、工业知识四门课程，目的是要粗通法语并掌握一定的工业技术常识，为去法国勤工俭学作些准备。其它课程和活动等是很少有的。但特别值得提到的，是我们在这里，与同学们一起参加了伟大的五四运动，经受了五四的战斗洗礼。邓小平同志是稍晚才进入这所预备学校的。他那时就是显得非常精神，总是精力十分充沛，他的话不多，学习总是非常刻苦认真。那时，我们入学不久，就爆发了震撼全国的五四运动，重庆各学校也立即响应，掀起了反帝反封建新文化的浪潮。我们预备学校的同学，为了抵制日货，反对卖国贼，曾经集体到重庆卫戍司令部去示威请愿，在那儿坚持了两天一夜的斗争，得到了初步结果。我们回到学校之后，就自动地把带有日本商标的牙粉、脸盆等日用品摔在地上焚烧，把洋布衣服也撕毁，表示再不用东洋劣货。当时，时代的脉搏，爱国的思潮，在冲击着我们的头脑，广大青年学生和各界人士高昂的爱国

热情，给了我深刻的教育。

我在这所预备学校经过了一年半的学习，到一九二〇年暑假就毕业了。随后，又经过考试，共有一百多人，我和其他同学几乎全都被录取为公费生。从中国到法国的路费，全部由开明士绅所募集的捐款中供给，这就给我们解决了留法勤工俭学中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马上就要到那遥远的外国去留学，心情是非常激动的，于是就兴高采烈地回到老家，同亲友们告别，准备立即出国。

远涉重洋到法国

一九二〇年九月初，我怀着惊喜的心情，同预备学校毕业的约一百一十名同学，包括邓小平（希贤），还有邓绍圣（小平的叔父）、周维桢、冉钧、胡大智、阙时杰、王若愚、熊禹九、刘君才、张熙、李植、贾岱、熊正钧、熊正心、刘深山等人，从重庆出发，乘船沿长江东下，饱览着大江两岸神奇秀丽的山川，看到了著名的天险三峡。到了上海以后，经华法教育会办理了手续，一个礼拜后，便乘坐法国邮船“昂得莱蓬”号，徐徐地开出杨树浦码头，怀着同祖国依依惜别的心情，踏上了留法勤工俭学的征途。

我们从上海出发，经过香港、西贡、新加坡、穿过马六甲海峡，路过科伦坡，渡过印度洋，到达红海，又通过苏伊士运河，在埃及的塞得港稍停之后，进入地中海，最后到了法国的马赛。

我们赴法途中的历程，现在回忆起来是很有趣味的。一方面，条件十分艰苦。我记得，那条邮船上的一等舱是八百元一张票，二等舱是五百元一张票，三等舱是三百元一张票，我们是花了一百元买的四等舱（即无等舱）船票。本来没有什么四等舱的，只是为了照顾我们贫穷留法勤工俭学生而临时设的。所谓四等舱就

是货舱，半明半暗的船底里，里面到处堆放着各种货物，没有什么设备，我们就住在重叠的双层床铺上。舱内空气非常恶劣，天气闷热，臭虫又多，蚊子咬得很厉害，许多人就买个躺椅到甲板上去消磨时间和睡觉，有时风平浪静，可以饱尝海上风光，奇观异趣；有时狂风大作，巨浪劈头打来，就使人头晕目眩。据说经过印度洋或地中海，总要碰上一次大风暴，果然我们就在印度洋上碰到了。当时，风暴卷着海水，掀起山峰似的巨浪，四万吨的邮船，一会儿被掀上浪尖，一会儿又落到浪谷当中，白天也刮得天昏地暗，宏大的邮船尤如一叶扁舟，在茫茫的海水中漂泊，真是吓人得很。我们不但一点东西也吃不进，就连黄胆都要吐出来了。这样，我们饱受了三天三夜的风暴袭击，算是幸运的过来了。另一方面，则是大开了眼界。邮船到了各地大海港，都要停上两三天，装卸货物、煤炭和水等东西，有钱人便上岸去进餐厅、买东西；我们穷学生就上岸去观光游览，饱阅市容，看博物馆，参观名胜古迹。许多城市尽管是高楼大厦，也有许多人是西服革履，但也有不少人是破衣褴衫，沿街乞讨。在有的港口，我曾看到一些穷苦的儿童游泳在船泊周围，向乘客们哀告乞怜。有的客人就将硬币抛入海水中，那些穷孩子们就潜入海水里去把硬币摸上来，客人们以此取乐，孩子们则以此谋生。当时看了，真使人心酸。这使我深深感到，世界上的人们同住在一个天空之下，却过着两种大相悬殊的生活，到处都是这样的不平。当然，我当时并不了解这是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制度造成的。

旅途中给我留下了美好印象的，是我们在地中海上遥远地看到了火山爆发的余焰，特别是在夜晚，喷射的火焰，尤如五颜六色的礼花，射入深蓝的天空，而在水中则出现着倒影。天上水中互相辉映，那种夜景是很奇妙的。船上虽然有时下令要我们带上

救生圈以防碰上大战后尚未消除干净的水雷，但却始终没有碰上，而我们在经过了四十来天的航海生活之后，在十月中旬，终于从马赛上岸，踏上了法国的土地。华法教育会已派人迎接到巴黎。

第二天我们来到巴黎，受到了许多勤工俭学学生的欢迎，其中就有在一年前就到法国的聂荣臻同志，我们在异国相逢，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和亲切之感。在巴黎呆了不久，大部分同学就分别到蒙达尼（或称蒙达时）、枫丹白露、圣得田、佛勒尔（或称阿恩）等地中学去学习或补习法文。大约在十月下旬，由华法教育会介绍，我们二十七位同学一起到佛勒尔中学去补习法文，同时也在那里等待工作。在过了四个月之后，一九二一年二月，华法教育会即介绍我与胡大智、阚时杰三个同学，到法国沙龙城由施乃德尔资本家办的一个公私合营的机械厂当了学徒工。当我们到了巴黎华法教育会（住在华侨协社里），领取介绍信时，正巧是“二·二八”运动的前夕，也参加向驻法公使馆示威请愿，无结果，次日即到厂作工去了。

我们在机械厂的生活是极为艰苦的。厂主虽然为中国、葡萄牙、西班牙等外国工人修建了非常简陋的木板工棚作宿舍，每个房间的面积不过数十平方米，要容纳二十多人，拥挤不堪，上下班又不一致，有人在做饭，有人洗衣服，有人在学习读法文，所以很不得休息。那时我与胡大智、阚时杰三个人组成一个伙食小组，每天下班回来就赶快用煤油炉子烧饭，我们十天半月也吃不上一次荤菜，经常吃土豆、洋葱、萝卜等蔬菜，加上用米粉煮的稀稀的粥作为汤。工厂的劳动十分紧张、艰苦，工头又很凶，经常随意辱骂工人，甚至拳打脚踢。在这个工厂里，我才亲身体验了资本家剥削的痛苦。我那时是下决心要求学的，所以，不管再苦再累，我都坚持晚上到工厂的职工夜校去学习两、三小时的技

术课程，还抽时间（如星期天、假日）自找老师补习法文。我拖着个疲劳的身体作工、学习，在这里忙忙碌碌地度过了近一年半的徒工生活。在一九二一年一月的时候，我年满十八岁了，按照法国的法律，满十八岁就算成年人，工资就比年龄小的学徒工约增加一倍，所以，从那时起竟稍微有了一点积余。那时，有的同学挣了钱就大吃大喝、欢乐一番。还有个别的花花公子，例如在巴黎、里昂的官费生，在大学挂个名，却成天去跑咖啡馆、跳舞会，进出于戏院、电影院，甚至乱搞女人。而我们勤工俭学生多数人还是能够细水长流，尽量节约度日，准备以后去实行“俭学”的宿愿。

在这个时期，赵世炎、李立三、傅钟、聂荣臻、邓小平等同志都先后在法国大资本家施乃德尔的克鲁梭钢铁厂作工，他们的生活同我们厂是一样艰苦。该厂有职工三万余人，华工就占约一万人，勤工俭学学生有一百五十余人。因为克鲁梭钢铁厂同我作工的沙龙机械厂相距不远，我在是年夏天某个星期日曾到聂荣臻同志作工的地方孟沙南（是克鲁梭钢铁总厂的分厂）去看望过，同他一起去游玩。由于我与聂荣臻同志是同乡、挚友、老同学，特别友好，所以我一到他那里，他就热情地招待。彼此畅谈生活条件、吃苦受罪和工作劳累的状况，但他却非常乐观，对前途充满了信心和希望，还对我谈论一些革命道理、十月革命等问题。这就使我增加了勇气，更加下定决心，要在勤工俭学的路上走到底。

到比利时上工科大学

一九二二年五月，我接到了聂荣臻同志从比利时沙洛瓦（现译为沙勒尔瓦）劳动大学寄来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告诉我说，沙洛

瓦劳动大学费用低廉，正在建筑中国学生宿舍，免收宿费，还为中国学生专门设有准备考大学的补习班。他建议我马上去那里补习功课，准备投考大学。我得了这个消息，十分高兴，便即刻赶到比利时，找到了聂荣臻同志，我又在他的建议下，暂时进入了这个大学附设的甲种职业学校。因为这里接触比国人多，学习法文方便。我们经过了一个时期的补习，在这年暑假，都考上了劳动大学。荣臻同志进了化学系，我进了机械系。从此开始了我们的大学生生涯。但荣臻同志在这里学习不久，在一九二三年初就到巴黎去了。我则一直在这里学习了四年多，直到一九二六年暑期毕业为止，并获得工程师文凭。

这所劳动大学是比利时社会党人创办的，学校的教员有不少是有名望的学者教授，或是在工厂很能干的高级工程师。学校的规模不是很宏大，但设备较齐全，试验台很多，很实用，房舍建筑也很讲究。学校座落在沙洛瓦城的最高处，外面有宽阔的广场，树木成荫，在城区不远的地方，有一条河缓缓流过，桥上人来车往，桥下运输船只穿梭而过。学校的环境是很好的，由于沙洛瓦城是比国的煤矿、电机电气工业中心之一，又有铁路直通法、德两国，交通很发达，劳动大学又有名气，所以布鲁塞尔都有个别学生每天早上坐一个小时的火车跑四、五十公里来上学。我们中国先后就有一百多名学生在这所学校学习过，其中有不少勤工俭学生。学校里设有三个系，即机械系，包括动力、建筑、桥梁等专业，还有化工系和电机电气系，是一所工科大学。学制为四年，前二年学基础课，例如三角、大代数、微积分、解析几何、化学、力学、物理等等。后二年学专业课，我记得曾学过机械制造原理，材料力学，内燃机、外燃机（即蒸气机）等课程。

我与聂荣臻同志在沙洛瓦劳动大学的生活，在精神上是丰富

的，在物质上都是很难的。我当时感到最大的困难是经济来源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曾经想了很多办法。我临出国的时候，亲友们这个送三元，那个赠五元，凑上了一百多元；经过勤工俭学生回国代表的奔走呼吁，得到当时中国政府，包括省、县政府的一些汇款接济，我也分得了一些；在考入沙洛瓦劳动大学后，我还争取杨希仲先生给寄来了三百元（后来，我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就同他再没有联系了）；还有在巴黎作工的好友的少许帮助；而主要的收入则还是靠勤工劳动。我在沙龙机械厂当学徒工的时候，拚命干活，节省开销，积蓄了一些钱。在上大学期间，每年放暑假三个月，我都去巴黎当临时工（事前托友人交涉好），以资补助。我还记得一九二三年暑假到巴黎，我同聂荣臻以及范一、陈家齐、何嗣昌等七、八人，租了一间较大房间，住在一起，白天就分头去工厂做工。我当了三个月的临时工，因没有技术，干了一些搬运工、锯铁条、锤铁板。一九二四年暑假，我到巴黎雷诺汽车厂去当了两个多月分发工具的临时工。一九二五年我又到巴黎雷诺汽车厂作了三个月描画图纸的临时工。我记得这个暑假，在巴黎一个咖啡馆里，由在雷诺汽车厂做工的中国同学们组织召开了孙中山先生追悼会，我也赶去参加了。我们通过做这些临时工，不仅维持了假期的生活费用，还积存了一笔钱留作学费。就是这样，在经济上我通过东拼西凑，千辛万苦，对付了四年多。

与聂荣臻同志我们两个在沙洛瓦劳动大学学习的同时，还有不少中国学生，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大学、布鲁塞尔工艺学院、蒙斯大学、列日大学、根特大学、鲁凡大学等处学习。例如在列日大学就有陈崇宪、万监周、黄士嘉等中国同学。我们这些人与比利时的师生朋友们相处得很好。比利时的师生朋友们待人热

诚、很好客，也很注重友谊，学校的同班同学家长曾请我们到家作客、玩耍、吃饭。

比利时国家小，情况又较复杂，但却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住在比利时东部、北部的是佛拉芒族人，讲佛拉芒语（与德文差不多），住在南部、西部的瓦龙人讲法语。这些在文化上、语言上、种族上各不相同的人们，由于历史的原因，形成了共同的风俗习惯，能够共同遵守一种制度，公文是用两种文字，彼此和睦相处，不闹分裂，这是很难得的。比利时的交通发达，铁路、公路密如蛛网。我在上学期间曾游历过布鲁塞尔、列日、安特卫普等大城市，还到过历史上有名的滑铁卢战役旧址参观过战役大油画。由于我专心学习科学技术，所以对比利时的历史了解得不多，只记得它是一八三〇年八月获得独立，才作为一个有八百万人民的独立国家而存在于世。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德军在一九一四年八月首先破坏了比利时的中立，侵占了比利时，直到一九一八年九月比军收复国土为止。在战争中遭到了巨大的破坏。我们于一九二二年到达比利时的时候，还能看到当年战争破坏的一些痕迹。但比利时人民，以高度的热情，很大的毅力迅速地恢复和重建家园，这种精神是很感动人的。

思想的转变

在沙洛瓦劳动大学的四年多，对我一生所走的道路，是有重要影响的。可以说，那四年多不仅奠定了我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理论基础，更重要的是奠定了我沿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前进的基础的人生观。在这方面，聂荣臻、刘伯坚、黄士韬等同志曾经给了我极大的帮助。

我刚到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学时，中国学生宿舍还没有修建

完毕，便和聂荣臻同志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小房子住下来，我们白天去听课，晚上回来一起洗衣服、共同复习法语和课程。两人互相照顾、生活得愉快。后来又一起进入大学学习。荣臻同志那时的学习抓得很紧，他在拚命攻读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同时，还十分用心地钻研马克思、列宁的学说。他经常给我讲学习体会，介绍苏俄劳农政府的政策。他认为我们中国也必须象苏联那样，用革命的暴力手段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反动统治，建立劳农专政，实行社会主义。我们还经常议论资本主义的弊病，工人失业，工厂主和工头的残酷压榨，富人可以日日山珍海味，穷人天天饥寒交迫。这绝不能做为我们的理想，这都给我的思想以很大的启发，使我开始认真思索自己应当选择的政治道路问题。

同时，我到法国和比利时参加勤工俭学的痛苦的实践经验，也给了我思想以很大的触动。例如一九二一年内在留法勤工俭学史上发生三次运动和斗争：

一是“二·二八运动”。在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八日由蔡和森、向警予等同志领导下，聚集在巴黎一部分勤工俭学学生四百多人向中国驻巴黎公使馆示威请愿，提出要“生存权、求学权”的口号，公使陈箓对此不仅不予理采，反而暗中勾结法政府派出军警殴打学生。结果数人受伤，一人被电车压死，四人被捕之暴行，立即引起旅法各界华侨的愤怒抗议，国内也发来抗议电，学生们表示一定要坚决斗争到底。陈箓被迫于这样压力下，不得不请法当局释放被捕人员并将国内为救济学生募捐来的部分款项分给有困难的学生，作俭工时期维持费。

二是旅法团体掀起“拒款运动”。一九二一年六月初国内北洋政府派出的专使朱启钤来巴黎，以出卖国家印花税、验收税和滇渝铁路建筑权……等等为担保条件向法国政府贷款，用以购买军

火打内战。得知这消息后，由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陈毅等同志，联合巴黎华侨各团体（包括勤工俭学学生会）组织了拒款委员会，并于六月三十日在巴黎召开了成立大会，会议通过发表了《拒款宣言》；宣读了周恩来同志起草的借款真相的调查报告。斗争持续了两个多月，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三是进驻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在一九二一年九月间，由于假借勤工俭学学生的名义募捐创办的中法大学建立后，招收的学生都是国内官僚贵族、军阀纨袴子弟，对于在法国流离失所的穷苦勤工俭学学生反而一个不收，这就引起全体勤工俭学生的极大愤怒，于是在赵世炎、蔡和森、李立三等同志领导下，发动了一次规模宏大的、一次政治目的更加明确和有组织的“争回里大”的求学运动。各地代表群集到里昂，占领里大校舍暂住下来，可是被陈箓、吴稚晖（是里大校长，从国内率领学生才到里昂的）暗中勾结法政府，突然派来二百多名武装警察包围起来把代表押送兵营，最后把一百零四位学生代表，看作“过激党”，加以“扰乱治安”的罪名，形同囚犯一样，于是年十月中旬被法军警押送马赛强迫上船遣送回国。

这些运动，因沙龙机械厂距巴黎较远，当时没有得到通知，故未能全部参加。但由于同病相怜等原因，对于中法反动政府残酷的镇压和迫害，却使我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和无比愤慨。此外，在那个时期，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实业救国的思想是很流行的。我参加勤工俭学，就是想到西方学点科学技术，回国也搞实业，以便使祖国富强起来。所以，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出发点并不是坏的。但经过了五四运动的斗争实践，再看看我们自己的遭遇，生活的极度艰难，特别是巴黎“二·二八运动”和“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都在向我们说明，想学习一些搞实业的本领，都

不允许，在这样的世道里，要靠实业救国，不是纯粹的幻想吗？我到法国之后，亲身感受到了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工厂工人弟兄们的痛苦，也使我感到回国以后，给资本家去当技术人员或是自己集资办小工厂，驱使工人去劳动，那是不堪设想的事情。这样，就使我逐步认识到了，走实业救国这条路子是走不通的。

与此同时，我在聂荣臻、刘伯坚等同志的影响下，也读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著作。总之，经过自己的实践体验，加上聂荣臻、刘伯坚等同志的熏陶，就使我的思想逐步地转向了社会主义，认识到只有象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那样，发动暴力革命，打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套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枷锁，实行劳农专政，才能真正挽救祖国。就是这样，在我思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于一九二三年一月经聂荣臻（别名向上）、刘伯坚（别名大冶）两同志的介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我取别名红工）。在一九二五年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在比利时的党团活动和
留比学生总会的斗争

在欧洲勤工俭学生中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同国内一样也是十分积极地进行着。一九二一年二月，周恩来同志与赵世炎同志，还有张崧年（张申府）就组织了旅法共产党小组，从事建党工作。一九二二年六月，周恩来、赵世炎、李维汉、李富春、傅钟、刘伯坚等同志在巴黎西郊布罗涅森林里召开代表大会，正式组织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并选举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为宣传委员，李维汉为组织委员。过了不久，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

欧之部（当时实际上是总支性质的，后来在一九二五年又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简称共青团旅欧支部）。在同年八月，周恩来、赵世炎同志又把在欧洲的党员组织起来，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当时的中共旅欧总支部包括三个支部（与共青团旅欧支部一样），即旅法支部，旅德支部、旅比支部。整个旅欧总支部在我们党的创建时期和大革命中，是起了重大历史作用的，特别是为党培养干部方面，做出了十分杰出的贡献。毛泽东同志于一九三六年同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在叙述了国内建党情况之后，又明确指出："同时，在法国，许多工读学生们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它的成立差不多是和中国国内的组织同时开始的。那里的党的发起人中，有周恩来，李立三和向警予（蔡和森的妻子，是发起人中的中国女子之一）。李维汉（罗迈）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发起人。"（《西行漫记》，急流出版社，1949年版，106页）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所属的旅比支部，就设在沙洛瓦劳动大学，在列日大学有一个小组，起初的负责人是刘伯坚和聂荣臻同志，在一九二三年初，聂荣臻同志到巴黎去了，一九二四年刘伯坚、熊味根等同志到莫斯科去学习。他们走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比支部的工作，就交给了我来负责。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六年，我就作了二、三年团支部书记的工作。

我们旅比团支部的成员，除了刘伯坚、聂荣臻之外，还曾经有熊味根、黄士韬、甘瑞、张贵元、乔丕成、乔丕显、万监周、张熙和我等，先后共三十多人，在这个团支部共同生活战斗过。那时，我们参加党团生活是很积极的，但是，由于年代久远，我只能记得一些片断了。

我们团支部的活动主要是组织起来学习和研究新的社会主义

学说，探讨中国革命的各项问题，每两周开一次讨论会。后来，随着国内斗争形势的发展，我们党团生活的内容也就越加接近实际了。在一九二三年夏天，我们中国同志与法国共青团员在巴黎布罗涅森林举行过联欢会，聂荣臻、张熙和我都参加了。两国男女青年在那儿唱歌、跳舞、谈天，还留下了一张合影。象这类适合青年的特点的活动，后来也举行过。

一九二三年夏学校放暑假后，我同乔丕成到巴黎找临时工作。在这个时候恰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改选领导，我俩都出席参加了。会上产生了书记局，由周恩来（任书记）、李富春（任宣传）、尹宽（任组织）、傅钟、邓小平等同志为成员，并在会上决定将《少年》半月刊改为《赤光》（但实际上这个决定推迟到一九二四年二月才实行）。

我还记得，我们旅欧团支部，大约是在一九二四年初，曾经研究过我们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因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孙中山的国民党在政治目的上是一致的，都是要打倒北洋军阀，铲除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势力。那时，周恩来同志受党中央委托，代表旅欧支部，与国民党在巴黎的代表商谈此事，还成立了国民党巴黎通讯处，聂荣臻同志就是通讯处负责人之一。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布国共合作成立统一战线之后，我们按照党中央给中共旅欧支部的指示，会同国民党左派成立国民党旅欧支部，下属在法国、德国和比国都成立了国民党支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都以个人身分加入了国民党。但是，实际活动很少，到一九二五年间，就又分裂为左右两支部。国民党在国内出了西山会议派，也影响到我们支部的团结。劳动大学前后曾经有过一百多名中国同学，其中大部分为勤工俭学生、也有俭学生，有国民党员、有共产党员、

青年团员，社会民主党员和国家主义党员(俗称青年党)，也有不参加各派活动不问政治的人，还有个别的人参加了天主教的活动。有个天主教神甫，叫雷鸣远，曾在中国呆了多年，说得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他给勤工俭学生介绍工作或进校读书或向富人募捐给勤工俭学生以救济，来拉拢一些人去信仰天主教。他的政治目的是防止“共产主义的灾难”，让天主挽救中国，使中国免遭革命的冲击，妄图把共产主义思想当作洪水猛兽加以扑灭。他在布鲁塞尔设立有“中国学生公教家庭”，组织受他接济和欺骗的青年进行活动。例如李杞和我们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同学贾岱等人，就陷入了他们活动的圈套。我们团支部曾派人同那些受骗的青年谈话、劝说，争取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但是实际成效不太大。

那时，为宣传扩大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影响和在留比中国学生中吸收左倾青年起见，我们的团支部还与国民党支部合作召集在比京、列日、根特等地大学读书的中国学生代表到沙洛瓦城，举行会议，于一九二四年正式成立了留比学生总会，并选出了乔丕成同志为会长，我为书记。在留比学生总会当中始终存在着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虽然学生总会长有时是我们的人，有时是国民党员，但学生总会书记一直是我担任，所以实际上的领导权是掌握在我们党的手中。例如曾以留比学生总会名义在1924年请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来校视察时向同学们作国内形势报告；1925年在比京召开追悼孙中山先生逝世大会等活动，均起了一定宣传影响。

在比国沙洛瓦，没有华工，只在一九二四年国内秦皇岛耀华玻璃厂筹建时，购买比利时制造玻璃技术专利权，曾派出一技术人员带领五个工人到沙洛玻璃厂实习。我们曾与他们取得密切联系，到他们住处看望，闲谈聊天，交换国内外情况。当技术员不

在场时，我们乘机把帝国主义蹂躏中国、北洋军阀连年打内战等等罪恶向他们宣传，说明工人应自觉联合起来，反抗他们。但时间不久(约一年多)，他们就回国去了。

我还记得在一九二四年列宁逝世后，我们党团支部内部举行沉痛纪念追悼会，大家对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主义创始人去世，深切哀悼，坚决化悲痛为力量，把他的学说、著作更进一步学习、研究、领会，并借此机会扩大队伍，吸收一部分新同志入团。

周恩来同志对旅比支部的关怀

中共旅欧支部为了培养革命干部，以推动国内革命运动的发展，从一九二三年春天起，曾陆续从留法、留德、留比的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选派青年同志，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去深造。莫斯科东方大学是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党为了支援东方各国革命，专门为中国、朝鲜、日本、印度等东方各国革命者设立的培养干部的学校。一九二五年中国革命开始走向高潮之后，又成立了莫斯科孙中山大学，专门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一九二七年武汉国民党政府叛变革命之后，中山大学即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简称中大)。周恩来同志为了陪同并欢送第一批（有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等十余人）到东方大学去学习的同志从巴黎出发到柏林去办理赴莫斯科的手续，当他们途经沙洛瓦城（沙洛瓦城是巴黎去柏林的必经之地)，刘伯坚、熊味根、黄士韬和我曾到车站去迎送他们，我才见到了久闻其名而未见其人的周恩来、赵世炎等同志。

周恩来同志是一九二〇年十一月赴法参加勤工俭学运动的，

他作为中共旅欧支部的创始者和主要负责人之一，经常奔走于法、德、比三国的中国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之中，宣传马列主义，研究欧洲各国革命运动的实际经验，给国内报刊写了大量通讯报道。他还曾同国家主义派的李璜、曾琦等人当面辩论，驳斥其谬论。我心目中早已印上了周恩来同志是一位很能干的青年革命家的形象。大约是一九二三年三月中旬的那一天，我们一到沙城车站上，大家一见面，就热诚地互相招呼、介绍，这时我才认识了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余立亚等同志。我记得周恩来同志很亲切地对我们说，中国革命形势发展很快，需要大批干部，现在到苏联进东方大学，这就开辟了一条为中国革命培养人材的道路。我们那时都十分向往莫斯科，认为那是光明的所在，凡是信仰社会主义学说的人，无不想去身临其境。我当然羡慕他们，也想去。我表示了这个意思。恩来、世炎同志见我还年轻，便嘱咐说，在劳动大学学习科学技术也是革命事业所需要的，应当安心，但同时要学习共产主义理论和注意观察国内外时局的变化。这次在车上接触时间虽然短暂，但恩来同志给我留下的目光炯炯、英姿勃勃、谈吐文雅、待人亲切的印象，却是极深的。当然，那时我并没有想到，后来竟能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为人民工作，所以，事实上这次会见却成了我接受他的教诲和领导的开端。

从这次会见之后，恩来同志来往于巴黎和柏林之间途经沙洛瓦城时，有机会则到学校来看望我们，做报告，讲形势或检查部署党团工作。

在一九二四年夏初，恩来同志应黄埔军校国民党代表廖仲凯先生之请，受党中央派遣，将要回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他从柏林回巴黎路经沙洛瓦城时，到我们所在的劳动大学停留了

两天，检查旅比支部的工作。那时，他没有住在中国学生宿舍，而是住在乔丕成同志原住过的房东家一间小屋子里，我当时和团支部委员乔丕成等同志向他作了汇报，最后，他应我们的要求，向大家做了两次报告。

首先，恩来同志向在劳动大学学习的数十名中国同学做了时事报告，报告会是由留比学生总会名义召集的。当时的同学虽然大多数是勤工俭学生，但是派别也不少，有信仰社会主义的左派，有国民党员，有国家主义派、有无政府主义派，有改良的社会民主派，还有国民党右派。恩来同志在报告中揭发了北洋军阀政府一味屈从帝国主义，压迫人民，媚外辱国的事实。他说，祝愿我们在海外的同学要和全国同胞团结一致，反对帝国主义列强，打倒封建军阀统治，并说这正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每个正直的有爱国心的中国青年的历史责任。当时同学中虽有不同的派别，各派政见不一致，但却都报以热烈的掌声，表示对恩来同志的极大钦佩。

另一次会议，是请他向旅比支部的全体党团员作报告，他讲了关于国共合作，国共两党组织发展情况，以及国民党腐败，应帮助国民党发展组织等，并讲了中共旅欧支部的发展趋势，向我们指示了要大力进行共产主义的宣传教育，扩大队伍，也即“宣传主义、吸收同志”，就是我们的主要责任。恩来同志在分析了中国的现状之后指出，靠改良主义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实业救国”也只是幻想；革命势在必行，只有学习苏联，搞暴力革命，中国革命事业才能有光明的前景。恩来同志的讲话，就象一股奔腾的激流，冲击着我们的胸膛，震荡着我们的思想，使我们身上充满了革命的力量。他充满青年活力和革命激情的讲话，衣着朴素、态度和蔼、平易近人，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所以至今还记得他那

英姿神态。

在那两天的接触中，我深感周恩来同志知识的渊博。无论对法国、德国、比国还是对中国，他都有深切的了解，我很惊奇也很佩服他对国内外很多事件几乎都能了如指掌，这使我深受教育。谈到所受的教育，使我还想起了曾经读过的青年团旅欧支部出版的《少年》杂志（后于一九二四年二月改名为《赤光》），这个刊物载有周恩来同志的多篇文章，我们在党团支部会议上认真地学习过。那几篇文章很系统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的病根是私有制，只有彻底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劳动阶级掌握了政权，才能建立起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那个刊物在我们旅欧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象一支战斗号角，起了很大的宣传鼓动作用，这与恩来同志的工作是有密切关系的。

废除中比不平等条约的斗争

一九二六年夏天，共青团旅欧支部领导旅欧的中国勤工俭学生和华工，发动了一个废除中比不平等条约的运动，并指示我们旅比支部进行配合，发动群众，展开斗争。

为什么要发动这个运动呢？我记得由于当时国内大革命的风暴正席卷着南半个中国，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湖南农民运动的兴起以及上海、武汉、九江等地的工人运动都在蓬勃发展，形势很好。恰在那年，中比之间订立的不平等条约期满，但在条约上规定，如要废约，必须两国政府双方批准同意。所以，为了配合国内反帝反封建斗争高潮的到来，中共旅欧支部便组织力量竭力促成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迅速实现。

我记得，这一运动的主要矛头是指向比利时政府的，为了使它同意废约，一方面我们向比利时的同情我们的有关单位和开明

人士，进行广泛地阐明工作，还举行记者招待会扩大宣传，以争取舆论的同情；另一方面，我们还直接向比利时外交部长汪代尔德提出抗议，要求他的政府迅速批准废除不平等条约。同时，我们召集比国各大城市如列日、蒙斯、根特、安特卫普等地的中国留学生和华工、华侨，到比国首都布鲁塞尔，向外交部、内务部等进行示威，呼口号散发传单。我们组织的这些活动，起初因为人数不多、声势不大，效果都不明显。因此，我们决定，在一九二六年九月末，把侨居在比利时、英国、德国、法国等欧洲其他各国的中国人，尽可能多地集中在布鲁塞尔，搞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驻比公使馆暗中支持)。

结果，我记得，共青团旅法支部的熊禹九、温大同，旅德支部的潘芳、王德宣、朱建邦，旅比支部的毛克生和我等都参加了。我是以留比学生总会书记的名义同留比学生总会会长邓矩芳一起在暑假中去布鲁塞尔参加的。此外，经过联络动员，还有驻在荷兰的中国海员多人，侨居英国伦敦、奥地利的中国人也派了代表。这样，就发动了一次数百人参加的规模较大的游行示威。

在游行示威那天，我们举着标语牌，故意在大街中央前进，潘芳等人还带头在电车道上卧轨，使交通阻塞，行人聚集，扩大事态，以便我们好向国内外发通电，造成舆论，给比国政府施加压力。果然，当游行队伍到达布鲁塞尔闹市区的时候，比利时大批警察一齐出动干涉，与我们互相扭打起来，最后竟将我们三、四十名同学关进牢房，并于当天晚上把其中的一部分人驱逐出境。事情既然闹大了，我们就通电全欧洲和国内，还要求中国驻比利时公使王京岐，向比利时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声明要降旗回国等项条件。

经过这次声势较大的斗争，终于使比利时政府被迫同意释放

在押学生，并表示答应废除中比不平等条约，从而使这一运动以我们的胜利而结束。这场斗争是有意义的，它的性质是反帝的，是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所以，它也是当时的中国大革命的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这样，就打下了准备于是年底在布鲁塞尔举行世界反帝反殖民地压迫、支援中国革命大会的基础。

到莫斯科去

我在一九二六年六月毕业后，从沙洛瓦劳动大学得到毕业文凭之后，就一边参加废约运动，一边等待党组织对我工作的安排。九月中，我得到中共旅欧支部的通知，告诉我党已决定派我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去学习。这个消息给我带来的喜悦是难以形容的，我拿着通知，高兴地跳起来了。我赶快从布鲁塞尔回到沙洛瓦城，马上翻看地图，查阅路线，收拾东西，准备出发。

我们在比国学习时，始终是很关注苏联的发展情况的，苏联在布尔塞维克党领导下取得了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又粉碎了外国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武装叛乱，随后过渡到了恢复国民经济的和平工作年代，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终于转而进入了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时期。从一九二六年起，苏联开始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工业化而斗争。（苏联实际上是一九二八年才开始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九二六年还是规划准备阶段。）在这个时期能够去苏联，一定会看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搞工业化的活生生的现实，这对我这个学习机械专业的人来说，将是一个新的从实践中学习的大好机会；特别是要到列宁的故乡，十月革命的策源地，真正的劳工神圣之乡去，亲眼看看列宁的继承人斯大林领导建设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在当时来说，实在是求之难得的事情。

与我同时被派到中山大学去学习的共有十人，其中谢泽沅同志和我是从比利时出发，其余的方志刚、胡大志、杨品荪、覃远猷、汤振坤、海荆洲（工人）等八人是从巴黎出发。我们经过准备之后，于十月初便一起到了柏林，受到了廖焕星同志的热情接待，他给我们安排食宿，住了一个礼拜后，办理了各种赴苏手续，我们便怀着极为兴奋和激动的心情，向莫斯科出发。

结 束 语

回忆参加留法、比勤工俭学的历程，我的心情是极不平静的。事情已过去六十年了，但它的深远意义却反而显得更加清晰了。这一运动在我们党的创建时期乃至整个党的历史上，都是起着重要历史作用的，它是中国革命青年追求马克思主义真理，寻求中国革命道路的一种富有成效的伟大革命实践，它是五四运动向深广发展的继续，它为我们党培养锻炼了一大批优秀干部。其中在我党中央担任领导工作的杰出的代表，就有周恩来、朱德、赵世炎、蔡和森、向警予、王若飞、陈毅、李富春、陈延年以及现在工作的邓小平、聂荣臻、李维汉、蔡畅、傅钟等等许多同志。他们为党为人民都做出了或正在继续做出伟大的贡献。同时，这一运动也为我们留下了勇于追求真理，艰苦奋斗、刻苦学习的革命传统。所以，这一运动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我深信，认真研究这一运动的历史经验，对于促进我们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特别是对于加速培养四个现代化所需要的人材，是会有重要的启示的。

最后，还得说明，事隔六十年了，有些情况，可能忘记、遗漏，甚至错误，尚望熟悉了解当时情况的同志补充、指正。

（一九八〇年五月）

追随徐老赴法勤工俭学的前前后后

（一九八〇年六月）

熊　　静*

我从一九一八年开始参加留法、留比勤工俭学运动，至今已经过去六十多年了。现在，回忆那段经历，说出我的切身感受，对于我们更好地为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服务，是会有些借鉴作用的。

一

我于一九〇四年六月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县五美乡。五美乡因附近有五座山峰称五美山而得名，是一个山青水秀的渔米之乡。但是，我的家庭和这里绝大多数人家一样，却是十分贫苦的。大约在我六、七岁时，我祖父去世了。我父亲熊瑾玎正在长沙楚怡小学教书，每月薪俸只有二十四块银元。在故乡仅有的两丘田，每年也只能收得五、六百斤稻谷，这就很难维持我们一家九口人的生活。因此之故，我父亲曾一度把我过继给他的挚友和同志徐特立徐老作儿子。

---

* 熊静原名信吾，是熊瑾玎同志之子。

徐老于一八七七年二月一日出生在五美山荷叶塅一个贫农家里。他家除种田的收成之外，还靠他父亲兼作中医的微薄收入维持生活。徐老在他父亲去世之后，曾想继承父业学作中医，但过了两年便在乡村教蒙童馆，当私塾先生了。后来，他到长沙城里的宁乡速成师范学校去学习了四个月，接触了新式学校的教育方法和孙中山的革命民主思想。从此，他便立志于革命和教育事业，和热心教育的何雨农、姜济寰等人在一九〇五年合办了一个梨山小学。徐老总是感慨我们乡下文盲太多，所以，他更热心于乡村教育事业的发展，并在自己家办了一所观音塘小学（近年来为纪念徐老，已将观音塘小学改为中学）。

徐老办这所小学时，总是强调对每个学生都必须从严要求，竭力促使其奋发上进、刻苦读书，不得荒废少年时光；并要教师对学生一视同仁，言传身教，循序渐进，善于诱导。而在学费方面却又因人而异，凡是有钱人家子弟，就由自家负担学费，伙食费；贫穷人家子弟，只负担在校吃饭的粮米即可，不必交纳学费；十分穷困人家的子弟，则免除一切费用，还由学校供给食宿，只是平时多帮助学校参加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就可以了。我记得，在徐老家寄宿的，也就是住校的，除了三位老师，还有我们四、五十名小同学。照顾这样多人的生活，光靠徐师母（徐老的爱人）一个人，是干不过来的。她虽然非常能干，能吃苦，也善于支配料理家务，但还是干不过来，她又是小脚，不识字，也有困难，徐老便请了一位杨师傅帮忙。再就是我们家境最贫苦的五、六个孩子，每天帮着徐师母打扫院落、摘菜、洗碗、打柴，干完了这些活计，我们再去和大家一起上课学习。可以说，徐老从那时起，就已经组织学生实行勤工俭学了。

我跟着徐老读了三年小学之后，在一九一八年六、七月间，

我父亲熊瑾玎从长沙市楚怡学校给我所在的观音堂小学写信，告诉说长沙要招考留法勤工俭学生，并要我到楚怡学校去报考。听到这个消息，我是非常高兴的，因为何叔衡、陈棱增、黄胜白、唐子怀、毛嶙殉、张怀等诸位前辈，都是当时楚怡学校很有名望的教师，还有校长陈夙荒(号润霖)，教务主任魏俊明等，他们与我父亲非常要好，从前我到楚怡学校曾上过半年学，对他们是熟悉的。只是因为我父亲负担不了我的学习费用，我才离开楚怡学校，到观音堂小学去读书。

我们观音塘小学去长沙报考的有五、六个同学。我记得，第一天考国文，题目是我的志愿。大概是想了解我们的文化水平和想作些什么事业。第二天考试史地，检查身体。我还记得何叔衡、陈棱增、黄胜白诸先生都是主考。考试结果，共录取了三、四十人，我也被录取了。那时，我父亲和何叔衡等几位老人，知道我要参加勤工俭学了，都很高兴。那些天，我打赤脚，披个蓑衣，进城到处奔跑，何叔衡同志见我这个样子，就很欢喜地说："这个细伢仔，不错，能吃得苦。"

二

在考试之后，经过一段准备，大约是在一九一八年十月，就由陈绍休同志带领我们从长沙出发去保定了。那次一同出发的还有陈绍常、颜昌颐、唐灵运、孙发力、侯昌国、刘梓、王人达、陈仁耀、黄进一、肖拔等人。我们从长沙乘火车，到汉口停了两天，过了长江，换乘京汉铁路的火车才到了保定市。

到保定那天，有许多人到车站上来接我们，其中就有蔡和森、毛泽东、肖子暲等同志。我们出了车站就是保定西关十字街，那天正好刮大风，进城门时，有好几个人被刮倒在地上。当

晚，我和唐灵运等同学住在泰安客栈，其他还有住第一客栈的。第二天，蔡和森、陈绍休、李维汉、李富春等同志还带我们到一个花园去游玩，并且照了相片留念。那时，蔡和森同志看到我个子小，就抓住我的手说，细伢仔，你叫什么名字！出门这样远，不害怕吗？想不想家呀？我说，不怕，有这样多同学在一起，不想家。从这时起，我才认识了蔡和森同志，我们都叫他蔡先生。那天，在花园里，我们很自由，到处随便跑着去玩，大家是很愉快的。

在保定停留的时间很短，我们就出发到河北省高阳县布里村去了。从保定到布里村，一部份同学是坐骡子车去的，我们还有二十多人，则是绕到白洋淀坐小船去的。那时，天气还不太冷，我们在白洋淀上一边帮助撑船，一边玩水。大约走了两天，到高阳县莘桥镇下了船。莘桥镇有集市，很热闹，距布里村很近，所以，一下船，很快就走到了布里村留法预备学校。

在这个学校的生活，是很有趣味的。我们湖南去的同学有三、四十人，我还记得有颜昌颐、唐灵运、黄进一、刘梓、胡封岳、陈毅生、朱春成、孙发力、侯昌国、娄绍莲、娄绍丞、吴显鸿、郑延谷、肖自乾、黄琪弼、陈仁耀、曹度谋等人。我们大都住在一起，共同睡在一个用木板搭成的大通铺上。我与黄进一很要好，就睡在一起，他是黄胜白的侄子，比我大三、四岁。晚上天凉，每人只有一条薄被，我们俩人就合在一起，钻在一个被窝里睡。

当时，学校的教师有齐连登先生教授法文，沈宜甲先生教授机械常识，而给我们影响最大印象最深的教师，则是蔡和森同志。

蔡和森同志和我们一起学习法文，还给我们讲授国文。他很

强调学好中文的重要性。他常说，我们应当努力学习法文，但我们是中国人，不能把中文忘记了。我们有些同学只是初小或高小文化程度，连一封家信都写不清楚。他很着急，于是就主动找一些中文程度差的同学，给补习国文。当时我是最差的一个，也是年龄最小的一个，蔡和森同志就经常对我说，你应当趁着年轻，努力学好国文，不然将来到法国去了，就很难有机会学习国文了。在上国文课时，他讲过关于墨子的问题，很赞扬墨子的为人和主张，并要我们学习墨子，教我们一举一动都要有礼貌，要多帮助别人，以助人为乐，不要自私自利，强者不要欺负弱者，而要彼此和睦相安；那些互相攻诈侵扰，都是不义之举，必须坚决反对。

蔡和森同志不仅时刻督促我们用功学习，还对我们的吃穿等生活问题非常关心。我们的生活都由他管理。他还特别注意教我们锻炼身体。他说，如果没有强壮的身体，将来到法国去怎么能担负工厂的繁重劳动呢？他经常亲自带领我们进行体育锻炼。有一天早晨，我在校外练习打拳，和森同志看见了，很高兴，便向我说："细伢仔，你这几手拳打得不错呀！在哪里学的呀？"我告诉他说，是在五美乡观音塘小学，由陈章甫、黎升洲老师教会我的。他非常感兴趣地，要我又练了一遍给他看。

和森同志对我们管教是很严格的。他发现我们的毛病，总是马上批评。有时我们跑到荜桥镇去买点好吃的，或是自己到厨房用小铁锅煮点面条吃，他是不允许的；他看见了，就会严肃地批评。他总是讲只有吃得苦，才能成就大事业。以后到法国勤工俭学，生活比现在还苦，现在不刻苦锻炼，不养成吃苦的精神，是不行的。他对我们虽然显得有点严厉，但我们都很尊重他，愿意听他的话。在一九一九年初的旧历除夕，和森离开布里村去北京

的时候，我和几个同学到保定送他上的火车。他走后，我们都很想念他。我们在布里村共同生活了半年多的时间，我总觉得，他是我们一位可敬可爱的良师益友。

蔡和森同志走了不久，教我们法文的齐连登先生也走了，可能是去法国了。大概是由于教师缺乏，我们不少人就坐上骡子拉的大铁轱辘车，转到了保定市育德中学附设的留法预备班。因为人多，一部份住在育德中学校内，我和另一部分同学就住在西关一个破庙里。我们每天上午学习法文，下午就到实习车间学习钳工、车工、刨工等技术。

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教授法文的教员叫李广汉，他是第一批去法国的华工，也是布里村人。他的法文程度不很高，只会讲话，不会书写。这位先生还管理我们的生活，每天晚上都到庙里来点名，不准漏宿，白天也不准我们随便在城里闲逛。不然，第二天，他就要狠狠地训斥一顿，还要处罚你。我们每晚必须准时睡在木板搭成的大通铺上，一个挨一个地挤在一起，到熄灯之前，他就一手提个纸糊的灯笼，一手拿着点名簿子，走进宿舍，开始点名。他在每点一个同学的名字之前，都先用法语喊一句“Avez-Vous?”(阿威吾)，意思是说你在不在或有没有？然后喊名字。我们的曹度谋同学，对于李先生这种喊叫，很反感，总是小声嘀咕说，我们又不是小孩子，来这一套干什么！有一天晚上，李先生点完名走了之后，曹度谋爬在被窝里作了一首打油诗，说：“华工李广汉，手提纸灯笼，口喝‘阿威吾’，寝室来点名”。大家听了哄堂大笑，躺在床上很久睡不着觉。其实，这位李广汉先生，是一位很认真负责的热心肠的人，我们大家还是很尊敬他的。

在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教机械常识课的，我记得是刘仙洲先

生。

三

我到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学习的时间不长，大约有三、四个月。有一天，突然接到我父亲的来信，要我立即回长沙。我到长沙才知道，是要我陪同徐特立徐老坐船去上海，并嘱咐我在路上要好好照顾徐老，他要到哪儿去就陪他走到哪里。

当时，湖南军阀张敬尧实行残酷统治，剥夺了人民的任何自由和民主权利，而对教育的摧残尤其厉害。毛泽东同志等发起驱张运动后，徐老最为积极地参加了活动，曾亲自到许多学校去宣传，揭露张敬尧的罪行。张敬尧下令要逮捕徐老。所以徐老必须离开湖南。在一天晚上，我陪同徐老离开长沙，过洞庭湖，沿长江东去，很快到了上海。徐老的学生姜濬寰到码头上接我们，并告诉说，去法国的船票已经交涉好了，只等通知一到，就可以上船启程。这时，我才知道，是要到法国勤工俭学去了。

姜濬寰这个人，是一九一四年第一批去法国的华工，他聪明能干，活动能力很强，不知他通过什么办法，弄到了十五张法国邮船"波尔多斯"(Porthos)号的船票，而且每张只花了五十元光洋。他还请环球学生会的干事给我们介绍了法国的风俗习惯、礼节、吃西餐的方法等等。经过几天准备并照相留念之后，我们十五个人，在一九一九年九月底(或十月初)，就离开上海踏上了赴法远航的征程。

我们一同出发的十五个人中，除了徐老、姜濬寰和我之外，还有熊为奇、林权英、周照陵、黄坚、何光作、陈绥、陈毅生、黄琪弼、肖自乾等人。当时，徐老已经四十三岁了，已经教了二十多年中小学和高等师范，在湖南教育界有很高的声誉和地位。

但他总觉得自己的知识不够，很难作别人的老师，再不学习，而还要继续作下去，那不是欺骗学生吗？他认为小学中学是基础，基础不打牢固，将来学其他高深的科学，就更不容易学好。所以，他下决心，和我们青年学生一道去勤工俭学，增进新的学识，特别是要去国外考察教育，尤其是中小学教育，以便将来改造中国的中小学教育，他这种精神是很感人的。

我们从上海出发之后，首先经过香港、海防，第三站就到了西贡。到西贡时，天已经黑了。因为天气很热，我们十五个人就睡在船后边的甲板了。我睡在徐老旁边，他年纪大，身体又不怎么好，晕船呕吐得很厉害，我就预备了一个木盆子，放在身边给他接着，然后倒在海里去，再把木盆子洗净。第二天早上七、八点钟，当我们到下边的食堂端饭的时候，刚一下梯子就看见横七竖八地放着许多消防用的水龙带，才知道，这只船上昨天晚上失火了。据水手们说，是船上装着许多牛皮，不知什么人抽烟，不小心失火，烧坏了船头，需要修理，还得等几天才能开船。

当时，西贡市有一个著名的华侨中学，听说徐老在船上，他们的校长、教师便上船来接徐老，非要徐老到他们学校去住几天。结果，由我和姜濬寰陪徐老到了华侨中学，受到了全校师生的热情接待。学校请徐老讲演，还请徐老题词。徐老说，就写“威震南关”四个字吧。因为我们的陈绥同学毛笔字写得好，徐老就让陈绥代笔。那时，越南已沦为法国的殖民地，徐老要写这四个字可能是教人们发愤图强努力重振国威的意思。

我们在西贡华侨中学住了十一、二天，波尔多斯号邮船修理好了，便继续起航向西前进了。临上船时，华侨中学的校长和师生们抬着一大串一大串的香蕉送上船来，给我们在旅途中吃。我们大家自然是非常感谢的，而华侨师生们对我们在异国相逢的无

限喜悦和亲如骨肉的同胞情谊，却更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我们离开西贡之后，经过新加坡，穿过马六甲海峡，在宾朗屿稍事停留之后，就开始了越过印度洋的航行，中途到过科伦坡，然后到达印度洋西岸的吉布提，再穿过红海，又通过苏伊士运河才到了塞得港。每到一个港口，我们就急急忙忙跑到岸上去玩。我记得，各个港口都是商店林立，人来车往，热闹得很。许多人西装革履，也有不少人破衣烂衫，伸手讨钱。所以，那些城市，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美好的印象。

离开塞得港之后，我们在地中海的突尼斯海峡看到了西西里岛上的埃特纳火山的爆发。那种景色极为壮观美丽，是人工所难以制造出来的，它给了我们以美妙神奇的感觉。

我们同徐老一起，就是这样在海上航行了两个月的时间，大概是在十一月初，才到达了法国南部的马赛港，结束了海上漂泊的生活。

四

我们到马赛上岸之后，先在一个营房里住了五、六天，然后到巴黎由新民学会会员肖子昇招待我们住在克隆布华法教育会的房子里。不久，我们六十多个中国勤工俭学生，就被送到巴黎南部的木兰省立公学专门学习法语去了。

木兰公学为我们专门开办了一个中国学生班，由法国人罗西诺勒 (Rossig—nole) 先生教授法文。在这里学习法文的过程中，徐老那种虚心好学，不耻下问，甘当小学生，刻苦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给了我们青年人以极大的影响。当时我们有人对他说："你年纪大了，要学法语，是很难的。"徐老满怀信心地说："我

今年四十三岁，一天学一个字，一年可学三百六十五个字，七年可学二千五百五十五个字，到了五十岁时，岂不成了一个通法文的人了吗？假若一天学两个字，到四十六岁半，就可以学通一国文字，我尽管笨，断没有一天学一两个字也学不会的。”还在去法国的航行途中，不管海上的风暴、颠簸，也不顾身体的疲惫、呕吐，徐老就一直坚持要我们每天教他学会几个法文单词，他反复地念呀，写呀，学得十分认真。到了木兰公学则更加日以继夜地刻苦攻读法文了。我记得那时他把许多同音异义的法文单词，写在手掌上或纸片子上，走到那里念到那里。例如，法文的石灰、白菜、热，都发“木”的音，他就把法文的“木”字写在手掌中间，把石灰、白菜、热，三个中文字写在周围，一边走路一边背读。他对我说，这样可以一举三得，背一个音就记住了三个字。徐老有时就连作梦还在背法文单词呢。

徐老后来谈到当时的情景说：“我小时只读过几年私塾，我的一点知识都是从半工半读，边教边学中得来的。一般人都说年老者不能求学，年老的人多半在社会上有些权柄，倘若全不求学，社会上受害就不小。所以我不怕人家笑话我是‘扶拐棍的老学生’，四十三岁还决心到法国去勤工俭学。和我同去的都是青年，有不少是我的学生，其中有位熊信吾，应喊我做太老师。我与他同学，等于降了两级，还要向他们学法文，变太老师做学生，这不难为情吗？但我当时想，从前学问很少的时候，当了老师和太老师，教人家，还要得人家的学费，这本是可耻！到了法国，法文一字不识，如果因怕失了旧资格而不学习，岂不更加可耻吗？只要学生不嫌我老大，肯教我法文，我就算年老，也是个进步的老人。”（《中国青年》1958年第五期）事实正是这样，徐老年纪虽然大了，但他的精神却总是朝气蓬勃永远向上的。

我们在木兰公学学习了六个月的法文之后，就分头到法国工厂去作工了。我被派到法国南部雷夫列夫铁工厂当工人。在这个工厂作工的中国勤工俭学生有鲁观成、熊云甲、胡封岳等三、四十人，其中的熊云甲曾在湖南大学读过书，他在工厂是技术最好的制图员；此外还有五、六十名华工，我们在工厂的领班就是上海去的华工张师傅。在工厂的一个很大的院子里面，有三、四十栋木棚，是我们工人的临时宿舍，每栋木棚子有十多间房子，每间房子可住三、四个人。大院内还有简易食堂和消费合作社。我们有的人吃不惯外国口味的饭菜，就自己买煤油炉子，在屋子里做中国饭菜。我们每天工作八、九个小时，可以获得十——二十个法郎的工资，在星期天或节假日上班，还可以得到双工资。这样每作一天工，就大约可以维持三天的生活。

我到工厂之后，专门负责磨刀具。因为工厂女工多，她们只会用刀，不敢自己磨。我干了三、四个月的磨刀具的工作之后，又被调到装配车间当了钳工，专门制作汽车和煤汽机零件。

当时，徐老在圣侠猛一个铁工厂也当钳工。圣侠猛是法国的煤铁矿区，工厂很多。我曾到那里去看望他老人家，还跟他一起到巴黎哲人厅参加过反对向法国借款的大会。我记得，在那一天，许多勤工俭学生和华工，聚集在哲人厅前，要中国驻法公使陈箓，当众说明借款情况。陈箓本人没有到会，只派了他的秘书出席，那个秘书在台上说了些不三不四的话，根本不承认有借款这件事，还说什么，你们是来法国勤工俭学的，好好作你们的工，专门读你们的书，不要管政府的事情。当这位秘书讲到这里时，坐在靠近讲台的一位叫胡育的湖南同学，猛然站起来指着台上，大骂“混蛋！放你的屁！”“我们都是中国人为什么不能管中国的事情?!”胡育同学一边大声怒吼，一边顺手抄起他的坐椅，朝

讲台上摔过去，并喊道："打死你这个卖国贼！"他这一喊，台下顿时响应，大家都高喊"打这个卖国贼！"会场立刻乱了起来，我怕碰伤徐老，就拉他离开那里，我们一到门口，就见有许多警察在街上，如临大敌。徐老愤愤地说：警察可能要抓人了！但徐老毫不畏惧，在街上站了许久，见没有动静，我们才最后离开了那里。

五

在留法勤工俭学的道路上，遇到的困难是很多的，而且也是各式各样的。

我在雷夫列夫铁工厂，本来是尽心工作的，不料由于工厂裁员却把我解雇了。于是，我跑到维西，去干修理火车头的工作。过了半年我又失业了，只得回到巴黎住在克隆布的帐棚里，每天从华法教育会领取一法郎的维持费，那些天我就只能买个面包，喝点凉水过日子。有时，我和几个失业的勤工俭学生，就站在巴黎的大街上，见到卡车，就上前去截住，问司机要不要装卸工，有的司机说要几个，我们就爬上车去，给人家装车或卸车，干完之后，随便由人家给几个法郎。我们就是这样打游击，混饭吃，"俭学"读书的事就无从提起了。

恰在这时，我遇到了法国天主教神甫雷鸣远。

雷鸣远是比利时人，长期住在中国，加入了中国国籍。他曾在天津创办了《益世报》，宣扬他是中国人，也爱中国，有时在报上也替中国说几句好话。后来，他被法国驻中国公使馆给赶回法国去了。据说原因是为一块界碑的问题。原来在天津老西开那个地方，有三种地段，一是法国租界，二是中国管辖区，三是三不管地段。在这三种地段的分界线上，都埋有地界碑。在中国地段

上有一座大教堂，后来发现地界碑移动了，使教堂划到了法国租界之内。雷鸣远当时住在教堂，他证实说，界碑是法国人移动的。这一下子可触怒了法国人。于是把他召回法国受到大主教的严厉责备，并要他在教堂内悔过，不准随便出入。后来，他从教堂出来，就利用这作资本在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和中国华工中大肆活动，表示同情勤工俭学生，可以帮助找学校或找工作。他还声明说，只能给介绍教会学校，可以去免费读书，而信教与否则可听便。听了他的宣传，便有一些青年被他吸引去了，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大约是在一九二二年六、七月间，我通过谢仲刚的介绍认识了雷鸣远，他表示可以送我到背利哥公学去学习。当时，雷鸣远成立了“中国学生公教家庭”的组织，在巴黎、鲁文、列日都有这种组织，我曾经也去过几次，主要是去看书报、下棋、打台球、打扑克。我这时就很厌恶谈政治的人们了，只顾专心读书学技术，同他的什么公教组织，我也不谈政治问题，起初只觉得象雷鸣远他们那些人给我们介绍学校，帮助解决生活问题，但是并不认识他们是为了把青年引导到脱离革命的邪路上去，以抵制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当时，一方面是我没有认清他的真面目，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生活困难，因此，就想去进教会学校。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徐老，徐老生活也极其困难，便说，能解决生活问题，还能学习，你愿意去，就去吧，由你自己决定。这样，我就离开了徐老，进入了教会学校——背利哥公学。

本来，我在五四运动的革命浪潮推动下，跟随徐老这样中国少有的革命老前辈，参加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但却没有象其他同志那样迅速走上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而是埋头于科学技术，不问政治，陷入了单纯业务之中，从而走了弯路。

我到背利哥公学学习了三年之后，在一九二五年又考入了比利时布鲁塞尔工艺学院航空系飞机制造专业。这所学院座落在比京郊外一个大森林里，环境十分幽静。我们在学校是半天上课学习，半天到工厂实习。学院的实习工厂规模很大，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工作母机。我所在的系，就有十多架飞机供实习之用。这时我与比利时同学一起住在学院的宿舍里，一切费用都是由华比委员会从庚子赔款中付给，生活条件就好多了。

我在工艺学院学习了三年之后，到一九二八年七月毕业时，获得了工程师的学位。随后，就被分配到比国交通部奥斯坦德(Ostende)飞行学校又学习了一年飞行和导航。这时，一切费用仍然是由华比委员会从庚子赔款中付给，这所学校就在靠近海边的比国最好的避暑海滩附近，环境是很幽美的。

我从奥斯坦德飞行学校毕业之后，由老师布勒(Boulet)介绍到比国沙卜卡(Sabca)飞机制造厂去工作，起初当实习工程师，做飞机装配，发动机试车的工作。一年之后又调到总工程师室担任助理工程师，负责飞机检验工作。

到了一九三二年冬天，当时中国的伪实业部工作考察团去欧洲考察。他们参观比利时的沙卜卡飞机制造厂时，正巧我就在一架飞机的座舱里检查仪表。他们看到我就问，是中国人吗？我回答说，是呀！其中又一人问我，你是熊信吾吗？我一看，原来是沈宜甲先生。他便约我到公使馆面谈。我到公使馆之后，他告诉我说：中国正需要你这样的人。于是在沈先生的催促之下，我在一九三三年元月，离开比京回国，三月初，才到达上海，回到了阔别十四年之久的祖国。

我回国之后，又经过了长期的学习直到一九五六年，我才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时，祖国已经获得解放，社会主义改造

也已基本完成，新中国正如一轮朝日升起在东方，而我却才开始了新的航程。

（徐建源整理）

华法教育会与勤工俭学生

（一九三二年八月）

盛　　成

勤工俭学生，在中国，在外国，几乎同共产党，同流氓的意义差不多；然而勤工俭学生中非共产党者居大多数，惟青年热血，有时过度，则难免耳。

以我看来，勤工俭学生，简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可怜虫。然华法教育会呢？

华法教育会在巴黎已有两个：一城内，一近郊哥伦埠。在中国，有北京、广州、上海各处的分会。

巴黎城内的华法教育会与其他的华法教育会不生关系。会长欧乐先生有一天对我的老友白理爱先生说："那勤工俭学生事，完全是李石曾先生管的，我不能负责，因为与我无关。"

巴黎近郊华侨协社里，粘有华法教育会办公处的字样，墙上挂出总书记李先生的来信：

"……劝诸君稍安毋躁……此番回国专为诸君谋……将来'里大'……诸君工学不成问题……"石曾。题不题那上海与巴黎无关的华法教育会和那一位姓沈的。害煞了多少由内省不远千里而来上海的青年，送出了多少不合资格的勤工俭学生。题不题在这位姓沈的之前，那位姓洪的，苦学生头上，也可以大揩其油的。

可怜青年学子，那知世味酸咸。拜读吴先生鼓吹勤工俭学的文章之后，逼迫父兄，卖换家产，去到上海而出洋。

由内省到外国，厘金卡儿太多。到了巴黎，都成穷措大。华法教育会所能供给勤工俭学生的，一是地板、二是布棚、三是维持费。

布棚，是法国上议员于格儒先生的美国夫人名碧细送与中国同学的。维持费的来源，极其复杂！由中法两政府的施舍，一直到俭学生的存款都有。

布棚。

想起了这座布棚，好象引起了我天方夜谈之一千零一夜中的佳话。那夜大雪。雪下坠，我早起的时候，正一头顶上去。有一位同学也同时如此。我笑对他说："我们和希腊古宫人柱一样。"他也笑回我说："焉知我们不是中国将来的柱石么？"这说话的是谁？是四川有志青年张侠逸。可惜他死在医院了。

布棚中既窄狭，又多人。所以天天希望去做工，脱离这倚赖生活的维持费。忽然间，门前挂出了一个新闻。有八个工位，要考。天啦！考什么？四个四川人，全考上了。当时代理总书记是四川刘先生，外号刘督军。会计是四川向先生，外号向省长。

那时同学心理都极端崇拜李石曾先生，虽是华法教育会办事人有不满人意处，李先生牺牲为怀，竭力代我们奔走。他日之"里大"即是乐园；今日暂时受苦，方可作他日之代价。

有一天，我遇着李先生从前的书记继伦女士，谈到勤工俭学与李先生。她说："李先生人是好人，可惜做事，有头无尾。昨日事今日忘，今日事，明日忘。计划千千万，有始有终者无一个。"当时我极信仰李先生，我对继伦女士说："你是社会党报纸《人道报》的记者，所以你不满意李先生！"她说："李先生与我，都是无

政府党。却是我这无政府党，绝不和外交部第二公事房中的人来往的！”

继伦女士不知道东方的文化与逻辑，所以误会了李先生的外交。继伦女士的为人，非常直率。欧战万险中卫护了她的爱人德国画家一位无政府主义者！

当时我非常愁闷。因为知道了华法教育会与工厂无联络以及华法教育会找工的方法！一礼拜中办事人乘包车去会工头，找了几个工位，就来耀武扬威的考同学。住大旅馆，饱享“三美”的幸福！他们同我们布棚中的生活，相差太远！然则他们不曾收入勤工俭学生马赛初到的二百方厘金么？

我正在恨闷之中，忽然接到年哥——盛白沙——寄来粤币百元。可亲可爱之年哥面目，却在一张汇票上含露着。

我去也，再见罢，布棚！

到了万多门，进中学，再起头念法文，学数学。

我自从“五四”以来，心散神驰，一时收敛极难。野花家植，自非一朝一夕之事。所幸那乐尔河曲曲悠悠洗去了我不少无端的惆怅！早六时钟鸣即起，寝室中有五十多人。饭堂分内外两间。门前有巴尔沙克的铜像。万多门、龙沙之桑梓中学，巴尔沙克曾读书其间。法国诗祖，当推开宗音律的龙沙！法国文豪，虽说服尔德派称正宗，但是巴尔沙克在世界思想上，足可代表法兰西文化。可惜法兰西人不悉世界人对法兰西文坛之真正的观察。俄国道斯陶以也渥斯基出世后，巴尔沙克之名益彰。将来之巴氏，或可代服尔德而领袖法兰西与世界文坛也。此其间，不过怀疑派与笃信派之分耳！

乐尔河直穿中学，分全校为两部。河东与河西。花园占四分之三。校长与监学，视中国学生与法国学生无异同。管理至严，

不能自由出入。法国学生，确少自治能力。欧洲社会，没有法律，真无天日。法国中学，没有监学，学生要造反了。自治的能力，是华人的特长。中国虽无政府，人民并不觉得。因为道德的训练自祖先以来已含在遗传性里。中国的文明，幸而是非法治国！

枫丹白露同学组织一个游艺会，宣传中国文化。海外听琴声，自不少低头远想！而拿翁故宫，却引领望我。

春假，巴黎华法教育会开勤工俭学谈话会。万多门中学委我代表列席。当时讨论工学同学出校入厂之问题。忽然间文牍萧先生宣布李石曾先生最近由国内来函。并报告里昂中法大学之经过。萧先生得意洋洋，刘先生、向先生皆喜形于色。全场菜叶面孔的勤工俭学生，气为之振！

钱用尽了之后，跑回巴黎找工。华侨协社，新到同学，比前更多，不说布棚没有空位，即是新开辟的地窖子，也无缺额。

所幸我自己出去跑了不久就找着了工。才知找工不难，并不要手艺，只要舌头滚出几个洋字出来，让人家听得懂，杂工“马老五”*有的就可做了。我起初在巴黎火车站旁边一家木工厂里找着了工。去的时候，填了合同签了字，管理人验了我的居留证。然后听说：“去上工吧！”

搬木头，扛木头，顶木头。不要手艺，倒要一副硬肩背，倒少不了一块大好的头颅。第一天，做了六点钟。回来倒在床上，饭也不想去吃，连大小便都懒得起来去解。一刻闲都是好的。今而后才知祸福苦乐，是没有绝对的，完全比较中来的。是没有理想的，完全是血汗的结果。第二天，清晨五点半，那无情的闹钟喻喻不住的来叫，好似说：

---

* Manoeuvre 之译音

“起来，穿衣服，去上工厂！”

我却来去的思索，看去好还是不去好？一想起了布棚，连想起了地窖，再想起了那维持费，扑突！我起来了。

冷水、面包、可可糖，接连咽了几咽。北风儿，你吹我吧！我不抖，也不颤。

穿上工衣，好冷！

工头来了：快快做！

经理来了：快快做！

厂主来了：快快做！

我这才辨别出来工人与资本家是两个阶级，一上一下，一压一抗，彼此相争不让而成的阶级奋斗！工头与经理不过是中间人物，帮助资本家来压迫劳动阶级的。

我每天晚上，工余之暇，遂专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克罗泡特金的《革命者的话》、《面包略取》以及其他社会学说的丛书。渐渐的我遂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信徒而倾向于无政府方面了。

忽然间，木工厂无多工作，歇工。工人全都站在马路边步行台上喝西北风！工厂出品至多，出品销场至少。往返不能周回，工厂因以停闭。欧洲大多工业，都是如此，畅出奢侈品，造物不问生产与消费，有无关系；只要一时有大销场，立刻千千万万的大批造出。与日用消费品有妨碍与否，这不是资本家所可意料而计及的。不过一旦市场充满，货不能销，资本家关上厂门贴出“歇业”两字就完了。他已发了横财，再去另开工厂。这里有手艺与无手艺的工人，同是一样的饿肚子。

这种工人不安的现象，在欧洲遂造成极激烈的阶级奋斗，社会的均率，因生产与消费悬殊太重，再也无法还原。而奢侈生产，破坏生产原则，比日用消费，高出万万倍！简直是物不应需！

资本家欲求补救方法，遂实行工业团集与资本合一。几家小店合成一家大店。几家小工厂合成一家大工厂。粮食公司说卖多少钱一石麦子，少了一文也买不来。粮食公司要叫巴黎人饿肚子，巴黎人只好饿肚子。

资本组织，既稳固而又完备，对我们这种东方无组织的国家用经济来殖民，我们能有命活下去么？他们把我们的麦子、稻子，一切粮食与布帛以及造屋的铁、石、砖、木，用极廉的价买去，操持他们自己国内的商场。他们将奢侈品运给我们。饿了不能当饭吃，冷了不能当衣穿。我们的均率自然大变，我们的社会如何又能安宁呢？他们反说华人好内乱！

然而欧洲资本制度就永远能不摇不动么？等到民众无衣、无食、无住之后，阶级战斗成为最烈事实。资本家不能销售集中的产物，经济不能轮还，资本制度之末日，可要到了。

我敲了一下门，里面有应声说：

“进来！”

“吴先生，我特来看你。”

吴稚晖先生新从国内来，——民国九年六月——大家都以勤工俭学的耶稣救命主到了。我正去看他。

他的神色，倒有一些儿不自在，他来，他不是办里昂中法大学来的吗？他来，他不是替我们勤工俭学生来解决工学问题的吗？昔日鼓吹勤工俭学的吴先生，今日来实行解决我们水深火热中的工学问题。

吴先生，我致敬你！你是我们的耶稣，你是我们的上帝！

他说：“华法教育会是李石曾办的，里大是我办的。”

又说：“我吴稚晖的里大，与他李石曾的华法教育会是没有丝毫关系的。你们勤工俭学生要去找华法教育会。将来要进里大须

报名投考。”

这一来，我们才知他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可怜虫的勤工俭学生竟是广州政务总裁会议席上的牺牲品！

吴先生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此番出来，在兴办广东大学的海外部里昂中法大学之外，自然也有一桩心愿要还的。

帮帮勤工俭学生的忙。既然吴先生也是华法教育会的会员。我们勤工俭学生没有能力来使华法教育会向我们报账，也没有能力组织勤工俭学生会的评议会，请吴先生帮忙，他立刻允许了。他晚上到我住的巴黎客寓里来，和我谈了好久，关于华法教育会以及勤工俭学生解决的问题，我对他备述其详。

华法教育会办事人迫于吴先生之命，只有召集勤工俭学生大会。在巴黎哲人厅举行，人为之满。开会后，华法教育会办事人李璜先生叫我做主席；而勤工俭学生方面则公推吴稚晖先生。吴先生就主席位之后，有一位四川人起立向我质问道：

“盛先生，李石曾先生给你多少钱来办勤工俭学生会的？”

我还不曾有时间回答，但听得一片合奏的声音答复道：

“华法教育会的走狗！”

全场秩序大乱。吴先生竭力维持秩序。一片声音：

“报账！”“报账！”

刘先生登场，说了几句话。只听：

“报账！”“报账！”“报账！”

账如何报得出呢？从来写账之时，就随随便便。到了结账之时，个位、十位、百位、千位、万位，都弄不清楚！勉强总计起来，差得太多！好歹从前写账之时，不过自己骗自己，是梦想不到要报账的。谁知中国光复之后，人民思想大变。而自“五四”以来，简直不能“混账”了。

华法教育会既不能报清账，勤工俭学生会有自治的必要，大家议决组织评议会，责成华法教育会召集。另外请电上海停止再送勤工同学。

吴先生无话再说，回国去了。随后华法教育会仍然是华法教育会，勤工俭学生还是勤工俭学生。国内华法教育会还不断的一批一批向法国送。勤工俭学生的问题，愈不可解决了。

同学方敦元拳打华法教育会书记刘先生，同学看了这出全武行，觉得痛快!

刘先生辞职养病他去。

……

华法教育会中国会长蔡孑民先生来法之后——民国十年五月——住在里昂，发去中国的一个电报。这个电报的译文是：

“……既无勤工之志，又乏俭学之能……”

他宣言说：

“华法教育会与勤工俭学生脱离关系!”

早一些宣布也好，迟一些宣布也好。在华法教育会未组成勤工俭学生独立评议会之前，在华法教育会陆续送来同学至一千多人之后，华法教育会对于勤工俭学生负的责任到了无以复加，那时蔡先生来宣言与同学脱离关系。

同学王演绘死在旅馆，二日，无人过问，领事馆推公使馆，公使馆推华法教育会。华法教育会说：“我们与勤工俭学生脱离关系了。”王君王君，你何不幸死在这个时候，你又何不幸生在这个时代?

同学张侠逸在医院手术后调治，闻华法教育会与同学脱离关系，连医药费一并脱除，遂迁居平民医院。病转剧而死。张兄张兄，伊谁杀汝?

我不批评华法教育会，我但说勤工俭学生来法后之死亡人数在二百之上——吃菌子死的、吃炸白薯死的、失踪死的、肺痨死的、疯癫死的。

天主教青年会都来救济流落海外的苦学生。

法国外交部也来组织中法维持委员会，广行慈善事业。后来改成中法友谊会。机会极好利用，出钱即可收买洋奴！

民国十年正月，陈箓公使也正由国内来法，听说他与李先生意见不合，但倒有心来帮忙。

勤工同学不曾吃教饭的都聚集起来，去公使馆要求生存权与求学权。那华法教育会维持费是再也领不到手了。

向警予女士哭哭啼啼的叫出：

“生存权！求学权！”（共值几百方一月。）

那“二八运动”，即二月二十八日完全如同一群丧家之犬，无路可走，声声狂吠。泰山的华法教育会既倒，危卵的公使馆如何抓得住呢？……生存权！求学权！几百方一月？……

陈公使已允立刻将全体送进学校，并允四百方一月维持三月，静待北京政府回信关于善后办法。同学怕“公使滑头”，不肯让步。有叫“打”者！陈公使已由法国警兵保护出使馆。千百同学，被枪把及警棍乱击抱头鼠窜，退出公使馆，呜呼，治外法权！

有的同学，与警兵对打，当时巷战至久，才退到塞夫方园。中法大战尚未解决，法国方面派出维持巴黎治安最有名的警备马队来毒打徒手同学。伤者无数。“五四”，中国学生与中国军警冲突，“二八”，则中国学生与法国军警战斗。谁敢再说中国人怕外国人。

同学王木，跑回哥伦布走到曲路口被电车碰死。有的同学拾

得他一块血淋淋的心，放在火酒里面，以作“二八运动”失败的纪念！

北京徐总统送了法国一份隆重的礼物，巴黎大学也就报答他一个名誉博士。徐总统特派专使朱启钤来办理授受。——民国十年三月——同朱专使来者，有吴鼎昌。巴黎同学极关心吴之使命。听说来交涉借款五万万元。后来在哲人厅开华人大会，——同年六月——请陈公使出席答复。使馆一等秘书王曾思代陈赴会答复，不得结果遂被打。

陈公使先后电回国内，都说勤工俭学生乱打人，以致国中父老把我们都看作流氓，再也不来接济可怜虫了。唉！里大！唉！华法教育会！唉！公使馆！

我暑假中由萧梅腊做纺丝工出来到里昂预备去参观生丝检查所，住在圣意乃纳山上协和饭店内，对门就是“里大”。

闲时也遇着褚民谊先生，谈东谈西，偶尔说到勤工俭学生与“里大”，他说吴稚晖先生的话：“里大与勤工俭学生是没有关系的，你可对同学说说清楚。”我望了他两望。这是民国十年九月初。

忽然九月十九日李隆郅——李立三——从克鲁索来了，对我谈道“里大运动”经过情形以及巴黎同学要来里昂种种。我当时对李隆郅说：“里大运动”与我个人毫无利益，我是不愿来里昂念书的。而且我反对这种与会馆相同的一座“里大”宿舍。不过在道理上说来，我应该加入这种运动。但是要依我下列三个办法：1.大队同学暂不来里昂；2.代表先到，谋与“里大”办事人开对席会议；3.在里昂舆论界作运动，择日去见爱里友、穆岱、雷朋、古朗等人，引起同情。假如不是如此，我立刻脱离运动。李当时允函达巴黎同学。

忽然间李接一电，二十一日早晨，巴黎大队全到，占据“里大”，李急找我办交涉。去见罗因省政府代表，与叙“里大”运动来源。他说：“刚刚你们发去公使馆一个电报，说你们被军警包围，今晚有极大危险，这电报是不是你发的？”我简直莫明其妙。旁边的褚民谊先生插进来一句话：“问他，是不是陈公使发车费叫他们来的。”

我这代表关在闷葫芦里，不得已去问总代表赵世炎，他说：“再不来，大家就要散了。”我再问李隆郅，他才把陈公使叫同学来占“里大”的情形对我说了。我登时发气道：“我确再也不过问了。”李回说：“正好利用官僚！”我遂离里昂！

后来听说代表全逃走了。只有李隆郅同一百零八同学一齐被武装军警两个押解一个学生，如同遣戍囚人，离开了法国回中国去了。巴黎方面，那时有陈箓、有章行严、有吴稚晖都竭力来帮勤工同学忙的。勤工同学走的时候，——十月——正是国内新招来的同学到里昂的时候，他们命运的悬殊，就是广州政务会议席上的一句话。究竟什么是里昂中法大学简称“里大”的？不过是旧炮台上盖了几座新房子，化去七十万元，定了九年合同的一座中国学生寄宿舍而已。后来听说褚先生也被打跑了，吴先生也被赶走了。外国人花弧中将代理校长，——究竟是舍监是校长，必也正名乎？

民国十一年二月，巴黎出了一件怪事：李鹤龄枪击陈箓公使。李鹤龄代被押回国同学报仇，枪击了陈箓公使。这个李鹤龄是清华学生，人长得极漂亮，英法语又极其熟练，爱运动，同学多与为友；惟家境极寒，志气倒不小。为报复被遣解同学之恨，辗转介绍得为郑毓秀女士的秘书。郑女士家里女同学极多，而宴会也多。公使、专使、南方北方的外交伟人，庭为之满。那天，

在陈公使偕某君出郑女士寓所时，李鹤龄乓乓乓三响，枪虽未伤陈公使，却吓坏了人不少。某君肩头开去了一块，他对人说："我再也不敢去郑小姐那里了。"

一部勤工俭学史，非常复杂，不过我简单记出有关于全体的一些重要事实。

"里大运动"虽说失败，确是成功，何以故？勤工同学从此得了一桩极大的教训：天上飞的雀儿肉，我们这些苦命的蛙儿是吃不到的。

从前做工是一个名辞，勤工俭学是一段故事，大多数同学的心理，都以为那苦的工，中国学生如何做得？得这种苦工钱，去求三四年的学，那岂是可能的事！因此去争"生存权"与"求学权"，酿成"二八"与"里大"两个不幸的大运动。有一部分同学，主张实事求是：既来勤工，就该好好的去学习，勤勤的去做工！

"里大运动"失败之后，维持勤工俭学生的机关，只有教育会与外交部合办之中法维持委员会，同学中有不少耻食嗟来之粟者，则去做工。

此番入厂的同学，大都矢志勤工，手艺既精，法语又熟。各工厂都十分欢迎中国勤工俭学生。我们却感激蔡、李、吴诸先生提倡勤工俭学运动之成功了！

民国十一年秋，北京政府汇交巴黎华法教育会分给勤工俭学生款项十万元。——听说这笔款子是李石曾先生奔走多时的结果。那时正是直奉战争之后，徐世昌退位，黎元洪复职，王宠惠代理内阁，李先生拿自己的车费代我们奔走，我们非常的感激李先生。

平时并没有勤工俭学会，同学听说款到十万元，立刻组织勤工俭学会，同学任卓宣被举为总书记，遂发生共产党把持总会的结果。

平时也没有华法教育会，实际就是一所转信的机关，李卓走后，是弓镠在那里；后来是杨鹤川，遂发生青年党把持华法教育会的事实。

十万元到，华法教育会也有了组织，来管理分配，与勤工俭学生发生关系。蔡孑民先生也不能料有今日。

华法教育会当时的书记，是高阳李光汉先生，他与法国上议员于格儒先生就组织了一个分款委员会。于先生与碧细夫人爱中国文明之心，人所共知。他们喜欢帮中国人忙，更乐于帮中国苦学生的忙！于先生在分款委员会不过挂名而已。后来李光汉先生竟将一部分公款买成马克，希图获大利！同学全体不得已去见于先生，并加警告。于先生急得泪下，说道："我是好心好意的来替中国无恃无怙的苦同学帮忙，从来没有拿过一文钱，你们现在倒要到法庭去告诉我侵吞苦学生的款项。我年已将七十，两个儿子阵亡，发白的人不曾到过公堂去对证，你们现在还叫我去到那铁栅子前面去做被告么？"说毕不住的流泪！

中国人的笑话，引起外国人的哭诉，总不算坏！华法教育会的书记李先生算走了。带去德国的马克千千万万，不过纸卷一堆而已！

当时勤工俭学生总会，组织极好，调查各同学的履历，亦极认真办理，审查勤工俭学的资格，汇造成册。各省勤工俭学会协同总会办理此事。各省勤工俭学会亦分头向各省运动省款，同学各人，已有不少存有储蓄。较之昔年，人人都喜形于色，人人都想代"勤工俭学"四个字增光！

可惜党派运动，极其激烈！共产党、学青年会与天主教以及法国外交部来收买勤工俭学生去念马克思的列宁主义，服从莫斯科第三国际的命令。于是乎有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以及候补赴

俄的共产青年团。与共产党针锋直对的有国家主义的青年党。其外有共同反对青年党的社会民主党以及工余杂志社的无政府党！后来才有国民党。

一个堂堂的勤工俭学生总会，为苦同学解决终身问题的机关，遂变成海外中国的政治舞台。你这一党来把持，他那几党联合起来反对，甚至于常演出一些全武行！

好了，共产党大多数去俄国，没有人再来把持总会，勤工俭学生总会遂亦不幸消灭了。

那末，最后，要说到民国十五年勤工俭学生争分庚款联合会了。争分庚款的运动，始于蒙白里同学，当时朱洗发起。他说："明知不可得，但不能不争。"我赞成，诸同学附议，遂组织蒙白里勤工俭学生争分庚款会。他们推我做书记，并举我去巴黎筹备联合会的事宜。一面通信各地，劝其组织分会。我到巴黎后，立与诸同学接洽；而党派分歧，极感困难。所幸我是无党，而又高唱以勤工俭学联合同志。当时青年党的态度怀疑，国民党有三处：一、三民派；二、南京国民派；三、汉口国民派，都主张一致争分庚款，极力赞成；共产党人数已少，雌伏在汉口国民派中，争款赞成，不来合作的；社会民主党与无政府党均竭力助联合会之进行。

各地分会，先后成立，巴黎各地分会，亦按区成立。此次打破各省勤工俭学会的模型，组织各地同学分会；又打破勤工俭学总会的把持，组织联合会，向各处进行，做争分庚款的运动。先造名册——《东方杂志》上曾发表过——审查结果，汇写五本。一呈法外交部，一寄北京庚款管理处，一留法使馆，一交穆岱先生，一存联合会。当时我与郑延穀同为联合会书记。

李圣章先生来了，由里昂到巴黎；他来向勤工俭学生摆一摆

架子，闹一闹脾气，就走了。

法国方面，已运动成熟，外交部里人已满口应承，下议院中各地议员由各地同学分头接洽，都允帮忙；而穆岱先生问分给的方法，我们说："入学者支款。"法国报界亦极帮忙。两处报纸，将我们的宣言登出，并加极钦仰的批评。罗曼罗兰更有信来奖励同学。

当时有一种传单，现译如下：题为"我们是些什么人？"

我们，勤工俭学生，昔日在中国，曾在北京、南京、广州、上海各大学，各高等专门学校，各省中学校毕业。我们到法国来了之后，腰中无钱；但我们的希望，是来求高深学问的。因此，我们首先矢志勤工，我们已经做了好几年的工作，现在还在下列工厂做工呢：西特罗思、娄暖、毕尔里埃、义斯巴洛瑞沙、劳伦、法尔曼、安里友、巴提牛、地雍补同、白松电话公司、于庆松以及其他诸公司，以上在巴黎。在外省：就在雪乃带尔大厂、克罗索总部，费尔米尼、奈威尔、哈佛尔、圣德田、圣沙门诸分部；在窝休省，力尔、罗昂、里昂各织厂，葛洛布纸厂，凡尔赛的苗圃，天蓝岸的花园，大西洋上的沙滩，乐么的田庄，蒙白里的农场，里昂的植物园以及其他各处的田园。

我们，勤工俭学生，做一极短时期的学徒后，遂变成有手艺的工人，或工头，或画图，或工程师助手，以及其他职务。

我们矢志勤工之后，得下了的工钱，储蓄在一旁。然后我们去进学校，进大学，入专门。差不多法国各著名大学、专门皆有中国勤工俭学生的踪迹。比如巴黎大学、史太师堡

大学、蒙白里大学、力尔大学、葛洛布大学、里昂大学、土鲁司大学、南锡大学、娄纳大学、克来孟大学，以及其他各大学，比如国立高等农业专门学校、格力农、蒙白里、娄纳；巴黎农学院、多埃农业工艺专门学校、凡尔赛国立高等园艺专门学校；巴黎高等矿业专门学校、圣德田矿业学校、各国立工艺专门学校、里昂中央学校、南特宝利太克尼可学校、北方工业院、葛落布电术院、葛洛布法国造纸专门学校、南锡高等林水专门学校、圣锡尔陆军学校、巴黎高等梁堤学校、高等电学校、国立艺术专门学校，以及其他学校。

我们大多数勤工俭学生都在农业、工业、或商业实习学校毕业，或是在都埃与亚赛矿工学校毕业。

有许多是已经得了硕士，其余的已将要得了。

有几位已经得了博士，回去在广州、南京各大学当教授去了。

有的在欧洲大学做教授的助手，有的做专门教授实习的主任。

要谈到专门人才呢，勤工俭学生中可分两种：其一、纯粹科学人才；其二、应用科学人才。

其一、有地质人才、植物人才、动物人才、生物人才、数学人才、物理人才、化学人才、地理人才，以及其他各种人才。

其二、有电气工程师、农学工程师、机械工程师、化学工程师、矿务工程师、梁堤建筑工程师以及其他工程师。

其余的学文学、艺术、法政、医学与药学。

以上种种，不过欲以简单的文字将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经过一切实在的情形写在极短的篇幅上。总之，勤工俭学的

宗旨是来研究欧洲文化，尤其是法国文化，希望将来回东方之后，改进中国的命运。无论如何，他们是中法亲善与中法友谊的建筑者，在工厂里，与工人共生活，在田庄里，与农人相往来，能说能谈，能沟通劳动社会。在学校里，与教员、学生交接，致知格物，能沟通知识阶级。

那么，我们勤工俭学生终日所做的事，莫非华法教育的事业。

因此，我们想来，或者也可以有分一部分法国退还庚子赔款的资格，况且这笔款子退还的时候，是指作教育经费用的。

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争分庚款联合会书记盛成、郑延穀始终没有接得回信！北京李石曾先生也不给我们回信！后来结果只落得：敬候北京解决！……

我现在来做一个结论，与国人谈一谈我们勤工俭学生的使命。俗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又说："苦尽甘来。"

我国自戊戌政变以来，留学生至今日，可列许多等！留东学生、留美学生、留欧学生！可是这些留学生在海外的时期不多，或则拿官费在海外立家庭，而对于海外没有一种正确的认识。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青年忽由意想趋于实际，留学生的阶级增多，有官费生，有自费生，有俭学生，有勤工俭学生，有华工俭学生。后二者，破除一切成见，去研究欧洲实际社会的组织，唯最是欧洲社会的现象与它的循环法。在外面看来，我们勤工俭学生是受社会化、共产化与无政府化，其实我们是"知行合一"的坚决的信徒与实行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我们勤工俭学的主义是：

"工者必学，学者必工。"

一部勤工俭学史，叙到此处可以完卷了。但是社会的改革，往往以多数的牺牲造成少数的结果，古诗云："一将功成万骨枯。"

虽然勤工俭学成功者不曾枯了万骨；但是天演公例与社会原则，还是给强者、胜者以成功的机会。

强者、胜者是吃尽苦中苦者！

自然，从前提倡勤工俭学运动者，可以说："有志者事竟成。"又有谁给意志薄弱者一些坚强的意志呢！

摘自盛成：《海外工读十年纪实》，中华书局 1932 年 8 月

留法勤工俭学若干情况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

陈　泽　孚

吴、李二先生的提倡勤工俭学，是以吴先生自己的苦学经验和李先生在法国所创办的豆腐公司有了实行的人做基础，再加以“五四”运动青年向上求知的精神所感召，更加以当时国内环境恶劣，军阀专横、教育破产，遂由此激起了一般浩大奔放的潮流，有志青年，从中国的四面八方，都投到这个学术探险的工读旗帜之下，而作西游的冒险。在当时被那些政客官僚和买办阶级所认为洪水猛兽或者有玷于官费自费留学生身份的一大群叫化团，实际乃是一群无党无派，只是追求光明向上的集合体。虽然它的分子非常复杂，人生观念，亦千差万殊，而看看西洋景以后，在他们的观感方面，多少总会有些转变，总比锢闭在荒村僻壤，抱残守缺，故步自封的成效好得多罢！乃不料当时的北洋政府和各省的地方政府，对于这一运动，不是看得过于严重，即是估量得太低，绝对不肯为国家或地方作育人材着想，在留学经费方面，稍给资助（自然也有些省份是例外的），而驻法使馆，却因过份歧视这个运动，不惜多方阻挠和破坏，以致演成纷歧错杂的思想，造成国家民族陷危的现局！

却说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人数，在一九二一年冬天，似乎已

达到了饱和的时期，分散法国各地，求学的求学，做工的做工，总数将以千计，而多数却居住在巴黎附近。法国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经济状况，尚未复原，工商事业仍停留于半睡眠的状态中。冬天，好象专门给人类带来了许许多多的苦闷和不幸。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以人数既然相当的多，遇到这个当口，求学既没有经费，做工又无厂门可入。而且连已经做工的人，亦因许多工厂停工而致于失了工作。华法教育会虽然想竭力来替失学而且失工的学生设法帮忙，每人每天发给五法郎的维持费，供在学的人，继续求学，失工的人暂维生活，终因杯水车薪，来源不继，大起恐慌。试想以一大群志在有为，富于冒险性的青年，同在一条求知与生活受到了煎熬压迫的死亡线上，怎能不多方想法，寻找出路呢？在私人社团方面，既已力有未逮，于是乎他们的目标，遂不得不转移到政府一方面去，于是乎乃有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发生包围驻法公使馆的运动。这个所谓“二·二八”运动，固然由于一部份人所策划和操纵，提出了“要求生存权”“要求求学权”的口号；但是，“无风不起浪”，在当时普遍的迫切需求之下，却已成为一致的要求。

当时，在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间，各因志趣和信念的不同，形成了若干小的组合，就我国人所知道的来讲，例如陈延年、陈乔年、李卓、华林等的工余社；蔡和森、向警予、薛世纶、李维汉、肖子暲、李富春等的工读世界社；周太玄、曾琦、李璜等则原为少年中国学会的重要份子、待到“二·二八”运动失败以后，蔡和森等乃宣布勤工俭学以死刑，主张不做工，专求学、陈延年等则表示异议，主张以工济学，仍为青年获致光明的大道。因此引起了蔡和森等的反感，张贴标语，骂工余社为勤工俭学的牌位。其实，这些都是一点意气之争，并无任何背景，对于当前

实际的困难问题，都没有具体解决的办法。

巴黎的三月春光，天气渐渐地和煦起来，法国各地的大工厂，也许是得了战争损失的赔款，经济渐渐活动，工作相继展开，华法教育会和驻法公使馆与法国政府洽商结果，决定由若干工厂，分批容纳中国学生入厂做工，并有不少学徒位置，用抽签方法来决定去取，于是候工的学生纷纷投入各厂，正式工作，其中以克鲁梭的西内代工厂——为法国最大的炼钢、铸炮、及制造火车头的著名工厂之一——人数为最多，当时有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大本营之称，“二·二八”运动的余波，在表面上，从此暂告停息。但内部，却正酝酿着次一行动。因为在克鲁梭的学生，人数既多，接触的机会亦多，于是有赵世炎、李隆郅（即李立三）、王若飞、任卓宣等发起勤工俭学期成会，想把各种主张不同的中坚分子团结起来，曾经集议数次，意见渐见融洽。可是不幸得很在巴黎方面因为有一部份学生对于蔡孑民先生曾有欠当的表示引起了蔡先生的不满。同年秋天，中法里昂大学宣布成立，这个大学的经费来源，都取给于退还的庚子赔款，庚子赔款的退还，可说是勤工俭学学生的唯一希望所在，亦即是吴、李诸先生提倡留法勤工俭学的使命所在。今一旦实现了，而留法的勤工俭学学生反被一律摒除在校门之外，大批从国内新招而来的学生，源源从马赛登陆，到达里昂，风声所播，群情激愤，这乃是一种相形之下的反感，凡属人类，尤其是曾经受过了多少折磨和刺激的青年学生，似乎都难于忍耐下去的。结果，却予那些素向歧视华法教育运动的人以可乘之机，而作一网打尽的鬼计。

“争回里大”的呼声，从法国各地的学校工厂，凡是有中国学生居留的地方，扩大开来了。克鲁梭便成为这个行动的司令台，各地的勤工俭学学生，分成两批，一批组织先锋队，一批组织后

援队。前者向里大校舍作占领的进攻，后者准备继续的援助。驻法公使陈箓，一向是嫉视吴、李诸先生的设施的。加以“二·二八”运动，受到学生的包围，认为这是吴、李二先生加诸他们的侮辱，这次他却将计就计，一面怂恿学生进行占领里大，一面又向法国政府建议，请将此批不稳的学生，加以拘禁，然后遣送回国。

大约是十月初旬的某一天罢！确实的日子，此刻已经记不清楚了，天气还是相当的暖和，我们担任后援队的人，在克鲁梭工厂得到先锋队的同学百余人，被法国军警所拘捕，禁闭在里昂兵营里的消息后，立刻就推派代表，去里昂一面慰问被拘同学，一面请吴稚晖先生设法营救，我系当时被派代表之一，当我去见吴先生时，石瑛先生亦在座，彼此商量结果，当天晚上即随吴先生搭车去巴黎。据吴先生说，他是想托章士钊先生去向陈箓疏通，释放被拘同学，但结果，以法国政府遣送学生回国的船位都已定好了，绝对无法挽回。遂搭然而返里昂。不出数日，即见百余被拘的同学，由法国军警押解乘车到马赛，登轮回国。于是争回里大的一幕惨剧，从此告终，而中国内乱的祸根，亦可说是从此开始，后来赵世炎、李隆郅以及我们的朋友冯克毅等，都在船靠新加坡时脱身辗转重回法国，从此以后，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失去了一个共同的观念与保姆，四分五裂，自寻出路，变化甚大。有些得到雷鸣远的协助，转往比国求学，有些仍投入工厂做工，而陈延年、陈乔年则因愤慨于里大当局处置的失当，遂改变其不受父亲陈独秀接济留学经费的初衷，而与赵世炎、李隆郅、王若飞、周恩来、任卓宣诸人合伙，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而中国国民党经过了民十三年的改组扩大组党范围，法国党部，由王京岐主持，拉拢各方活动分子加入国民党，于是共产党的活动，遂得加速地展开。同时曾琦、李璜等亦即进行组织青年党的工作，留法

学生界，经过这样一来，情形愈加复杂，早已失去了当年勤工俭学提倡的精神，而成为政治斗争的场合。后来共党分子由法国政府驱逐出境，转往苏联，受过若干时期的训练以后，由于国共合作的成功，遂全体回国参加国民革命，从此以后，他们那套夺取政权的工作，则为举国所共知，无待赘述了。

摘自《世界社的精神——从勤工俭学到社会化》，《世界月刊》第二卷第六期，1947 年 12 月

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

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

第三册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6·25印张　368,000字

1981年11月第1版　1981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500

书号：11071·145　定价：1.60元

封面设计：王　晖　蒋士欣
封　面　画：文国璋

书　　号：11071·145
定　　价：1.60　元